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特殊少将的特殊使命——杜重石传奇



内容提要

这部传记文学，写的是统战工作者杜重石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杜重石，四川广安县人，1932年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毕业以后，出任以杨森为军长的二十军军部秘书兼广安第一中学校长，时年20岁。

1937年，杜重石出任二十军驻上海办事处少将处长。1938年春，他代表杨森去延安访问。出于爱国热情，入抗大第四期学习，并秘密入党，成为特别党员。1939年春，他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派遣，在四川以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少将主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议以及“袍哥大爷”等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统战工作。1946年被捕入狱，经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保释，出狱后逃往香港，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出任民革西南工作区中央特派员。1949年5月由成都经香港去北平，同年12月奉周恩来的命令再度入川，任贺龙的政治代表，继续做统战工作。

统战工作难做，从事统战工作者更容易“犯错误”。1950年因党内派性作怪，杜重石被排挤出四川，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又因当年掩护的少将身份被作为“历史反革命”而错捕错判，去安徽劳改近20年，历尽了人间苦难，终于1980年平反昭雪。

杜重石现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上海市长宁区委顾问、上海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会长宁分会顾问、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委员兼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第一章 杨森提挈后辈

1932年，杜重石在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毕业后，凭他父亲与杨森的深厚世谊，被杨森任命为二十军军部秘书。

从此，这个本来学艺术的学生，进入了军政圈子，在坎坷的道路上艰难地颠簸了一生。

一、讲闲话引出话头

四川古为巴蜀之地，川东为巴国，川西为蜀国。据《人民日报》1988年11月19日的考古发掘报道，早在200多万年前，就有人类的祖先在这里繁衍生息，所以这里也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之四川省是我国各行省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行省，现有人口1亿1千多万，将近我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解放前，现在的四川省分为四川和西康两个省。整个西南地区共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个省。当时西南地区川、康、云、贵四省一共7000万人口，四川就占了5000万。半个世纪来，我国总人口翻了一番，四川省的人口相应地也翻了一番。

四川不但在西南四省中人口最多，物产也最丰富，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但是这个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其实只富了一个“川西坝子”，而川东和川北的山区则十分贫穷，老百姓连穿衣、吃饭都有困难。

1949年11月，笔者是二野三兵团进军大西南接管部队的成员，路经川东秀山、酉阳二县的交界处，当时天降大雪，命令就地宿营。我们一个班在公路边不远的半山坡上找到一家老乡，就在那里住下。进门不久，就发现这家人家夫妻两口子只有一条能遮羞的裤子，需要见人或外出的时候，两口子倒换着穿；一个五六岁的小儿子赤条条一丝不挂地站在大门口看雪；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因为既没有衣裳也没有裤子，只好躲在床上不露面，后来见她像猫似的溜下床来上厕所，才发现她身上也是赤条条地一丝不挂。再看看他们的床上，除了茅草之外，根本就没有被褥。问问孩子，只知道吃苞谷，根本不知道大米饭是什么东西。于是全班同志纷纷解开背包，拿出不多的替换衣裳来“武装”了这一家四口。“解衣衣人，推食食人”之余，得知这家人家已经四个多月没尝到盐味儿了，于是我们又把随身带着的食盐给了他们小半碗。两口子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几乎给我们下跪。

第二天出发，一路上经村过庄，所见到的大人孩子包括姑娘、媳妇儿在内，身上挂的全是“烂巾巾”，也就是无法再补的破布片。于是大家再次解开背包，许多人自己也只剩下身上的一套军装了。

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贫穷的百姓，而且是在号称“天府之国”的公路边儿不远处。同是一个四川，贫富悬殊竟有如此之大！后来我把自己的亲眼所见讲给许多人听，居然还有人不相信这是真的！

广安县，在四川省东部，距离成都约200公里。清代以前属顺庆府管辖。辛亥革命后废顺庆府，改名南充。现属南充地区管辖。这里地处山区与盘地的缓冲地带，没有太高的山，也没有广阔的平原，县境内以丘陵为主，连县城也建在半山坡上。有一条

渠江，从东北往西南流经全境，到合江与嘉陵江汇合，注入长江入海。

物产和生活尽管比不上川西，但比山区还是富庶一些。

据清代《广安县志》记载：“广安厥土饶沃，无旷土，无闲田，无沃瘠之别，无水旱之忧。树以桑麻榆枣，畜以牛马鸡豚，植以葱韭蔬果，延以瓜瓠薯葛。广安物产富饶，凡山林竹柏之材，原野羽毛之族，陂池鲢介之虫，水陆草木之实，岩洞药石之宝，畜产皮角之富，兼而有之。兹地所产之稻米‘苞谷香’尤滋润，号称金羹玉饭；所出之蚕丝品质特优，黄白莹然；所织之襁布，汉赋有载，谓为筒中黄润，一端数金。”

本地人为本县修县志，不免要自夸几句，实际上广安的天时地利，都不如县志上写得这样好。

处于丘陵地带的广安县，山坡一般都比较平缓。即便是石山，也很少有突兀而起的崇山峻岭。山虽然大都是土山，可惜土质较薄，不利于草木庄稼生长。但是每个山顶，几乎都有一棵黄桷树孑然独立，树干挺拔，枝叶茂盛，树冠伸张，远看幢幢如华盖。怪的是，每个山顶，总是只有一棵黄桷树，很少有两棵并排的。因此“识者”有曰，广安县要出几个大人物，不过他们只能各立山头，独霸一方，互不相关，互不统属云云。

这话也许不错，因为广安县确实是个出人才的地方。著名的地方军阀杨森，就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广安县人。第一，他的小老婆之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至少在国民党的军政要人中，恐怕是数一数二的了；他几乎到处都有公馆，每个公馆里都有个小老婆。老婆多，自然子女也多。子女吃饭前，要做祷告。但不是向上帝祷告，而是同声念出：“爸爸给我衣穿，给我饭吃……”第二，他与共产党的关系，说不清也道不明。1920年，恽代英与萧楚女在泸州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不但支持，而且还常常参加活动，似乎颇有进步倾向；北伐期间，他当二十军军长，共产党员朱德，是他的党代表；他儿子杨汉忻、侄女儿杨汉秀，又都是正牌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杨汉秀，还是延安派到重庆去做策反工作的，四川解放前夕，让军统局特务杀害了；他自己本人，在四川当军阀，与各川军军阀争地盘，到上海抗战，几乎全军覆没，当过贵州省省主席，也当过重庆市市长，后来到了台湾，活到96岁，不但在90岁高龄还娶了个17岁的小姑娘做第13房姨太太，居然还给他生了第43个孩子，开创了夫妻年龄悬殊、老年得子两项吉尼斯记录。此人一生，可谓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的，不是四川军阀、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广安县人杨森，而是另一个更具传奇色彩的广安县人杜重石。他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而且还是个袍哥大爷。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中国的现、当代史。

他——是杨森的秘书，是二十军驻上海、成都办事处的少将处长，是延安抗大的学生，是秘密的共产党员，是贺龙的政治代表；

他——学的是艺术，干的是政治，当的是袍哥大爷，做的是党的统战工作；

他——坐这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共产党的监狱，铁骨铮铮，虽九死而无悔，历史最终证明他无罪；

他——是一个特殊的少将，一个特殊的党员，一个特殊的袍哥，一个特

襁——指襁城。川东古为巴国，有襁族人在今广安地区筑襁城。公元前316年，巴国为秦所灭，改襁城为宕渠县，属巴郡；五代改名始安；隋复襁城旧名；唐改名渠江；宋改名广安，以迄现今。

殊的犯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在特殊的道路上，忍受着特殊的委屈。

人人都知道，革命战争，有明暗两个战场。一个在地上，那里炮火连天，硝烟遍地，军号一响，冲锋陷阵，与敌人展开白刃战、肉搏战，争的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为每一寸土地付出血的代价，较量的是武力；一个在地下，这里听不见枪声，看不见炮火，凭的是社会地位、人际关系，以语言作武器，用文字作刀枪，也许还要嘻嘻哈哈，频频碰杯，甚至出入歌厅舞榭，妓院娼寮，在与敌人“同流合污”中进行隐蔽的战争，较量的是智力。一个有勇有谋的斗士，往往愿意在明的战场上拼搏，争一个谁强谁弱，斗一个你死我活，是胜是负，心明眼亮，胜得痛快，败得心服，而不愿意在暗的战场上用一言一语、一计一谋去磨磨蹭蹭，去勾心斗角。其原因，就在于地下战场的战斗比地上战场更激烈、更复杂、更难于应付，对个人来说，更充满危险性。

但是，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两个战场，却又是互为因果，缺一不可的。有时候，地下战场所取得的胜利，能胜过地上战场十万神兵的战果，甚至是地上战场所不能取得、不能替代的。因此，不管地下战场有多么困难、多么危险，还得有一部分革命战士而且是最优秀、最忠诚的战士舍命去做。

其实，不论地上战场还是地下战场，根本的目的，都是削弱敌人的力量，增加自己的力量。地下战场，如果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以取得敌方的情报为目的，一个以取得对方的理解为目的。第一个地下战场的斗士，不管他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都要求具有各种各样用于窃取情报的技巧，包括化妆、跟踪、摄影、游泳、驾驶、打斗、密电、急救等等全套技能，以便在任何困难的处境下顺利取得情报，为地面战场服务；还需要机智勇敢，善于随机应变，一旦暴露，要凭自己的本事“全身而退”。第二个地下战场的同志，是从思想、认识、利害关系等方面争取敌对营垒中的人脱离敌方与我联合，以分化、瓦解、削弱敌方的力量，或争取中间力量为我方所用。

在敌占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就属于第二个地下战场。

“统战工作”，不但比地上战场的战斗难打，而且比地下战场的第一个战场处境更困难。其困难之处，不仅仅在于要遭受到敌方的袭击而牺牲，更有可能来自自己方的误会、中伤而惨遭磨难甚至杀害。

这部书中所写的杜重石，就是我党一个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而在解放后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前辈。他那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本书中，说的固然主要是他一个人的历史，但是通过他的故事，反映的则是近半个世纪来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

二、军部秘书兼一中校长

广安属于丘陵地带，即使是县治所在的广安县城，也不是一马平川，民居大都依山逐水而建，有高有低。

当年的广安县城内，有一条“正街”，又有一条“后街”。在正街与后街的交叉处，有石阶拾级而上，名为“州坡”。在州坡上面，有一所广厦，住着杜氏家族四世同堂的老少50余口。杜家堪称当地望族。1913年9月19日（农历八月十九），杜重石即出生于这个殷实的富户人家，在兄弟中行二。

杜重石的父亲名奉圣，号述言，生于清光绪二年丙子（公元1876年），与邑人视学（相当于现在的县教委主任）王宣奕、翰林蒲殿俊（清解元，四川立宪派首领）同庚。三人过从甚密，互称“庚兄弟”。述言先生世居广安，忠厚传家，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在邑人眼中，是个正直的士绅，声望甚高。杜重石上小学的时候，广安县团练局邓局长曾邀请述言先生为其副职，但述言先生淡泊名利，婉言谢绝，并矢志终生隐德不仕。

按照杜氏族谱“奉先宜全……”的辈份儿，述言先生给大儿子起名叫先觉，字斯民，给这个“老二”起的族名叫“先器”，字“重石”，后以字行。后来还有一个老三，名先谷，字文博。

当时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人们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和标榜民主共和新政的“中华民国”都抱欢迎的态度与殷切的希望，纷纷把孩子送到本地新办的小学、中学去读书。但是当时已经有二三十万人口的广安县，却只有一所初级中学。读完了初中，只能到顺庆府去读高中。稍有经济实力与政治远见的家长，干脆把孩子送到成都、重庆甚至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的高等学府去深造，以便接受更多的新知识、新事物。

杜重石既然家道殷实，父辈又是开明士绅，也算书香门第，当然不会例外。他从小天资聪颖，16岁中学毕业以后，就到当时最“开化”的上海去读书——进的是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的是戏剧与绘画。

1932年暑假中，刚刚步入20岁的杜重石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广安，正好赶上八月十五“团圆节”，与家人团聚；也赶上了自己的“弱冠”大礼，向家人、亲友宣布自己已经成熟，可以出仕“替天行道”了。

他少年英俊，一表非俗，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称得上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他家学渊源之外又加西方艺术的熏陶，更显得谈吐风雅，风采照人，学贯中西，才华横溢。他的学成归来，一时间竟使小小的广安县城人人瞩目，成为“风云人物”了。

大学毕业，应该献身于社会，学以致用了。但是干什么事情好呢？

他学的是艺术，长于戏剧和绘画，要让他自己选择职业，当然最好是搞艺术，以实现自己从小就梦寐以求的理想。不得已而退一步，不妨到中学里去当个老师，为国家培养一批有志于艺术的青少年，用戏剧和绘画去反映国家民族的苦难、人民的疾苦，从而唤起民众，振兴中华。可是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四川省经过一二十年的省内内战，至今仍陷于军阀割据的局面，一方面是许多急于要做的工作没人做，另一方面许多有才能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以至于像杜重石这样有为的青年，竟连这样一个极低的愿望和要求也实现不了。

当时“九一八”事变刚过去一年，东北三省已经沦于日寇之手。尽管爱国志士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义愤填膺，但是各地封建军阀割据一方，拥兵自重，并不以国家安危、民族荣辱为念。对于一个学艺术的青年来说，要想通过戏剧与绘画来“艺术救国”，岂不是痴人说梦？

为了给儿子寻求出路，杜老先生带着“学成回乡”的杜重石四处拜客。当时的广安，一切都在地方军阀二十军军长杨森的统治与控制之下，他不仅控制了军队和县政府的各部门，就连工商界、教育界也都由他说了算。杜老先生在当地是知名士绅之一，他与杨森并非泛泛之交，而是世谊甚深。杨森从下川东败退川北，回到老家广安，头一个拜访的就是述言先生，可见交情非比一般。既然一切都要通过杨森安排，因此杜重石回到故乡以后，述言先

生带他去拜访的第一位“父执”，就是杨森。

杜重石跟着父亲到了杨森的公馆。杨森的公馆很多，几乎各大城市都有。在汉口的叫“杨森花园”，在重庆的叫“渝舍”，在成都的叫“蓉庐”，但是在老家广安县城内，反而一直没有他自己修造的公馆。他原籍湖南衡州，祖辈迁居广安龙台寺，他在顺庆中学读四年级的时候，考取了清廷设在成都的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从此离开家乡，先后在云南、四川各地带兵打仗，在混战中发展势力，争夺地盘，军马倥傯，很少回到老家来。直到1928年底在下川东战役中被刘湘战败，兵退川北渠县，又于1931年初占领广安、岳池、营山、蓬安、顺庆五县，把军部设在广安城里，决心把老家当作他东山再起的根据地，这才着手在广安建立公馆。

自从杨森在下川东战败之后，是他历史上最穷的时候。部队粮饷无着，靠东挪西凑和友军接济过日子。军官不论大小，每人每月一律发两块八大洋。可见杨森当时经济上窘迫之一斑。

尽管杨森占领了广安等六县以后，增加了地方赋税和盐税的收入，但要他拿出十几万银元来盖一所新公馆，一时间还是办不到的。但是堂堂军长，总不能没所公馆。何况他妻妾成群，子女众多，总不能叫姨太太们也像士兵似的住集体宿舍、打通铺吧？

正好坐落在县城北沧沟街的一所王氏巨宅要出售，杨森以2.8万银元的价格买了下来，经过装修扩建，粉刷一新，倒也相当气派。

所谓的“北沧沟”，其实是一条臭水沟。杨森的公馆既然坐落在这里，北沧沟也就得到了疏浚，河水清且涟漪，夹岸垂柳依依，风景之美，犹如公园一般了。

公馆落成以后，因广安昔称“城”，有人建议定名为“庐”，杨森未取，自己起名叫“涵虚山庄”，并亲笔写了，刻在汉白玉石上，镶在大门的上面。

杨森的“涵虚山庄”，杜重石也还是第一次来。这座在广安全县来说堪称一流的公馆，却居然建在半山坡上，是顺着山势一进入从低到高修建的。整个建筑群，大门的地势最低，里面的房屋，一幢比一幢高，远远看去，重楼叠翠，非常雄伟。大门外面，左右各有一片栽着“铁线草”的青草地，植有法国梧桐，看样子是原房主的旧物。进了大门，迎面有四棵硕大的铁树，枝叶茂盛，非常壮观。这可是杨森花了重金从广东购得，再通过水路不远万里运回广安来的。——不知道是它们“水土不服”呢，还是年龄不到，据说到了广安以后，就从来没有开过花儿，一直到1978年，四株铁树方才同时全开花儿了。——沿着台阶拾级而上，进了二门，有几进院子，四周都是高大的瓦房，最前面的一进是杨森的书房和会客室，后面的几进是他的“后宫”。再往上走，则是杨森的“后花园”。这里虽然没有“四时不谢之花”，但是青石台阶的两旁，果木花草却也不少。山顶上还有一个“涵虚洞”，一般人轻易不能进去，可能是他“静养”或者处理军机大事的地方。

杨森子女众多，自己也喜爱体育运动，翻修涵虚山庄的时候，居然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愣在半山坡上开辟出一座儿童游乐场和一座不算小的网球场来。

杜老先生带着儿子，专程拜谒，杨森在书房盛情接待。

杨森虽然是广安人，但是极少回到故乡来，所以对杜重石这个下一辈的青年，其实并不认识。杜重石从小眉清目秀，聪明乖巧，很得大人的喜爱；

在学校里读书，总是名列前茅，常得师长们的夸奖。如今大学毕业，已经是一个体魄强壮、思想成熟的青年了。经过“九一八”爱国救亡运动洗礼的大学生们，一提起抗日，都有滔滔不绝的一车子话好说。杜重石是个爱国青年，在上海参加过学生运动，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杨森见到这个英俊魁伟的大学生，经过一番谈话之后，就对杜重石十分赏识。

杨森本来就很重“乡谊”，凡是有广安人去投靠他，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录用。他的二十军，高级将领们不是他的子侄，就是他的学生；下级军官和士兵，则绝大多数是广安人。所以人称二十军为“杨家将，广安兵”。杜重石既然是广安人，又是老朋友儿子，杨森自然要格外照应，何况他对这个器宇轩昂的年轻人还特别有好感呢！杨森是个在仕途上久经沧桑的宿将，见杜老先生今天特地携子来访，心里已经明白其来意，所以没等杜老先生提出请求，当时就主动表示要留杜重石在军部当秘书的意思。

对于这样的“恩遇”，如果是别人，简直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是对杜重石来说，却还有些“意犹未尽”。他不是嫌秘书的官儿太小，而是不愿意投身在军阀部队中参加那些毫无意义的封建纷争。他是广安人，虽然在上海读书，对杨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二十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多少也有些耳闻。从洁身自好出发，他并不愿意插足到这个是非的漩涡中去。今天之所以跟随父亲来看望这个“父执”，根本就没想到要“弃文就武、投笔从戎”，而是因为杨森掌握了当地的军政大权，要想谋一个差使，非通过他不可。所以杨森一提出这样的“动议”，竟大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他急忙表示：一者他没有从军的打算，二者他也不是当秘书的材料，只要求在哪个学校当个教师，即于愿已足。

杨森哈哈大笑：“要当老师，这还不容易！我早有志于在广安办学校了，军内军外，文的武的，我都想办。只是目前我刚刚安定下来，百废俱兴，一时还没有那么大的胃口，揽不了那么多的买卖。眼前第一个急着要办的，就是中学。这样吧，你先到我军部来挂一个秘书的衔儿，等我的学校办起来了，马上让你去当教师，这还不行吗？”

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作为晚辈，如果坚持说“不干”，未免太有点儿“不识好歹”了，何况他父亲还在旁边一个劲儿地撺掇怂恿，只好硬着头皮，暂时答应了下来，而把希望和出路，寄托在杨森开办的学校上，寄托在杨森的不食言上。

细想起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缘份”二字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各方面都很不错的人，在某些人看起来，偏偏这也不顺眼，那也看不惯，能挑出一大堆毛病来，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儿去；而一个缺点很多的人，凑巧在某一个问题上与众不同的见地，得到了某人的赏识，于是“一美遮百丑”，于是越说越投缘，于是就有了缘份，于是……于是一切都好说了。杜重石之与杨森，就有这样的缘份。尽管在部队里当秘书，与他的所学相去甚远，他也无志于从军，但在那个时代，艺术不但救不了国，更不能换饭吃，在父亲的开导与劝说下，他终于还是勉为其难地点头了。好在军部的秘书，无非是起草一些千篇一律的公文，杜重石的国文底子深厚，手到擒来，并不吃力。何况杨森的秘书数量甚众，最多的时候，能编一个排，落到杜重石肩上的任务，也不是那么重的。

当时广安城内，办有一所广安中学。那是由地方士绅合资在清代的紫金书院、民国初年的紫金小学基础上逐年发展建立起来的三年制初级中学。

1933年，县教育局根据夏炯的提议、杨森的授意，在离城30里的戴市镇成立一所中学，包括小学在内，称为县立第一中学。经过近半年的观察，杨森见杜重石当个秘书游刃有余，当个教师更其屈才，就决定给他加码，要他兼任县立第一中学的校长。杜重石见杨森果然并不食言，高兴万分，兴致勃勃地到戴市镇上任去了。

那个年代的青少年，能够上小学的称为“百人望”，能够上中学的称为“千人望”；由于家境的贫富不一，学生的入学有早有晚，有的人交不起学费，读两年，停两年，有的人小学毕业以后，结了婚生了孩子，再来上中学，都不是什么少见的事。因此同一个年级中，学生的年龄大都参差不齐，最小的还拖鼻涕，最大的可能已经做了父亲。1933年暑假，杜重石刚满20周岁，而学生当中，年龄比他这个校长大的，也大有人在。

戴市镇是广安县的第一大镇，在广安县境东北，距县城30里许，相对县城而言，地处渠江上游。杜重石既当二十军军部秘书，又当县立一中校长，就不免要“两头忙”。好在那时候他年轻力壮，生气勃勃，虽疲于奔命，也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从此，在小小的广安县，人人都知道有个少年得志的杜秘书、杜校长。

三、杨森和他的二十军

杨森的一生，在四川各军阀之间时分时合，时打时和，反反复复，变化无常；他一心想在四川自立为王，顾忌到自己力量不足，又不得不投靠吴佩孚、蒋介石，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他跟共产党的关系，也是时而联合，时而反目。他是一个典型的多面派人物，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这个人的历史，稍加敷衍，就是一部十分生动有趣的演义小说。由于本书不以他为主角，所以不打算详细叙述他的故事。本书以杜重石先生为主角，以杜先生为中心贯穿全书，与杜先生有牵连的人和事，大都要涉及。杜先生大学毕业以后，就在杨森的二十军做事，终其一生，受杨森的影响很深，本书的后面，也有许多地方要提到杨森及其二十军，完全撇开杨森一字不提，既做不到，也不应该。因此，这里特辟一节，浮光掠影地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四川军阀。

杨森，原名淑泽，字伯坚，号子惠，生于1884年2月20日（清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四）。兄弟姊妹五人，他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老二淑身，字懋修，曾在川军唐廷牧师任旅长；老三淑实，字传三，在杨森的二十军第九师当军需主任；两个妹妹，都嫁给了二十军的军官。

杨森的父亲是个学武的生员。也许他自己练武一生，始终没当上个将军，有些灰心了，所以他不让杨森习武，而送他到私塾去读《古文观止》和四书、五经，后来又上了广安县的紫金小学和顺庆府（今南充）中学。

但是杨森见堂兄弟们都在练武，他自己也很喜欢骑射，就偷偷儿跟着堂兄弟们学，所以杨森勉强可以说是个“文武全才”。这和他一生喜爱体育，也不无关系。

中学毕业以后，杨森考取了清廷设在成都的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并在这里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0年，杨森在陆军速成学堂毕业，被派在成都附近的新军当排长。辛亥革命中，杨森追随陆军速成学堂总办尹昌衡围攻督署，擒杀总督赵尔津，升任营长。

1915年1月，杨森任云南讲武堂队长，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滇军军官，为他以后在滇军中得势打下了基础。

1916年反袁护法之役，杨森任护法军第一军军部参谋。这期间与朱德同事，两人结下了较深的友谊。

1917年8月，杨森任靖国军第二军参谋长、靖国军总部参谋长。

1918年初，杨森任泸州靖国清乡司令兼独立团团团长，支持并参与恽代英、肖楚女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杨森转投川军，任熊克武部旅长。

1921年，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杨森任第九师师长兼川南道尹，一方面任用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支持恽代英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又与吴佩孚暗中勾结。

1922年5月，刘湘兵败，辞去川军总司令，杨森任第二军军长，从此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开始与第一军在万县、重庆、成都之间展开拉锯式内战。这期间，杨森曾邀请朱德到他的第二军任职。朱德因不满国内的军阀混战局面，一心出国寻求真理，谢绝了杨森的邀请。朱德出国之前，杨森为他设宴饯行，并说“虚位以待”，随时等朱德回来与他合作。

1924年5月，吴佩孚操纵的北洋政府任命杨森为“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相当于督军），兼理政务，大批网罗文人学士，成立“智囊团”，提出“建设新四川”的口号，禁止缠足、赌博，提倡运动和卫生，推行新政；并办起了“四川陆军讲武堂”，为自己的军队培养亲信骨干。

1925年，吴佩孚政权垮台，段祺瑞任临时执政，为削弱杨森的权力，任命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节制所有川康军队；任命赖心辉为四川省省长、刘文辉为帮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使四川军阀互相牵制，扩大了彼此之间的矛盾。杨森企图以武力统一四川，结果众叛亲离，反而被刘湘、袁祖铭的“川黔联军”逐出夔门，军队大部被刘湘所收编。杨森逃到汉口，吴佩孚打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的旗号，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委任杨森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收拾旧部，打回四川。这时候刘湘和袁祖铭发生了矛盾，都派人来与杨森联系。杨森两面都接待，实际上他联合刘湘，共同驱逐黔军袁祖铭。

1926年，杨森联合刘湘，把黔军头目袁祖铭赶出四川，将所部改编为十个师，分别驻扎大竹、梁山、涪陵、开县、长寿、夔府（今奉节）、丰都等县，占据以万县为中心的“下川东”地盘。

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进逼吴佩孚盘踞的武汉。杨森见北伐军势力强大，派代表到广州要求“易帜”——因为杨森原来打的是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北伐军打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北伐军总部考虑到杨森的势力及与吴佩孚的关系，派杨森的老朋友朱德带领一批政工干部到了万县。不久，陈毅也奉命从北京来到万县，协助朱德工作。杨森迫于形势，虽然不得不表示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但暗地里仍与吴佩孚有往来。8月21日，还接受吴佩孚给他的“四川省省长”的封号。

8月29日，英商太古公司的“万流号”客轮撞沉杨森军押送银元的两只木船和一只筏子，淹死官兵58人、民工十人，损失枪支五六十支、银元8万多元。朱德、陈毅得到这一消息，极力鼓动杨森向英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8月30日扣留了“万流号”客轮。9月4日，陈毅与中共万县地下党组织成立了“万县被英轮肇祸惨毙同胞雪耻会”，发表宣言，并召开“万具备界

群众抗英大会”。9月5日，驻宜昌英海军陆战队63人，企图将“万流号”劫走，与中国士兵发生枪战。停泊在万县江边的英海军军舰“柯克夫号”和“威警号”即向万县市区开炮，并发射燃烧弹，炸毁、烧毁民房400多间，死亡居民604人，负伤389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

“万县惨案”发生后，朱德、陈毅等人联合万县地下党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英大会，发表宣言，提出赔偿要求，全国各地人民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杨森也做好了与英军开战的准备。形势的发展，使英帝国主义者惊慌失措，不得不派出重庆、宜昌两地的领事出面调停。

这期间，朱德去武汉联络杨森“易帜”的事宜。10月25日，北伐军总部委任杨森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委任朱德为党代表。在杨森之后，四川军阀也纷纷“易帜”。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赖心辉为二十二军军长，刘成勋为二十三军军长，刘文辉为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为二十八军军长，田颂尧为二十九军军长。

1927年1月，英方见中方态度强硬，向吴佩孚求援。吴佩孚出于自己的利益，密电杨森“和平解决”，暗地里让英方给杨森一些赔偿。杨森不敢违背吴佩孚的旨意，释放了被扣英轮，“万县惨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3月，吴佩孚秘密派人来与杨森策划暗杀朱德的事。杨森当然也知道朱德已经是共产党人，生怕自己的部队被朱德所赤化，不能长期留朱德在自己的部队里。但他仍以“友谊为重”，对朱德采取“不杀政策”，而是抬出10万大洋来，请朱德带领原班政工人员以到武汉参观学习为名，“礼送”出境。朱德也从侧面了解到吴佩孚的活动，知道自己继续留在万县非常危险，就离开了二十军。后来蒋介石另派一个姓刘的人到二十军任党代表。朱德走了以后，杨森把二十军中有革命倾向的官兵23人统统枪毙，连他自己的侄儿、第九师师长杨汉域也被关押起来，后来调任军部副官长，剥夺了军权。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不但要与武汉国民政府唱对台戏，还出兵攻打武汉国民政府。他任命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电令杨森率部出川，进攻驻扎在鄂西的武汉政府主要武装力量唐生智部。

5月5日，杨森部自万县东下，9日进驻宜昌，14日进驻荆州，21日进驻仙桃镇（今仙桃市），直指汉阳。6月8日，唐生智集中兵力反击，包围仙桃镇。杨森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处处挨打，6月20日，终于全线崩溃，逃回宜昌，部队伤亡惨重，第九师几乎全军覆没。

刘湘见杨森仙桃镇大败，趁机进驻万县，并打算封锁夔门，不让杨森败军入川。刘文辉、田颂尧等见刘湘后路空虚，又打算趁机进攻重庆。刘湘不得已回师保老窝，杨森方得于6月26日返回万县。——从此刘湘与杨森旧债未清，又加新账，冤仇越结越深。

1927年7月，吴佩孚走投无路，逃到四川。一入夔门，杨森即亲自到奉节，迎接吴佩孚进入白帝城。此后的几个月，他不顾全国各地声讨吴佩孚及国民政府的通缉吴佩孚令，又把吴佩孚接到万县。为此，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1月1日明令免去杨森本兼各职，委任杨的师长郭汝栋接替二十军军长。从此又引发了杨森与郭汝栋之间长达十来个月的争权混战，最后不但大获全胜，还于1928年10月6日迫使蒋介石对杨森发出“免予查办”的明令。

杨森恢复二十军军长职务以后，心心念念，只想找刘湘报昔日之仇。1928年12月16日，杨森发出讨伐刘湘的通电，22日拂晓开始进攻。但是

连战皆败，先出击的杨汉域师全师被缴械，长寿失守；1929年1月3日，全军败退梁山，继而败退达县，绕道宣汉，退守渠县。杨森倒刘湘彻底失败，最后只剩下残缺不全的6个混成旅，下川东一带20多个县的地盘，统统被刘湘占去，不得不寄人篱下，惨淡经营。

从1929年到1933年，杨森以渠县为基础，逐渐扩展自己的势力，又恢复了拥有七八个县的实力。这时候他的虚衔儿计有四川省政府委员、川康绥靖第三路总指挥、四川剿匪第四路总指挥等好几个；但是他真正的“实职”，是二十军军长，真正听命于他的，也只有二十军。

杜重石就是在杨森惨败之后刚刚有些抬头的时候，来到二十军的。

四、杨森的后宫

30年代的中国军阀，除了抓权、弄钱、扩张势力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玩儿女人。从东北的张作霖到西南的杨森，无不后宫充盈，姬妾成群。

在四川的军阀中，杨森虽然以妻妾众多、子女成群而闻名，但还不是川军中的“榜首”。据说原是他手下师长的范绍增，家里就有17个姨太太，至少在数量上已经压过杨军长一头了。

杨森妻妾虽多，却不像历代封建帝王那样纵欲，“从此君王不早朝”；作为一个军人，他依旧黎明即起，从事体育锻炼。正因为如此，他能够活到96岁；到了90高龄，还能够登山，还能娶最后一个小老婆，还能生育子女。在“高龄渔色”这一点上，是任何一个多妻者所无法比拟的，堪进吉尼斯世界记录。

杨森一共有原配妻1人、续弦妻1人、妾10人，儿子21个，女儿22个。

杨森结婚很早，原配夫人姓张，在他中学毕业考取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时候病故，没有留下子女。她有个弟弟叫张元培，一直跟随杨森在二十军军部当军需。

杨森的续弦叫谭正德，又名继贞，四川广安县人，1908年结婚。杨森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以后，谭夫人曾一度随军，生有长子汉忻和次子汉烈。1913年杨森的营长职务被撤，把妻儿送回广安老家。两个儿子都曾在北平读书。长子汉忻信奉共产主义，与父亲长期不来往；次子汉烈一直随父亲在军中任职，是二十军的最后一任军长。四川解放前夕，在四川金堂县率部起义。

三姨太刘谷芳，云南禄丰县人。1913年杨森丢官，到昆明投靠滇军将领黄毓成，替他在温泉监工修造别墅。有个在温泉开茶馆的刘柱卿见杨森能干，主动把长女谷芳嫁给他。杨森发迹以后，刘柱卿曾出任杨森驻汉口办事处处长。刘谷芳生有子女5人。

四姨太田蘅秋，四川阆中县人。杨森脱离滇军转投川军熊克武，任第九混成旅旅长。1920年5月，杨森驻兵阆中，见田蘅秋长得漂亮，就托刘湘的炮兵团长白义普到田家去说媒。田家不愿把女儿嫁给军官做姨太太，媒没有说成。一直拖到1921年，田家慑于权势和压力，由田母出面把女儿送到泸州与杨森结婚。田蘅秋生有子女7人，善于经营管理，后来成为杨森的“管家太太”。所有现金、田产，都由她经管。解放前夕，她携带财产逃到香港，后来定居台湾。

五姨太肖邦琼，四川泸县人。杨森驻防泸州的时候，与团部秘书肖竹轩都住在南门外，两家只有一墙之隔。肖家的女儿肖邦琼是个小学教师，杨森看中了她，让下属拉线，纳为第五房太太，颇得杨森宠信。生有子女5人。肖邦琼的哥哥肖寿眉，因此成了杨森的亲信。

六姨太陈顺容，又名凤英，本是三姨太刘谷芳的贴身丫头，15岁的时候被杨森收房。生有子女5人。

七姨太曾桂枝，贵州毕节县人。她本是杨森在路上捡来的一个小姑娘，也许是弃儿，也许是走失。这个小姑娘聪明伶俐，很讨人喜欢，杨森就交给一个下属收养。稍稍长大，出落得相当漂亮。杨森见了，领回家来，改名杨家桂，先给三姨太刘谷芳当使唤丫头，然后按照陈顺容故事，收为七姨太。当时她只有14岁，年轻漂亮又善解人意，很得杨森宠爱，一直带在身边。杨森专门为她请来一名音乐教师，教她弹琴唱歌，后来还送她到北京、上海等地读书，学习外语。这时候她已经生有两个女儿。

1929年杨森败退渠县，有耳目向他告密，说曾桂枝在上海与一个姓陈的男同学经常在一起跳舞，似乎有越轨行为。杨森听了大怒，立即找了个理由，写信要她速回。曾桂枝到底年轻，不知道利害，还与陈某惜别依依，照相留念。陈某送她一个戒指，她当即戴在手上；陈某要求她回四川以后代他在杨森面前谋一工作，她也满口答应，甚至回到渠县以后，仍继续与陈某书信往来。杨森看见她手上戴的戒指，偷看了他们的合影和来往信件，也不发作。曾桂枝以为他什么也不知道，还天真地要求杨森给陈某安排一个好工作。杨森很痛快地答应：“你写信叫他来，我让他当县教育局局长。”曾桂枝信以为真，立刻给上海发信，陈某接信，高高兴兴地动身来四川。刚走到渠县附近的乌水滩鲤鱼桥，就被杨森派去守候在那里的人开枪打死了。杨森得到消息，又叫两个马弁送曾桂枝坐船到鲤鱼桥去接陈某。曾桂枝不知道死期将至，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满怀高兴地上小船。船到鲤鱼桥边，曾桂枝刚刚一脚迈出船舷，正四顾寻找情人的时候，身后的马弁喊了一声：“曾太太，对不起！军长的命令！”话音刚落，枪声就起，曾桂枝应声倒地，去追赶他的情哥哥去了。

接着一条船马上来到，船上坐着杨森的侄儿杨汉印和五姨太的哥哥肖寿眉。他们用石头绑在两具尸体上，沉入了渠江。

曾桂枝和陈某死后，据说渠江江面上经常出现一对形影不离的野鸳鸯。当地人都相信这是曾、陈两人的精灵所化，就把鲤鱼桥改名为“苦鸳鸯桥”，沿用至今。

杨森听说曾桂枝是在跳舞场上认识的陈某人，很认真地说：“只能我和别人的老婆、女儿跳舞，我的老婆、女儿绝对不能和别人跳舞。”并以此作为“家规”，要妻女们严格执行。

又有人说，曾桂枝认识陈某人是田颂尧的一个家庭教师从中牵线的，他不问真假，派手下把那人暗杀了。

八姨太汪德芬，四川成都人。她是杨森杀害七姨太曾桂枝以后，于1930年在广安县新娶的“填房”，当时只有15岁。她父亲原来是成都的一个中学教师，后来在二十军军部当秘书。汪德芬结婚以后，还到广安中学继续读书，并由军部的音乐顾问姜芸丛和闵德新教她弹钢琴，发现她有音乐天才。1932年底，杨森派秘书张晋才送她到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音乐。毕业以后到成都，在杨森办的天府中学当校长，以后一直住在成都。她依靠杨森的势力，当过

“国大代表”。生有子女 4 人。

九姨太蔡文娜，四川泸县人。她是泸县女子中学的“校花”，经人撮合，把她送到资中与杨森同居，当时只有 14 岁。后来杨森把她送到广安中学读书，自己住在泸州。不久就听说她与教英文的男性家庭教师关系暧昧，杨森把她接到泸州，打算处死。众姨太以她年幼无知苦苦求情，杨森用马鞭狠狠打了她一顿，又要田衢秋作保，才算了结。抗战期间，她在成都华西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还有许多故事，后文将详细介绍。她生有两个儿子。

十姨太郑文如，重庆人，原来在重庆南岸裕华纱厂做工。她有个远房舅舅叫杨正谊，在二十七集团军当军医。他为了巴结当时在贵州省当省主席的杨森，于 1945 把她带到贵阳，通过杨森的副官王联奎用汽车把她送进杨森公馆，收为第十房姨太太。后随杨森到重庆，生有子女 2 人。重庆临解放时，她已经失宠，所以杨森逃到台湾，也没带她一起走。解放后嫁给一个工人。

十一姨太胡洁玉，四川广安县人。她是杨森老家的仆人胡应忠之女，14 岁的时候到重庆读书，住在杨森公馆里，杨森的子女都叫她胡妹妹。这时候杨森已经 60 多岁，见她长得漂亮，一定要纳她为妾。胡应忠竭力反对，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把她带回广安。杨森不舍，亲自驱车到广安，以送她进国立女子师范读书为名，又把她接到重庆。胡应忠十分生气，发誓从此再也不进杨家大门。1949 年杨森从重庆逃跑，把她带到台湾，送她进台湾大学读书。在杨森 86 岁那一年，胡洁玉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又送她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书，1959 年毕业，取得博士学位，并成为核物理教授。

十二姨太张某，台湾人。杨森虽然妻妾众多，但他到了台湾以后，田衢秋年老多病，另住别处，胡洁玉去了美国，子女也大都分散在国内外各地，身边实际上没有亲人。在他 90 岁那一年，聘请了一位 17 岁的初中毕业生当他的秘书兼如夫人，上下通称她为“张小姐”，经常陪着他爬山、骑马、打猎、游览、参观、访问，还给他生了最后一个女儿。

杜重石到二十军军部的时候，杨森的妻妾还只编到第九位，其中原配夫人已经故去，七姨太已经被处死，实有妻妾为七人，子女共 20 多人。广安县的涵虚山庄落成以后，众妻妾大都住在山庄内。

杨森自称是北宋边将杨继业的后代。在军中，他搞的是任人唯亲的“杨家将”；在家里，他用封建主义加法西斯对妻妾子女进行严厉的“管教”。

他的妻妾们，一律不准请客，不准打牌，不准抽烟，不准酗酒，不准跳舞，不准私自拿用家中的东西等等。家中的事务，按月由各房妻妾轮流管理。也和《红楼梦》中的贾府一样，大人孩子都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月份钱”。他在家的时候，年轻的姨太太必须在清晨 5 点钟起床，陪他打网球或骑马。他虽然子女众多，但仍然鼓励妻妾生育，怀孕之后即给 5000 元生活补贴，孩子一生下来，就在外国银行开户，存款 2 万元（他自己在日本正金银行存款几十万，抗日战争爆发后全部被日本没收）。姨太太们为了得到这笔钱，千方百计争媚邀宠，希望多生子女。杨森一生最怕戴绿帽子，一旦发现妻妾有外遇，处置起来是极残酷的。杨森还购置了大量的田产和房地产，分给妻妾们。泸州的田产分给蔡文娜、肖邦琼，成都的田产分给汪德芬、蔡文娜、肖邦琼，广安的田产分给陈顺容，重庆的田产一部分分给郑文如，郫县的田产分给田衢秋，在汉口的房地产分给刘谷芳。

他要求子女们都要大学毕业，一律住校，只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才能回家。还必须学会骑马、打球、弹钢琴。家里请了许多家庭教师，分别教妻妾儿女

们古文、英文、数学和音乐，并经常举行家庭音乐会和球赛，目的是检查子女们的学习成绩，每次的家庭音乐会，按例都必须先演唱由他作词、由著名音乐家刘雪庵作曲的混声四部合唱歌曲《杨氏家歌》。

杨家开饭，不但热闹，而且很富于戏剧性。饭厅里“品”字形放三张圆桌，上边一张大圆桌，坐的是杨森和他的妻妾，姨太太们一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众星捧月似地拥着杨森；下面两桌，一张大的是大儿女们的饭桌，一张小的是小儿女们的饭桌。子女不论大小，开饭之前，都要像教徒做祷告一样，双手合十，拖长了声音，先念一篇杨森制定的“感谢词”：

爸爸妈妈，给我们饭吃。我们要听教训，学好人，才对得起爸爸妈妈。请！

说完了这个“请”字，方才开始吃饭。

“杨公馆”里面的故事，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足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杜重石虽然年方弱冠，还没有接触过社会，但是终究在上海那个大地方上过大学，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新思想。因此，他对于杨森的所作所为，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看不惯的，甚至也有反过来受杨森影响的。在他的一生中，接触杨森以后，堪称是他人生道路的第一个转折点。

第二章 夹缝中求生

杜重石到二十军的时候，正值杨森在下川东战败，龟缩在家乡一隅，前有刘湘等实力派四川军阀虎视眈眈，后有红四方面军开拓革命根据地与他争夺地盘。杨森处于夹缝之中，两面都不敢得罪。掂掇轻重，他也想联合共产党打击老对头刘湘，因此派杜重石等人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达成了协议。可惜，张国焘在取得胜利后，不讲信用，调转枪口，又来打杨森。于是，合作破产了。

一、文武全才的夏旅长

杨森手下的军官们，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年轻，不但排、连、营长个个都是小伙子，就是团、旅、师长，也极少有“老将”。第二是亲信，不是他的子侄，就是他的学生，最少也是广安同乡人。

第五混成旅的旅长叫夏炯，思想进步，作风正派，文韬武略俱备，颇有儒将风度，是川军中以开明、求新著称的将领之一。自从杜重石当了军部秘书以后，夏炯见他少年老成，谈吐不俗，抱负不凡，也很器重他，两人经常交往。后来杜重石兼任设在戴市镇的县立第一中学校长，第五旅的驻地当时也在戴市镇，两人见面的机会更多，感情也日见融洽。

夏炯是杨森 1921 年在泸州办的“陆军讲武堂”的高才生，毕业后一直追随杨森。1926 年，夏炯在万县的“四川讨贼联军总部”担任“将校队”队长，相当于团长。所谓“将校队”，就是“军官大队”，任务是集中训练收编来的非嫡系军官，以便统一思想，好为杨森效力。1926 年 8 月杨森“易帜”以后，夏炯曾出任第九师师长。下川东一战失利，二十军取消师的编制，他出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夏炯从进四川陆军讲武堂到 1933 年当旅长，前后还不到 10 年时间，年龄还不到 30 岁，在杨森军中，也算是提拔得比较快的。

此人爱憎分明，民族气节强烈，对于外族入侵，反抗的态度十分坚决，但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则与一般军阀部队等同看待，认为也是以武力扩张势力、侵占地盘，谋求的不过是少数人的利益。因此对红军应该联合还是应该打击，当以自身的需要为依据。他的这些看法，可能受杨森的影响较深。

夏炯不但善于带兵打仗，在军事之外，他的所想所说、所作所为，也与一般的军人不大一样。

广安县城和戴市镇都在渠江的旁边，夏季要游泳，跳进江里就能游一个不亦乐乎，根本不用花一分钱。但是夏炯却偏要花费人力物力在自己的驻地戴市镇修建了一座游泳池。这在 30 年代初的四川乡镇，简直成了一件破天荒的新鲜事儿，在全县人人瞩目，称赞者有之，揶揄者也有之。杜重石听说以后，特地跑去看。在那个年代，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谓的“游泳池”会是个什么样子，简陋到什么程度，可以想见。倒是刻在游泳池墙上的那一行大字：“我们满身奇耻大辱，要何时才能洗得干净！”却特别醒目，显示出这个游泳池的与众不同之处，更显示出这个游泳池建造者的与众不同之处。

杜重石看了，故作不懂地问，“一个人身上再怎么脏，也不能算是奇耻大辱吧？”

不料夏炯却毫不掩饰地反问：“日本人不放一枪，就侵占了我们的东三

省，这难道不是奇耻大辱吗？”

从广安县城到戴市镇，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几里路，但是几千年来，却只有一条崎岖蜿蜒的小道儿相通，只能听见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也就是四川特有的木制独轮“鸡公车”在山路上吱吱嘎嘎地歌唱。为适应军事和民用交通的需要，夏炯带领士兵和乡亲们一起劈山开路，修建了一条简陋的广戴公路。公路修成以后，夏炯又在车站旁边的石壁上刻下了七个大字：“劈山开路让人行”，每个字都有五尺见方，铁划银钩，苍劲有力，正是夏炯的手笔。杜重石看了，就指出山石上的这一句与游泳池墙壁上的那一句，恰好是上下文。夏炯也会意地说：“要雪奇耻大辱，就要有披荆斩棘、劈山开路的先锋队嘛！”还说：“凡是主张抗日雪耻的，我都拥护。凡是奴颜婢膝向侵略者屈服的，都是历史的罪人。我宁愿为救国而死，决不当亡国奴而生。这就是我所奉行的‘军人魂’。”

简单的几句话，表达了他的心声，也显示出他的抱负不凡。看起来，让他屈居于军阀部队中当个旅长，还有点儿大材小用。共同的语言，一下子就把他们两人的距离拉近了。不久他们两人就成了莫逆之交。

夏炯的旅部办有一个“人生剧社”，经常给部队上演话剧，如田汉的《苏州夜话》、《湖上悲剧》、《生之意志》等等。有时候，也公开向社会各界演出。那年月，当地人的封建意识还很浓厚，不但部队中没有女兵，就是剧社里也没有女演员。所有女角也和京剧、川剧一样，一概由男演员扮演。话剧在当时被称为“文明戏”，尽管说话也拿着“舞台腔”，动作要摆出演戏的姿势来，终究与实际生活比较接近，便于观众接受，但男人扮演的女角，扭扭捏捏的，看上去总有点儿不伦不类，给人以滑稽可笑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剧情与效果。

杜重石在上海学的是戏剧，上海比内地开化得多，上演话剧，女角早就已经由女演员扮演了，他到了二十军军部以后，组织了一个“广安剧社”，但他反对由男演员扮演女角的做法，为追求更好的戏剧效果，他处心积虑地打算在本县开一次先例，要让男女演员同台演出。

夏、杜二人关系日渐亲近以后，两人在“女角应由女人扮演”的观点上渐趋一致，决定军部剧社与旅部剧社合作，外请几个女演员来“客串”，上演几部大型的多幕剧。

经过努力，他们得到当时在重庆主编《新蜀报》副刊的金满城先生的帮助，从重庆美术专科学校请来两位老师（是夫妻二人）和两个女学生，先排演了外国著名话剧《少奶奶的扇子》，又上演了反映“五卅”惨案的多幕剧《顾正红之死》和取材于当地的多幕剧《郑安涛之死》。限于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尽管戏演得很粗糙，化妆、布景、效果之类也跟不上去，上台的“外国人”也不是高鼻子、黄头发的，但总算在内地县城开创了“男女同台演戏”的先河。

影响最大、反应最强烈的，还是《郑安涛之死》。这是夏炯与杜重石根据广安实事自编自导的戏，主题是揭露、控诉鸦片烟害人。主角郑安涛，本是广安中学的一个好学生，很受老师的器重；后来跟父亲学会了抽鸦片，弃学去重庆谋生。两年后回到广安，衣冠楚楚，手面阔绰，俨然富家公子，实际上却是个抢劫、拐骗、无恶不作的匪徒。事败被捕后，觉得无颜见人而自杀。当时四川人抽鸦片十分普遍，十几岁的孩子抽鸦片并不奇怪，连部队里也有许多“双枪兵”、“双枪将”。此戏公演以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为此，杨森曾下令让他们带此剧在二十军戍区内巡回演出，以扩大影响。

当时，夏炯正与南充女子师范学校的体育主任范淑良老师谈恋爱，南充与广安相距 50 多公里，中间还隔着一个岳池县，两人谈情说爱，全靠情书频繁往还。每有精彩之句、得意之笔，夏炯总要拿来给杜重石看；每逢爱河中波涛汹涌、风猛浪高之时，也要请杜重石帮助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就好像杜重石是他的“恋爱参谋”、“婚姻顾问”一般。后来他们俩订婚，特请杜述言老先生当主持人；范淑良办嫁妆，还是杜重石陪她到重庆去置办的；他们俩结婚，杜重石是当仁不让的男傧相。——两人关系的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二、二十军的处境

杜重石与夏炯的友谊与日俱增之后，两人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杜重石说起自己在上海与左联文人有来往，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参加过学生运动；夏炯也把二十军与共产党的历史渊源以及目前的处境无保留地统统告诉了他。

杜重石虽然十几岁就离开了故乡，远赴上海求学，但作为广安县人，对于杨森的情况，多少还是知道一些的。他知道杨森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护法之役，当过滇军第二军的参谋长；后率队投川军，任川军第九师师长、代理川军第二军军长；川军混战期间，与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拉锯，时胜时负，胜时攻进重庆，败时退守宜昌、云南，从此与刘、邓结下宿仇；投靠过北京政府，接受过陆军上将的高衔；效忠于吴佩孚，出任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四川省省长。此人善于四面迎合，喜欢脚踏两只船。北伐期间，他仍听命于吴佩孚，困守于万县，看到北伐军进展顺利，曾派人到广东国民政府输诚，要求加入国民革命军，又派人到北京找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要求调人到他部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却又与吴佩孚割不断联系；1926年8月，广东政府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派朱德任二十军党代表，在9月5日“万县惨案”中，朱德曾支持他与英帝国主义斗争到底；1929年6月，邓锡侯的二十八军所属旅长门继勋在遂宁附近率部投奔红军，经渠县王家场二十军驻地，杨森没有拦击，让他顺利通过，等等。1930年以后，杜重石离开了广安，对于二十军的情况，就知道得差不多了。

1930年至1931年间，蒋介石背叛革命，接连三次围剿工农红军中央根据地，都以失败而告终。1932年6月，又发动了第四次进攻。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由于领导人的路线错误，导致反围剿的失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不得不于当年冬天率主力转移到陕南、川北地区，继续开展斗争。

这期间，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已经战胜了跟他争霸四川的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取得了“独霸四川”的定局。蒋介石为了笼络刘湘，派李仲公为代表常驻重庆。还有消息说：为了结束川军各派系割地自雄的局面，以后所有川军的军饷，一概由刘湘统筹统支。据此人们普遍认为，蒋介石要借重刘湘来统一四川了。

在这种局势面前，杨森为了自保，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以壮大力量。措施之一，是借“四川剿匪第四路总指挥”的名义，以“匪患严重，需要扩军”为由，把原来的二十军手枪大队扩充为第七混成旅，任命他的侄子杨汉

印为旅长。真正的目的，则是想据此向刘湘多报多领军需、军饷。实际上，第七混成旅只有原手枪队的那一班人马，此外既无更多的兵员，也无更多可用的枪支。

这时候，位于广安、岳池、渠县边境的华蓥山地区，有一支由岳池人刁文彪领导的地方红军在活动，颇有武装实力。为了配合红四方面军入川，刁文彪得到杨森扩军的消息后，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以“绿林”自居，主动去找杨森，要求接受“招安”，表示愿意把全部人马改编为第七混成旅所辖的一个团，由刁文彪任团长。而他的真正动机，则是想取得合法地位，以便扩大红军的力量。夏炯并不是傻瓜，对刁文彪的用意其实也很清楚。根据当时二十军的处境，他建议杨森不妨来一个“将计就计”，答应“招抚”，以扩大二十军的实力，并寻求机会通过刁文彪暗中与红军主力取得联系，为进一步联合红军攻打刘湘做好准备。

尽管杨森是在自己的家乡当地头蛇，可是前面有代表国民党蒋介石的刘湘，后院儿有代表共产党的地方红军，只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杜重石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杨森任命为二十军司令部秘书的。二十军的日子不好过，他这个秘书也有点儿不大好当，何况他当时还只有20岁！

三、第一次联合共产党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趁四川军阀混战无暇北顾的机会，率领红军部队由陕南越过米仓山进入川北，先后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并于1933年2月成立了川陕边区苏维埃政府。

此事令蒋介石大为震惊，当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并命令刘湘、杨森派兵“会剿”。

田颂尧刚刚与刘文辉结束了成都巷战，于2月中旬匆忙挥军北上，兵分三路，向川北革命根据地进攻。

杨森在下川东兵败不久，在渠县、广安喘息了两年，刚刚恢复了一点儿元气，不想再把老本儿拿去孤注一掷，命令第五混成旅旅长夏炯带领本部人马稍稍北进虚应故事。部队到了江口（今平昌县），受到红军的阻击，就退到巴河南岸固守，与红军隔河相望。

巴河是渠江的上游。渠江发源于米仓山，大小通江在通江县汇合以后称通江，通江在江口与南江汇合后称巴河；巴河在三汇镇与州河汇合后称渠江，在合川注入嘉陵江。

川北红军采用“敌进我退”战术，田颂尧挥军北进，一路无阻，3月间，先后迅速占领了南江、巴中，5月初又占领了通江。正在田颂尧沾沾自喜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5月下旬红军开始全面反击。田颂尧孤军深入，四面受敌，三路大军迅速被瓦解。6月初，川北红军部队不但全部收复通江、南江、巴中地区，根据地也比以前更加扩大了。

田颂尧兵败，退守仪陇、南部（仪陇和南部是相邻的两个县，不是仪陇县的南部地区），夏炯干脆率部返回渠县原防。

7月7日，蒋介石见田颂尧“进剿”不力，任命刘湘为“剿匪总司令”，指挥四川各路军阀继续“围剿”川北红军。这时候田颂尧已经成为惊弓之鸟，无力再战；杨森深知川北红军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胜了没什么油水，败了

要伤自己元气，何况又是在老对头刘湘的控制之下，更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所以采取“龟缩”政策，以自保为原则，尽力不与川北红军发生正面冲突。

这时候，以“绿林”身份投靠杨森的刁文彪，已经是夏炯手下的一名团长。他见杨森对“围剿”川北红军持回避政策，并不积极，知道杨森有难言之隐；又知道夏炯是杨森的得意门生，一切言听计从，就向夏炯大胆进言，表示自己与川北红军头目有些私交，如今两军对垒，既不和，也不打，双方徒然消耗实力，不如以双方利益为重，大家坐下来正面会谈一次，最理想的是各自放弃小利，联合起来，一致对敌，争取大利；退一步，也可以寻求划定边界、互不侵犯的条件，各自谋取自身的发展。

夏炯对于刁文彪的身份，其实心里很清楚，只是不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如今听他的一席之言，虽然明知道他是为川北红军考虑，但是二十军在当时的情况下，处境也的确十分艰难，如果能够与川北红军互通声气，不论是某种程度的联合或某种条件下的自保，对二十军都是有利无害的事情。于是就把他的意思加上自己的意思向杨森说了。

对于自己目前的处境，杨森心里当然十分明白。他本来一心想在四川军阀混战中取得胜利，从此登上“四川王”的宝座，但是逐鹿的结果，自己成了败兵之将，不但失去了下川东二十余县的地盘，还要在死对头刘湘面前低头俯首，唯唯听命，这口窝囊气，也不是好咽的。这时候，如果上面没有刘湘的控制，旁边没有红军的威胁，以他目前所占据的尚称富庶的地盘，是可以逐渐得到发展的，因此，如果川北红军确实有联合互保或划界自保的诚意，倒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道、经过慎重考虑，杨森责成夏炯去经办此事。杨森是个老谋深算的人，他自己不出面，即便一旦事情暴露，他可以推说不知道，一切都是“手底下人”办的。只要能保住他自身，部下即便得到处分，仍可以设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他对刁文彪这个人不放心。这个人是共产党打进来的，如果让他当代表，他考虑的必然是红军的利益，而不是二十军的利益。因此，只能让刁文彪出面牵线，对于派谁去与红军谈判，要夏炯认真考虑一下。

杨森与夏炯反复磋商，最后选定夏炯手下一个团长叫李麟昭的作为谈判代表。李麟昭虽然不是杨森的内亲外戚，却是成都讲武堂毕业的学生，不但是杨森的亲信，思想观点也与杨森、夏炯完全一致。更主要的还是此人勇有识，善于随机应变，既不会损伤二十军的利益，遇到紧急关头，又能全身而退。

通过刁文彪的往来牵线，作为二十军代表的李麟昭终于与川北红军暗中联系上了，决定双方进行一次正式会谈，地点设在巴中县东南方向的得胜山（今属平昌县得胜乡，在县境北）。当时江口（今平昌县城）以北是两军的军事分界线，得胜山一带，既不是红军的势力范围，也不是杨森的防区，双方都是“单骑赴谈判的地点设在一家山村小酒店临时腾出来的楼上密室内。代表红军的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他一口湖北腔，不像个本地人，只好长袍礼帽，一身收山货的外地客商打扮。杨森这边，除了李麟昭之外，还有牵线人刁文彪。他们都是四川人，一身当地人打扮，脑袋上缠着厚厚的白色包头布，身穿靛青上布长衫，腰间暗藏家伙，以便对付万一。不过刁文彪并不参加谈判，介绍双方认识以后，就以协助店家奔走上菜为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去了。

陈、李二人入座以后，略说两句客气话，就直接切入主题。李麟昭转达

了杨森的意见：双方可在平等的前提下成立联军，目标是共同对付刘湘的二十一军。但是联军只是行动上的联合，除了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分头作战之外，两军之间没有统属的关系。

陈昌浩一开始就指出二十军面临的危险处境，如果不寻求自己的出路，难逃被刘湘或蒋介石吞并的命运。因此，他转达张国焘的意见：要求杨森取消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建制和番号，完全脱离蒋介石的控制，改编为红军，一切行动都要服从红四方面军的命令。

当时的形势，是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把田颂尧的部队打了个落花流水，扩大了根据地；而杨森的二十军，由于接连打了几个败仗，龟缩在广安一隅休养生息，惨淡经营，日子似乎很不好过。在张国焘看来，杨森只有投靠红军，才能图谋自保，才能有所发展，不然，不是被刘湘吃掉，就是被蒋介石所排挤。因此，他对于谈判的认识，等于是“受降”，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在双方地位平等、利益与共的前提下联合作战，共同对付刘湘。

李麟昭一听张国焘提出的条件，明明是要把二十军“吃掉”，而不是双方地位平等的“联合”。这样的条件，与杨森所提的基点相去太远，觉得很不好谈。他一个团长，只能转达军长的意见，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也无权作出决定。他只能答应：两军联合以后，红军可以派一些政工人员到二十军来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明耻教战，鼓舞士气，但二十军的人事、经济必须独立。除了与红军联合进攻刘湘之外，其余的军事行动，红军不得干涉。

陈昌浩的意思：杨森既然要向红军靠拢，就要彻底背弃蒋介石，不能做骑墙的两面派。不然，所谓“联军”，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日后杨森如果有反复，不但红军无法控制，也影响红军的声誉。

两人经过反复商讨，由于基点相去太远，无法达成协议，李麟昭只好在“回去向军长汇报后，再决定行止”的借口下，很客气地告辞。

谈判无结果而散。

李麟昭回到广安，向杨森汇报了谈判经过，杨森冷笑一声：“要我投靠红军，我还不不如投靠蒋介石呢！”

从此，与红军谈判、成立联军的事儿，就不再提起。

这是1933年春夏之交的事情。

事隔几个月后，红四方面军见杨森对联合反刘一事持冷淡态度，也知道自己的“要价”太高了，于是主动“落价”，通过刁文彪的关系；又一次提出第二次商讨的建议。杨森觉察到红军这一次有比较大的让步，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就责成夏炯亲自出面与红军谈判，并给予比较大的“自决权”，以便“见机行事”。

这时候，夏炯的第五混成旅旅部已经由广安县的戴市镇搬到岳池县公园。在保证来人安全的前提下，夏炯建议谈判地点就设在岳池县公园内。这样，可以排除一切外界干扰，让双方畅所欲言，也不受时间的限制。经过刁文彪的往返联络，红军方面表示同意。

到了约定的日子，红四方面军的代表陈昌浩和随员黄超，化装成商人模样，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岳池县公园的时候，已经傍晚。双方立即进入会谈，从晚饭的饭桌上谈起，一直谈到深夜。二十军的正式代表是夏炯，杜重石为随员。

这一次会谈，双方各自退让一步，只在“配合作战，共同对付刘湘”这

一基点上联合，不求组织系统的联合，因此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双方经过讨价还价，具体磋商，总算达成了协议。协议的内容主要是两条：一是红军与二十军各不相犯；二是由红军出兵攻打刘湘部队，由二十军负责军需补给。——这样，表面上杨森与刘湘并不发生正面冲突，在舆论界、在川人中、在蒋介石面前，都更好说话一些。这正是夏炯的高明之处，也是这次会谈的成功之处。

这个协议，虽然意义重大，但是并没有形诸文字，没有让杨森和张国焘签字，只能算是口头的“君子协定”。这是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也是杨森的精明之处。红军虽然也有了据点，但成败未卜，前途难测，如果正式签订协议书，一旦落进蒋介石或特务分子的手里，对红军也许无所谓，对杨森来说，那可就惨了。

达成协议以后，夏炯立刻调拨军装 2000 套（包括帽子、鞋袜、毛巾、水壶、皮腰带在内）、子弹 8 箱以及许多医药用品和军需物资，作为礼品赠送给红军。杜重石也拿出两支德国造 20 响快慢机木壳枪来送给陈、黄二人，并说：“这是夏旅座割爱，特意送给二位作自卫用的。”——这种手枪，枪筒比较长，射程比较远，能够连发，接上木壳，还可以当冲锋枪用，在当时的二十军，要算是最新式的武器了。

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夏炯和杜重石的这一策略对红军、对抗日来说都是绝对有利的。尽管杨森的出发点是为了报复刘湘的夙怨，但对当时川北的红四方面军来说，却是雪中送炭，给予了十分有力的支持。

这一年，杜重石只有 20 周岁。在别人，大都正在求学，也许还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人心叵测，但他却以自己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少，正式参与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这一笔，是他人生旅程上很重要的一笔，也是引发他后来一系列不寻常遭遇的总的导火线。

四、联合之后的反复

川北红军与杨森达成了互不侵犯协议，解除了后顾之忧，趁四川军阀内部矛盾重重、互相观望之机，并没有按照协议去攻击刘湘，而是发动了“仪南战役”（“仪南”指仪陇和南部这两个相邻的县，不是仪陇县的南部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打击退守仪陇、南部两县的田颂尧部。经过十几天的战斗，消灭了田颂尧部 3000 多人，缴枪 1000 多支，解放了仪陇县全境，控制了广元、昭化（现属广元市）、苍溪、阆中、南部等县的部分地区，基本上占领了嘉陵江东岸地带和陕南宁羌（1942 年改名宁强）地区。更主要的，还是占有了南部县境内的盐井，打破了长期的封锁，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的吃盐问题。

自古“兵不厌诈”，没有“老实”的将军，对军事家来说，为了打胜仗，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不遵守协议、协定之类，都是家常便饭，不必苛求指责。何况当时红四方面军处境困难，军事行动贵在神出鬼没，根据具体环境的不断变化，应该有自己的作战主动权。但是张国焘在击败了田颂尧部队以后，不但不根据自己的处境与发展前途设法谋求与杨森的进一步合作，反而运用所谓“吃弱壮己再攻强取胜”的错误策略，用“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于同年秋季发动了“营（山）渠（县）战役”，全力攻击杨森。

为什么红四方面军要使这一招“回马枪”呢？这是因为以巴中为中心的根据地，巴中、仪陇、江口三地，正好是一个“品”字形；但是其南部边境

从仪陇到江口之间，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有杨森的第二混成旅前哨部队驻扎在巴中县境内的玉山场、鼎山场一带，犹如一个拳头在红四方面军的眼前晃动，不但阻碍了红军从这里向南发展，一旦敌人发动进攻，这里也是最好的突破口。张国焘认为，杨森的这个据点，必需加以拔除。至于双方谈妥的协议，反正没有文字可据，即便有文字，杨森也拿不到桌面上来，再说，“兵不厌诈”是军事常识，谁要是相信协议、恪守协议，只能说是个傻子，不是个将军。于是，张国焘集中了优势兵力，向杨森袭来。

1933年9月下旬，川北地区秋雨连绵，不大也不小，淅沥淅沥，没完没了。秋雨一下，天气就凉，秋风一吹，能令人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22日夜，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七十三师的战士们，头戴箬帽，脚穿草鞋，冒雨摸黑穿过荒僻的山间小路，在天亮以前，插入玉山场、鼎山场的南面，黎明时刻，向杨森部队发起突然袭击。与此同时，红三十军从北面攻击玉山场，红四方面军十一师从侧面攻击鼎山场。杨森部队突然间在睡梦中腹背受敌，来不及还击，纷纷溃逃。

张国焘并不以取得玉山场和鼎山场就满足。他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挥军南下；一天一夜，即推进到达营山以北30公里地区，遇到杨军阻挡，暂时休息。

杨森见张国焘不讲信用，发动突然袭击，大骂张国焘不是玩艺儿，急忙命令第一、第二两个混成旅残部据险死守，不得后退一步，又急调第三混成旅增援蓬安、第五混成旅增援营山，加强防守。

双方对峙了四五天。9月29日深夜，红三十一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发起夜袭、奔袭，直插二十军第一混成旅后方佛楼寺、杨家寨，打死第一团团长程栋梁，俘虏第三团团长，杨军士兵从梦中惊醒，无法抵抗，纷纷溃逃。30日，红军乘胜向营山进攻。二十军旅长杨汉忠得到消息，知道反攻已经不可能，只好将旅部撤到渠县。

30日黄昏，据守在前线阵地的杨军两个营才知道自己被红军分割了，后面的部队已经伤亡、逃匿一空，这才急忙放弃阵地，抄小路逃回渠县县城。

这一役，红军消灭了杨森部队团以下官兵1000多人，缴获长短枪2500多支，占领了营山全县、渠县大部和蓬安县北部嘉陵江以东地区。

杨森上了张国焘的当，认为共产党不讲信义，说话不算话，为了达到扩展势力的目的，居然不择手段，懊悔之极，也恼怒之极。于是不得不破釜沉舟，放弃广安、岳池等县，把军部迁到南充，联合刘湘，攻打红军。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势力迅速扩张，不但震惊了四川的大小军阀，也震惊了南京的蒋介石。为了防止红四方面军沿嘉陵江南下，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召集川军各路头目开紧急军事会议，要求在三个月内必须消灭川北的红军。1933年10月4日，刘湘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在成都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下面有六个总指挥：第一路总指挥为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第二路总指挥为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第三路总指挥为新编第六师师长李家钰，副总指挥为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第四路总指挥为二十军军长杨森；第五路总指挥为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副总指挥为第四师师长范绍增；第六路总指挥为二十三军代理军长刘邦俊。六路人马共计一百一十几个团，20多万人，还有飞机18架。

由于张国焘的策略性错误，不仅失去了利用川军之间的矛盾，分化川军、削弱川军“围剿”红军力量的大好时机，反而促成了四川军阀的大联合，一

致来对付红四方面军。加上张国焘所到之处，总是推行他的那一套极左路线，结果丧失了民心，化友为仇，给自己造成了四面树敌、孤军作战的局势。幸亏徐向前善于指挥，沉着应对，发动地方武装配合作战，极力扭转孤立局面，变被动为主动，方才在敌人强大的攻势下保住了川北革命根据地。

10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联合地方武装，主动发起“宣（汉）达（县）战役”，占领了宣汉、达县、万源三个县，化零为整，使川北根据地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便于共同防守。

1933年11月1日，刘湘指挥的六路大军开始对川北红军发起围攻。王陵基和刘邦俊率所部在开县城西、开江县城北一线与红四方面军展开激战。随后，杨森部队罗德润旅、夏炯旅、杨汉域旅分别从蓬安县、渠县和花轿镇（在广安县北面、蓬安县东南、渠县西南）出发，一起进攻营山县城。红军退出营山，杨森即把军部迁进营山城内，并命令杨汉域旅继续北进。红九军集中优势兵力反击，在凤凰寨附近将杨汉域旅打败，消灭了杨旅近两个团的兵力，一直追到营山县城。

前方战事失利，如今兵临城下，进则缺乏实力，退则唯恐受到蒋介石和刘湘的责罚，杨森感到了处境十分困难。这时候，夏炯从保存实力出发，建议再次与红军谈判，希望双方暂时停火。杨森抱着姑妄一试的心情，让夏炯派旅部副官长王一鹗单身一人化装潜赴通江县城，会见了张国焘和陈昌浩。当时红军考虑到进攻的敌人兵力强大，战线过长，四面受敌，疲于奔命，不利久战，也同意与杨森暂时停火，可以集中兵力去对付王陵基和范绍增。于是再次达成“双方互不进攻”的秘密协议。陈昌浩还派一个姓徐的秘书改换服装长驻夏炯的旅部，进行观察和联络。此后的几个月，红军与杨森在营山以北观望对峙，基本上不发生战事。

维持到1934年3月中旬，杨森迫于蒋介石和刘湘的命令，不得不派高德周旅进攻巴中、通江，派罗德润旅、夏炯旅进攻兰草渡，结果遭到红军的反击，几乎溃不成军。杨森急忙派人给红军送去布匹、医药器材等物品，说明自己迫于命令不得不出兵的苦衷。红军表示谅解，以一批土特产作为回报，希望继续保持互不进攻的协议。于是杨森部队推进到兰草渡附近，即按兵不动，与红军隔河对峙。

这一段时间，杜重石除了协助夏炯与红军联络、谈判之外，主要时间都在杨森的军部。他作为一个文职人员，当然没有资格参与战事的决策，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却在战争中得到了磨炼。

第三章 川军一瞥

杨森上了张国焘的当，挨了“回马枪”，连老窝儿都几乎失去，不得已，只好又与刘湘联合。刘湘是个很迷信的人，出兵打仗，还要请“神仙”指示天机。结果一败涂地。

蒋介石为了监督非他嫡系的川军“剿共”，派他嫡系的特务入川“监军”。钦差大臣拿着尚方宝剑，找川军开刀。谁撞在刀口上谁倒霉。

杨森见在四川已经没有他的发展余地，决心投靠蒋介石，来一个背靠大树好乘凉。

一、神仙师长刘从云

刘湘是四川大邑人，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校。他出生于1888年，比杨森小四岁，是杨森后届的同学。

1921年搞的“四川自治”，33岁的刘湘出任四川各军总司令兼省长，实际上是省内打内战。1924年12月，曾被杨森攻克重庆，1925年8月，刘湘联合刘文辉、赖心辉、邓锡侯等部，又把杨森赶到川滇交界处。所以他与杨森之间“夙怨”甚深。1926年北伐期间，大势所趋，各路川军表面上总算结束了多年的角逐，全都“联合”在国民革命军的旗帜下，杨森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刘湘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刘文辉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

1933年夏季，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剿匪总司令”，指挥各路川军围剿红军。

但是川军各派之间矛盾深重，互相猜忌，特别是刘湘与杨森之间，夙怨很深，勉强受命于蒋，也是面和心不和；其余川军首领，更怕红军一旦被消灭之后，刘湘会“挟天子以令诸侯”，借蒋介石之名，行吞并各派川军、独霸四川之实，因此大都抱迟疑观望态度，或拥军自重，或虚张声势，谁也不肯卖力。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4月底，刘湘的六路大军围攻川北红军，发动了3次总攻，结果不但没有消灭川北红军，反而给川北红军以可乘之机，使各派川军都有程度不同的损失，伤亡总人数达3万以上。

对于这一情况，身为“剿匪总司令”的刘湘，当然也有所觉察。为了缓和、消解相互之间的猜忌和矛盾，刘湘特地于1934年夏天在资中召开了“第一次剿总军事会议”。会上，刘湘除了当众保证“剿匪”结束以后各派川军的原有地位之外，还决定设立一个“剿匪总司令部前方军事委员会”，以杨森、邓锡侯等各军军长为委员，却以二十一军模范师师长刘从云为委员长，代替刘湘在前方指挥。

这个刘从云，本来是个以星相占卜为业的江湖术士，外号人称“刘神仙”。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得识刘湘，大讲朱元璋因得刘伯温的辅佐而成为大明王朝开国之君的故事，暗示他就是可以辅佐刘湘成“大业”的“当代刘伯温”。刘湘一向迷信，对刘从云的花言巧语十分赏识，竟任命这个不知行军打仗为何事的江湖术士为模范师师长。有道是“一张床上睡不了两家人”。刘湘之妻，外号“刘佛婆”，本是个佛教徒，十分相信善恶因果。轮回超度之说，在刘从云鼓舌如簧的蛊惑之下，深信他是个能预卜生死凶吉祸福的活神仙，竟拜他为师，跟他学起什么修身养性、长生不老之术来。

我国古代的军事建制中，曾经有过“军师”一职。军师是文职人员，他们大都不会舞枪弄棒，也不会上阵厮杀，只是出谋划策的“参谋长”，掌印行令，还得“元帅”升帐。所以俗语又有“军师行不得令”的说法。军师一般由熟读兵书、阵法的儒生、道士或江湖术士担任。我国古代有四大军师，指的是：姜子牙、张良、诸葛亮、刘伯温。但是姜子牙时代，孔丘和李耳都还没有出世，因此他既不是儒生，也不是道士，而是个在朝歌街上开过命相馆的江湖术士；张良传说是鬼谷子的高足，鬼谷子是苏秦、张仪的老师，是不是道教，已经无法考证了，但张良晚年一心学道，不求仕进，方才不为刘邦所忌，免于诛戮，则是事实；诸葛亮呢，明明是个儒生，传说他的军事知识得之于岳父，但是多少年来的舞台形象，却让他穿上了八卦衣，披发仗剑，呼风唤雨，似乎与道教沾点儿边；刘伯温在元朝末年当的是浙东儒学提举，相当于今天的教委主任，是个儒生，当无异议。但是除了这四大军师之外，历史上也确实有一些军师是由流落江湖的“牛鼻子道人”担任的。不但李世民有个徐茂公，连李自成也有个宋献策。于是，刘湘任用江湖术士刘从云为“军师”，似乎也就名正言顺了。

上有行者，下有效者。在刘湘两口子的带头之下，二十一军各师的师长，如范绍增、陈兰亭、周晓岚等人，也都拜刘从云为师。——范绍增比刘湘小6岁，四川大竹人，绿林出身，是南北有名的袍哥舵把子，外号“范哈哈儿”（四川方言中，“哈哈儿”有“傻呵呵”的意思），1923年投杨森，任第四师第八旅旅长，1926年9月杨森部接受改编期间，升任第七师师长，1928年倒向刘湘，任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周晓岚则是刘湘的小舅子。

从此，刘从云在军中被尊为“神明”，而他自己也以当代的刘伯温和诸葛亮自居，俨然以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师”身份出现。

1932年，刘湘与刘文辉争霸四川，发生武装冲突。刘文辉也是四川大邑人，与刘湘同宗同族。刘文辉比刘湘小7岁，但是论起辈份儿来，却是刘湘的小叔叔，四川方言称为“幺爸”。四川有一句歇后语，叫作“刘文辉的部队——垮干”，因为他的士兵中抽鸦片的人很多，战斗力很差，一打就垮。所以刘湘没费多大力气就打败了刘文辉，取得了胜利。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刘湘之所以能战胜他的“幺爸”，全靠刘神仙扶乩降神指示军机，所以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当时军队中的将士还很迷信，刘湘也乐得借此迷惑群众，笼络军心，通过以神治军的手段，达到他独霸四川的目的。

刘从云被任命为“剿匪总司令部前方委员会委员长”以后，杨森、邓锡侯等委员大都口服心不服，想给他点儿厉害看看，当时徐向前驻兵川陕边境米仓山南麓通江、万源等县，而蒋介石给刘湘的电令中，又有“徐匪用兵，有诸葛孔明之妙”这样的话，于是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大家一致主张应该由川军中装备最精良的二十一军模范师去打通江和万源。刘从云当然也知道这是众川军首脑故意跟他为难，可是无法推诿，不得不硬着头皮应承下来，暗地里再寻思金蝉脱壳之计。

事有凑巧，当时川北根据地的红军，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川军，正主动从通江、万源撤退。刘从云探听确切，装模作样地扶乩请神，乞示行止，居然得到一道“大吉大利，旗开得胜”的法帖。然后摆出一副大张旗鼓长驱直入的架势来，挥军北上。果然大军到处，“如入无人之境”，“敌军望风披靡，不堪一击”。这一巧合，凭空给刘从云抬高了身价，增添了十二分的光彩。他在得意之余，居然口出狂言，宣称只消三个月，就能把入川红军消

灭干净。

当年秋天，刘湘又召集第二次“剿匪军事会议”。川军各派系首领身着戎装，按辈份儿大小、实力强弱分坐左右两排，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刘从云，却穿着曳地长袍，头戴红顶瓜皮小帽，帽额上镶一块长方形白玉，道貌岸然，极力装出一副诸葛亮再世的神态来，端坐在大厅正中的太师椅上，左右两个“侍童”，各穿黑色道袍，黑鞋白袜，披散头发，打扮得不伦不类。他的面前，是三张方桌拼接起来的“香案”，铺着大红氍毹毡，桌前围着彩色金绣姜太公封神故事的桌围子，案上点一对红烛、燃三炷清香，香烛的后面，是一只烧着檀香木的铜鼎和一个扶乩用的沙盘。真是香烟缭绕，“神气”十足。不知道内情的人，只以为这里是哪一个教派的神坛香堂，绝不会想到这里是川军“最高级军事会议”的会场。

会议由“委员长”主持。他的开场白，更是别开生面，十分“精彩”：“我们是神兵。统领神兵的，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共匪’是草寇，草寇焉能敌我天兵天将？”

说完了开场白，刘从云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对天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以后，两个侍童各扶住丁字形乩笔的一端，在沙盘上颤抖晃动起来。刘从云用严肃低沉的语调，拖长了声音一字一句地唱：“神驾降临，诸弟子跪接。恭请神灵指示众弟子的前程和‘剿匪’的军机！”

在刘从云的“礼赞”下，众川军首领纷纷下跪。开会之前，刘湘就提出要杨森拜刘从云为师，行磕头礼。杨森大呼：“我妈死了，我都没磕过头。我不能给刘从云下跪。”刘湘又给他打招呼：“那么神灵下降的时候，一定要与众首领一起下跪磕头。”

杨森这人，虽然也是个封建割据的军阀，却不迷信。当时为处境所迫，在勉为其难的心情下参加这次会议，已经情非得已，再要他下跪磕头，实在无法接受。但是刘湘再三关照，又不能当场拆他的台，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到时候别人磕头，我行三鞠躬礼，总也能虚应故事了。”可是这时候听刘从云一吆喝，众将领们纷纷下跪，又见坐在自己两旁的邓锡侯、李家任等人都已经跪了下来，如果自己依然像电线杆似的戳着，正应了“羊群里出骆驼”这句话儿，反而不美，于是只好也身不由己地跟着大家一起跪了下来，又跟着大家一起磕了三个头。

众首领一磕头，两个侍童扶着的丁字形乩笔也不颤抖了，接着前后左右地“走动”，在沙盘上“刷刷刷”地划出模糊不清似字非字的“天书”来。——这种“天书”，当然只有刘从云一个人认识。每划出一个，刘从云就高声唱出，用笔录下，拿一个丁字耙把沙盘抹平，侍童就接着划下一个字。

一连划了三个字，据刘从云辨认，说是“郭邓福”，并解释说：“神灵示意：弟子邓锡侯是福将郭子仪转世，跟郭子仪一样，五世同堂，福寿延绵！”

邓锡侯比刘湘小一岁，四川营山人，毕业于四川陆军第四中学，1926年接受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他身材矮胖，为人圆滑，外号“水晶猴儿”，又叫“邓汤圆儿”。杨森在蒲团上跪着，听说邓锡侯是“福将”，有点儿啼笑皆非，心里没好气他说：“你‘邓汤圆儿’应事圆滑，在川军角逐中，不论谁输谁赢，你都有糖吃，当然是福将，还用得着‘神灵’指示吗？”

乩笔接着转动，又在沙盘上划出模糊不清的“天书”来，刘从云说是“关义杨”三字，并解释说：“神灵示意：弟子杨森，是关云长转世，性情高傲，但是义薄云天，肝胆照人，是‘剿匪’救民的中流砥柱！”

杨森听了刘从云的“神话”，心里没好气地说，“你这不是明明说我他日要败走麦城吗？”

像这样，刘从云一一“点将”，给众将领判定祸福前程以后，沙盘上最后出现的是“天罡灭”三个字。据刘从云解释：“天罡”为36之数，神意当是36天内即能消灭红军。反正沙盘上的“天书”除了刘从云之外谁也不认识，只能任凭他胡说一气。

但是事实却并不像“刘神仙”预测的那样。红军主动撤出通江、万源以后，在8、9两月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川军，不但重新占领了通江、万源，还扩大到南江、巴中等县，将北起广元、南至阆中的嘉陵江东岸地区全部收复，与苍溪、仪陇、阆中的红色苏区联成了一片，声势更加强大了。

刘湘的六路“剿匪”大军，第一、二、三路逃到嘉陵江以西，第四路的杨森部队退守营山、渠县。刘从云见大事不好，脚底下抹油，逃之夭夭。六路川军围攻川北红军的“空前壮举”，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蒋介石得知刘湘因听信江湖术士的胡言乱语而导致四川“剿匪”的不利局面以后，大为震怒，急电命令刘湘将刘从云以“巫术乱军、贻误军机”罪论处。可是，这时候“刘委员长”早就已经不知去向，刘湘就是想“从严办理”，也无从惩处了。

于是杨森又抓住这件事情对刘湘大肆攻击。他在广安县教育局召集二十军营以上军官和中小学校长讲话说：“大家都知道，我杨森是从来不相信装神弄鬼这一套的。这次刘湘强迫我在军事会议上磕头拜神仙，愚弄我，我是二十军军长，是全军的代表，所以实际上就是愚弄二十军，欺负二十军。二十军的官兵多年来跟我杨森南征北战，同甘共苦，我们遭此愚弄，必需卧薪尝胆，团结一致，共报此仇。”

杨森讲话以后，跟他一起去参加军事会议的参谋范诞生又把他耳闻目见有关刘从云装神弄鬼招摇撞骗的故事和笑话生动详细地描述了一番，引起了众人一阵阵大笑。

广安县教育局局长胡哲先，因他说话中爱用“把戏”二字，因此外号人称“胡把戏”。他听了杨森和范诞生的讲话以后，十分感慨地说：“现在已经是科学昌明时代了，刘湘还在军队中以迷信骗人，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害人害己，怎么能够不导致失败？”

杨森插话说：“我看刘湘耍的把戏，还不及胡把戏的把戏高明哩！”一句话，又说得大家哄然大笑起来。

在这次会上，范诞生还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1931年，广东省主席陈济棠倒蒋。他是个很迷信的人，行动之前，特地请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后人替他扶乩降神，指示军机。沙盘上出现的“天书”，据说是“人必倒机不可失”七个大字。但是张天师没作任何解释，就离去了。他的徒弟解释说：“人指的是蒋介石。‘人必倒’，是说蒋介石必然倒台。‘机不可失’，当然是说倒蒋的机会不可失去。”陈济棠信了此话，通电反蒋。宁粤之战刚刚打响，陈济棠的空军被蒋介石收买，投向南京，反击粤军。陈济棠倒蒋失败，不得不宣布下野。出国之前，特地跑去问张天师：神明指示，为何不灵？张天师说：“神明指示，说得最清楚不过了。只是天机不可泄，我不能事先为你解释明白，所以才无言离去。乩文中的‘人必倒’，意思是说‘倒’，字去人为‘到’，也就是蒋介石必然要到广东；‘机不可失’，明明已经告诉你飞机不可失去，你却不加注意，刚刚和南京打仗，飞机就失

掉了，这不是逆天行事吗？”

无独有偶。1929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期间，唐生智为蒋军第五路军总指挥。12月1日，突然在郑州通电反蒋，改称“护国救党军第四路军总司令”。

唐生智此举，从时机和时间上来说，都选择得非常合适。当时蒋介石正与冯玉祥、阎锡山打得焦头烂额，后方空虚。唐生智要是能够一鼓作气，通电之后立即出兵，出奇制胜，是完全有可能取得大胜利、大成功的。那样，中原大战的结局必然有所改观。但是唐生智在12月1日发出通电以后，却迟迟不发起总攻击。为什么呢？原来唐生智请他的“军师”顾子同根据“术数”卜定总攻的良辰吉日为12月27日，其余日子都有凶兆和劫难。于是，唐生智在通电以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居然按兵不动。

当时陈诚任蒋军第十一师师长，他一得到唐生智通电反蒋的消息，大吃一惊，他的部队驻地就在唐生智的侧翼，而且与蒋介石的其他部队相距甚远。如果唐生智宣布反蒋以后，首先包围他的部队，聚而歼之，陈诚除了负隅顽抗之外，也只有束手受擒或尽忠报主的份儿。陈诚紧急布防，打算为蒋介石尽忠，在惶惶不安中等待了几天，见唐生智部毫无动静，大为惊讶。派人通过秘密渠道打探，方才知道了内情，不由得哈哈大笑，从从容容地调兵遣将，在12月27日前一个星期，先期向唐生智发起总攻击。唐部措手不及，一战而溃。唐生智无可奈何，只得宣布下野，出国避难。

顾子同，字伯叙，是扬州著名术士，又是佛教密宗的居士。他深谙瑜伽气功，善于平地飞身腾跃。1922年，经人介绍结识了唐生智。唐生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尊称他为“顾老师”，还让部下将士都跟他参修术数和佛学，一切行止，都要请顾老师占卜以后，才作决定。唐生智怎么也没有想到，一生的事业，竟然会败在自己奉若神明的“军师”手里。

到了20世纪，中国将领的军事行动，居然还要听令于神巫，其愚昧无知的程度，可悲亦复可叹！

二、别动队的下马威

1935年春夏之间，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四川。蒋介石命令薛岳统率吴伟奇的第四军和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黔军同时入川追击；又命令贺国光率参谋团、康泽率别动队到四川，任务是督促川军堵截红军。

康泽率领着别动队，是“见官大一级”的“钦差大臣”。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也为了“杀鸡给猴子看”，刚到重庆不久，他就以“整饬军纪、政纪”为由；把重庆警备司令部的上校参谋李绍舟给枪毙了。罪状则是“包庇烟赌和共匪”。但是执法的既不是刘湘的“剿匪总司令部军法处”，也不是重庆警备司令部，而是由别动队的政训处处长白良直接下令逮捕并执行枪决的。

李绍舟是重庆警备司令部的上校参谋，同时又是重庆袍哥团体“叙永乐”茶社的“掌旗大爷”，在重庆“袍哥界”也算是个有名的人物。这次康泽的别动队要拿李绍舟开刀，人们都知道完全是白良假公济私一手制造的冤案。

事情的起因，据说是白良和另一名浙江籍的别动队官员到重庆金沙巷一家妓院去寻欢作乐，碰上了李大爷手下的三个弟兄。双方为争夺一个姑娘发生了争执，结果是“强龙难敌地头蛇”，姑娘还是让李大爷的手下人给架走

了。事后白良向老鸨子唐二妈打听这三个人的来历，唐二妈不敢得罪“钦差大臣”，只好如实说出。白处长为了挽回丢失的“面子”，在浙江籍官员面前夸下了海口，说是一定要李绍舟把这三个人交出来由他处置。事后白良去找李绍舟要这三个人，尽管李绍舟明明知道这三个人是谁，但是一者这种争风吃醋的“骚事儿”以尽量不扩大为上，二者出于袍哥的义气，也不愿将自己的兄弟伙儿送到别动队去挨打受气，于是就以“不知道在金沙巷闹事的人是谁”为由，拒绝交出人去。白良碰了这样一个软钉子，觉得在同济面前失去了威信，下不来台，气上加气，老羞成怒，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决心杀李绍舟这只鸡给其他袍哥军官那些猴子们看。于是捏造了以上罪名，也不经法庭审判，直接由白良下令执行枪决。

事情当然不会这样就结束。一方面是李绍舟在重庆袍哥界有一定势力，他的“兄弟伙儿”不肯就此善罢甘休；另一方面川军将领们对别动队的飞扬跋扈盛气凌人也心怀不满。特别是刘湘二十一军的师长潘文华、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以及出身“绿林袍哥”后受招安为师长的范绍增、陈兰亭等将领，都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儿去，暗中鼓动中下级军官，要与别动队作一番武装较量。

白良是四川岳池县人，对四川的袍哥并不陌生。此人工于心计，得知川军将领们鼓动部下寻衅闹事，并不怯阵，而是沉着应付，不但不把李绍舟秘密处决，反而决定由别动队押解李绍舟游街示众以后再赴刑场，且看川军将领们能有何作为。

到了李绍舟游街枪决的那一天，沿途人山人海，人群中有人高呼：“李大爷做了染红别人顶子的冤死鬼！”警备司令部和市警察局以“维护治安”为由，派出了大批的武装军警和便衣儿，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有动静，立刻接应。袍哥以及各界为李大爷摆的“香案”设的“路祭”，更是一台接着一台，押解李绍舟的别动队人员，连向前走动一步都很困难。

按袍哥和军官们的猜想，一路上设置了这么多的“障碍”，把别动队给惹急了，一定会出面阻止干涉的。只要别动队一阻止，双方一发生争执，引起武装冲突，事情就会越闹越大，甚至无法收拾。没有想到白良吃了秤砣铁了心，出发之前，再三叮嘱押解人员：任凭沿途有多少人路祭、谩骂，一概置之不理，决不许有任何粗鲁的举动，以防“激起民变”。只要把罪犯押到刑场，执行了枪决，就算完成任务。因此，押解和行刑人员，一个个全都忍气吞声，哪怕半天只移动一步，也耐心奉陪到底。

由于白良采取“不抵抗主义”，坚决不开第一炮，袍哥军官们也只能做到“骂骂而已”，并不敢动手抢夺，而如潮的人群，也总有散去的时候。袍哥军官们白费了许多人力物力，也只能眼看着李绍舟饮弹而亡。双方较量的结果，依旧是白良得胜。

三、杨森投靠蒋介石

蒋介石上台以后，一方面积极发展自己的嫡系部队，一方面对地方杂牌军施展收买、分化、逐一宰割的政策，效果卓著，使各地方杂牌军提心吊胆，不知如何是好。

杨森在广安当土皇帝，本来是可以偏安一时的，但自从遭到红四方面军的突然袭击以后，败退南充，不得已而倒向刘湘，结果是正面受到控制，背

面受到牵制，真好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日子并不好过。经与心腹们几度磋商，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与其死守川北，腹背受敌，不如躲开红军，脱离刘湘，向蒋介石靠拢。有道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不管怎么说，蒋介石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是全国的领袖，戳杆儿总比刘湘要硬些。杨森反复考虑以后，决定破釜沉舟，向蒋介石请命，表示愿意放弃川北的防地，听候中央的调遣。

蒋介石正想分化川军、控制川军，见杨森自动放弃在四川的地盘，认为他这个头带得好，是地方服从中央的好榜样，就命令刘湘发给二十军开拔费大洋 20 万元，让杨森带领部队到川南宜宾集结待命。

出发之前，杨森把军部人员编为两个宣传队，其中一个由杜重石和军部体育处处长张理 及另一秘书刘仁甫共同负责，任务是沿途书写、张贴“拥护蒋委员长剿匪安民”、“攘外必先安内，先安内才能攘外”之类适合蒋介石口味的标语。

但是部队出发以后，刘湘即以种种借口扣押、拖延开拔费不发，使得杨森军饷无着，在行军途中遇到困难。二十军官兵只好紧缩开支，官员不分大小，每人每月领 12 元生活费；士兵每人每月 6 元。杜重石和张、刘二人，本应有勤务兵三人、军马三匹，也临时减为共用勤务兵一人、军马一匹，总算维持到了宜宾。

宜宾位于四川省的最南部，是岷江与金沙江的汇合处，金沙江的东南岸，就是云南省了。

蒋介石为什么要杨森到宜宾来集结待命呢？名义上，是调二十军到川南堵截北上抗日的中央红军，实际上，是另有文章的。

当时贵州还是地方军阀的势力范围，蒋介石鞭长莫及，于是他耍了一个小聪明，第一步，以红军为“前驱”，等红军攻进贵州以后，再命令薛岳以“追击”的姿态尾随红军进入贵州；第二步，在战略上故意放红军出贵州，却命令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亲率黔军出黔追击。这样，轻而易举地就把王家烈调出了贵州，由他的嫡系薛岳取而代之，从此贵州就成了蒋介石控制的地盘了。

蒋介石取得了这一经验，也想照方抓药，把云南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但是这时候红军主力已经到了四川，不可能再调回云南，正好杨森主动放弃四川的地盘，愿意靠拢“中央”，蒋介石认为杨森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地方军，不妨让他入滇，取代“云南王”龙云。因为早在 1915 年杨森就在云南护国军第一军总部当过参谋，护法之役中又担任过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对云南不但熟悉。而且有基础。此外，还想利用杨森与朱德的私交，趁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遭到严重困难的时机，劝说朱德“弃暗投明”，瓦解红军。

杨森这个人，有时候是很重“义气”的，从前对吴佩孚是如此，现在对朱德也是如此。他不但没有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去劝说朱德投降，反而吩咐他当旅长的侄子杨汉忠，如果与朱德相遇，互不侵犯，让他过去。杨汉忠给朱德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给朱德。

信内写明自己的部队番号、联络信号等，要求红军在长征途中，与杨军互不侵犯。这时候蒋介石命令杨森所部在荣经县黄土坡由北向南布防。杨汉忠到达黄土坡，就接到了朱德的回信：

汉忠师长吾侄勋鉴：

来函悉。吾侄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殊堪嘉许。按照来意，饬敝部

先头部队与贵军切取联系。专复。顺颂

勋绥

朱 德

顷 首

杨汉忠把朱德的这封信送给杨森。杨森看了，把信交给作战参谋何泽霖，让他读熟之后把信烧掉，然后说：“对朱德，我们说话要算数。”

后来红军北上，路过荣经黄土坡，杨森命令杨汉忠朝天开枪，让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川滇边境，只有杨森的西路部队与红军的殿后部队小有接触。

等中央红军全部过境以后，杨森把部队全部集结雅安，只以一个师假装尾随。这时候，中央红军主力已经翻过了夹金山和大小金川，向懋功、抚边、卓克基等地前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至于蒋介石让杨森入滇取龙云而代之，他不但唯命是从，而且十分乐意。难的是龙云土生土长于云南，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从1928年起就当云南省省长，经营多年，实力强大，只怕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并不那么如意。

1936年2月，蒋介石命令杨森取道宜宾、筠连，经西昌进入云南。杨森进入云南边境以后，为了试探龙云对二十军人滇的反应，以与龙云部队赛球为名，于1936年初夏亲率篮、排、足、网四个球队的运动员及电台人员共50多人去昆明。但是龙云对杨森此来的动机已经有所怀疑，他在欢迎杨森的宴会上，用开玩笑的口气半真半假地说：“子惠兄，你我是老朋友了，咱们真人面前不讲假话，如果委员长想在云南施展驱逐王家烈出贵州的故伎，先把我龙云调走，再宰我的部队，恐怕是黄粱美梦。你的二十军最好不要进入云南，以免引起误会。”

杨森从龙云的话中已经体会到他对二十军人滇抱着坚决反对的态度，只好用话岔开去说：“志舟兄你别误会嘛，咱们都是喜欢运动的人，在部队里我更提倡运动。这次我是带球队来与你联络感情的，云南也可以算是我的老家啦！我在这里赛球以后，还要到河内去比赛的。”

终席以后，杨森连夜把龙云的态度秘密电告蒋介石。

在龙云面前，话已经说到了这一步，杨森为了掩饰他到昆明的真正目的，与龙云的球队比赛结束以后，不得不硬着头皮到越南河内走了一遭。

当时越南还是法国的殖民地。杨森率领球队住在河内的一家旅馆里，从一个中国女服务员口中，得知越南劳动党领导人胡志明因为发动人民从事民族解放斗争，正被当地殖民政府通缉，处境十分危险。杨森对帝国主义者侵略压迫弱小民族一向痛恨，当即表示可以设法给胡志明一些帮助。通过女服务员，杨森跟胡志明联系上，并谈妥由杨森掩护胡志明等五人秘密离开越南，前往中国。

越南与云南接壤。滇军所需军火，大多由法国供给，双方关系密切。因此要想让胡志明等人安全通过中越边境，不但要对法国殖民政府保密，也要对龙云保密。杨森让胡志明等人穿上印有二十军标志的运动衣，装扮成二十军运动员模样，正大光明地离开河内，与杨森同一趟火车到达昆明。杨森怕龙云发觉，急电驻扎在云贵边境的一三四师师长夏炯派专车把胡志明等人接到沾益，再由旅长李朝信派部队把他们送到贵州安顺。

杨森到处有“家”，在安顺也有“外室”，就把胡志明藏在他的私宅内。

志舟——也作子舟，龙云的字。

另四人就在李朝信的旅部暂住。为防蒋介石派在二十军内的特务分子觉察，很快就设法让胡志明等五人安全离开了安顺。——后来胡志明在重庆被军统特务发觉被捕，辗转经冯玉祥等多人出面斡旋，向蒋介石保释，方才得以到达延安等等，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从昆明回来，杨森给蒋介石打了个报告，阐述此去试探龙云心态的经过及龙云的反应。蒋介石考虑到龙云在云南经营多年，根深叶茂，轻易搬不动他，要是使用武力把他赶出云南，在当时“一切以剿匪为首要任务”的口号声中，也不是时候。于是就来一个“就地安置”，任命杨森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兼贵州省主席，受薛岳节制。

第四章 上海抗战

杜重石出任二十军驻上海办事处处长，出版政论性刊物《前哨》，并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罗青交上了朋友。于是，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了第一个转折。

杨森主动投靠蒋介石，蒋介石却一心要消灭这支地方杂牌军。“七七”抗战事起，蒋介石急调新近投靠他的杨森部队到上海抗战，真正的目的，则是想趁机借日军之手行他排除异己之实。

二十军经过四十几天的急行军，在十分疲劳的情况下，以最落后的装备，迎战在当时来说已经是装备精良、且是以逸待劳的日军。经过五昼夜的鏖战，二十军的三个师六个旅人员伤亡过半，师长负伤，剩下的人勉强只够整编一个旅。他们不但自己所守阵地屹立不动，还将友军所失的一个阵地从敌军手中夺了回来。这一仗，打出了川军的英勇，也打出二十军的风格。

二十军撤出战斗，调防安庆，通过杜重石的联系，杨森与共产党再次接上了关系。

一、开赴前哨阵地

杨森向蒋介石请命，主动放弃四川的地盘，原是想摆脱刘湘的控制，向“中央”靠拢。但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不如意，以杨森取代“云南王”的计划未能兑现，虽然杨森本人得了个“贵州绥靖公署主任兼贵州省主席”的衔儿，看起来已经与刘湘平起平坐了，但是实际上只落得二十军失去了“老窝儿”，却依旧是“川军系列”之一，仍摆脱不了刘湘的控制，而且跟刘湘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

1937年夏季，刘湘在何应钦的参与下，以“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兼四川省主席”的名义召开了“川康整军会议”，强把杨森的一三三、一三四、一三五师“整编”为两个师。整编以后的二十军，军长是杨森，副军长是夏炯；杨森的两个侄儿：杨汉域任一三三师师长，杨汉忠任一三四师师长，一三五师的人员合并到各师，番号撤销。

这等于缩小、控制了杨森的势力，对二十军的将领们来说，是一件十分不愉快的事情。夏炯对杨森说：“二十军要图生存，谋发展，既不能只依靠南京，更不能与刘湘合作，而必须开展‘多方外交’，一方面与各地方势力加强联系，一方面努力宣传自己，扩大二十军在全国范围的影响，才能壮大声势，提高地位。”他还举例说：“范绍增不过是刘湘手下的一个师长嘛，还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呢！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不但在上海有办事处，还在上海法租界办了一个叫《国防论坛》的刊物，连篇累牍的文章，宣扬国防建设的最大障碍是专政独裁；只有还政于民，实行宪政，才能团结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建设国防，抵御侵略。实际上是含沙射影，指责的是‘蒋家天下陈家党’的专制独裁，违背了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实现宪政的遗教。现在这个刊物在军政界影响很大，等于在给李宗仁、白崇禧做宣传。我们也有必要到上海去设一个办事处，办一家刊物，给二十军造点儿舆论，扩大一下自己的影响。”

对于夏炯的这些意见，杨森和杜重石等人是完全同意的。上海当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可以利用租界进行各种活动及对外联络。经

商讨细则以后，因杜重石在上海多年，对上海比较熟悉，就决定由杜重石挂少将衔儿，出任二十军驻上海办事处处长，开展宣传、联络活动。

杜重石自从投身二十军，在军部挂一个秘书的衔儿，既无职也无权，杨森的秘书又多，除了与陈昌浩会谈当过一下“随员”之外，可以说没办什么“露脸”的事儿，也没取得值得一提的成绩，倒是随着军部辗转奔波了好多地方，连自己所最关注的县立广安一中的教职、所最热心的军中剧社，也无法顾及。如今杨森把这样重要的工作放到他的肩上，他似乎感到自己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可以施展一下自己的能力与抱负了。

在杜重石的人生道路上，这又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

当年7月初，杜重石兴致勃勃地到了上海，通过各种关系，很快地就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福履里路口租了一座洋房，挂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驻沪办事处”的牌子，同时积极着手筹办政论性三日刊《前哨》。

牌子挂出没过几天，“七七”卢沟桥事变起，由杜重石主编、杨森题写刊名的《前哨》三日刊，经过突击奔走，正式出版了。第一期的主要篇幅和内容，当然以宣传抗日为主。刊物刚一散发，就得到了各界的好评。

又过了一个月，“八一三”上海抗战，杨森奉命率二十军到上海参战，《前哨》立刻发表文章配合，宣扬二十军是川军中首先放弃防区奔赴上海抗战的第一支部队，同时指责刘湘不以国家民族危亡为重，眼看外敌入侵，仍在四川保守地盘，图谋个人权力。一石二鸟，既扩大了二十军的抗战声势，又抨击了地方军阀不顾国家民族危亡只图拥军自保的短浅眼光。

二十军驻沪办事处的房屋宽敞，楼下的一间侧室，就租给一个叫罗青的单身房客居住，但是杜重石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有一天，杜重石在《申报》上看见苏州高等法院开释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史良等人出狱的报道中，同时释放的还有江苏救国会筹备人罗青的名字，却不知道彼罗青是否即是此罗青，就主动到楼下拜访，一探究竟。攀谈之下，方才知道他就是与“七君子”同时释放的那个罗青，刚出狱不久。

杜重石与他进一步深谈，得知他是江苏省江都县人，1902年2月出生。早年曾在家乡主办进步刊物《少年周刊》，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的活动，1936年，他在文化界救亡协会战时特种委员会担任总干事兼总务部副部长，部长是沈钧儒，而组织部长是章乃器，宣传部长是邹韬奋。特委会解散后，章乃器被全国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会长宋子文聘为委员兼宣传组组长，罗青和欧阳予倩、许幸之出任副组长。所以他和上海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的关系十分密切。“七君子”入狱，他也一起被捕了。被捕后关在苏州监狱，与“七君子”一案并案受审。抗战爆发后，在各界的强烈呼吁下，被无条件释放。

许幸之是杜重石在上海求学时期的绘画老师，有这样一重关系，杜重石和罗青之间的了解就深了，关系也近了。杜重石谈起自己在二十军的任职情况以及创办《前哨》三日刊的宗旨与动机，再就抗战这个主题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罗青谈起汪精卫在林伯生主编的《中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题为《寻求与国》的臭文章，提出所谓“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的观点，尽管那时候汪精卫还没有公开投降日本当汉奸，但是卖国的立论，已经昭然若揭。两人越谈越投机，杜重石当即请罗青就这个问题写一篇社论，予以驳斥。罗青也不推辞，一口答应了。

不久，罗青写的社论《怎样寻求与国》在《前哨》上发表了。文中说：“日寇由侵占东三省而蚕食华北，节节进犯之后，又挑起卢沟桥事件而至‘八

一三’上海战争。面对日帝国主义铁蹄在中国领土之践踏；面对日侵略者的刀枪对中国人民的屠杀；面对日侵略者的兽行对中国妇女的奸淫；面对日侵略者对中国人民财产的抢劫等血腥事实，而仍持和平犹未绝望，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必须忍辱负重，静待‘国联’舆论制裁之谬论者，无论其辞藻如何哗众取宠，然而事实无情，终将使其堕入粪坑，为全民所唾弃，所共诛。”

同一期的《前哨》上，还发表了杜重石写的题为《本性素乖，凶残难戢》的短评，一方面配合社论驳斥汪精卫的无耻谰言，一方面也借机刺激一下刘湘。文中说：“日寇继卢沟桥事件之后，又挑起上海战端，丧心病狂，肝胆别具。人类之本性素乖，凶残之性难改。当此民族存亡之秋，竟仍有人认为和平尚未绝望，牺牲未到最后关头，认贼作父，屈膝乞怜；更仍有人伏居巴东，割地自雄，图保实力不知有国者，亦必为全民共弃、共诛。留蜀诸公，何不以昔日内战争城夺地之勇，为国家民族作拼死之斗！民族存亡，全系于斯，时机迫切，不容仁待。巴东甫公，盍兴乎来！”

这两篇文章，抗战的立场坚定不移，指责的言辞铿锵有力，道出了爱国者的心声，指出了卖国者的无耻，一时传诵者颇众，也是杜重石与罗青在抗日救亡战线上并肩战斗的开始。

此外，杜重石还为郭沫若主编的《救亡日报》写一些宣传抗日的小品文和街头剧，以此表明《前哨》及其发行人的立场。

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是最容易考验一个人的。时间不长，杜重石就与罗青结成了生死之交，无话不谈。在杜重石的肝胆相照下，在国共合作已成定局、部分共产党员可以适当公开活动的前提下，罗青不再隐瞒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时候，杜重石方才知悉罗青于1926年就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向导》报担任校对。后代理主持宜兴党支部工作，曾领导江都东乡抗租暴动。“四一二”政变后被捕，脱险后于1930年到北平，参加“左联”、“社联”活动。1931年曾代表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军委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部谈判合作。1932年后到石家庄铁路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参与领导南京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他与“七君子”一起被捕，只因为他与“七君子”关系密切，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并没有暴露。

那年月，报刊上关于共产党的报道，除了大肆歪曲和诬蔑之外，正面的介绍是没有的。罗青自从向杜重石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之后，就把党中央关于抗战的活动与态度告诉了杜重石，综合起来，有如下三方面：

（一）国共两党曾于1937年7月15日在庐山会谈，为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进行谈判。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代表共产党，由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代表国民党。会谈中，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向国民政府提出的三项基本纲领：1.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2.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3.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为了顺利实现这三项基本纲领，共产党对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1.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2.

甫公——指刘湘。刘湘号甫澄，川人尊称为“甫公”。

张冲——蒋介石侍从室负责情报的中将处长。

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3. 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4.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同时向国民党提出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 毛泽东于7月23日提出“坚决抗战，反对投降妥协”的八大纲领：1. 全国军队总动员。2. 全国人民总动员。3. 改革政治机构。4. 实行抗日外交。5. 改良人民生活，6. 实施国防教育。7. 执行抗日的财经政策。8. 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 庐山会议之后，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日本帝国主义最怕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所以才迫不及待地挑起上海战争，企图在军事上再给国民党施加压力，以达到它破坏国共合作的目的。可见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日救国、争取最后胜利是极为重要的，必须尽力巩固和发展。

这些情况，有些可以从报纸上看到，但是很不详细；有的则根本看不到。尽管杜重石当年在上海读书的时候也曾经接触过一些文化界的共产党人，后来与红四方面军谈判，也见过红军部队中的共产党人，但是像罗青这样无保留地当面开导，却还是第一个。也可以这样说，杜重石真正接触共产党，正确认识共产党，是从罗青开始的。《前哨》三日刊有了罗青的参与，等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一般，从此立论更加正确，立场更加坚定，抗日的态度也更加坚决了。

二、二十军上海抗战

杨森得到蒋介石的命令，率二十军于1937年9月1日从贵州安顺场等地徒步出发，沿湘黔公路行军，到湖南辰溪乘船到长沙，换乘火车经粤汉路到武昌徐家棚车站，连夜渡江到汉口。在汉口滞留了几天，转京汉路到郑州，再转陇海路到徐州，换津浦路到浦口，立即渡江到南京，转南京到上海的京沪线车到嘉定县。前后历时41天之久，总算于10月12日到达上海前线，部队在嘉定县的南翔火车站集结。

杨森还在行军途中，即于10月9日得到了蒋介石的命令，他的一三三师和一三四师加上临时调拨来的中央军二十三师，参加上海抗战，划归淞沪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被编入第六兵团战斗序列，任务是防守大场、蕴藻浜、陈家行一线阵地，与日军白川大将指挥的第九师团、禁卫师团对垒。杨森的军部指挥所，就设在南翔火车站。

10月15日清晨，二十军一三四师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激战三昼夜。师长杨汉忠负伤，团长林相侯、营长洗纠华等阵亡，官兵伤亡过半，但是阵地屹立不动，凶残的日寇没能前进半步。

18日，防守陈家行阵地的二十三师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击，丢失了阵地。薛岳把责任推到杨森身上，下令杨森把阵地夺回来。这时候一三四师已经无力再战，杨森就把任务交给了杨汉域。一三三师接受了任务以后，全力出击，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终于把陈家行阵地从日寇手中夺了回来。但是官兵牺牲惨重，二十军严重减员，兵力不足，已经无法继续防守这三个阵地了。

19日，杨森奉命把三个阵地交给广西部队接防，二十军结束了五昼夜的

上海抗战，奉命到纪王庙整顿残部。经整编，除去伤病员，剩下还能作战的兵员勉强只够编为一个旅，交由杨汉域指挥，又担负起掩护上海军民转移到苏州、常熟之责。在莘庄至常熟的途中，二十军残部又与日军激战两昼夜，终于完成了掩护的任务。任务完成后，杨森先到南京接受蒋介石的“嘉奖”，被委任为第六军团长，然后奉命转移安庆，接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节制。

二十军从进入上海到撤出上海，前后不过一个多星期，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按照蒋介石的估计，这支部队从关山千万重的西南边陲长途跋涉来到上海，疲惫交加，加上装备落后，面对以逸待劳的凶顽日寇，必然会一触即溃的；这样，他就可以假手日寇把二十军这支非嫡系部队消灭，就可以找理由办杨森一个“指挥不当”的罪名，即便不开刀问斩，也要他从此当光杆儿司令。没有想到杨森的部队居然还挺能打仗，不但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还能把别人丢失的阵地夺回来。不过，二十军经此一役，已经名存实亡，剩下最多不过一个旅的兵力了。面对二十军这样的“战绩”，蒋介石怎么能不当面予以“嘉奖”呢。

二十军途经汉口的时候，在杨森的私邸杨森花园遇见国民党中宣部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袁丛美。袁也是四川人，因为脸上有麻子坑，所以自嘲地取了个漂亮的名字叫“丛美”。当时他正借住在杨森花园，适逢主人因出征而回归，邂逅相逢，无以为敬，就拍了一部二十军开赴上海抗战的新闻纪录片。这件事情在全国的影响虽然不大，但给二十军官兵们的鼓舞却不小。

二十军到达南翔的第三天，即10月14日，副军长夏炯和副官长范诞生一起到法租界二十军驻沪办事处联络，杜重石就介绍他们与罗青见面。这一次晤谈，既别开生面，又十分融洽。有杜重石的关系，罗青开诚布公，并不掩饰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因此，一方是共产党员，一方是国民党员，但又都不代表党组织，而谈的偏偏又是如何加强国共合作、如何巩固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坚持抗日救亡等等党和国家、民族的大事，似乎双方都是负有祖国兴亡命运之责的人。这次晤谈，夏炯对罗青的印象极佳，并把这极佳的印象一直输送到杨森那里，为此引发了杜重石的延安之行，又为此引发了杜重石后半世的坎坷遭遇——这都是后话。

17日夜，上海文化界人士郭沫若、田汉、许幸之、胡兰畦、胡莘等人，鉴于杨森在川军中率先抗日，用相当落后的武器抵挡住日军猛烈的炮火，坚守了阵地，足见官兵们爱国心之强、士气之高，可为抗日军人的楷模，商定一起到南翔车站二十军指挥所去看望、慰劳杨森。

郭沫若当时在上海主编《救亡日报》。早在北伐时期，他就与杨森有过接触，并建立了相当深厚的交情。

胡兰畦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1920年，恽代英、萧楚女在四川泸州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时候。她也是会员之一，研究会得到杨森的支持，杨森也常常到学会去研讨马克思主义学说。胡兰畦不但早就认识杨森，而且和杨森的夫人也有交往。1922年，杨森任命恽代英为川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恽代英又介绍胡兰畦到川南师范当教师。杨森对胡兰畦很有好感，有意要娶她做姨太太，被胡兰畦一通大炮轰了回去：“我父亲是四川有名的袍哥大爷。袍哥大爷的女儿是不嫁给人家做姨太太的。”

杨森虽然碰了个钉子，但对胡兰畦的印象和关系一直很好。1945年杨森出任贵州省省主席，创办《贵州日报》，还是聘请胡兰畦当社长。

郭沫若等五人在杜重石的陪同之下，由南站乘火车出发。车刚开出不久，由于前方铁轨被炸，火车停了下来。一直等到深夜2点，还是无法通行，郭沫若和田汉等人只好返回市区。杜重石和胡兰畦拦住了一辆运送军需物资的卡车，总算在天色黎明的时候到达南翔。胡兰畦见到了杨森和夏炯，转交了何香凝的慰问信，仍搭运输车返回上海。

夏炯虽然只与罗青见过一次面，但是对罗青的印象极佳。二十军离沪之前，曾经向杨森建议聘请罗青为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在军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因为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张铭，是蒋介石派来的。他自恃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天子门生”，看不起杨森，还觉得自己到二十军这样的杂牌军来当个政治部主任，太屈才了，因此说话行事，处处盛气凌人。杨森对张铭也很不满意，但是蒋介石派来的“钦差”，既得罪不得，也不能请他开路，如何请罗青来屈就副手的事情，必须让杨森与罗青两人当面谈了才行。杨森听说罗青是共产党员，而且与杜重石交情很深，也想通过罗青与共产党建立横向关系，还想把杜重石派到延安去考察，并向朱德请教一些问题。但是当时军马住们，这些事情一时间都顾不上。

三、新防区安庆城

二十军离沪后，杜重石仍留在上海法租界处理办事处的善后事宜和《前哨》的停刊事务。直到1938年元旦，这才伙同罗青以及办事处的翻译齐卫莲夫妇搭乘意大利海轮“甘姬号”去香港。

齐卫莲是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英语、法语都很好，还娶了个法国夫人，中文名字叫“木林”，齐卫莲到了安庆以后，接受杨森的聘请，当了他的顾问，以后就一直追随杨森，直到重庆解放。

“甘姬号”停泊在吴淞口外。通过上海的青帮者太爷曹幼珊的协助，将他们一行四人和一匹大洋马用小火轮送到吴淞口。这匹大洋马，是杨森通过行家向上海跑马厅买来的赛马，要杜重石给他运到安庆。价格贵贱还在其次，难的是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日子转运这样一头庞然大物，未免太招摇了点儿，会不会遇上麻烦，谁也不敢保险。马是装在一个特制的大木笼里的，先用马车拉到黄浦江边码头上，再用力夫抬上小火轮，就已经够引人注目的了；到了吴淞口，还要用吊车从小火轮上把大木笼子吊起来放到海轮的甲板上。恰恰这时候日军的巡逻艇开足马力呼啸而来，杜重石等人正担心会有麻烦，日军见是一只意大利海轮，没加理睬，又呼啸着开走了。

船到香港，一行人转道广州，再坐火车到汉口。这是南京沦陷以后从上海到汉口的“最佳路线”了。汉口回龙寺有一家川帮商号，与二十军素有来往，以前凡是二十军营以上军官来汉口，都住在这里。杜重石一行，也援例住进了这家商号。

第二天，罗青带领杜重石到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拜望吴玉章和李克农。谈话中罗青提起杨森要派人到延安访问的事情，吴玉章说：“凡是愿意去延安访问的，我们都欢迎。何况杨子惠和朱总司令是好朋友。”

过了两天，章乃器也从香港来到汉口，罗青和杜重石去看望他。杜重石谈起杨森有意礼聘罗青去二十军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事，章乃器表示完全赞同。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是浙江青田人陈诚，章乃器与他不但是小同乡，而且还是总角之交。他说：“如果罗青愿意去二十军而又遇到困难，他可以到

陈诚那里去说项，以促成此事。”

二十军有一只小火轮，来往于汉口、安庆之间，由一三三师副官长汪海铨管理。杜重石等人在汉口的事务办完，就搭乘这只小火轮到达安庆。

安庆虽然是安徽的省会，但是城市很小，人口也不多，又不通火车，在长江流域诸省的省会中，算是比较穷的一个了。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寇的海陆军各一部沿江而上，直取安庆，妄图经安徽向湖北推进。杨森受命阻击，派一三三师开往巢县、无为、庐江拦截，派一三四师向巢县出击，歼灭了部分日军。日军发觉安庆空虚，另派一支部队分两路钳击安庆。驻防合肥的何成浚部不战而逃，安徽省主席蒋作宾和党政要员们慌作一团，他们既不与驻守安庆的二十军取得联系共商联防大计，也不组织民众防御日寇侵犯，而是带头动用各种车辆，满载行李、家眷连夜奔逃，把省会迁到六安去了。老百姓见当官的逃跑，也跟着逃跑。一两天之内，安庆市民逃匿一空，家家关门闭户，街上买不到任何东西，城市生活陷于瘫痪状态。

杜重石等人到达安庆，这里已经变成一座空城、死城。但是作为军人，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二十军不足一旅的人马，依旧死守这座空城，没有后退一步。

罗青见到了杨森，尽管他们还是第一次谋面，却像老朋友似的，并不拘束，也没有隔阂，谈话十分随便。罗青首先对省主席蒋作宾率领省政府、省党部的大小官员望风而逃一事大加挞伐，在这种时势下，谴责蒋作宾不要老百姓，等于表扬杨森坚守阵地，与百姓共患难。他们两个，一个是不愿当面说奉承话，一个是喜闻过而不喜闻功，因此反倒特别说得来。

杨森虽然是个军人，但酷爱读书，知识面很广，早年就参加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广安老家的书房里还保留有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他与罗青晤谈竟日，所涉问题很多，很像国共两党的代表在谈判，又像两个学者在争辩，更像两个老朋友在聊闲天儿。

杨森先从一个谣传说起：“外面有人造谣，说我挖了玉阶的祖坟。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和玉阶不但没有杀父戮兄之仇，而且还有深交；我更不相信挖祖坟破风水这些迷信勾当，我怎么会做这些蠢事？谣言出来了，我又不便公开声明，真叫人哭笑不得！”

罗青说：“国民党的顽固分子，造谣、挑拨离间，本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的职业病。其实，谁也不会相信这些鬼话的。朱总司令当然更不会相信。”

杨森又说：“我们知道张国焘已经投靠了国民党。这可叫我有些提心吊胆，要是他把二十军和红四方面军秘密谈判的事情当作资本向蒋委员长告密，有许多人要人头落地，我可就要吃不了的兜着走了。”

罗青说：“即便张国焘已经以此为资本向国民党告了密，我看至少目前蒋委员长还不会发作。现在是国共大合作时期，国内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抗日；国际上，中国已经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空军已经到中国来支援中国对日作战。共产党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抗日救国的。蒋委员长讲过：‘艰苦抗战是死中求生之路。牺牲一切，全国奋起，务达最后胜利之目的。’这说明他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也说明他有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共赴

国难的决心。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如果蒋委员长还去翻这些陈年老账，是要失去民心的。”

杨森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步步进逼，我军节节败退，蒋委员长实际上是在退无可退的窘境中才被迫抗日的。在抗日的口号下面，也还有他自己的打算。至少在对待中央军与地方军上就不是一视同仁。上海抗战，我们二十军减员一半儿以上，武器、弹药、装备的损失也十分巨大。蒋委员长口头上说要给我们补给，可是至今没有兑现。”

这时候夏炯插话说：“不提中央军，就是在地方军中间，我们二十军的装备恐怕也算是最落后的了。可是在上海抗战，我们二十军能够坚守阵地，正牌儿的二十三师却守不住，把陈家行阵地给丢了。司令长官又命令已经伤亡惨重的二十军克日收复。这可就有点儿强人所难了。要不然，二十军也不至于减员一半儿以上！照我看，中央如果不改从前借红军之手来削弱地方杂牌军的做法，现在如果不清除借东洋兵来消灭杂牌军的私心，是要误国误民的。”

杨森听夏炯说出了他不便于直说的话，沉吟不语。杜重石是个直性子，干脆把话挑明了说：“薛岳是指挥上海抗战的司令长官。他明知道二十军已经伤亡惨重，还下了克日收复二十三师丢失的阵地。好在我们不惜牺牲，总算把阵地夺回来了，要是我们再来一个全军覆没呢，他薛岳能逃脱调度不当的罪责吗？”

杨森听了，摇摇头，语重心长地说：“在这个问题上，薛伯麟也有他的难言之隐。上海是南京的门户，上海的存亡，直接影响国民政府的存亡，所以蒋委员长对上海保卫战是十分重视的。调哪一支部队布防，让哪一支部队接防，薛伯麟都要及时向统帅部请示报告，再遵从统帅部的指示发布命令，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如果二十军在上海战役中全军覆没，有人也许正求之不得呢！”

杜重石还怕罗青听不明白，又来一个画龙点睛：“薛岳名义上是淞沪战区的司令长官，实际上只是个传达统帅部命令的传令官！”

罗青也频频点头，很感慨地说：“没有大公无私的抗日友军，抗日救国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如果有人想利用抗战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也许能蒙蔽群众于一时，但最终总要彻底暴露、彻底失败的。”

接着，他们从这个问题谈开去，先从抗日救亡谈到国共合作，又从国共合作谈到统一战线。杨森说：“共产党提出的‘四项保证’的第一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是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所表示的诚意。可是身为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张国焘，办事却口是心非，言行不一。1933年秋天，张国焘与我们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密约，可是他在取得胜利之后就片面毁约，向我们突然袭击。我们还是要吸取张国焘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讲信义的教训的。”

罗青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第一，当时国共两党还没有达成统一战线的协议；第二，张国焘违背中央自搞一套，他的极左做法确实给共产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好在张国焘的问题发现得早，在党内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清算。现在共产党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历史条件都不同了。党内确立了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经过整风，改正了以往的一系列错误，认真贯彻国共合作宣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道是‘百闻不如一见’，杨将军要是还不相信，可以派人到延安去看看嘛。”

杨森想起夏炯再三提过要派杜重石到延安去考察的事情，就表示欣然同意，诚恳地说：“对，对。我们是应该和延安直接沟通，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按说，派夏炯去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和陈昌浩也算是老相识了。可他是现役军人，二十军的将领，目标太大，也离不开。我的意思，是派杜秘书到延安去‘留学’，也代表我去看望玉阶，向他请教二十军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求得生存与发展的策略。请罗先生促成此行。”

罗青表示此事由他负责向延安方面联系。当天的长谈，就此结束。

4月中旬，《大公报》、《新闻报》记者范长江、陆治从鲁南台儿庄采访战地新闻归来，路过安庆。范诞生与范长江是叔侄关系，他与夏炯一起代表杨森设宴欢迎他们，并把还留在安庆未及撤退的党政机关人员和社会法团负责人请来，听他们介绍台儿庄大捷的战地实况。

范长江和陆治两人详细介绍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汤恩伯、关麟徵、孙连仲等部40万精锐，发动民众，于4月初将两路日军分别阻止在山东临沂和台儿庄，并在台儿庄与日军矶谷师团血战四昼夜，歼敌2万，取得辉煌胜利的经过，还特别强调了“军民协同作战”的成效。他们讲到在台儿庄战役之前，师长池峰城率领守军浴血奋战，把日军主力吸引到台儿庄附近，李宗仁方才能够调集大量兵力，包围日军，形成内外夹攻的形势，取得了声振中外的台儿庄大捷。而池峰城部队之所以能够坚守阵地达半个月之久，主要就是靠老百姓的支持。战斗结束以后，池峰城指着一个老妇人的尸体对记者说：“她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把日军的动向报告给我，后来被日军发现，就把她炸死了。”范长江和陆治两人的战地通讯写得好，讲话也有声有色，听者如临其境。他们讲完了，夏炯很感慨地说：“二十军在上海抗战，临近前线的乡镇长全部跑光了，老百姓大都跟着逃难，剩下的不是老弱，就是病残，再不然就是一些痞子游民，留下来只想趁机发国难财，‘军民协同作战’的话，根本无从谈起。希望新闻界的朋友们在这方面多作宣传，要求乡镇保甲长们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真正做到军民合作，共同对敌。”

杜重石也接着说：“二十军在上海抗战，后来又掩护军民西撤，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和各界爱国人士在上海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要完成那样大规模的救护、支前和协助军民转移的任务，简直是不可能的。可是听说很受安庆市民欢迎的抗日救亡演剧队，只因为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就被安庆市的治安机关禁止活动了。像《放下你的鞭子》这样的街头剧，很受市民欢迎，居然以‘扰乱市容’为由，也不许演出。这不能不使人感觉到国共合作的脆弱性和潜在的危机。希望今后上切从抗战救亡、共赴国难的大局出发，不再出现影响国共合作的不祥之兆。”

尽管当时在座的人大都不是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儿，可是杜重石这样说话，也还是够胆大的。那一年他刚25岁，少年气盛，说话鲁莽，也在所难免。

范长江、陆治离开安庆以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封锁线外的安庆》的文章，报道了安徽省政府迁到六安以后，安庆军民的合作抗日气氛，特别提到二十军官兵为了搞好军民关系，正在掀起一股学习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热潮，早晚点名的时候，都要集体诵读。

实际上，二十军官兵学的，是经过夏炯、范诞生改造过的“四大纪律十

四项注意”。四大纪律是：英勇抗战；服从长官命令；不要人民东西；坚固军队团体，十四项注意是：逢人宣传；说话客气；爱惜武器；不当散兵；整洁驻地；买卖公平；借物还原；损物赔偿；不乱拉屎；远让汽车；不嫖不赌；自己洗衣；负伤交枪；负伤守纪。

不久，原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张铭忽然不辞而别，桌上留下一封信，大骂二十军诸将领，还指斥杨森的许多不是之处。大家对张铭的飞扬跋扈本来就很不满意，这一下都来劝说杨森聘请罗青出任政治部主任。夏炯说：“看张铭那架势，一定是到‘金殿’‘告御状’去了。既然他不仁，就别怪咱们不义，老令公也应该向中央反映反映他张铭在二十军的所作所为。咱们这时候推荐罗青，也正是机会。”

第二天，杨森正要让杜重石起草报告，不料汉口总政治部发来电报：已派员接张职务。罗青也同时接到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章乃器、安徽省动员委员会主任朱蕴山联名从六安发来的电报：已推荐罗青任省动员委员会总干事，速来六安。

既然一方有了补缺，一方又有了高就，留罗青在二十军的事，也就无法再提了。

各省的“动员委员会”，本来是发动民众开展抗战救亡工作的群众机构，但是安徽省的动员委员会却由原省党部的那些官僚组成，没有群众参加；除了在省党部门口加挂了一块牌子之外，更没有做任何工作。当时的安徽省省长蒋作宾已经被免职，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省长。他对这个有名无实的“动员委员会”很不满意。为此特地请同盟会老会员朱蕴山先生出来加以改组。朱蕴山先生是很器重罗青的，就把罗青给请走了。

罗青在临走之前，又跟杨森就派遣杜重石去延安的事宜进行了磋商，说定了一切由罗青负责联系，一有眉目，即请杜重石动身。

老令公——指杨森。二十军的军官大都是杨森的子侄辈，实际上是一支“杨家军”，军中多以《杨家将》中的“杨老令公”来称呼杨森。

第五章 延安观光

杜重石作为杨森的私人代表，到延安去观光，并向朱德请教一些政治、军事上的问题。

他在延安参观，耳目一新，发现这是一个真正抗战的政党，思想上发生了第二次转折。

他面见毛主席的要求得到满足。但是在会见之前，因为被不信任的搜身，引发了他的不愉快，因此在见面的时候，竟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一、未曾入境先问俗

罗青走后没几天，就发来电报，要杜重石到六安去跟他会面。大家心里明白，他已经与延安方面联系好了。

杨森把杜重石叫去面授机宜，交待了如下几点：（一）吸取张国焘过河拆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教训，办事必须十分小心，千万别再上共产党的当。（二）观察一下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四项保证是否言行如一。（三）听说解放区学俄国人的“一杯水主义”，把乱搞男女关系说成是“婚姻自主”，调查一下是否属实。（四）听说张学良的东北军派了许多军官到延安抗大学习，调查一下是否事实。（五）学习八路军深入敌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的经验和方法。（六）了解解放区人民政治、经济、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以及民心向背。

1938年5月初，杜重石到达六安，罗青带他先后拜访了章乃器、朱蕴山和省动员委员会的两位副总干事：一位是青年经济学者、《通俗政治经济学讲座》一书的作者狄超白；一位是陶行知的得意门生、省动员委员会的共产党党组书记张劲夫。又介绍他认识了救亡演剧队的两位领队：张一萍和蒋岱燕。

朱蕴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老前辈，声望与地位都很高。杜重石向他反映了救亡演剧队在安庆遭到治安当局禁演的情况，他说：“这是国民党少数顽固分子搞的，不能代表国民党。我和章乃器建议安徽省政府向新四军提供医药、经济方面的援助，也遭到少数人反对。不过李宗仁倒说：‘不管什么人、什么部队，只要是抗日救国的需要，我们都应该从大局出发，竭力相助。’可见国民党内也不乏明智远见之上。救亡演剧队遇到的困难很多，他们经费少，流动性大，自己又没有交通工具，行动不便，还要跟地方上那些顽固分子周旋，也真难为那几个年轻的娃娃。”

杜重石说：“安徽军邮局负责人张锡扬是我的老朋友。演剧队要去的地方，只要通邮车，我可以请他帮忙，让演剧队搭他的邮车。”

从朱蕴山先生处出来，杜重石就介绍张一萍跟张锡扬认识。后来张锡扬也确实给救亡演剧队提供过一些方便。

古人说：入境先问俗。杜重石要去延安，却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就向狄超白、张劲夫打听解放区军民团结、发展生产、共同抗日以及陕北人民的风土习俗、文化生活等等情况。他们两人也尽其所知，详细介绍。狄超白还给王昆仑写了一封介绍信，说他是国民党内开明进步人士，嘱咐杜重石到了汉口以后，一定要抽时间去拜访他，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用到他的。

汉口是长江沿岸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刚进5月，气候就已经十分炎热。

杜重石从六安坐汽车出发，经商城、麻城，到达汉

口，顾不得满头大汗，下车之后，根据罗青的安排，立刻到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去见吴玉章。

吴玉章是四川荣县人，1903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他不仅是追随孙中山先生发动民主革命的元老之一，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参加过南昌起义，也是共产党高层领导的元老之一，与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并称为“四老”。他待人诚恳，态度和蔼，在杜重石这样的后生晚辈面前，毫无长辈的架子，笑嘻嘻地说：“杨子惠派你到延安去访问，很欢迎，很欢迎。子惠跟朱总司令是老朋友，他的儿子汉忻、侄女儿汉秀，也都很进步嘛。正好明天李克农同志要去延安，你跟他一起去更方便些。希望你到了延安以后，冷眼旁观，多提意见。”

其实，汉忻和汉秀都是共产党员，为了便于工作，特别是便于做杨森的工作，他们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甚至杨汉秀在重庆解放前夕被军统特务杀害，解放后对她的“烈士”身份都迟迟不能肯定，所以当时吴老只说他们很进步。这叫“点到为止”。

杜重石从八路军办事处出来，又赶到政治部第三厅去看望郭沫若和田汉。郭沫若外出开会去了，只见到身着军装、精神焕发的田汉。两人本来就认识，杜重石说了这次来汉口，是要转道去延安访问，又说了说救亡演剧队在安庆、六安的处境与活动情况。

田汉说：“有道是‘百闻不如一见’嘛，到延安去亲眼看一看，总比听人家说的更实在些。我这里，外面把第三厅叫作文化厅，‘创造社’的冯乃超、蒋光慈和‘左联’的一些朋友们都在这里工作刚说到这里，有两个四川口音的客人走了进来，跟田汉打招呼。田汉站起身来给杜重石介绍：“这位是阳翰笙，这位是袁丛美。”

然后转向杜重石向两位客人介绍：“这位是二十军军部秘书、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杜重石。”

大家互道“久仰”。这可不是客套，因为彼此确实是神交已久的老朋友了。

阳翰笙是个文质彬彬的剧作家，一口川南乡音未改。杜重石经常看他用“华汉”的笔名发表文章。袁丛美呢，杜重石早就从夏炯的口中听说过他在汉口为二十军拍摄赴上海抗战的新闻纪录片，但是一直没机会见面，不料今天在第三厅不期而遇。袁丛美也是一身戎装，腰间比田汉还多了一柄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军人魂”短剑。杜重石知道他性格诙谐，就逗趣地说：“多蒙您给我们二十军扬名，十分感谢。可惜那时候我在上海，不然一定要沾老乡的光，请您把我也拍进镜头。”

袁丛美也凑趣地说：“那时候您要是在汉口，我一定把镜头推得近近的，给您拍一个大大的特写，让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二十军有一个少年英俊又博学多才的杜大秘书！”

他的幽默，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杜重石因为明天就要动身，还有许多事情要办，时间很紧，又见他们好像有事情要谈，不便久坐，略谈几句，就告辞了。

从第三厅出来，去拜访王昆仑，不巧他正好外出，只得留下狄超白的介绍信和自己的名片，写上“专访未晤”及寓所的地址。想到狄超白说的延安人生活简朴、人人布衣，又顺便到市场去买了两套灰布中山装，回到寓所，

却见到王昆仑留下的名片，上面写着“特访来晤”字样，懊丧不迭。但是天色已晚，还要在明晨出发之前抓紧时间写好几封信，再去拜访已经来不及，这一次，只得失之交臂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杜重石就和李克农同车去延安。车上除司机之外，还有一个男青年和两个女青年。男青年四川口音，衣着十分朴素；两个女青年则打扮入时，一个脖子上挂着金项链，一个手上戴着钻石戒指，她们互相讲的是福建话，估计是华侨。动问之下，才知道她们俩都来自印度尼西亚，而且都是投奔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的。

李克农是安徽巢县人，当过中央苏区的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刚40岁，职务是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抗战开始后历任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等地办事处处长。

在车上，李克农也和所有党的保卫干部一样，说话不多。杜重石主动和他搭讪，找些话题来说，他也只是听着，有时候点点头，有时候连头也不点，杜重石谈起当时社会上的热门新闻——刘湘客死汉口之谜来。刘湘死后，社会上有两种传闻：一种说法，是刘湘曾经和韩复榘同谋反蒋，韩复榘当了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未与日军交战，居然就放弃了山东，被蒋介石在1938年1月间枪毙了；刘湘生怕下一个就要轮到自已，所以他是吓死的。另一种说法，刘湘虽然勉强出川抗战，但是蒋介石把刘湘的师长唐式遵升为军长，不久又提升为军团长，用分化刘湘部队的手法来削弱他的军权；唐式遵是个有名的大草包，根本不会指挥作战，以唐式遵取代刘湘，分明是看不起刘湘的意思，因此刘湘是气死的。李克农听了，反问说：“刘湘死了，空出来的四川省主席，你看会由谁来继任？”杜重石答：“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蒋委员长答应过‘川人治川’的。不管怎么说，总得找个四川人来装装样子吧？”李克农说：“不这样做，川康地方和中央的矛盾就要加深了。不过中央政府大概也不会放心‘川人治川’的。”——后来四川省主席一职并没有给四川人，而是由蒋介石自己兼任，说明李克农的分析和判断都是正确的。

后来杜重石又谈起当时的另一个传说：国民党为了表示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诚意，打算恢复北伐时期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李克农听了；却严肃地说：“如果这一传说确是事实，恐怕不能看成是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诚意，很可能这是玩弄容共反共的另一种手法。不着事物变化的实质，好心人是很容易被表面现象迷惑的。”——后来蒋介石在1941年1月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证明李克农的这一分析和判断也是正确的。

二、耳目一新的感受

车到延安，李克农把杜重石安置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由边区政府交际科科长金城负责接待。金城安排他住下，又给了他一摞餐券，分早中晚三种颜色，并交待说：以后每星期到他那里领一次；每张餐券可以到招待所大门外右侧那家小饭馆儿里吃一餐“份儿饭”。

杜重石归置好行李，觉得肚子饿了，就拿上一张餐券，按指点到大门口右边找到了那家小饭馆儿。这家小饭馆确实不大，迎面就是炉灶，店堂内一共有四五张方桌。他找了张桌子坐下，用餐券换来了主食和副食，一个人坐

着慢慢儿吃。主食是四个小馒头，或者是一大碗米饭，可以任择；也可以要两个小馒头、半碗米饭。副食是一菜一汤，菜是榨菜炒肉丝儿，汤是榨菜肉丝儿汤，够得上“原汁原味”四个字。用这样简陋的饭菜来招待客人，而且是到延安后的第一顿饭，杜重石总觉得共产党也过于小气了些、寒酸了些。后来才知道，就是这样的饭菜，也已经比当地的军民生活高得多了。

杜重石一边吃饭，一边随意地看着街上。这时候有两个穿着日军军装的人，挑着满满的两桶水，神态自若地用日本话聊着天儿，从小饭馆儿门前走了过去，前后走了两三个来回。看样子，一定是日本战俘无疑。八路军优待俘虏，不打不骂，这他是听说过的，但是不加拘束地满街上走，还让他们挑水，却就感到有些奇怪了。

在灶上掌勺的厨师见杜重石满脸惊讶的神色，就用四川话搭讪：“老乡，你从‘白区’来，看到东洋兵帮老百姓挑水，觉着稀奇，是不是？”

杜重石觉得自己穿一身灰布中山装，说话也十分平易近人，已经很像‘苏区’的干部了，就否认说：“老乡，这一回你老哥看走眼了，我不是从白区来的，是从老解放区来延安办公事的干部。”

不料那厨师却连连摇头说：“不像，不像。我这双眼睛，看的人多了，是老区来的还是白区来的，我一眼就能认得出，你骗不了我。我们苏区的干部，没得你这样整齐的衣服鞋袜，更没得你哥子这样说话的派头；看见东洋兵帮老百姓挑水，也不会脸起眼睛看稀奇的嘛。”

杜重石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老乡，你的眼睛真像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好厉害睛！实话告诉你，我是今天刚刚从汉口来的。你倒是跟我说说，这两个日本战俘，怎么会帮老百姓挑水呢？”

那个厨师也哈哈大笑起来：“怎么样，我说我的眼睛看人不会走眼嘛！你连日本战俘在延安的生活都不晓得，还充啥子老区干部唷！告诉你，我们这里有一个日本共产党办的‘日本反战同盟’，专门帮我们教育、训练日本战俘。经过学习的日本战俘，有的到前线去喊话，做反战宣传，有的在延安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劳动。刚才你看见的那两个战俘，是在帮助年老体弱没得劳动力的老百姓挑水，也就是学习为人民服务嘛！……”

这是杜重石到达延安以后初次接触老百姓所上的第一课，感触颇深。

吃完饭回到招待所，在大门口意外地碰见朝鲜族青年音乐家郑律成。他们是在上海的时候由罗青介绍认识的。今天邂逅相遇，倍感亲切。问他到招待所干什么，他说找洗星海研究谱曲的事儿。走进招待所，才知道原来洗星海就住在杜重石隔壁的房间里。

郑律成介绍杜重石跟洗星海认识。他拿来找洗星海研究的歌曲，就是后来十分出名的《延安颂》。郑律成顾不得和洗星海研究曲谱的事儿，急不可待地谈他自己的近况、问杜重石的近况，又说了许多朝鲜、越南、日本的人民和共产党支持中国抗战的消息。说到越南的时候，他说：“胡志明现在就在延安。听说他还是杨森掩护到中国的，可真有这事儿？”

杜重石把杨森如何掩护胡志明到昆明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洗星海说：“从前四川内战，常常听见杨森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个四川军阀，今天听你这么一说，他对越南人民的反帝斗争还是满支持的嘛！”

三个人聊了一会儿天，杜重石怕影响他们研究曲谱的事儿，就告辞回自己房间休息。

第二天，陈昌浩到招待所看望杜重石来了。他穿一套肩头和膝头都已经

磨白了的灰布人民装，赤脚，穿草鞋，打着裹腿，比起几年前那一身商人打扮来，显得寒酸多了。人也还是那样清瘦，不过精神却很好。一见面，陈昌浩先感谢当年二十军赠送给红四方面军的许多物资，然后又检讨违背互不侵犯密约突然进攻二十军防地的错误，并再三说明那是张国焘的错误决策，当时他也曾经表示过异议，可是作为一个党员，又不得不坚决执行命令的苦衷。还说：“张国焘受到党内批判以后，仍拒不承认错误，已经逃离延安，投靠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为此中共中央已经在最近、也就是上个月的18日作出处理决定，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

杜重石笑着说：“张国焘的那一手，不但坑害了二十军，也损害了红军的威信和共产党的信用，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像这种言而无信的人，终究成不了大气候。开除他出党是完全应当、绝对正确的。不过我们听说他投靠了国民党以后，颇有点儿提心吊胆，他要是把当年跟二十军秘密谈判的事情当资本向蒋介石告密，我们可就要人头落地啦。”

陈昌浩也笑着说：“你我今天不是又见面了吗？可见张国焘还没有向蒋介石告密。他不是不想出卖这一情报，可惜的是当时咱们的谈判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即便有的话，也不在他手上，他是人证、物证一样也拿不出来。这种事情，关系重大，凭他空口说白活，蒋介石也不会相信的。何况他自己后来又进攻过二十军的防地，这个谎怎么也扯不圆。再说，他虽然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可不保他的身家性命。他从自身安全出发，还不敢像疯狗似地到处咬人。要是你们的杨老令公人头落地了，‘杨家将’的弟兄们，还不找他算账啊？”

一番话，说得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第三天，金城陪杜重石去参观陕甘宁边区信用合作社。这是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前身，也是发行“边币”的“真正”单位，负责人是专门筹划边区政府经济建设的杨献珍同志。为什么要说这里是发行边币的真正单位呢？因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式发行10元以上的边币是1941年的事情，在此以前，也就是1938年3月，开始以“延安光华商店”名义发行只限于边区流通的“辅币券”。这种辅币券，当时也叫“边币”，而“延安光华商店”，实际上就是边区信用合作社的另一块牌子。

关于为什么要发行这种边币，杨献珍对杜重石这样解释说：“国民党不但严禁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流入解放区，还想尽一切办法限制法币落到我们手里。我们没有法币，就不能在白区买东西。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积攒起来，拿到白区去买医药用品和我们边区目前还不能生产而又为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物资。解放区的农村经济，有些可以以物易物，比如拿一个鸡蛋到信用社换几张纸；可是还有许多东西、许多场合不能以物易物。边区政府为了老百姓买卖方便，只好由信用合作社以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少量的辅币券，只限于在边区流通。这是我们被国民党逼出来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可是国民党却指责边区政府私发货币，扰乱金融，破坏政令统一。”

杨献珍一面说一面从抽屉里取出几张辅币券来递给杜重石看：“请你看，这样粗糙的辅币券，还不如国民党统治区烧给死

人用的‘冥钞’质量好呢。这能说是我们私发货币、扰乱金融、破坏政令的统一吗？我们在物质条件这样差的地区艰苦奋斗，还要应付国民党对我们的物资封锁，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服从一个大局：抗日救国！”

辅币券的纸张质量相当次，图案和印刷也很粗糙，面值最大的是一元，

最小的是五分，中间还有五角、两角和一角的。杨献珍接着说：“边区政府除了用积攒法币的办法到国统区购买必需的物资之外，还发动军民到南泥湾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自力更生，逐步解决边区军民的吃穿用问题，少受国民党的窝囊气。在大生产运动中，我们共产党员处处带头，连朱总司令也参加开荒、周副主席都学会了用纺车纺线呢！”

杜重石插话说：“我到延安来才两天，根据我的观察，边区军民的生活水平，实在是低得不能再低了。在国统区，政府官吏大都是靠裙带关系钻头觅缝爬上宝座的，不但不学无术，而且贪污腐败，就连一个小小的乡保长，也要借抽壮丁、派捐款敲竹杠，中饱私囊。当官的和老百姓生活悬殊，长此以往，不但要失去民心，对抗战也是不利的。”

金城接着说：“我们解放区，根本就没有贪污腐败的事。解放区各革命根据地政府都有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的，处以死刑；挪用公款为私人谋利的，以贪污定罪；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浪费公共财产、使公家受损失的，根据其浪费程度惩处，或撤职，或监禁。再说，解放区的干部不论大小，生活水平相差得并不多，如果有人贪污，搞特殊享受，也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杨献珍又补充说：“1932年的时候，湘鄂赣临时省委对贪污惩治得最坚决。凡是侵吞公款的，一律交群众大会议处，严重的当时就枪毙。”

杜重石到延安才三天，但是所见所闻，给他的感觉是耳目一新，到处体现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气象。这里的生活虽然艰苦，可是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各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劳动，支援抗战。共产党员更是以身作则，处处带头，吃苦在前，与人民血肉相连。他们这种不辞劳苦，一心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无私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跟国民党统治区的结党营私、贪污腐败、破坏国共团结、妨碍全民抗战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这一边是一切服从抗日救亡大局而艰苦奋斗，那一边却寻找种种借口，破坏团结合作和共同抗日。两相对比，尽管杜重石是来自地方杂牌军的参观客人，不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什么官员，但总是“那一边”的人，不免也感到羞愧。

当时杜重石只有25岁，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极强，加上性格爽直，因此参观结束以后，很激动地对金城倒出了肺腑之言：“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我到延安才三天时间，但是所到之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团结抗日景象。尽管国民党顽固派动用了一切手段来剥夺解放区军民的最低生存条件，但是延安军民发扬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给我的感觉是面貌焕然一新，跟国统区简直是两个世界。三天来的感受，使我坚定了一个信念：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救星，共产主义必将在黑暗的中国冲出迷雾，显出万丈光芒，普照到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文化上受桎梏、生活上受困苦而渴望民主自由的人民身上。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抗日救国，就必须长期深入群众，学习群众，溶入群众，投身到延安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中去，为抗日斗争做出无私无畏的奉献。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到了延安，好比如丹在炉，如铁在冶，我这颗爱国之心一定会狂跳，我这腔救亡的血一定会沸腾。为了开我茅塞，广我眼界，我要求谒见掌管延安这座革命大洪炉的高人毛泽东，向他请教，接受他的鞭击和棒喝。”

金城见这个好激动的年轻小伙子慷慨激昂地说出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言词来，莞尔一笑。也许他当交际科长以来，像这样迫不及待要求留下来学习的人见得太多了，所以倒有些见怪不怪，只是淡淡地说：“杜先生能够放弃比

较优裕的生活条件，主动愿意到我们延安来吃小米，这行动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嘛！……”

杜重石急忙把话头抢了过来：“对比国共两区人民的生活和奋斗目标，我只有这点儿‘大进步’，是远远不够的。我还需要更加深入地锻炼，改造世界观，与旧社会的旧习性彻底决裂……”

在杜重石的诚恳要求下，终于感动了上帝，金城笑嘻嘻地答应请示一下上级，能够安排的话，尽量安排他谒见毛主席。

三、首次谒见毛主席

自从杜重石向金城提出想谒见毛主席的要求以后，虽然天天盼望得到允许，但也并不完全寄予希望。因为在六安的时候，罗青、狄超白和张劲夫都说过：毛主席为党为国日夜操劳，经常工作到深夜，是个大忙人，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一般人都不要去打搅他。杜重石虽然代表二十军和杨森到延安来参观，到底是个不足道的小人物，又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军国大事”要向他汇报，只要他的秘书说一声“免”，就可以把这件不急之务给否定了。

这期间，杜重石在金城安排或陪同之下，参观了延安的许多地方，一晃就过去了两个星期。正在杜重石以为“希望落空了”的时候，忽然金城来通知，说是经过安排，毛主席答应见他，而且立刻接见。

这可真是意外。在此之前，金城居然连一点儿消息也不透露，以至连见到毛主席到底问些什么问题、跟他说些什么话，都没有好好儿考虑过。现在是说走就得走，只好边走边想，见了毛主席，再随机应变了。

金城领着杜重石，走到一个小山坡前面，指着 30 米开外的一个小院子说：“那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你自己去好了。我还有别的事情，不陪你了。”说完，就转身往回走。

杜重石一面往前走，一面低头沉思：“早就听说，毛泽东和边区的老百姓一样，也住在窑洞里，怎么忽然又变成一座小院子了？再说，金城再怎么忙，总也得把我带进院子里面介绍给主席或者他的秘书再走哇，我这样贸然闯去，警卫人员要是不让我进去，该怎么办呢？”

正想着，忽见一个背着盒子枪的警卫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转了出来挡住了去路，挺有礼貌地问：“同志，你找谁？”

杜重石急忙回答：“我要见毛主席。我叫杜重石，是二十军军长杨森派来的。”

那警卫员先从上衣兜儿里取出一张字条来看了一下，大概是核对姓名。这说明毛主席的接见，秘书们事先是安排好了的。没有想到的是：那警卫员把字条收了起来，接着突然伸出双手，在杜重石的全身上下左右环摸了一周——这当然是检查一下来客是否带有武器，杜重石不由得立刻想起“番邦来使不得带刀见驾”的故事来，同时恍然大悟金城为什么不带他进门的真正原因了，他本是个容易冲动的人，遇见这种不应该有的“待客之礼”，心中很不高兴，立刻形之于外，一边把上衣的扣子解开，一边干巴巴地说：“我把衣扣解开，好让你检查得更仔细些。”

那警卫员急忙摇手：“不用了，不用了。”接着又解释说：“对不起，这是我的任务，是警卫人员制度规定的。”然后指指 10 米开外的院子大门说：“那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意外的人身检查，使杜重石对毛泽东的看法立刻有了变化，景仰的心情也减低了许多。为了使自己安定一下情绪，也为了重新考虑一下见到了毛主席怎样说话，用什么身份向他说话，都说一些什么话，他需要短短的一段时间，可是已经到了门口，站着不走，总不像话。灵机一动、就问那警卫员，“这里有小便的地方吗？”

警卫员略一迟疑，指指身后的乱树丛说：“你随便找个僻静地方就行。”

杜重石朝他指的方向倒转身走了20多步，一面小便一面想：“我是代表二十军来向共产党的主席请教政事的客人，可是主人在见客之前先要对客人进行人身检查，分明是把我当成敌对阵营来的信不过的使者看待。本来我是想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向共产党的主席请教如何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战救亡、如何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争取最后胜利的，现在既然他对我放心，拿我当敌人看待，我干脆把自己放在国民党的地位跟他说话，强调一下国共合作，必须以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四项保证为前提。”

考虑成熟，杜重石回过身来，一级一级地踏上了院门前面的十几级台阶，迈进了院门。院门里面也站着一个人，身上却没背着枪，估计不是内侍就是秘书。他再次报了自己的姓名，那人指着右侧的一间房间说：“主席在里面。”

这是一座不大的一明两暗三开间房屋，房前有个小院儿，打扫得挺干净的。杜重石根据指点走进右面的东屋，见一位留着长头发、面容清癯但很有精神、身材魁伟的中年人，坐在藤圈椅上伏案看文件。房内没有别的人，当然就是毛主席了。杜重石走近前去，恭敬而轻声地说：“毛先生，感谢您在百忙中接见我。杨森、夏炯两位将军嘱我代他们向阁下致敬问好，并敬聆阁下对国共合作、抗日救亡的意见。”

毛主席放下文件，抬头打量了一下来人，微笑着说：“你就是杜先生，欢迎，欢迎。请坐。我们欢迎国民党人到延安来参观访问，从各方面了解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你不要客气，在延安看到有什么问题，只管提出来。抗战救国是全国人民的事，只要大家开诚布公，和衷共济，就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

杜重石在他办公桌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不慌不忙地说：“阁下所说的‘大家’，按我的理解如果指的是‘国共两党’的话，那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基础，就应该是贵党对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了。”

毛主席摇摇头说：“国共合作的基本纲领是个整体，不能片面地只谈我们的保证，而不谈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三项要求。只有把纸上的东西全部付诸行动，变成事实，才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杜重石试探地说：“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我听说，国民党为了表示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正打算恢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呢。”

毛主席瞥了他一眼，似乎在揣测他说这句话的意图，但并没有作正面的答复，而是说：“这个传说如果是真的话，我们会作声明的。”

关于这个问题，杜重石在来延安的途中已经跟李克农提起过了。这时候再次提起，是想探测一下李克农的意见是否与中央最高领导人一致。但是毛泽东所说的“要作声明”，既没有说向谁声明，也没有说声明什么。他本打算再进一步问问清楚的，转念一想，觉得不太合适。这时候忽然想起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杨廉、省警察局局长柳维垣对杨森说的“共产党取消没收地主土地是政治宣传，实际上只是变了个花招，把地主当汉奸整”来，就没头没脑

地说了一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地主总是工农的敌对阶级。沦陷区的地主大都和日寇有勾搭，有的还做了维持会会长，他们欢迎日本人，甘愿当汉奸，也都是事实。未雨绸缪，免得将来搞阶级斗争多麻烦，不如现在就把地主当汉奸看待，从理论到实际，好像也都说得通。”

毛主席听了，笑了起来说：“不能这样。把不是汉奸的地主当汉奸看待，这不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言行不一，是对人民的欺骗。”

杜重石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来“请教”毛主席，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幼稚，对共产党的不了解，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进门之前遭到了搜身，思想上有抵触情绪。这时候被毛主席一句话噎住了，窘态毕露，再也对答不上来。毛主席似乎也意识到了他的尴尬，就用别的话岔开去说：“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社会，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必须分为两个阶段。从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一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进行第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是旗帜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孙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革命’，指的就是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这种革命已经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而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了。”

这些革命理论，是杜重石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不由得又一次产生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但特别注意听，还把刚才因为搜身所引起的不愉快也冲淡了，渐渐地忘却了。听到这里，似有所悟地插话问，“既然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完成以后，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是否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不是革命的终结，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呢？”

毛主席点点头说，“是这样。这是只有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出现的新情况、新前景。在这样的国家里，阶级地位发生了变化，在政治方向上，无产阶级已经处于领导地位。”接着他娴熟地、背诵一样地说：“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曾经庄严地声明：‘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可惜国民党自己违背了这个声明。我们希望国民党在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中改正它。”

杜重石听到这里，已经完全为毛主席的革命理论所折服，对于刚才的搜身，不但已经完全不再介意，而且认为也许那是负责保卫的同志所出的并不高明的招数，很可能毛主席根本就不知道客人进门还有这样的“礼节”。这时候，他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又一次迸发出来，又一次像对金城说过的那样，向毛主席表述了他到延安以后所见所闻的感受，以及得出并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所不同的是，这一回他不以能在延安多住几天为满足，而直接向毛主席提出要进入抗大，作为一个正式学员，认真地从头学起。

第六章 抗大留学

杜重石不以走马看花式的参观为满足，决心参加抗大学习，深入了解共产主义的真谛。

他以自己特殊敏锐的观察力，观察一些很普通的问题。在抗大这个革命摇篮中，他与一些人的观点并不一致。他编了一个话剧剧本，在抗大上演，以说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他终于获准入党，成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秘密党员。先后经毛泽东、陈云、朱德的接见，面授机宜，接受任务，离开延安，到白区，在川康地方势力中间为党做统一战线工作。

一、窑洞大学见闻

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杜重石进抗大学习的事情迅速得到落实，被编到抗大三大队七中队。用的是别名“杜平”。抗大的全名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于1937年改称扩大后建立的。早期的学员，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由解放区各部队保送或抽调，是轮训性质的，每期不过几个月；后来从国统区来延安寻求真理的青年学生越来越多，就变成以培训知识青年为主了。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开学，共有各地来的知识青年477人；到了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开学，就有知识青年4000多人了。抗大第四期学员多，相应教职员也多，共有1386人。其中教员共253人，即主任教员23人，军事教员和助教90人，政治教员和助教128人，文化教员12人。杜重石来到抗大，第四期的开学典礼已经过去，所以他是第四期的“插班生”。

抗大第一期的校长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抗大设有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兼任主席。

“七七”事变以后，林彪、刘伯承分别担任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师长，无法分身过问抗大的事情，1938年1月，罗瑞卿继任副校长，校长名义上仍由林彪兼，但实际校务全由副校长罗瑞卿负责。所以抗大学员既是毛泽东的学生，也是罗瑞卿的学生。

抗大是著名的“窑洞大学”，设在延安的凤凰山上。山坡上一排排的窑洞，都是学员们自己挖出来的。挖窑洞，吃小米，打草鞋，爬大山，是每一个抗大学员进校以后的必修课。杜重石虽然没有赶上第四期的开学典礼，但却赶上了罗瑞卿带领上千名学员在凤凰山挥锄挖窑洞的这一课。经过半个月的突击，挖成了175孔窑洞，解决了抗大学员猛增的住宿困难。

七中队的窑洞地势比较低，从七中队窑洞上面的山坡再往上走，就是三中队；从三中队窑洞上面的山坡再往上走，最高处的一排窑洞，就是五中队——女生队。

七中队队部窑洞前面有一片开阔地，当然是在打窑洞的时候同时平整出来的。开阔地上筑有四堵长方形的“干打垒”土墙，估计当是利用窑洞中挖出来的土打的。土墙上架起人字形草顶，于是就建成了一座可容百人的“大棚”，作为全中队学员开会、张贴文件或墙报以及进行各种宣传活动的地方，并有一个专门的名字，称为“救亡室”。

这种“救亡室”每个中队都有，有点儿近似“俱乐部”的性质。每个“救

亡室”设主任一人，生活干事和文化干事各一人。七中队救亡室主任是个山西青年，面目黧黑，右眼角还有一块黑斑。

他是从“山西王”阎锡山办的“抗日救国牺牲大同盟”转到抗大来的。据他说：“牺盟”虽然打着抗战的旗号，但是个反共、防共的组织。他识破了“牺盟”的真面目以后，就脱离“牺盟”，转到抗大来了。

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南充旧称“顺庆府”，下辖广安、岳池、营山、蓬安……诸县。杜重石是广安人，与南充人是“小川北大同乡”。每逢罗瑞卿到三大队来作报告，杜重石总要以“大同乡”

的身份去找他聊几句。有时候罗瑞卿也主动找杜重石谈话，不过那不是因为“同乡”的乡谊，而是因为杜重石来自国统区，身份是“国民党人”，在抗大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员，罗瑞卿有责任对他加强统战工作。

从年龄上看，杜重石虽然只有20多岁，但由于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学识不同、理解力不同，加上特殊的身份，也就是“阶级立场”的不同，他的许多观点，往往与同学们格格不入。但是同学之中，多数人并不理解他的这种特殊身份，更不理解为什么他的见解往往与他们不一样。按他们的想法，既然同是抗大的学员，在所有问题上的认识，就应该完全一致才对。为了避免经常发生观点上的冲突，每逢班组学习讨论，杜重石总是倾听别人的发言，尽量避免开口。为此，班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批评他说：“杜平同志在学习讨论会上是只带耳朵不带嘴的。”

抗大的课程，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教材有《社会发展史》、狄超白的《通俗政治经济学讲话》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

有一次讨论社会发展史，有个同学发言说：“社会发展的规律，是资本主义必然取代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沙皇俄国当时还是封建主义，但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全国响应，封建主义的俄国，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中国要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也要学习苏联的十月革命，用武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中国也就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下子过渡到社会主义了。”

对于这种观点，班组内当然没人会有异议，纷纷发言表示同意，只有杜重石持不同看法。但为了避免争论，而且明知道争也争不清楚，所以依旧保持沉默，一言不发。这时候班长点了他的名，又说他只带耳朵不带嘴，一定要他谈谈自己的看法。杜重石被逼无奈，生平又不善于说假话，于是又一次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见解：“马列主义要根据具体国情灵活运用，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搬。中国的情况，与沙皇俄国是不一样的。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先要实现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

他的发言还没有结束，就遭到了与会者的纷纷反击。第一个发言的是山西人“救亡室”主任：“你说三民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意思是说：没有三民主义这座桥，就不能到达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那就更加谈不上了。”另一个接着说：“要照杜平的理论，岂不是要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去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吗？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政党，还能叫共产党吗？”下面连珠炮似地发言，当然也都是近似的调调儿。

讨论会的发言越来越热烈，离题却越来越远。杜重石等他们说差不多了，这才不慌不忙地说：“革命的现阶段为实现三民主义，这不是我的理论，恰恰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来的。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来的四项保证的第一条，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

现而奋斗。’毛主席也亲口对我说过：‘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是为社会主义扫清道路。’照我的体会，这就叫‘不断革命论’，也就是‘革命阶段’论。”

大家听杜重石这样说，互相望望，显出一副似信非信的样子。

二、宣传工作中的政治偏见

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召开之前，著名戏剧电影工作者袁牧之到达延安。

袁牧之是浙江宁波人，30年代初他才20多岁的时候，就在上海参加左联，从事进步戏剧活动，主演话剧《怒吼吧！中国》。25岁又主演了电影《桃李劫》，28岁编导了电影《马路天使》，年纪轻轻的就在影剧界享有盛誉。1938年初秋，他在汉口接受八路军办事处的委派，到延安来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那时候，他也还只有29岁。

袁牧之到延安，还带来一个话剧团，那时候通称“救亡演剧队”，给抗大学员演出了一场话剧，内容当然是宣传抗日的。剧中前一幕表现的是八路军将士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紧接着下一幕幕启，是几个国民党官员在一间漂亮舒适的客厅里打麻将。谈笑风生中，突然空袭警报响了，这几个官员慌慌张张地跑下台去，躲进了防空洞。灯光暗转，警报解除，那几个官员重又上台，各归原座继续打麻将。其中一位一边洗牌一边说：“咱们继续抗战嘛！”其余三位和另一位悠闲地吸着雪茄、站在一旁看打牌的人都同声附和：“对，对！咱们继续抗战，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哈哈……哈哈……”

这种为宣传抗战而临时编写的小话剧，特点是故事简单，手法明快，要让工农兵群众一看就懂，并不太讲究艺术性、技巧性，只是在人物、场景上比活报剧、街头剧稍为复杂些。这出戏的主题，无非是通过舞台形象的对比，来说明共产党的军队如何积极抗战，国民党的军队如何消极抗战，如此而已。当时解放区各演剧队的戏，大都这样编，这样演，也没有什么人提出过异议。

但是杜重石却与众不同。第一，他是学戏剧的，懂得戏剧的各种表现手法，觉得这样表现抗战、宣传抗战，不但大方向不对，格调也太低了点。第二，他刚从国统区来，正好知道国共双方军队抗战的真实情况：当时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挺进冀鲁豫平原，连克不少县城，建立起巩固的敌后根据地，这完全是事实。而在后方的国民党官员中，有许多人“不知亡国恨，犹唱后庭花”，依旧浑浑噩噩地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这也是事实。由于国共两党成员的阶级基础不同，当时国民党的党员、官员，从政治素质到个人修养以及党内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宏观的眼光看，都不及共产党，这更是事实。如果没有日寇的侵略，共产党的革命对象就是国民党。问题是：当前的政治现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的敌人是日寇，国民党至少暂时不是敌人，而且还是朋友，中央军则是友军。在政治上的态度，应该联合友军共同对敌；在电影、戏剧等艺术中的态度，应该多表现友军中积极的一面，多表现敌军凶残的一面，这才是正确的。否则，不但不符合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且也不符合当时抗日战场上的事实。不管怎么说，在台儿庄与日寇浴血奋战的，都是国民党的部队。再退一步说，杨森亲率二十军到上海抗战，战斗激烈，将士们前仆后继，为国捐躯，整整一个军，半数壮烈牺牲，所剩还不到一个旅，这是杜重石亲眼所见的，总不会假。应该说，在抗日战

场上，既洒有八路军指战员的热血，也躺有国民党官兵的尸体。作为文艺尖兵的“救亡演剧队”，演出的又是宣传抗日的话剧，在褒贬对比上如此偏颇，所起的作用，肯定是不利于国共合作，也不利于团结抗日。大敌当前，如果不一致对敌，而是继续互相攻击，总是要抵消力量的。

杜重石跟袁牧之不熟，不便于直接找他提这些意见。正好潘汉年当时来延安向延安各界人士作报告，介绍日本帝国主义向苏联挑起“张鼓峰事件”，遭到苏联还击以后的国内外军事政治形势。潘汉年长期在上海活动，杜重石跟他也有一面之交，就跑到他那里去谈了自己对此剧的看法，希望他转告袁牧之。

潘汉年倒是同意杜重石的看法，说过“为了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从团结抗日的愿望出发，这些情节和台词，是应该注意一下”这样的话。至于他是否把这一意见转告袁牧之或党中央负责宣传口的同志，就不知道了。从这件事情上看，潘汉年的政治思想某些方面与杜重石是相通的。

与杜重石同车到达延安的四川青年，姓李名俊明，进抗大后，编在三大队三中队，而且被选为救亡室的文化干事。两人因有这段“同车之谊”，关系似乎比别人要近一些。杜重石跟他谈起袁剧中的一些问题，李俊明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那时候，日本统治者正在日本本土开展一个愚弄日本人民的迷信运动：用一块印有太阳旗的布，把一张写有“吉祥如意，避灾得福”字样的纸条包起来，然后发动老百姓来缝，每人在每个布包上缝一针，每个布包要经过一千个人的手，称为“千人缝”。他们宣扬：把这种“千人缝”布包给侵华日军士兵挂在脖子上，就能够逢凶化吉，避免血光之灾。

杜重石搜集到这一题材之后，就以此为素材写了一个话剧剧本叫《祖国》，主题是描写日韩两国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爱国人士携手并肩，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剧情是：日本退伍军人协会会长小川太郎，眼见侵华日军在平型关、台儿庄惨遭失败，朝野上下对“数月亡华论”逐渐失去了信心。为了鼓舞侵华日军的士气，继续蒙骗人民，小川太郎在国内发起“千人缝”的迷信活动。小川的秘书金咏芳子，是个韩国的革命志士，也是日本当时的地下革命组织——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负责人之一。她年轻美貌，勇敢机智，利用小川太郎对她的觊觎之心，虚迎实拒，若即若离，终于取得了小川一方面企图以“千人缝”的迷信举动来迷惑日本人民，一方面大肆敛财肥私的证据，又巧妙地设法把这一消息流传到日本社会，激起人民的公愤，纷纷指责。小川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自杀。

杜重石之所以要写这一剧本，旨在说明被日本帝国主义迫害的日韩人民，虽然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但为反对侵略战争，尚且不避艰险，一心一意，携手并肩地与共同的敌人进行斗争；同为中华民族的两个政党，更应该同心同德共赴国难。同时也是用对比的手法，批评袁牧之的剧本不应该在舞台上贬低友军的形象，妨碍团结。

杜重石把自己写的剧本拿去给李俊明看，他不但十分欣赏，而且十分卖力地在三中队排练，准备上演。剧中需要两个女演员，他就到五中队——女生队去请：一个叫孔贞的河南姑娘出演小川夫人，另一个就是同车来延安的

李俊明——四川温江人。抗大毕业后，接受任务回四川搞统战工作，在刘树成师长处当副官。现健在，住成都。

印尼华侨之一。

话剧《祖国》终于在三大队演出了，而且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当时在抗大做政工工作的熊复看了演出以后，对杜重石说：“演出效果还不错。可以把剧本油印出来，交其他大队上演。戏里面的小川太郎是个军国主义者，以自杀告终，好像不大可能。不过我也没有更好的修改意见。”杜重石说：“我安排小川太郎自杀作为剧本的结束，一方面是根据日本武士道精神，一方面也是借此象征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等于自杀，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话剧《祖国》的演出，使杜重石在抗大成了知名之士，大出风头。正好那时候抗大成立同学会，经全校同学投票，白丁被选为主席，杜重石被选为副主席。

三、秘密的特别党员

1938年暑假，美国各大学进步学生组织了一个访华代表团到延安访问。访问结束后，代表团团长向抗大、鲁艺及延安各界人士演讲。杜重石作为抗大学生会的副主席，也参加了接待。

这位美国学生访华代表团团长，是一位豪爽、热情、略带冲动型的青年，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眉眼神态表情丰富，有时候甚至还手舞足蹈的。给他当翻译的是一个抗大的女学员，身穿抗大校眼，脖子后面还背着草帽。他每讲完一段，她先在小本子上快速记下要点，然后即兴组织词句，转达给大家。听她那流畅的翻译，口音中带点儿广东腔，估计是个从国外回来的华侨。

代表团团长首先赞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悠久文化，推崇孔子的儒教思想是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热爱和平、又能够捍卫民族尊严的伟大民族。延安人民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民族精神，赢得了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尊敬。他赞扬解放区人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军民同心，融为一体，坚持抗战救亡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但是这样爱好和平的民族，却正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的深重灾难，美国学生代表深表同情。抗日军政大学是锻炼抗日英雄的洪炉；但是这座洪炉却缺少应有的物质条件。我们回国以后，要把访问延安的所见所闻忠实地告诉美国人民。我们要在美国各大学发起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捐献一元钱运动”。美国有好几百万大学生，每人捐献一元钱，就有好几百万。……

演讲会之后，这些热情的美国大学生还围着罗瑞卿七嘴八舌地问：“您希望我们回去以后，为抗大募多少钱？”“您能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数字吗？”

事后罗瑞卿跟杜重石说：“没想到这些美国学生这样热情豪爽。他们问我要具体数字，我真不好回答。我怎么能对客人说我要多少多少钱哪！”

杜重石笑着说：“怎么不好回答？您就说：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嘛！”

罗瑞卿也笑了起来：“可惜这句中国成语美国人听不懂，就是翻译过去，他们也无法理解呀！”

由于美国学生的带头，抗大的学员们也自发地发起了一个以个人名义向海外侨胞和国统区各界人士为抗大劝募资金的活动。作为同学会的副主席，杜重石主动承担起组织、宣传、统计等等工作。他不但带头向国统区的夏炯、范诞生及其他可信赖的亲友们寄去劝募信，还动员与他同车来延安的那两名印尼女华侨捐献出母亲送给她们的纪念品——也就是她们来延安的路上戴过

的那枚钻石戒指和那条金项链儿。抗大学员大都是穷苦人出身，有贵重首饰的人不多，能献出钻戒和项链儿的人就更少了。如果不是杜重石在车上看见过并一再动员，她们也许还不会捐献出来的。这一下，她们俩的爱国举动，立刻传遍了全校，各中队救亡室纷纷送去用大红纸写的表扬信，表扬她们热爱祖国、带头捐献、支援抗战的义举。

抗大的生活艰苦，伙食很差，极少有吃肉的日子。每逢星期日，杜重石总要到边区政府招待所右边那个小饭馆儿去“改善生活”，用四川话来说，就叫做“打牙祭”。他喜欢吃甜食，经常到小饭馆儿去请那个四川厨师炸馒头片儿，再撒上白糖。这在现在当然是十分普通的饭食，但在当时的延安，可就是十分高档的享受了。有时候，他也请三中队的李俊明和五中队的那两个印尼女华侨一起来“打牙祭”——炒一盘榨菜肉丝儿，炸几碟馒头片儿，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这个小饭馆儿，是边区招待所的一个点儿，金城时常要到这里来走走。杜重石常来吃饭，有时候也能在这里碰见他。有一回杜重石在这里吃过了饭，正好碰见金城，俩人就坐在店堂里聊闲天儿。

杜重石说：“我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真像在沙漠中找到了绿洲。

我的视野开阔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看得更加清楚了，理想也更高了。可惜我的出身不好，不够入党的条件。”

金城说：“我跟你讲过多次了嘛，你能够毅然放弃在国民党军队里那样高的地位和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甘愿在延安吃小米，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大进步。这跟‘逼上梁山’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是不一样的。你刚才说的话，说明你已经懂得用阶级观点来考虑自己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这更是一大进步。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是走什么样的道路，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你的这种进步要求，我可以向抗大的党组织反映一下。”

几天以后，七中队李指导员找杜重石谈话，问他到延安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和进抗大以后的感受。他把跟金城和毛主席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之外，又作了一些补充：“我在国统区的时候听说解放区的青年学习苏联十月革命后的‘一杯水主义’，放纵两性关系，还标榜这是性的解放。我在延安的实际生活中，根本就没看见过这样的事情，可见这全是国民党顽固派为欺骗国统区人民所捏造出来诬蔑共产党的造谣中伤。倒是通过黄克功事件，我了解到延安的两性关系是正常的，既不放纵，也不勉强；功劳再大的党员干部，犯了罪也与普通百姓一样处理，一视同仁。我已经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先锋队，是与人民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的。

我十分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只是不知道像我这样出身的人，能不能向组织提出入党的申请？”

李指导员说：“你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和要求，说明你已经有了很大、

黄克功事件——黄克功是长征时代的红军团政委，1938年在抗大任第六大队大队长。他曾与陕北公校学员刘茜谈恋爱并确定了关系，后来刘茜表示拒绝，黄克功克制不住自己，拔枪打死了刘茜。对此事抗大师生有两种主张：青年学员大都认为黄克功是个长征的老干部，出于一时感情冲动而杀人，事后已经非常懊悔，应该宽宥他，让他到前线去戴罪立功；职员和老师们大都认为功不能抵罪，不论有多大的功劳，触犯刑律，必须一视同仁，不然就无法服众，也等于纵容有功的老干部可以犯法。罗瑞卿将以上意见向党中央汇报以后，毛主席亲自到抗大来征求处理意见，在校长室一面抽烟一面考虑，足足踱步3个小时，最后批准执行枪决。

很好的进步。关于你能不能入党的问题，等我请示上级党组织以后，再答复你。”

大约 10 天以后，李指导员拿来三张油印的入党申请表叫杜重石填写。杜重石按要求填写了表格，不久就得到批准。考虑到他要在白区工作，身份暂时不能公开，所以他的入党，是秘密性质的特别党员，关系直接在中央组织部。以后党组织与他联系，也不能用杜重石或杜平这两个名字，而要用规定的代号“王扬”。

四、再谒主席，辞别朱总

杜重石成为特别党员以后不久，金城通知他毛主席要再次接见他。他已经是特别党员，由金城陪同，先去晋谒组织部部长陈云。陈云的住所是窑洞，门前有一长条空地，看样子已经用锄松过土，浇了水，准备种什么农作物。从这也可以看出，共产党不论什么层次的干部，都要以身作则，艰苦创业，从事生产，开荒自给。连陈云这样的中央级部长也不例外。

陈云是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出身，相貌清秀，和蔼可亲，说话语音偏低，但是彬彬有礼，很有风度。他告诉杜重石，组织部决定让他回国统区去做统战工作，具体出发日期听候通知。

这次接见，陈云同志跟杜重石谈了许多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工作方法。他说：“在国统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也就是实行既要统一、又要独立的原则，采取既有团结、又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独立，指的是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执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句话：抗日统一战线，就是要把敌对的或消极力量争取到自己这一方面来，加强抗日的力量，而不是放弃自己的原则向敌对或消极力量妥协，削弱了抗日力量。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也和上战场打仗一样，要懂得战术，要给自己找掩蔽体和保护色，还要善于利用国民党顽固派冠冕堂皇装点抗战门面的话，来实现我们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妥协的政治主张。”陈云同志接着阐述了抗战救亡必须坚持持久战，批判了当时人们头脑中最普遍的速战速决和悲观失望两种错误的观点。

杜重石问：“我在国统区工作，怎么跟党组织联络呢？”陈云答：“必要的时候，会有人跟你接头的。”

杜重石又说：“我到延安来的任务，是代表杨森向朱总司令请教并参观访问的，如今半年过去，我这个任务还没完成呢。”陈云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了。朱总司令最近已经从前方回到延安来，在你离开延安以前，他会安排时间接见你的。”

陈云谈话的低声语调，有使人乐于与他交谈、亲近的吸引力。

随后又由金城陪同，杜重石再次晋见毛主席，请示在白区如何开展统战工作等问题。

杜重石心情轻松愉快，充满了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崇高信念。他像尊师重道的学生一样，屏息静气地恭聆主席的指示和教导。关于利用各种关系广开门路，他想起四川的袍哥，就问：“川康袍哥组织遍布城乡，有的还拥有武装，与川康军队浑然一体。请问主席，能否作为统战对象？”

毛主席说：“旧瓶可以装新酒嘛！凡是对抗战有利的，都要加以团结，争取到统一战线中来。”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总结了抗战15个月来的经验与教训。陈云说的最近朱总司令从前方回延安来了，就是开的这个会。会议结束以后，朱总司令给抗大、鲁艺学员及各界人士作了一场当前军事、政治形势报告，也就是传达会议精神，贯彻今后的工作方向。

在这次报告会上，杜重石详细听取了朱总司令传达的会议精神，主要是克服右倾错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精神。

共产党提出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党内就出现了右倾错误。有的在救亡运动中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迁就让步；有的在接受改编中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丧失了警惕性，以致上千人的部队被国民党缴了械；有的过分相信国民党，在国统区把一切党的活动公开化；有的军队领导干部以接受国民党的军衔为荣，甚至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有的人眼看着国民党特务分子在根据地内进行破坏不敢斗争，等等。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1937年“七七”事变起，共产国际书记处于8月10日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的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同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这一“新政策”。他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敌后根据地的作用，幻想通过国民党的军队速战速决，并且申明以上观点是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7年12月下旬，王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到达武汉，在武汉大学作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公开宣扬他的错误主张，又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对国民党作了种种让步。一直到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还进一步提出“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赞同国民党提出的“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八路军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其实，所谓“统一武装”和“统一待遇”，只是王明的一厢情愿，国民党是绝不会这样办的；而所谓“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等，只不过自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而已。

王明以前是“左”倾势力的代表，只知道斗争，不知道团结，不承认团结各种中间势力的必要性。由于斯大林和一些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估计过高，对他的反共立场估计不足，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而王明又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并加以发挥，于是又形成了他的右倾错误。

中共中央举行了三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派任弼时为代表到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情况，共产国际终于表示同意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在此基础上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终于在党内从根本上克服了王明的错误路线。

通过这次传达，使杜重石更进一步了解到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复杂

性及困难性，也更进一步坚定了到国统区去做这一神圣工作的信心。

传达报告刚刚散会，三大队大队长方正平通知杜重石说：朱总司令要见他。

这时候已经是冬天。杜重石到延安已经半年多，他的任务本来是代表杨森来向朱总司令请教并参观访问的，但是这个愿望提出来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安排。如今他入了党，就要离开延安了，可是这一任务还没完成。上次毛主席和陈云接见，他已经再次提出，陈云答复是在他离开延安之前一定安排。如今朱总司令主动找他来了，可见他离开延安的时间也不远了。

杜重石在礼堂后面的休息室见到了朱总司令。由于是初冬，天气晴朗，加上他刚才作报告提起了精神，可能感到热，所以披着新棉衣，没扣扣子，一副憨厚朴实随便的神态，全没有总司令会见下属的架子。

杜重石想借多叙述一些杨森与他的旧谊来引起他的回忆与好感，所以见到朱总司令以后，竟喋喋不休地从他们两人在云南护国军中同过事；朱德去德国留学，杨森曾为他饯行；1926年“万县惨案”发生以后，朱德和陈毅到万县协助杨森反英斗争；北伐时朱德还当过杨森的党代表；接着又说了二十军奉命在上海抗战，几乎全军覆没，还受到中央军的歧视，等等。

朱总司令一直等杜重石把话说完以后，这才笑笑说：“杨子惠的这些往事，我都晓得的。中央军歧视地方军，当然要不得。可是大敌当前，大家都应该服从抗日救国这个大局。讲清误会，消除隔阂，互相谅解，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我们八路军就是抱这样的态度待人的。一切都要从团结抗日出发嘛。我们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被迫抗战的，速战速决、悲观失望都不对。一定要坚持持久战。抗大已经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作为军事学教材发给你们，你应该把这本书介绍给子惠看一看。”

杜重石答应了一声，朱总司令接着说：“我们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战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是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翻筋斗。肚皮里不太平，是削弱敌人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战斗力。这种配合起来在敌人前后方同时打击敌人的打法，是战胜敌人的好办法。子惠派你到延安来参观学习，了解八路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游击区，和敌人打游击战，好得很嘛！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打击敌人。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派来不少军官在抗大学习，我们把他们编成一个独立中队。他们学习了《论持久战》中的游击战的战略地位问题，据说收获很大呀。不过，无论什么军队，也不论是打游击战还是正规战，都要严格军风纪，才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没有群众基础，情报不灵，怎么能打游击战呢？这是我们多年的经验。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得很好，所以八路军随便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才会对八路军像亲人一样。”

朱总司令说到这里，杜重石插话说：“二十军也很重视军风纪的。由于部队统属系统上的原因，不好把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照搬，夏炯他们到了安庆以后，就把‘三大纪律’改为‘四大纪律’，把‘八项注意’改为‘十四项注意’了。”

说到这里，杜重石把二十军的律条一一背了一遍，朱总司令听了，笑着说：“二十军的纪律和注意事项比八路军还多些，我还应该向子惠学习呢！”

杜重石接着说起社会上谣传杨森挖了朱德的祖坟，由于政治处境的原因，杨森又不便公开辟谣，感到很为难的时候，朱总司令说：“这明明是国民党顽固派耍的挑拨离间伎俩，哪个相信这些鬼话，哪个就要中计上当。”俩

人又深谈了一番关于如何在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事情，最后朱总司令说：“前线军事很忙，我就要去前线；你也即将回二十军，再找你谈话的机会就没有了。你到国统区去开展统战工作，切记要坚持党的原则，要有独立自主精神，不能迁就，一迁就就要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利用。”说到这里，他从棉衣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递给杜重石说：“这封信请你带给子惠兄。他是我多年好友。他爱国、反帝，民族意识很强，这都是很好的。只是什么都在个人权利上打圈子，就不作兴了。”谈话就到此结束。杜重石拿出笔记本儿来，请朱总司令题字留念。朱总司令用钢笔写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八个大字。朱总司令致杨森的信，是用毛笔直行书写的，并不封口。杜重石离开延安的时候。为防途中发生意外需要销毁，所以反复诵读，铭记在心。信共两页，首页是：

子惠吾兄大鉴：

别久念深，由杜平先生处得悉吾兄近况，甚为欣慰。国府公布的国共合作基本纲领，谅早为兄洞悉。我党以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盖抗日救亡，首在国共合作，全民团结。民族解放，必须坚持抗战，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全赖于此……

这封信，杜重石安全带到了成都。1940年春，杨森的顾问齐卫莲从湖南前线因公到成都，杜重石把此信交他转给了杨森。

过了1939年元旦，杜重石接受任务，离开延安，先到西安。然后通过陕西省军邮局负责人林卓午的关系，搭邮车平安到达成都。

到达西安的时候，恰逢“宣侠父失踪”事件发生，对杜重石的震动很大。宣侠父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与胡宗南同学，只因为他是共产党员，胡宗南竟在国共合作期间下令军统特务将他绑架，而且制造了“失踪”的假象。杜重石去延安之前，路经汉口和西安的时候，曾和他两次见面，对他针砭时弊的见解十分佩服。这种政治迫害，一方面说明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大局坚持反共，一方面也说明国共合作的前途并不平坦。此去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也是困难重重，险夷难卜。想到自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又振作起来，不论前途有多么大的艰难险阻，决不动摇为党工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意志和信心。

第七章 摸索前进

杜重石到了成都，党派来联络员与他联系，根据上级的意见，他留在成都，没有到二十军的驻地湖南去。

他根据毛主席“旧瓶可以装新酒”的指示，利用袍哥这一民间封建帮会，吸收思想进步的青年参加，作为社团的骨干，进行一系列统战工作和反蒋活动。

一、留在成都，不去湖南

杜重石到达成都以后，去四川省立医院检查了一下身体，医生建议住院，他就住进了医院。

一天，他的族侄杜桴生突然到医院去看他，使他惊讶不止。

这个杜桴生，祖居广安县盐井坝镇，后来迁到了岳池县。按族谱他是杜重石的侄子辈，但年龄却比叔叔大。杜重石高中毕业后到上海上大学，他已经在宜昌当四川中学校长。杜重石每逢寒暑假回广安，船到宜昌停泊过夜，总要上岸去看看这个当校长的大侄子，扰他一顿晚饭。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手头的“禁书”也多，俩人连讨论带争论的，一聊就聊到半夜，然后就在他那里住下。他们两个名为叔侄，由于年龄相差不多，感情容易沟通，思想也比较接近，所以俩人的关系却和亲兄弟相似，几乎无话不谈。1933年初，杜重石出任广安县立第一中学校长，他曾经带来一个岳池人唐征久，介绍给广安一中当美术教师。这个人思想很进步，后来知道也是个共产党员，1948年在华蓥山起义中牺牲了。从1933年以后，叔侄两人就没再见过面。如今杜重石下车伊始，又没开“新闻发布会”，他是怎么知道“叔叔”的行止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杜重石惊奇地问。

“是王扬告诉我的。”杜桴生笑眯眯地回答。

“啊！”杜重石趋而向前，紧紧地握住了这个“侄儿联络员”的手！一切都不用问了。由他来联络并指导工作，不但顺理成章，而且是最恰当的人选。可见组织部考虑问题十分周到。不过他怎么会找到医院里来，似乎还是一个谜。“你怎么知道我住院？”

他哈哈大笑起来：“古话说，一只燕子飞过去，还有个踪影儿呢，你一个大活人，知道你已经到了成都，我就不会去打听打听？”

“可是没人知道我在这里呀？”

“怎么没人知道？你没告诉人？”

“我是来检查身体，医生建议我住院的。事先并没有这个打算。所以说不可能有人知道。”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居然就发生了。你从西安出发，搭的是军邮局的邮车，这不是秘密吧？车到成都，你没说住在什么地方，可是你在车上跟司机说过：胃病、痔疮都犯了，一到成都，先得上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对不？”

“就这一句话，你就找到我了？真是福尔摩斯！看起来，我的话还是太多了点儿。真如俗话所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

“陕北生活苦，吃小米对咱们四川人来说也不习惯，犯了胃病，是应该赶紧治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你什么时候到成都的？现在住在哪里？”

“我到成都已经好久了，暂时住在一个朋友家里。”

“尽管我在这里一人住一间病房，难免隔墙有耳，说话总不太方便。特务分子是无孔不入的。我过几天就要出院了，住叠湾巷25号。你干脆搬到我那儿住，说话就方便了。”

杜重石出院以后，开始在社交场合公开露面。这时候，杨森的二十军在湖南前线，他正考虑是去湖南还是留在成都的当口，恰逢吴玉章、陈绍禹由陕北去重庆，经过成都，住在商业街沙利文饭店。邓锡侯和潘文华为他们设宴接风，请杜重石作陪。杜重石在开宴前抓时机悄悄儿向吴玉章汇报自己在延安学习、入党以及接受任务来国统区做抗日统战工作等情况。吴玉章说：“根据你的条件，留在成都利用袍哥组织在川康军政人员进行统战工作，比你到湖南前线去更有作用。”

不久杜桴生搬到杜重石的住处。这一次见面，环境比较安全了，杜桴生首先简要地向杜重石介绍并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

当时的国内形势是：自从武汉沦陷，迁都重庆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不论亲日派还是亲英美派，投降、分裂、倒退的活动都十分严重。

1938年12月，代表亲日派的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逃离重庆，在河内发表“艳电”，赞成日本首相近卫文提出的《中日关系三原则》，公开投降日本。当时社会上纷纷传言，认为这是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演的一出“双簧”。因为飞机场、飞机都控制在军统也就是蒋介石的手里，没有蒋介石的默许，汪精卫是不可能先飞昆明再飞河内的。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虽然继续抗日，但是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的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上定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等反动方针，会后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制订了一系列的反共政策和具体方法，促使国内局势发生逆转。于是接连发生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一系列国民党反动派袭击、杀害共产党地方武装或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

为此，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并于1939年1月13日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主持。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地方上的实力派、著名的知识分子，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杜桴生现在的工作，就是《新华日报》驻成都特派记者。

杜重石先简单汇报了自己代表杨森到延安参观、进抗大学习以及秘密入党派来国统区做统战工作的情况，又转述了最近吴老同意他留在成都不去湖南的意见。他分析历史上形成的四川军人利用袍哥势力扩充军队力量，袍哥又利用军队作护符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互依互存关系，认为自己留在四川组织袍哥团体，扩大川康军政人员的联系面，以此来开展统战工作，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旧瓶装新酒”，也就是陈云所说的在国统区作战应该找的最好的“掩蔽体和保护色”。

艳电——指汪精卫1938年12月29日在河内发出的电报。当时发电报通用韵目“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代表日期，29日的代表韵目是“艳”字，所以称为“艳电”。

《中日关系三原则》——指中国与“满洲国”建交；缔结反共条约；实行中日经济合作。

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杜桴生也认为杜重石去湖南前线，不如留在成都与川康地方军政人员组织袍哥团体更有利于统战工作。留在成都，实际上就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团结地方上的实力派，促使国民党继续抗日。不过他认为“新酒”固然一定要装，但也不能装得太急；太急了，会引起袍哥界守旧的头面人物的反感，欲速则不达，不但酒装不进去，反而流到了瓶子外面，白白浪费了。

于是两人作了决定，请杨森的妻舅、二十七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处长肖寿眉给杨森发了一封电报，就说杜重石留成都养病，暂时不去湖南。

去留的问题决定以后，杜桴生说：“你刚到成都，对川康两地军政界的情况恐怕还不太了解。我介绍两位熟悉‘行情’的朋友跟你认识，他们会帮你出些点子的。一个是办《民声日报》的田一萍；一个是在《建国日报》主编《时事周刊》的王达非。”

杜重石摇摇头说：“恐怕不行吧？这些人，既然都跟你来往密切，一定都是被特务分子盯着的危险分子。我刚到成都，还没怎么亮相呢，就跟这些人打交道，我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呢？”

杜桴生笑笑说：“好像还没那么严重吧？田一萍办的《民声日报》，被社会认为是左倾报纸，你暂时不跟他来往也好。《建国日报》是邓、潘、刘出钱办的为川康地方说话的报纸，后台老板都是川康两地的实力派人物，特务分子不会注意的，你放心好了。”

过了几天，杜桴生果然给杜重石引见了王达非，并得到他的许多帮助。直到全国解放，他才调到上海市去做统战工作。

二、旧瓶新酒“蜀德社”

杜重石作出了留川的决定，立即着手与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副主任潘文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军界头面人物取得联系。当时他们正以抗战需要为名，利用袍哥的组织，计划在川康两地建立百万地方武装，以此来对抗蒋介石企图直接插手川康党政军务。他们得知杜重石愿意在成都发展袍哥组织，委了他一个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议的虚衔，积极支持他活动。

杜重石取得了可以公开的身份，抓紧这一时机，拉拢潘文华部一六四师师长陈兰亭、邓锡侯部二十八军副师长龚渭清、川康绥靖公署副官长黄瑾怀、二十三军经理处处长赵丕休等人，酝酿成立了一个袍哥团体——蜀德社。同时又租了二十军一三四师师长杨汉忠在梓潼桥正街的一座私宅，开了一家“广厦饭店”，不但对外营业，也作为蜀德社的社址，举凡社里的活动，都可以在这里进行。

不久，杨森发来电令，任命杜重石为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处长，仍挂少将衔。这样，他的活动就更加方便了。

尽管杜重石本是四川人，父执、亲友中也不乏“汉流”名人，可以说是自小就在袍哥世界中长大的，但他本人并没有参加袍哥组织，对袍哥“开山堂”、“拿言语”之类的规矩虽然不是一窍不通，至少并不详细。如今既然要“打”进袍哥界做统战工作，就不得不进行补课，以免“露怯”。

成都是袍哥的活动中心。当时在成都城内的袍哥组织，就有“孝友社”、

汉流——也作“汉留”，指袍哥界。

“正伦社”、“东山联合总社”等等许多个。这期间杜重石与袍哥界的老舵把子陈兰亭、范绍增等人换了帖，“义结金兰”，他的年纪最小，做了他们的小老弟。然后通过各种关系，以各种借口，从各茶社的袍哥大爷们那里借来一些有关袍哥行规、历史等方面的资料，例如《大汉公》、《金不换》、《海底》、《汉流大全》之类。其中只有《大汉公》是辛亥革命后担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开山设堂的规章刊印本，其余全是手抄本或口授笔录本，错别字极多。

通过这些“典籍”的突击学习，杜重石对袍哥组织的历史沿革，袍哥界的规矩、礼节、言语等等逐渐内行起来；也得知哥老会受革命党人的影响，在历史上也起过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辛亥革命前的导火线“四川成渝铁路护路运动”，哥老会出过很大的力量。至于辛亥革命以后，哥老会的领导权大都被地主、官僚、军阀所夺取，成为纯粹的封建会道门，那是后期的事。

他体会到：哥老会既然可以为辛亥革命出力，同样也就可以为抗日战争、人民解放出力。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旧瓶可以装新酒”，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如何吐故纳新。从此他开始以“杜大哥”的身份在成都袍哥界露面，并逐渐以自己的这些观点去实践。

“蜀德社”的名声在成都亮出来并逐渐叫响以后，通过杜桴生和新闻界民主人士王白与等人的介绍，吸收了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的一些大学生作为“新酒”来加入蜀德社。

由于大学生们认为袍哥团体是封建组织，从不愿意参加到自愿加入“蜀德社”，是经过一些争议并做了说服工作的，杜桴生说：袍哥是社会团体组织；既然袍哥名称不易为人接受，建议把袍哥改称“社团”。社团可以是抗日的、爱国的组织，这样，大学生们就容易接受多了。1944年，由民盟主席张澜领衔联合川康部队将领发起创办的袍哥刊物《大义周刊》，所发表的有关袍哥的文章，就都把袍哥改称为“社团”。

从此，杜重石在社会上活动的公开身份，是杨森二十军驻蓉办事处处长、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议和“蜀德社”的袍哥大爷。

三、参与倒王反蒋

四川的政局，抗战以前基本上处于地方军阀争霸、互相攻击的局面，谁的实力大，谁来坐庄。对省外，也是谁的力量大就投靠谁，就接受谁的封号。抗战事起，四川各路军阀名义上都接受中央政府即蒋介石的领导，实际上蒋介石的政令仍要通过他的代理人下达执行，不然，蒋介石在四川就会寸步难行。当时四川军阀中以刘湘的势力为最大，所以蒋介石封他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主席、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让他最最亲信的陈诚屈居副司令长官。

这样一来，原来与刘湘有矛盾、面和心不和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就秘密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反刘湘的力量，实际上也就是反蒋介石的力量。

1938年春，刘湘病死在汉口。当时社会上纷纷传说：有说是被蒋介石收买范绍增暗杀的，有说是刘湘以前与韩复榘同谋反蒋，蒋介石枪毙了韩复榘，刘湘一害怕，吓死了；有说是蒋介石提升他手下很无能的师长唐式遵为军长又擢升为军团长，他是气死的。其实，那个时候刘湘已经遵令离开了四川，

蒋介石没有任何必要去暗杀他了。刘湘到汉口的时候已经病重，连吓带气，加重了病情，倒还比较符合实情。

刘湘死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由副手陈诚递升，蒋介石当然大可放心。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蒋介石入川之前，曾经对 5000 万四川人许下过“川人治川”的诺言，不便委派自己的亲信取而代之，斟酌再三，干脆把这一职务赏给了王缙绪。王缙绪原来是杨森二十军的一名师长，正向蒋介石频频表态要效忠于中央。对于川康绥靖主任一职，则不得不让邓锡侯接任，而让潘文华做他的副手。

这样一来，四川省的军政大权就都落在“川人”的手里了。为了分化、牵制这股力量，蒋介石伤透了脑筋，挖空了心思，把王缙绪的儿子、原来是旅长的王泽浚提升为四十四军军长，调到安徽安庆受杨森节制，参加抗战。这一来，王缙绪就成了手底下没有军队作后盾的“纯文职”省主席，想造反也反不起来了。

此外，蒋介石又利用矛盾，把唐式遵提升为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用以牵制潘文华。唐式遵妒忌心强却又能力平庸，川人称他为“唐瘟牛”。他在安徽东南与日寇作战中，失陷了广德县与泗州镇，他推卸自己失守防地的责任，又为陈诚下令撤退打掩护，讨好陈诚，向蒋介石诬告是因为潘文华按兵不动，作战观望，至有此失。结果潘文华得了个撤职留任的处分，两人从此有了矛盾。蒋介石利用他们之间的夙怨，企图以此达到控制两人的目的。

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是个有职无权的虚衔，潘文华荣任此职，心里并不满意。他对于蒋介石任用亲信、排除异己的一贯做法十分了解，川军如果不联合起来以求自保，明显将被蒋介石所各个击破，逐渐吃掉。于是他暗中联络对蒋介石不满的地方力量，主要是云南省主席龙云、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等人，暗中策划结成一个自保性质的联合组织。恰巧龙云奉蒋介石电召到重庆述职，潘文华特地把他约到成都，与刘、邓等人进一步密谈，签订了一个川、滇、康三省联防密约。

但是事机不密，他们的活动被王缙绪侦得。王缙绪正想博取蒋介石的欢心与信任，就把这一联防密约说成是“反蒋同盟”，然后作为邀宠的本钱在 1939 年 4 月间向蒋介石告密。更巧的是：王缙绪的告密电报，又被潘文华的侦收电台所截获。于是引起了连锁反应，川康三省军人倒王的好戏更加紧锣密鼓地敲响了。

倒王的主炮，是由潘文华的一六四师师长彭光汉领衔，联合陈兰亭、刘树成、周虎臣等七名师长联名电呈蒋介石，历数王缙绪治川以来五大罪状的通电。通电一面上呈蒋介石，一面就要以传单的形式向社会广泛散发，以便造成舆论，促使王缙绪下台。但是当时王缙绪还在台上，这样的通电，一者普通的印刷厂没人敢印，二者也不能给不可靠的印刷厂印，不然，一旦走漏了消息，势将前功尽弃。因此，印刷通电传单这件事情，是由杜重石通过杜桴生的地下印刷厂印出来的。

王缙绪身为省主席，也有他自己的情报系统。川康军人联合起来反他，他也有所耳闻。7 月间，他打发他的三姨太刘滞根和她的母亲刘老太太两人带了些糕点去看望杜重石。

王缙绪的这个岳母，外号人称“金蝴蝶”，是个在成都袍哥界很有名气的女袍哥。她的女儿刘滞根，外号人称“银蝴蝶”，嫁给王缙绪当三姨太以后，母女两人更加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了。

金银两蝴蝶一进门，就笑嘻嘻地说了些“杜大哥当了蜀德社舵把子，特地来贺喜”之类的客气话，好像她们确实是为“袍泽之谊”而来似的。但是言谈话语中，总绕着弯儿扯到蜀德社的社长陈兰亭身上去，又谈起为什么彭光汉没有当蜀德社的大爷，却又自立一个什么社等等。醉翁之意，当然是希望从杜重石口中得到一些他们联合倒王的消息。杜重石既然已经参与其事，当然也不会轻易泄露秘密。结果金银两只蝴蝶白白往返飞了一圈儿，什么情报也没打听到。

到了7月间，彭光汉等七师长联名倒王的通电上呈蒋介石，同时在各报刊登载，邓、潘系统的部队，也已经在成都附近集结，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满腔怒火，却又发作不得，更不能动用军队进行镇压。考虑再三，只好暂且忍气，发电急召邓锡侯和潘文华到重庆训斥。

蒋介石见到两人，第一句话就说：“彭光汉作为一个军人，竟敢领头抗上，应该处分！”

邓锡侯和潘文华同声回答：“我们是川康绥署主任，我们治军无方，请委员长处分我们。”

蒋介石明知道彭光汉的根子就在邓、潘两人身上，动不了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宣布将王缙绪免职。于是下面的问题，就是所遗四川省主席一职，应由谁来填补了。

按照潘文华的想法，只要把王缙绪反了下去，四川省主席就非他姓潘的莫属。但是蒋介石也不是傻瓜，对于潘文华的腹内文章，其实一目了然。四川省主席，是个有职有权的实力派，不论给邓还是给潘，都只能促使川、滇、康三省加强联防，助长反蒋力量。何况蒋介石对于刘文辉的迭次反蒋，至今心存芥蒂，未曾忘怀！

第一次：1928年，刘文辉任四川省主席，统兵10万，与唐生智联合，发出“冬”“东”二电，逼蒋下野；只因张学良1928年12月29日在奉天（今吉林省）易帜，以致唐、刘合谋反蒋不到一个月时间，即告失败。

第二次：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合讨蒋，刘文辉又暗中准备出兵武汉，与阎、冯、李联军，于同年6月发出“鱼”电，再次公开反蒋。只因阎锡山按兵不动，又告失败。

第三次：1932年12月，汪精卫从重庆逃到河内，经过昆明的时候，云南省主席龙云、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出于反蒋的目的，曾经与川康军界领袖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联络，打算拥戴汪精卫另立中央政府。只因政学系老前辈、龙云的老师李根源以民族大义把龙云说服了，川康地方势力方才没有爆发拥汪反蒋行动。这次秘密反蒋虽然并不公开，但是来往的密电都被蒋介石侍从室的密电破译机构所破译，蒋介石其实也都知道。

川康军人以前有过数次反蒋事实，目前又有名为反王实为倒蒋的动作，蒋介石怎么放心再把四川省主席这一实权交给并不拥护他的川康军人呢？

但是囿于“川人治川”的诺言，蒋介石又不能把这一职务交给不是“川人”的自己的亲信，考虑再三，蒋介石只好作出了自兼的决定。1939年9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王缙绪辞四川省主席，照准。遗职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理。”

所谓“兼理”，当然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省长的职权全由“省政府秘书长”贺国光代拆代行。

为了安慰潘文华，贺国光、孔祥熙秉承蒋介石的意志，与潘文华“义结

金兰”，成了换帖兄弟。潘文华有个胞弟叫潘昌猷，经营一家重庆银行，孔祥熙破格委任他为四川省银行董事长，还由中央银行贷款 200 万元充实四川省银行基金。这就是蒋介石采取的“稳邓、拉潘、孤立刘”的分化川康地方力量的政策。

邓锡侯和潘文华是深知蒋介石这种阴谋权术伎俩的，也懂得三位一体利害与共的唇亡齿寒关系。因此明面上并不发作，暗地里三人商定：决不因蒋介石的分化收买而改变初衷。当务之急，是要把省政府机关报《华西日报》继续掌握在自己人手中，不能让贺国光接手或插手，以便继续控制舆论。他们以《华西日报》是刘湘办的，只能由刘湘系统的人接管为理由，组成一个有傅真吾、邓汉祥（刘湘时代的省府秘书长）、彭光汉、刘树成、周晓岚（彭、刘、周三人都潘文华部的师长）、王白与参加的《华西日报》董事会，由王白与任报社社长，贺国光也无可奈何。

这个时期，杜重石的主要工作是制造反蒋舆论。一方面，他发动蜀德社的大学生和青年军官在他们足迹所能到达的地方，特别是各大学校园和春熙路漱泉茶楼、少城公园内的茶室中以“摆龙门阵”的形式，散布“蒋委员长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兼任四川省主席，一者有失体统，二者无力兼顾，三者也与‘川人治川’的许诺不符”的舆论。别看这只是街谈巷议，自古“清谈”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和力量是很大的，尤其是公园茶室里的“龙门阵”影响更大。因为这里是文化、教育、新闻界的聚会场所，这里的论点，是能左右整个舆论界的。另一方面，再发动袍哥界把成都的社会舆论传到外地县市直到重庆，把所制造的舆论四出传播，尽力扩大影响。

迫于社会舆论，蒋介石也不能不考虑“挂名自兼”四川省主席是否妥当的问题。但他既不愿把这一实权交给与他并不一条心的川康军人，又要装出一副俯顺民意、实现川人治川的姿态来，斟酌再三，最后决定把这一职务交给四川人张群。1940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四川省政府主席蒋中正辞职，照准。遗缺由军委会成都行辕主任张群兼理。”

四、禁止袍哥活动的风波

1940年春，广汉县长沈实先因征粮引起民变，军委会成都行辕派宪兵去镇压，但是被袍哥武装把守住从成都到广汉的要道，不许宪兵通过，张群心里明白，袍哥武装之所以敢如此大胆，是因为背后有川康军人的支持。无奈之下，只好请与川康军人有密切关系的袍哥大爷、“孝友社”社长陈静珊去广汉出面调停，不到半天时间，民变即被平息，社会秩序也很快恢复正常。

张群兼理川政以后，继续执行对邓、潘、刘三人的分化政策，只是对刘文辉的打击稍有放松，改为孤立。但是通过广汉事件，张群明白地看到：袍哥组织与川康军人是浑然一体的。要削弱川康军人力量，首先必须削弱袍哥的力量。于是张群以四川省政府的名义冠冕堂皇地发布禁令：“查袍哥分子成员复杂，违禁犯科，危害社会治安，实属封建余孽，罪恶渊获。自本府禁令公布之日起，严禁袍哥集会结社，违者严惩不贷。”

这样的禁令，明眼人当然一眼就能看出，张群的矛头所向，其实是川康军人。因此以潘文华为代表的川康军人，不甘示弱，下决心要与张群较量一番，见个高低。

较量的第一个回合，是由潘文华部一六四师师长彭光汉出面，在成都东

丁字街华瀛大舞台举行袍哥团体“合叙同总社”的成立大会，彭光汉自任总社社长，同时举行声势浩大的“迎宾会”，各地袍哥舵把子纷纷前来祝贺，盛况空前。

早在杜重石成立“蜀德社”的时候，就打算把彭光汉拉进来。杜桴生的意思是：把潘文华的两个师长拉进一个社里，好像不太妥当，再说，让谁当正社长，也不大好安排，因此也曾经与彭光汉商量过，请他再另立一个山头，以壮大声势。彭光汉的准备工作刚刚做好，还没开堂，正赶上张群的禁令公布，于是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个顶风行船，逆水行舟，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张群既然下决心要削弱川康军人的力量，当然也不会胆怯，何况还有蒋介石做他的后台戳杆儿。于是下令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方超亲自带领保安警察大队到华瀛舞台去镇压，以表示他禁止袍哥活动的决心，也显示一下他这个中央大员兼理川政的威风。

方超字仲文，本是杨森的部属，杜重石到成都以后，还曾被特聘为该局的“设计委员”和事务主任。他带领一批保安警察去执行张群的命令，但是一路上凡是通往华流舞台的通道，都有荷枪实弹、架起机关枪的一六四师部队把守，不许保警大队通过。方超自以为是奉命办事，绝不买账，非过不可；守军得到师长的严命，不论秧子，绝不放行。于是军警双方发生冲突，动起武来，结果当然是谁也没得到便宜，连方局长也受了伤。成都市警备司令严啸虎是一六四师的副师长，绝不会站在张群一边替方超说话。张群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拾，以“军警双方轻率从事，致生误会”为由，各打40大板，严词训斥了一顿，即不了了之。

这场斗争，方超吃了点儿小亏，彭光汉则扬眉吐气，取得了胜利。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杜重石即召集蜀德社的大学生“新酒”们开会，讨论进一步对付张群的办法。因为袍哥的公开活动一旦被取缔，利用这个掩体和保护色进行统战工作也就不可能了，因此必须坚守这个阵地。杜重石认为，共产党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在白区内生存下去，是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军阀混战和蒋介石与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如果蒋介石的手下全是清一色的亲信，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思想行动完全一致，上下同心，令出必行，红色政权的存在就十分困难，甚至不大可能。同样道理，现在四川的军政之间，与蒋介石之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袍哥组织正好利用这一矛盾，也在夹缝中求生，并逐渐发展壮大。经过讨论，多数大学生认为杜重石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也是可行的。

根据这一观点，杜重石等人搜集资料，写了一篇有关袍哥的历史及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的文章，公开地发表在复兴社主办的刊物《快报》上。

《快报》的主办人史伯英，是复兴社的重要骨干。1931年，他在广安的二十军当过党务特派员。杜重石利用这一历史渊源，加上当时国民党的政学系与复兴社因争权夺利而面和心不和，矛盾很深，于是这篇本来很难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就在这样的“夹缝”中破上而出了。文章主要说：

袍哥的正名为“哥老会”，是“天地会”的一支。“天地会”又名“三点会”、“三合会”，本是清代的民间秘密结社，属于帮会之一，应该是社会团体性质。因为会众宣扬“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所以最通行的名称是“天地会”。其宗旨是“反清复明”。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所以对内也

称为“洪门”，讹传为“红门”。相传是郑成功于1674年（清康熙十二年）最初在台湾开山设堂，以后从福建沿海逐渐扩展到长江流域各省以及两广地区，并形成小刀会、红钱会、哥老会等支派。哥老会的创始人方大洪，他从台湾潜回大陆，带来开山设堂的规章《海底》，并在雅安组织了第一个哥老会组织“汉流”。哥老会的会众对首领称为“大哥”或“大爷”，相互称“袍哥”，含有“袍泽”的意思。“哥老会”的早期宗旨也是“反清复明”，会众大都是农民、手工业工人、退伍军人、游民、小地主等等。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哥老会曾经领导过多次农民武装起义和反洋教斗争。

辛亥革命前后，在南洋及美洲的洪门组织“三合会”、“致公堂”发展创建为“兴中会”。此后，陆皓东、陈少白等人即以“兴中会”名义分赴各地联络江湖志士进行革命活动。

同一时期，湖南长沙成立了“华兴会”，以黄兴为会长。

1905年，孙中山先生联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在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4月“黄花岗”之役，“洪门”力量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帮会团体不论在反清复明或辛亥革命前后，对复兴民族、捍卫民族利益，对国民党的贡献，都为其他社团所不及。这在国民党党史文献中都是有据可查的。如杨虎（啸天）所著《革命缀言》一书中说：“昔日总理在初期革命时代，曾运用‘三合会’、‘致公堂’志士仁人之献身党国者，更前仆后继。武汉政府时代，余屡随，总裁往返武汉，而余负有总裁安全之责，然卒安然无事者，得力于当地帮会之助者实多。”

又如蒋鼎黻所著《军政领袖蒋介石》一书中说：“主席早在第二期革命，竟用了比帮会分子更复杂的一般暴汉、无赖、贱民的集合，锻炼成一个足以自豪的军队……”

根据以上所叙，足证当今之执政者，以袍哥分子复杂、违法犯科为理由而禁止其活动，实属似是而非，因噎废食之论。盖违法者绳之以法，犯科者惩之以纪，实为当事人应负之责，不应涉及袍哥社团之整体。犹之于政府机关有违法读职之官吏，即今其机关停止运行一样，为识者所不取。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不但深得袍哥界的赞许和拥护，在非袍哥的读者中，也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五、两起暗杀案

张群见袍哥活动无法阻止，就派特务分子以参加袍哥为由，打入“蜀德社”和“合叙同”这两个属于“旧瓶装新酒”的社团进行秘密活动。他们不但用重金收买意志薄弱分子，进行挑拨离间，破坏团结，还密切注意川康军人首脑的一言一行，向蒋介石汇报，企图置人于死地。

于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日益加深，终于演出了戏剧性的暗杀场面。

在成都帘官公所街，有一家相当气派豪华的高级妓院，进出的嫖客，大都是“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们。妓院的鸨儿，人称“花四姐”，是个手腕高明、善于应酬的中年妇人。由于她广泛接触军政工商界的上层人物，消息灵通，也有些关系，小小不来的面子，也能买得下来，因此在成都的“交际圈儿”中，也算是一位“头面人物”。

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人，以前经常在成都青羊宫邓锡侯的别墅里

聚首，对外称为“转转会”，也就是轮流做东聚餐的意思。他们的经常聚会受到蒋介石的注意以后，为了避开特务分子的盯梢，仿效当年蔡松坡佯装沉溺酒色以迷惑袁世凯的故事，也时常到花四姐的妓院中走动，借机商讨对策。

特务分子见他们三人常常在帘官公所街聚会，也怀疑其中有诈。但是这三人的贴身侍卫，都是久经考验忠于主子的死士，特务分子不但不能取而代之，连接近这三人都相当困难。于是就把主意打到了花四姐的身上。经过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花四姐终于被特务分子所收买。

彭光汉是邓、潘、刘三人安全保卫工作的总负责人。他对花四姐近一段时间来的鬼鬼祟祟，似乎有所觉察，但拿不到证据，无法说话，只能叮嘱派去护卫的保镖们时刻留意，多加小心。

这期间，潘文华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把第十八师周虎臣部撤出宜宾、泸州，由中央军接防。潘文华与邓锡侯照例在花四姐的妓院里集会，商定了向蒋介石电陈十八军暂时不能撤出川南的理由。但是电报还没有发出，在重庆的蒋介石却已经知道了电报的内容，立即改变了原先周虎臣师撤出川南以后再派中央军去接防的计划，而且抢先一步，不等十八师撤出，急命中央军王公侠、廖昂两个军迅速占领宜宾、泸州，强迫周虎臣师退守井研。

蒋介石之所以要急于强占宜宾、泸州，不仅仅因为川南地方富庶，更主要的是这里地势险要，东可扼重庆，北可守成都，南面又可拒来犯之敌，因此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这个大西南的枢纽通道要是被蒋介石所把持，川、滇、康三省联防，也就成了纸上谈兵了。

邓锡侯和潘文华吃了一个哑巴亏，怒不可遏。事情明摆着，泄露机密的，必定是妓院中人，一回忆草拟电文的当时情景，警卫人员照例只能在院门外守候，不是传呼，没有情况，根本进不了内间，何况所有警卫都是经过严格挑选长期考验绝对忠心的亲信，而商量电文的时候是在内间里面的密室进行的，所有的丫鬟和几个妓女又都打发到外间去了，因此也在排斥之列；只有花四姐一人，因为被视为是“自己人”，允许她进出内间密室送烟送茶或向外递话，因此考虑再三，嫌疑最大的，就剩下花四姐一个人了。

彭光汉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不露声色，派人内查外调，终于查明情报确实是这个老鸽子送出去的。于是决定派徐则林、徐则达兄弟二人负责的行动组，送给她一个最高“奖赏”：“荣归故里”。

行动组经过严密策划，徐氏兄弟及其手下以各种身份通过各种手段进入花四姐的妓院潜伏下来，然后于深更半夜同时闯进了她的卧室。面对着屠刀，这个素以泼辣凶狠著称的女人吓得浑身筛糠，不得不压低了嗓子，一五一十地说清了是谁要她窃取的情报，她又是怎样做的手脚，情报又是如何传递出去的，全都交待得明明白白。在她总以为说清楚了，也就可以保住性命了，但是徐则林领的是“杀”的任务，任凭这个老鸽子拿出多少银子来，也无法买得她的活命了。

为了制造匪徒谋财害命的假象以迷惑警方，徐氏兄弟杀了花四姐以后，故意把房间里的橱柜翻乱，还把她的手提包拿走。按照他们的想法，这是奉命办案，一切“上边”自然有安排，绝不会出什么漏子。再说，一件杀人抢劫案发生，单是警方的现场勘察、取证、立案，就要半天以上。因此，徐则达在第二天上午一早就大大方方地拿着手提包里4000元支票到福利钱庄去

提取现金。没有想到的是，这张支票，恰恰是福利钱庄襄理谭银山在头天下午给花四姐的，他当然还不知道花四姐已经命归西天，但是对这张支票那么快就到了徐则达手中不免有些怀疑。随口问了一句，徐则达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再问一句，徐则达有些心虚，说不取了。事情到了这一步，他可是想走也走不了了。双方吵吵了起来，徐则达被扭送到警备司令部。这时候，花四姐的案子已经发作，那边正为找不着凶手犯难呢，这边恰好有了“铁证”。正要动刑，彭光汉亲自来警备司令部，跟严啸虎说明实情。严啸虎是彭光汉的副师长，当然不会为难。但是谭银山送来的人，审也不审就这样放了，又难于交待，只好把徐则达转送绥靖公署副官处暂时禁闭起来。事情到了绥靖公署，就一切都好说了。由杜重石出面，跟副官处副官长黄瑾怀说明前后经过。黄瑾怀心中明白，做了个手脚，拖了两个来月，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准予保释了事。一件凶杀案，就此再也没人提起。

除了特务分子对袍哥组织和川军头目进行监视破坏外，其他帮会分子，或出于妒忌，或出于被收买，也来捣乱。有个叫高洪恩的，在青帮中被尊称为“高老太爷”，在成都的帮会中，也算是个头面人物。此人被军统所收买，派他的门徒混进“蜀德社”和“合叙同”，进行挑拨离间。袍哥俗称“光棍儿”，本意是说袍哥天不怕地不怕，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切都拿得起，放得下，连生命都无所谓。但是高洪恩的门徒却故意歪曲地解释说：“光棍儿”的“光”，是说袍哥要光明，“棍”是说袍哥要正直；“光明正直”，就是说袍哥兄弟伙儿千万不要被那些思想靠不住、别有用心的小伙子（指大学生“新酒”）所利用。这还不算，还向军统特务机关告密，说这两个袍哥团体内有“异党分子”在搞政治活动。

对于青帮分子的这些破坏活动，不久就被彭光汉查明是高洪恩所指派。于是，也派徐氏兄弟把高洪恩暗杀了。

当时成都布后街一带有若干家扬州妓院。这些妓院，平时都靠青帮中的地痞流氓势力保护，因此各家妓院每月每节都要向青帮头目孝敬“保护费”若干。这些肮脏钱高洪恩大都落了腰包，只有极少数分给他的喽罗们，因此早就引起手下人的不满了。他一死，不但帮外人纷纷传说是他手下人因分赃不匀而引起的谋杀，甚至连帮内的人也互相猜忌，不知道究竟是谁下的手。

这件案子当时虽然也向治安机关报了案，但是有川军从中插手，最后依然是不了了之。

对于花四姐和高洪恩这两件谋杀案，事前杜重石是知道的。按他的意见，坚决反对使用暗杀手段，因为这样做不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达不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反而影响社会治安。但是在袍哥组织和川军首领中，都对国民党中央插手和特务破坏恨之入骨，因此“以牙还牙”和“杀鸡警猴”的意见终占上风，杜重石等成了少数人的意见，也无法阻止。

第八章 龙门阵战术

杜重石是 30 年代末加入共产党的党员。40 年代初，他在四川白区做统战工作。统战工作的基础，是宣传共产党的英明与伟大，然后以此为基础，将敌对力量和中间力量争取到自己一方来。

杜重石既然在白区做统战工作亦即宣传工作，对反苏反共的言论，特别是敌对营垒中人别有用心的造谣中伤，当然是要加以反驳并回击的。当时他手中还没有报刊之类的宣传工具，只能通过袍哥组织发动“新酒”们用“摆龙门阵”的形式来“据理力争”。

一、政治大论战

1941 年 1 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以《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为题发表讲话，对“抗战到底”作了明白的解释，即“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等于是蒋介石公开向世界宣告：我已经放弃东三省，而且承认“满洲国”。蒋介石不但违背了“抗战到底”是“收复失地，打到鸭绿江边”的民意，而且在国民党内成立了“防共反共委员会”，制订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同时还大肆宣扬“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信条。

这时候，蒋介石已经兼任“国民参政会”议长，因此他的讲话国际上就认为是“代表民意”的，所起的作用更加恶劣。

日本方面的报纸《上海导报》立即发表题为《评论中国官员谈话》的文章，说出了蒋介石没有公开说出来的话：“中国之所以继续抗战，而不能造成远东慕尼黑的前途，完全是由于蒋介石讨共无法解决。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早就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而讲和了。”

1940 年 9 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与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签订了《德意日军事同盟》。日本同意德国、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欧洲新秩序”；德国、意大利同意日本在东亚建立“东亚新秩序”。这等于说，德国和意大利都承认日本侵略中国是“合法”的。

1941 年 1 月，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了“皖南事变”，围攻新四军，举世震惊；而日本“同盟社”则立即发出新闻评论，大加赞扬“蒋介石盲目抗战，几年来只做了一件好事：围剿共军”。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接见爱国华侨的时候，还公开说：“外国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要对外取得胜利，首先要清除国内的反对党。”蒋介石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时期继续反共的立场，已经昭然若揭了。

杜重石的姑妈有个侄子叫谈云章，是重庆市刑警处处长，为人倒是挺讲义气的。为了从他那里多得到一些情报，也为了给自己找一把保护伞，杜重石也把他拉到“蜀德社”来当个“大爷”。他是军统局的骨干分子，掌握的“内幕新闻”多，青年人往往喜欢到他那里去摸底。而他有意无意地透露的消息，大家也都比较相信。“皖南事变”发生以后，他说：“共产党宣传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真正的目的，是想借抗战为名，扩大红军的力量，为他日取得政权打基础，所以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他的话，很快传遍了重庆、成都。

再过三四个月，即 1941 年 4 月，苏联又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

而当时全国人民都认为，国际上真正支持、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如今苏联竟与日本签订这样的协定，岂不是不再帮助中国了吗？

这些国内外政治动态，在当时的群众中造成了极为混乱的思想。杜重石觉得，不赶紧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开展抗日宣传、做好统战工作都是不利的。八九月间，经与杜桴生商量，决定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油印本发给“蜀德社”中政治上比较可靠的青年军官和大学生们传阅，并通过他们的大力宣传，逐渐扩散到群众中去。

杜重石巧妙地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对他们说：“谁能领导中国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取得最后胜利，实行民主政治，还政于民，谁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领袖。要实现民主政治，就要遵循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让中国人民手中有权。”他又以“拥护蒋委员长团结全国人民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口号进行宣传，使得混进“蜀德社”和“合叙同”两个袍哥团体内的特务分子、青帮门徒们，既无法从政治上找借口，也无法找茬儿捣乱，从而达到中共提出来的“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坚持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的政治主张。

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狂飙》月刊主编姜蕴刚，标榜的虽然是“民主党派”，实际上与国民党是一个鼻子眼儿通气的。他经常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评论国是”的政论性文章，还在上课的时候公开贩卖他的政治观点，特别是在苏联与日本签订的《互不侵犯协定》问题上大做文章，煽动人心，制造混乱，迷惑和影响了许多青年人。

杨森的九姨太蔡文娜，当时正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由于她是贵州省主席、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的如夫人，她在学校中的一言一行，都有比较大的影响。1932年杜重石到二十军当军部秘书的时候，蔡文娜虽然已经成了杨森的姨太太，却只有15岁，还在广安中学读书；如今9年过去，她年龄增长了，思想也成熟了。蔡文娜不但认识杜重石，而且还是她比较信服、比较崇拜的一位。于是杜重石就利用这一重关系，首先做通了蔡文娜的思想工作，然后让她在与同学们“摆龙门阵”功时候发表与姜蕴刚针锋相对的政治见解：

“姜老师在《狂飙》上发表约国是评论，上课的时候又加以引申发挥，结果引起了同学们的思想混乱。古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难当头，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是应该的。现在不是国共合作抗日了吗？但是国共两党是怎么合作的，同学们也应该知道一下：中国革命的兴起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引发，是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国外或者通晓外国政治学说的知识分子有极大关系的。但是国共两党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弄得怀有一腔热血但又缺少识别能力的爱国青年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我比同学们略大几岁，经过的事情也多一些，那些娓娓动听、颇能感人的话也听得多一些。所以对那些一贯以说好听的话为职业、而做的往往又是误国误民的坏事的人，可能具有较强的识别力。照我看，抗日救国，只有‘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双管齐下，才能取得胜利。像汪精卫那样卖国媚外、制造内乱的败类要是不除，怎么能够外抗强敌呢？”

蔡文娜说完之后，有的同学说：“姜老师说的话，有些还是对的。至少苏联现在不应该同日本签订什么《互不侵犯协定》。”蔡文娜根据杜重石的话进行解释：“苏联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预见到希特勒有挥师东进的危险。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为防止再次发生吉林省中苏交界处

日本挑起的张鼓峰事件，这是稳住日本的暂时性策略。苏联是否对日本宣战，要看形势发展。因为他东线还有希特勒，不能顾此失彼。我们坚持抗战到底，第一要有必胜的信心，第二要把胜利的希望建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抗战要靠自己，不能寄托于外援。就好像我们提倡的妇女解放一样，主要依靠妇女自己站起来，冲破社会强加给妇女的牢笼，不能等待人家来解放。”

蔡文娜的话，比较客观地阐述了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状况，反驳了姜蕴刚借苏日结约问题离间中苏关系，迷惑群众，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二、蔡文娜之死

蔡文娜上的是社会学系，有比较清晰的头脑，对妇女解放运动也有一定的认识。她自己在 14 岁的时候糊里糊涂地被杨传云的老婆送给杨森做姨太太，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识的提高，对自己的婚事当然是很不满意的。她有心要冲破这个牢笼，求得自己的解放。但在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时代，她的生死存亡都在封建军阀杨森的掌握与控制之下，要想通过“请求”的方式向杨森乞求解放，无异于与虎谋皮。结果，她还是死在杨森的屠刀之下，成为封建主义的牺牲品。

蔡文娜的故事本来不在本书的叙述范围之内，但是一者这里提到了这个人物，二者蔡文娜之死不但事例典型，故事本身也能说明许多问题，所以这里顺便作一简单介绍。

关于蔡文娜的被害经过，一般人的传说和报刊上的报道是这样的：

蔡文娜到华西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因为她以前有过“不轨”的行为，杨森当然很注意她，就让五姨太肖邦琼的哥哥、时任二十七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兼天府中学校长的肖寿眉派人暗中监视，一连观察了三年，反馈回来的消息，都说她虽然经常与一些外国人往来，参加打网球、听音乐之类的活动，但是严格恪守杨森的“家训”，从不敢参加舞会。因此杨森对她的监视，也逐渐放松了。

在她上四年级的时候，通过打网球认识了医学院口腔系一个姓吕的男同学。那时候，她那个只占有十分之一的老丈夫已经 60 多岁，性格暴戾，动辄打骂，缺乏情趣，刚刚 20 岁冒头的蔡文娜，眼看着校园中一对对青年情侣，联系自身，不免有红颜白发之叹；而这个学医的小白脸，则风度翩翩，温柔体贴，善解人意。不久，两人就由相怜而相爱了。他们悄悄儿商定，等蔡文娜大学毕业以后，逃离杨森的桎梏，两人一起到美国去生活。

尽管两人的行动相当秘密，但是男女相爱，总难免要见面，一见面，也难免要亲热一番。一次两次，也许没人知道，时间一长，就难免会露出蛛丝马迹来。没过多少时候，就被肖寿眉放出的眼线所侦知，并把情况汇报到了杨森那里。

杨森姨太太多，最怕的就是戴绿帽子。一听说蔡文娜“老毛病”发作，气得脸都白了。立刻发电报，要蔡文娜在寒假期间回到重庆。

蔡文娜回到重庆的那天，正好赶上杨森宴请外宾，即由蔡文娜充任翻译。饭后又一同到戏院看了川剧，没发现杨森有什么反常的脸色。看完戏回家，杨森发现她手上的一枚大钻戒没有了，严辞追问。蔡文娜无法掩饰，干脆来一个破釜沉舟，把实情说了出来，还十分天真地要杨森看在她伺候了他十来年的份儿上，放她一条生路，准许与她离婚，成全她与姓吕的婚姻。杨森听

了，只是绷着脸，既不答应，也不说不许。当夜两人还在一起歇宿，如同往常。

第二天一整天见不着杨森，蔡文娜心中惴惴不安。她不是不知道七姨太曾桂枝是怎么死的。但她又幻想杨森如今年纪已老，也许会对她网开一面。直到深夜，还不见杨森回到公馆，她只当不会有事儿了，就上床休息。没过多久，房门被推开，她还以为是杨森进房来，抬头一看，却是杨森的侄子杨汉印，而且手里还握着手枪。蔡文娜喊了一声：“汉印，你要做啥？”杨汉印没有答复她，枪声却响了。

杨森杀害蔡文娜以后，立刻集合所有的姨太太到蔡文娜的房间里去看。姨太太们一个个吓得浑身发抖。杨森又吩咐马弁把蔡文娜的尸体用被子裹紧，扔进“渝舍”网球场旁边的枯井里。

杨森搜检蔡文娜的遗物，发现有吕某用英文写的信，请人翻译出来，当然是卿卿我我的情书。杨森气儿不打一处来，立刻派人去杀。不久杀手回来说，姓吕的已经逃跑，是坐飞机先到印度后转美国的。——不知道是杀手网开一面放他一条生路呢，还是姓吕的听到了风声，果真逃跑了。

事后，蔡文娜的姐姐蔡文琪因好久没接到妹妹的信，特地到重庆去看看，在公馆里没找到妹妹，就去问杨森。杨森回答说：“她跑了，跑到英（阴）国去了。”接着又言不由衷地说：“你的丈夫，我准备委他当县长。”

蔡文琪发觉杨森的脸色不对，说话也不自然，心知妹妹多半已经被害，就哭着跑到了陈兰亭家里，果然得到了证实。陈兰亭的夫人房芝兰还劝她说：“你赶紧离开这里，当心杨森要斩草除根！”

蔡文琪无可奈何，只得立刻离开重庆。

以上是一般的传说。但是杜重石先生说，蔡文娜的被杀，完全是一桩冤案，而且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国民党特务借题假手谋害而死的。其经过过程曲折复杂，绝不是传说的那样简单。因为那时候杜先生不但与蔡文娜都在成都，而且与她的关系还比较接近，所有过程，基本上都知道。下面就是杜先生提供的蔡文娜被害经过。

1942年夏天，身为贵州省主席、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的杨森由贵阳到重庆向国民政府述职，蔡文娜也回重庆“渝舍”与杨森团聚。暑假结束，蔡文娜由重庆到成都返校。同行的有潘文华部师长陈兰亭的夫人人称“房八姐”的房芝兰、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刘航琛的夫人外号“黑牡丹”的陈玉英。车子开到离成都30公里的龙泉驿地方，汽车的发动机出了故障，司机下车修了半天，仍无法启动。时近黄昏，她们三人站在汽车旁边，一副焦急不堪又无可奈何的样子，溢于言表。

这时候，有一辆美国空军的吉普车飞驰而来，见道旁停着一辆小轿车，三位美貌的女士伫立一旁，明知是车子抛锚，却故意停车询问停车原因。当即由蔡文娜用英语回答。美国空军就热情地邀请她们三位搭他的吉普到成都。途中，蔡文娜继续用英语和那美国空军交谈，向他表示感谢，并得知他的名字叫史特沫斯，是个空军中尉；蔡文娜也告诉他自己的姓名，现在在成都的华西大学读书，但没告诉他自己是杨森的如夫人。

这以后，史特沫斯到华西大学去看过蔡文娜，还给她写过一封信，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抬头写的是My dear Miss Tsay，也就是“我亲爱的蔡小姐”。这在外国，本是很普通的事情。

成都华西坝，是教会大学集中的地方。除了华西大学之外，还有抗战后

内迁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山东齐鲁大学，都是教会办的学校。

由于蔡文娜的身份特殊，既是贵州省主席的如夫人，本身又有封建婚姻的桎梏和封建家庭的处境，四年的大学生活，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她不但成了反封建、争女权的活跃分子，而且在华西坝的女大学生中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

解放前的教会学校，学生大都是有钱人的子女，除了家在成都本市的之外，一般都住学生公寓。蔡文娜的条件更好，杨森专门给她在华西坝置一座小洋房，门口挂着“蔡寓”的铜牌，里面卧室、书房、客厅、厨房、车库、卫生设备一应俱全，书房里还有钢琴。不过她的车库里放的不是小轿车，而是一辆“包车”。

当时成都的小轿车还不是很多，除了军政高级人员之外，一般的富有商人、有身份的官员、高级的教授、走红的演员、阔老的姨太太等，坐的都是“包车”。所谓“包车”，其实就是日本传过来的人力车，通称“黄包车”。不过“包车”与街上兜揽生意的黄包车可不一样。尽管也是两个轮子一个座，一个人在前面拉，可不论是车是人，突出的一个字是“帅”。先说拉车的车夫，讲究的是请那膀大腰圆、年轻力壮、模样清秀、腿脚麻利又不爱说三道四的老实小伙子。夏天穿一身细白洋布的中式裤褂，扎着裤腿儿，脚登一双布面皮底的圆口鞋，头戴一顶细麦秸编的小草帽，一条雪白的毛巾搭在脖子上；冬天则是一身藏青或深灰色的小棉袄棉裤，戴一顶毡帽。从外表上看就显得干净利落。跑起来不但要快，更要稳，上坡不要人家下来走，下坡能走四川车夫特有的“飞步”，让坐在车上的人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有时候前面眼看就要撞人了，要立刻站得住；实在站不住的时候，哪怕自己滚出八丈远，也要保证坐在车上的人不摔下来。没有这几宗本事，就甭想在阔人家里拉包车！

再说车子，当然是崭新的，车篷乌黑，车两边两盏白铜大车灯，擦得锃光瓦亮，车上插一个油光光的大鸡毛掸子，足有二尺多长，车垫子上绣着图案。年轻的太太坐在车上，夏天打一把小伞，冬天膝头盖一块毛毯，嘴里嗑着瓜子，脚底下踩着叮咚作响的车铃，招摇过市，别有气派，的确是当年成都街头点缀市容的一景。

蔡文娜有的是钱，选车夫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中挑一，从外表模样儿到拉车的技术，全是第一流的。对这个车夫，蔡文娜十分满意。不论上学、上街，坐的都是这辆车。——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命，就送在这个人的手上。

当年的大学生，功课不像现在这样紧。有些选修课，可以上也可以不去上。只要修满了规定的“学分”，就可以毕业。因此，大学生们聚集在一起闲聊天儿、侃大山的时间也比较多，不一定非得是星期假日。而蔡文娜拥有这样宽敞、豪华的住所，既不受外界的干扰，又有茶点可供，因此她的“蔡寓”变成了一个家庭沙龙，经常是高朋满座，胡侃神聊，从生活小节到国家大事，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前面说过，蔡文娜出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政治上的基本态度是反封建、求自由的，加上与杜重石等思想进步人士接触较多，政治倾向越来越明确。而出于她独特的身份，又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什么犯忌犯禁的话她都敢说。由于她具有比较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她的言论，就逐渐成为华西坝女大学生议论时政的舆论中心了。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是无孔不入的。在大学生中，他们采取威逼利诱的手

段，发展了一批特务分子或外围组织。在蔡文娜的座客中，当然也不乏这种“职业学生”混杂其中。

根据特务学生的汇报，军统当局对蔡文娜既感到头疼，可又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并不能据此通知杨森，让他对自己的妻子多加管束；也不能直接把蔡文娜抓起来关进监狱。于是，就产生了“除之而后快”的念头。

要杀蔡文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明杀暗杀都不行。最理想的办法，就是让杨森自己下手。杨森小老婆多，而他最怕的就是戴绿帽子。他的七姨太是怎么死的，特务头子们都很清楚。那么，干脆投其所好，让他来一个醋海兴波，让她在醋海中灭顶。

本来，军统特务打算利用美国空军中尉史特沫斯给蔡文娜写信这件事情来大做文章，但是这样做一者会引起中美外交上的麻烦，二者也还难于制造一两种能让杨森相信的物证，仅凭一封写有 My dear Miss Tsay 的英文信，是不能让杨森动杀机的。

于是军统局的特务分子们处心积虑地想办法制造一件事端，专门用来刺激杨森。这一任务，就交给了毛人凤的老婆向心影。这时候，毛人凤和向心影都借住在杨森的“渝舍”内。

1943年冬，杨森循例到重庆去向蒋介石述职，而蔡文娜也值寒假到重庆与杨森欢聚。其间适逢美国空军节，宋庆龄在嘉陵宾馆举办盛大的中美联欢舞会，杨森也带了蔡文娜去参加。

杨森有很严的“家规”，绝不许姨太太和女儿们参加任何舞会。

因为他的七姨太曾桂枝，就是在舞场上认识了“野男人”而勾搭成奸的。尽管蔡文娜从来不进舞厅跳舞，可今天是孙夫人办招待，又有丈夫在身边，这条家规似乎也有了“圆通”的余地。说巧也真叫巧：恰恰在舞会上又遇见了美国空军中尉史特沫斯。他一者不知道蔡文娜是杨森的如夫人，二者即便知道她名花有主，绝不会知道她家有不许跳舞的规矩，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蔡文娜共舞。杨森并不知道史特沫斯半年前就认识蔡文娜，见他们俩不但跳得挺起劲儿，谈得也很亲热。而他们用英语交谈，杨森又一句听不懂。特别是美国人的性格比中国人奔放，杨森在旁边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不由得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蔡文娜与他相处十几年，当然知道他爱吃醋的毛病，三场跳下来，见杨森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就说：“咱们提前走吧！这里是舞会，总会有人邀我共舞的。”

杨森却又很犹豫：“今天是孙夫人主持的联欢会，她给我发了请帖，也注意到你已经来了，咱们这样早就走，是对她的不礼貌、不尊敬。还是再坐一会儿吧！”

这时候，由向心影挑选并安排的一个军统小特务，西服笔挺，风度翩翩，彬彬有礼地过来请蔡文娜跳舞。在这种场合，即便不想跳，也不能过拒，只好勉强应付一曲。小特务是向心影关照过的，跳到某一个角落，突然把蔡文娜搂得很紧，脸挨着脸，两人的嘴唇几乎就要贴在一起了。就在这一刹那间，躲在一旁的向心影的情人周伟成，赶紧偷偷儿抢拍下这一镜头。

下面的戏，就都由向心影和周伟成导演了。

寒假期满，蔡文娜返回华西大学不久，肖寿眉突然接到一封署名“华大同学”的匿名信。信中说：蔡文娜即将与情人私奔。肖寿眉不敢隐匿，把匿名信转给了杨森。杨森密嘱肖寿眉不要声张，暗地里派人监视蔡文娜的行动以及与她来往的可疑人物。于是肖寿眉就用钱收买了她的几个同学和拉车的

车夫。

蔡文娜的车夫，按例送她到学校以后，就回到住处兼任“门官”，等到了说定的时间，再拉车到学校去接。有一天，蔡文娜已经上学去了，突然来一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青年，上门来拜访“蔡夫人”。车夫说：“太太上学去了。请教尊姓大名，等太太回来了，我好回话。”来客说：“不用了，我下次再来吧。”说完，就匆匆地走了。

从那以后，这个年轻人又来过两三次，每次都是太太上学去了，总也见不着。最后一次，他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这样不凑巧，来了几次，都见不到你家主人。这样吧，等蔡夫人回来，请你把这封信交给她。”

车夫觉得这事情蹊跷，根据肖寿眉的嘱咐，没把信交给太太，而是交给了肖寿眉。

信封里不但有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而且还有一张蔡文娜与一青年男子几乎脸颊相贴的亲热照片。

照片正是向心影的姘夫周伟成所偷拍的。至于那个青年，也就是舞会上邀请蔡文娜共舞的那个小特务。至于情书，反正是男方写给女方的，怎么造都可以。

肖寿眉以为抓到了证据，立刻把这封信连同照片一起转给了杨森。肖寿眉的妹妹肖邦琼是杨森的五姨太，不论是出于替妹妹争宠，还是为自己邀功，他都不会把这封“情书”昧起来的。

杨森看见了这封情书和两人如此亲热的合影，怒不可遏，就起了杀蔡文娜的心。

这根套在蔡文娜脖子上的绞索越拉越紧了，而她却仍被蒙在鼓里，毫无所觉。

不久，杨森以述职为由到了重庆，并电召蔡文娜来渝相会。夜间，杨森诘问蔡文娜可有私情，蔡文娜说绝对没有。两人为此争吵起来，蔡文娜觉得受了委屈，气愤之下，跑到邻室去过夜，不与杨森同房。这对杨森来说，无异于火上加油，追到邻室，拿出合影的照片来质问：“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谁？他到华西坝去看望过你多次，别以为我不知道！”

蔡文娜瞠目结舌，不知所对。杨森拂袖而去，蔡文娜嚎陶大哭。杨森在火头上，不辨真假，下令叫杨汉印枪毙蔡文娜。杨汉印说：“夜间人静，枪声一响，会惊动何（应钦）总长。”杨森说：“不管你用什么法子，只要把她整死就行。”结果杨汉印把蔡文娜勒死，把尸体扔进了渝舍的废井里。

蔡文娜死后三日，肖寿眉对杜重石说：“惠公蔡夫人与私奔，现在还隐藏在成都，伺机外逃。老弟是袍哥大爷，地面上人头熟，消息灵通，请你找袍哥弟兄探听一下隐藏的地方。”

肖寿眉放出这样的烟幕，目的当然是为了掩饰蔡文娜的真正死因。其实杜重石心里很明白，又一个冤鬼作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离开了人世，哪儿也找不到她了。

蔡文娜的姐姐蔡文琪，在民生轮船公司当会计，好久不见妹妹，去问杨森，杨森也说：“你妹妹有了情人，现在藏在成都，打算外逃。我正在找她。”

蔡文琪明知是谎言，但在杨森炙手可热的权势威胁之下，也无可奈何。

三、引导高层次会见

1941年6月，希特勒果然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西部广阔的边境线发动全面的闪电袭击，苏联猝不及防，全线溃退。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人民从此陷入艰难困苦的境地。

这是蒋介石盼望已久的“好事”。因为苏联自顾不暇，就没有力量来支援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野心，也就能够如愿得逞了。

1941年10月，国民参政会部分参政员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了对时局主张的十条纲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争取政治民主等。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赞扬。11月，中国共产党首先响应，在解放区普遍实行了国共两党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关于解放区的消息，国统区的报刊上当然是不会发表的。杜重石通过杜桴生拿到了这些材料以后，立即传递到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的手里，同时结合川康地方权益，激发他们的爱国救亡民族正气，又引导他们去见当时对川康政治导向有巨大影响的革命前辈张澜。他们不但一再表示赞扬、拥护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的政治主张和解放区的“三三制”政权，而且对蒋介石的专横独裁政权表示不满。这一次会见，是邓、潘、刘三人政治态度的正式亮相，也是他们倾向共产党、走向进步的开始。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又发生了强烈的变化，世界大战的局面已经形成。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0多个国家的首脑在华盛顿开会，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宣言》，中共中央随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表示拥护。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和政治气候下，中国共产党要积极团结、争取川康军人，川康军人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历史性抉择。于是通过杜重石和杜桴生的联系，安排刘文辉在重庆和成银行总经理室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秘密地见了面。——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是个民主人士，以前是刘文辉的部属。

这次会面，周恩来对刘文辉说：太平洋战争一爆发，形成了两个统一战线：一个是以《联合国宣言》为基础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统一战线；一个是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而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给蒋介石出了一道难题。他要继续反苏反共，破坏团结，与日本妥协单独媾和，是违反《联合国宣言》的。估计他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采此下策。国际形势的这一变化，正是川康地方大有作为的好时机。

刘文辉回到成都，把周恩来的话向邓锡侯、潘文华作了传达。邓、潘二人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准备积极行动起来，巩固三省联防，继续反蒋。

刘、邓、潘这三个川康军人领袖，因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有所不同，在反蒋的态度上也有程度不同之分：刘文辉表现得最积极，而邓锡侯则较温和。但是他们三人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歧视川康地方势力以及吞并排斥异己等等做法，都是不满意的。而川、康、滇三省联防，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反对蒋介石、保卫大西南最有力的措施，绝不能轻易放弃。尽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影响到国内政治关系，蒋介石对刘文辉的态度也逐渐由排斥、孤立、打击变为“安抚”，但是刘文辉心里非常明白，蒋介石通过张群对他的“安抚”，实际上就是控制他，伺机消灭他。邓、潘二人当然也深知唇亡齿寒的相互关系。因此，即便三人反蒋的决心有强有弱，行动有紧有缓，他们

对三省联防共同反蒋的认识则是一致的，不变的。

这以后，最积极的刘文辉，特地在雅安建立了一座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由中共地下党员外号“王二先生”的王少春负责。王少春的妻子秦惠芳，就是这座秘密电台的报务员。周恩来则派当时在南方局工作的张友渔常驻成都，当川康军人不桂名的政治指导员，随时向他们介绍国际形势和中共中央对时局的主张。后来又派朱蕴山、邓初民到成都向刘文辉专门介绍重庆各界民主人士反专制独裁、争民主自由的政治活动情况。而张澜与加拿大籍民主人士、华西大学教授文幼章，则经常向潘文华提供张群的政治活动情况。因为张群与张澜、文幼章等民主人士交往，是打着国民党“开明派”的旗号出现的，有些对外保密的事情，对张澜和文幼章并不保密。

因此，周恩来与刘文辉谈话以后，对川康军人的政治影响作用很大。也可以说，这是刘、邓、潘走向进步的具体行动表现。而所有这一切，则都是杜重石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活动的结果。

四、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1942年12月，杜重石以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少将处长的身份，到重庆去参加杨森的女儿杨郁文与蒋介石的外甥竺培丰的婚礼。杨郁文是杨森的管家四姨太田蕙秋所生的女儿。关于竺、杨联姻的介绍人，有的书上说是毛人凤的妻子向心影。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后，当时杨森任贵州省主席，不经常来重庆，所以何应钦和特务头子毛人凤两家，都住在重庆中二路杨森的公馆“渝舍”内。杨森的管家姨太太田蕙秋也住在重庆，她对这两人的家属曲意奉承，招待得非常周到，因此交情很深。过了一段时间，就由毛人凤的妻子向心影出面介绍，把她的女儿杨郁文嫁给了竺培丰。

据杜重石先生回忆，把杨郁文介绍给竺培丰的，是蒋介石的秘书宁波人汪日章和杨森的顾问广安人邱怀瑾。他们两人是勤工俭学留法时期的好朋友。竺、杨两家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婚礼的时候，汪、邱二人即以“月老”的身份出席。证婚人则是当时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居正。

不过，当时“名人子女”的婚姻关系，真正的介绍人与婚礼上的介绍人，往往是两回事儿，因此不妨把这两种说法都记在这里，何者为是，姑且存疑吧。

竺培丰是蒋介石妹妹蒋瑞莲的长子。蒋瑞莲的丈夫竺芝珊，本来是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玉泰”号的店员。蒋介石发迹以后，竺芝珊依靠裙带关系，当过苏州税务局局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津浦铁路车务总段段长等肥缺。竺培丰在宁波商校毕业以后，蒋介石保送他到日本学习空军，很得蒋介石的喜爱。杨、竺两家的联姻，一家要笼络，一家想巴结，当然是建筑在利害关系上的政治性婚姻，只是以新郎、新娘为联系的纽带罢了。

婚礼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男女双方都是豪门，其场面的盛大、隆重、欢快、热烈，自不待言。宾客之多，虽非绝后，也是空前。婚礼之后，接着举办舞会。杜重石参加这样的集会，当然不是为了图热闹，更不是来看场面的。他作为一名地下党员，身负重任，到这里来是他的工作，是另一种形式的战斗。因此，他没有那种兴趣找舞伴下舞池，而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有没有适当的人选可以交谈。

在舞厅里面转了一圈儿，正好迎面碰上了谈云章。前面说过，他是杜重

石姑妈的侄子，两人也算是远房的表兄弟。他在刘文辉的部队中从连营长一直当到团长，后来参加军统，成了骨干，顺着这条线当上了重庆市警察局刑警处处长。说起来，也算是行伍出身。此人性格倒还爽直，只是有意无意间总要显示自己在军统中的地位，显示自己比别人知道的内幕消息多。正因为如此，所以杜重石在筹办“蜀德社”的时候，也把他拉进社里来当个“大爷”，一方面拿他当保护伞，一方面就近探听消息。今天无意中在这里相遇，当然要跟他谈谈，就把他拉到了一边儿。

聊天中，谈云章说起刑警处最近派一批刑警到新成立的中美合作所去受训，又说这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援助，也是对军统局的信任。杜重石反将他一句说：“现在美国人好像相信你们有些本事了，这才跟你们‘戴老板’联合成立什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

所’；可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国人是看不起你们的，根本就不相信你们‘戴老板’手下会有什么能人。”

谈云章面有愧色地点头说：“老弟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你是不知道，早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星期，委员长就把侍从室机要组破译出来的日本企图偷袭珍珠港密电急转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萧勃交美国海军情报署。可是他们不相信中国有能破译日本密电码的能人，还以为是中国害怕美、日关系趋向缓和，故意制造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来挑拨美、日关系的。后来美国人吃了大亏，才相信中国人的情报可靠。现在成立的这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就是专门研究情报的，由我们戴老板当所长，美国海军情报署署长梅乐斯当副所长。梅乐斯就是一个破译密电码的专家。”

杜重石挖苦地说：“美国人大批地到中国来，你们警察局就有事情可干，也有大财可发了。你们把中国妓女送到医院里去检查，消了毒，再送给美军寻欢作乐，大把的美钞，不就进了你们的腰包了吗？”

当时重庆、成都的警察局，的确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这件事情，所以杜重石说的，并不是玩笑。

谈云章神秘地笑笑说：“老弟，你扯到哪里去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要取得胜利，情报的及时和正确是十分重要的。成立中美合作所，目的在于加强中美情报合作，帮中国培训情报人员。合作所帮我们训练刑警，所有的教材和器械设备，都是美国赠送的。美国教官的全部费用，目前暂时由我们垫付，以后再由美国分期归还。你说的妓女检疫，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警察

萧勃——军统局驻美国站站长。公开的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

破译出日本计划偷袭珍珠港密电的能人——是指从日本返回中国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池步洲。他在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组下属的“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专门从事破译日方密电。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成立之初，虽然既有中统分子也有军统分子，但却既不属于中统也不属于军统，而是军委会下面一个为抗战服务的情报咨询机关。“军技室”成立不久，由于中统、军统争权，所有军统分子都被赶出了“军技室”。池步洲本人没有参加过中统或军统。珍珠港事件以后，戴笠贪天之功为己功，到处宣扬有关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为军统人员所破译，所以才有失实的传闻流传。请参看吴越著《蒋介石的绝密王牌》一书，青岛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借研究情报为名，以培训中国情报人员为掩护，实际上干的却是迫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秘密勾当。所以池步洲等一批真正对日本密电码有研究的专家，与打着“研究情报”旗号的中美合作所无关。

局想不管也得管。妓女既然客观存在，让她们检查一下，总比带着梅毒到处传播要好些吧？……

两人正在聊天，突然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迎面走来。谈云章给杜重石介绍：这是毛人凤的夫人向心影，如今两口子都借住在杨森的公馆“渝舍”内。毛人凤是军统局地位仅次于戴笠的特务头子，这是尽人皆知的。他的夫人，杜重石却不认识。没想到向心影听了谈云章的介绍之后，歪着脑袋端详了一阵杜重石，笑着说：“原来是杜家阿弟呀？十几年不见，小伙子不但有了出息，人也越长越漂亮了嘛！”

向心影一笑，露出腮边两个小小的酒窝，风韵相当迷人。杜重石这才想起来，原来这个向心影，就是以前的老邻居向绍英！

谈云章惊讶地问：“你们本来认识？”

向心影哈哈大笑：“认识你以前，我们就是老相识了。岂止是相识，我们还在一起住过呢！”

“怎么？你们……”谈云章有些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不许胡思乱想！”向心影卖弄风情地白了谈云章一眼。“人家可是个正经人，不像你……”

说笑了一阵，向心影别处应酬去了。谈云章还有些不信地问杜重石：“你们当真同居过？”

杜重石也笑了起来：“我可没那胆子偷吃这样的禁果！1931年，我在上海读书，因为再过一年就要毕业了，所以这一年暑假

期间我没回广安，就在打浦桥租了一处石库门房子住了下来。为了省房租，是和一个万县人叫向友楠的合租的。我和向友楠住前楼，他的一个侄女儿住后楼。这个侄女儿，当时叫向绍英，就是今天的向心影。我们俩同年，不过她比我大几个月，所以混熟了以后，就叫我‘杜家阿弟’。那时候，她刚满18岁，豆蔻年华，的确长得漂亮，鹅蛋型的脸面如桃花，整齐的刘海下面，两条柳叶似的眉毛，一双水汪汪的双眼皮儿大眼睛，明亮清澈，高矮适中，身材窈窕，常穿一件乔其纱的旗袍，一笑露出两个小酒窝，真是温文尔雅，聪明伶俐，妩媚动人……”

“听你那么一说，简直把她描写成西施再世了。看她今天的模样儿，尽管风韵犹存，却不像你说的那么美。别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看她的今天，一方面固然年龄已经增长了十几岁，对一个女人来说，‘青春’阶段已经过去，更主要的，是生活的经历把她少女时代的天真烂漫、纯真无邪统统消磨光了。当年她的眼光是热烈、聪敏、温柔、坚毅的，令人生爱；今天她的眼光是深沉、冷凝、狡黠、闪烁的，看了令人生厌，甚至恐惧，的确是前后判若两人。《麻衣神相》上说的‘相随心变’，是有道理的，绝不是迷信。当年她在上海，如果不是早已经名花有主，我是会喜欢她的。

今天重逢，我却有些怕她了。”

“你说的当时她已经名花有主，是不是指的殷汝耕？”

“不错。我和她认识不久，就知道她原来是殷汝耕的情妇，殷汝耕是浙江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留学生，1927年当过中国政府驻日代

石库门房子——指清代末年至民国初年上海标准的“弄堂房子”，是两层或三层的木结构建筑，为当时的中产阶级民居。每幢房子以一家一户为单元，一般都开有前后二门。前面的大门朝南，用细洁的条石做门框，黑漆双扇厚木门。“石库门”之名即由此而来。

表。我在打浦桥和向家合住的时候，殷汝耕在外交部东亚司工作，已经四十五六岁，时常到她住的后楼来跟她幽会。他一来，就住下不走，开头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后来听他叔叔说起，我才知道他是殷汝耕。暑假期满后，我回到学校，接着‘九一八’事变，我们忙于救亡，从此就没有再见过她。”

“那么她后来的情况你是一无所知？”

“至少她怎么会嫁给毛人凤，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

“‘九一八’事变以后，殷汝耕参加过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1935年，日本人制造冀东事变，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出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投靠日本当了汉奸。向心影的叔叔向友楠，本来就是我们的人，这时候出任四川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他向我们老板详细介绍了向心影以前跟殷汝耕的关系，建议利用她与殷汝耕的旧情作为掩护，派她去刺杀殷汝耕。我们老板接受了他的建议，亲自跟向心影谈了话，鼓励她以国家、民族的大利、大义为重，割断儿女私情，果敢行动。向心影当时倒也答应得很干脆。可是一到河北，见到了殷汝耕，发现殷汝耕还是那么爱她，为情所困，不忍下手，就劝他不要做为人唾弃、遗臭万年的事。殷汝耕听出她话中的意思，醒悟到她不是为续旧情而来，一再盘问，软硬兼施，她终于说出了戴老板派她来刺杀的实情。殷汝耕感动之极，不但没有跟她翻脸，还再三保证在他权力所及的范围之内，绝不会伤害她，一定安全送她回到南京。向心影的刺杀任务没有完成，戴老板很光火，责令毛人凤审查她未完成的原因。审查期间，毛人凤被向心影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所征服，给她作的结论是‘年轻无知，悔悟认真，恕其初次，留观后效’。——这一留，就留给他自己了。要是别人，处分起来可不轻呢！”

向心影参加军统以后，心肠变得十分冷酷。她与毛人凤之间并无感情，而是有她自己的所欢周伟成。两人经常合作设计害人。他们陷害杨森的九夫人蔡文娜，已如前述。

1943年1月11日，杜重石参加《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纪念活动，见到了吴玉章同志，把谈云章所说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情况向吴老作了汇报。吴老说：“从现有迹象观察，蒋介石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恐怕不仅仅是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中国战场交换情报的需要。很有可能这是美蒋特务机关互相勾结、迫害中国人民的先兆。”

以后的事实，证明吴老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杨家的婚事忙完了以后，杨森抽工夫在渝舍和杜重石谈谈去延安的见闻和成都办事处的工作，范诞生也在座。杜重石从延安回来以后，杨森从湖南撤到贵州，两人还没有机会见面细谈呢！

谈完了工作，杜重石特地又问起1939年6月12日发生的“平江惨案”。当年的6月27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过报道：说是二十七集团军派人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通信处，惨杀了通信处主任、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并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及其家属四人全部活埋。这一“平江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延安各界还举行集会并通电全国强烈抗议。杜重石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曾写信给杨森询问事件真相。也许杨森有难言之隐，没有答复，所以今天顺便一问。

杨森说：“杀害新四军通信处的人员，是何学植干的。我只知道他是个营长，却不知道他是个暗藏在集团军内部不露身份的军统特务。那天我接到薛岳的命令，要我抓捕新四军通信处的全部人员，还特别指名派何学植去执

行。我按命令办事，派何学植去抓人。他到了那里，却自作主张把人整死了，事后说是奉的薛岳的密令。他对我是阳奉阴违，对薛岳是唯命是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的处境就像从前有人说我挖了朱玉阶的祖坟一样，我能声明与我无关吗？我是二十七集团军的总司令，杀人的是二十七集团军的何营长。我只有替别人‘背黑锅’的份儿。”

杜重石性子一上来，又振振有词地说：“这分明是有人故意在军座与共产党之间制造矛盾嘛！看人论事，不能只是以事论人，还要以人论事；以人所处环境、地位的特殊性，来说明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只看事物的发生，不看事物发生的特殊环境和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自然就会引起误解了。”

范诞生在一旁笑着说：“你又来了！你是不知道，惠公接到你谈论平江事件的那封信，连二十军里都有人向惠公进谗言，说你在‘教训’他。惠公当时只说了一句：‘小孩子嘛，难免自以为是。这是年轻人好胜心强的表现。’你都二十六七岁的人了，还挂着少将衔儿呢，惠公说你是个‘小孩子’，进谗的人也就没活可说了。”

这一番话，说得杜重石感慨万千，不由得也哈哈大笑起来。

第九章 《大义周刊》大义凛然

杜重石到四川做统战工作，前一时期，由于手中没有刊物，没有公开说话的地方，所以只能发动袍哥中的青年们利用“摆龙门阵”的办法制造一些口头舆论，因此作用不是太大。自从国内外的政治气候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创办刊物的条件成熟，根据党的指示，他联合张澜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办了《大义周刊》以后，有了“为民请命”的阵地，他才能无所畏惧地说心中所欲言，配合全国各地的进步刊物，从“国共合作、共赴国难”转移到“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新的统战基点上来。

一、蒋介石的花招

1944年4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提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要实行民主，保证人民生活和地方自治等政治要求。蒋介石原则上表示同意。

同年9月，在重庆的各党派代表冯玉祥、董必武、张澜、张东荪、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等及各界代表300余人集会，要求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改组成立有各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声势浩大，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作出决策。

日本政府深怕中共提出的这一主张在各民主党派的热切支持与赞同下会成为事实，对日军侵华大大的不利，于是挥军深入桂林、柳州、南宁直趋贵州，于1944年12月6日占领了独山，目的是在军事上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以缓和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

在这一形势下，蒋介石急命贵州省主席杨森率部增援西进部队。杨森在贵阳作紧急疏散动员，川康地方也感到恐慌。潘文华一面命令陈兰亭、彭光汉两师做好进山打游击的准备，一面聘请蜀德社的“新酒”赵仕奎任秘书，要他在部队进山之后做政治思想工作。赵仕奎是川大学生，在蜀德社中以能言善辩著称。

当时在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西欧方面，美英苏军正取得节节胜利，德军彻底失败已经成为定局；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在东南亚的陆军部队也已经军心涣散，运转失灵。所以日军占领独山，也不过是回光返照一下而已，于败局无补了。

这期间，美国政府见中国人民要求民主政治的呼声日益高涨，也认为只有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政治，才符合民意。这种认识与决策，是与当时任中印缅美联军总司令的史迪威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思的促使分不开的。

史迪威与高思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敌后开辟了抗日根据地，牵制了日军，减轻了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取得了很大成绩；而属于蒋介石嫡系的胡宗南40万精锐部队，却围堵西北苏区，不用来抗日。甚至八路军驻国统区办事处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搞到的医疗物资，也被蒋介石所封锁，禁止运进苏区。史迪威对蒋介石这种只着眼于党争而不顾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做法极为不满，曾于1943年9月6日建议蒋介石撤掉对西北苏区的封锁，不但蒋介石可以增加40万军队用于抗日，共产党也无须留下相当数量的军队来防范国民党军队向苏区的进攻，而全力投入抗日战场。这样的意见，

蒋介石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怀疑史迪威是与共产党串通一气阴谋颠覆他的独裁政府。

1944年4月22日，《大公报》揭露孔、宋家族在昆明秘密屯积的物资，足够云南全省军民4年的食用；而孔二小姐在美国结婚的费用，足够救济10万难民维持4个月；单是缝制嫁妆所费的工时，就与缝制甲种师两个师3万人的军装所花的工时和费用相等。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是政学系所控制的报纸，与国民党的关系，用当时比较流行的评价，是“小骂大帮忙”性质。“小骂”，指的是平时发表一些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腐化读职乱纪的案件，用以吸引读者！“大帮忙”，则是指政学系首脑黄郛、张群、吴鼎昌等人通过报纸对蒋介石独裁政府的捧场与支持。这一次怎么会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小骂”一变而为撕破脸皮的“破口大骂”

呢？

原来，政学系所把持的《大公报》中，也有非政学系的编辑，也有敢写敢骂的进步记者。例如著名记者范长江，就是原西南联大的进步教授，而这次揭露孔、宋家族屯积、糜费的消息，就是由龙云和刘文辉商量好，巧妙地透露给范长江的。

史迪威看见这样的报道，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大大加深。他认为蒋介石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在中国战场上削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为此建议罗斯福：把美国援华物资中应该分给中国共产党的那一部分，也像美国援助南斯拉夫、把物资直接交给南共领导人铁托一样，把物资直接交给中国共产党。

这一建议，蒋介石当然竭力反对，而且也加深了对史迪威的不满。

1944年5月，以蒋介石为中印缅战场最高统帅的缅甸战役失败，给蒋介石当参谋长的史迪威，对中国援缅军队延误时机很有意见，要求中国军队的人事作一些撤换调整。但是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以为史迪威是冲着他去的，有损他“最高统帅”的尊严；他认为史迪威不是以参谋长的身份帮他做事，而是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在监督他，凌驾于他之上。于是，当时就发生了“统帅”与参谋长之间争夺指挥权的矛盾。

1944年9月初，美国B—29型重轰炸机轰炸日本军事基地，以阻止在华日军西进侵占独山。这时候，史迪威再次建议蒋介石调用围堵西北苏区的军队用于抗日，但仍被蒋介石所拒绝。

至此，史迪威见与蒋介石交涉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就通过美国联合参谋部转请罗斯福：要求把中国战场全部军队包括共军在内的指挥权都交给史迪威，罗斯福原则上同意，并派赫尔利为总统私人代表到重庆，一方面调停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寻找机会“劝”蒋介石把指挥权交出。

赫尔利与蒋介石还没有谈妥，急性子的史迪威却等不及了。他认为反正罗斯福已经同意了，于是就在9月19日直接去见蒋介石，请他把指挥权交出，不然，要他对中国战场的战局恶化负责。

蒋介石大为生气。他向美国政府抗议，软硬兼施，要罗斯福把史迪威召回。

孔二小姐——指孔令俊。她是宋美龄嫁蒋介石以前的私生女，送给孔祥熙抚养，所以姓孔。当时社会传说：她仗着“父亲”的势力，飞扬跋扈，任意挥霍，而且面首如云，生杀由之。与龙云的第三个儿子“龙三公子”，都是当时西南地区最著名的“纨绔”。

赫尔利也觉得史迪威没等他与蒋介石谈妥就自己出面索要兵权，未免鲁莽了点儿。于是他打报告给罗斯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国政府不应该支持史迪威与蒋介石争夺指挥权。蒋介石失去兵权，也意味着美国将失去中国这个盟邦。美国现在所需要的不是为史迪威争长论短，而是要打败日本。

罗斯福接受了赫尔利的建议，只得于1944年10月19日将史迪威召回。21日，史迪威被迫辞职，代之以魏德迈；赫尔利则代替高思为美国驻华大使。史迪威与蒋介石的这场较量，以罗斯福的妥协而宣告失败。

二、蒋介石欲杀刘文辉

蒋介石对待国内异己武装力量，一向采取先分化、后各个消灭的政策。对川康云贵四省武装，贵州的杨森已经受“招安”；云南的龙云远在边睡，暂时鞭长莫及；四川的邓锡侯、潘文华已经稳住，只有西康的刘文辉最不听话。不过经过这几年的冷落、孤立，现在似乎已经到了整他的时候了。

1944年初，蒋介石派军统高干罗国熙率领一个旅的兵力，到西康去当经济检查处处长。其目的，是想控制刘文辉的行动。刘文辉得到这一消息，一方面立即派兵集结邛山等地，阻止罗国熙部队进入西康；一方面用“地方绅士”的名义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明用不着派兵进入西康的理由。同时还利用袍哥势力，发动群众举行示威。蒋介石“强龙难斗地头蛇”，只好让罗国熙撤回部队，单身一人到西康上任。

这以后，蒋介石多次召见刘文辉，想把他抓起来，但是他不是借故不来，就是没有适当的时机和借口，总也抓不住他。

蒋介石终于想起了他妹妹的亲家杨森，打算让杨森来立这一功。他把杨森叫到重庆，对他说：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每天都有报告给中央，已经掌握了刘文辉“通敌”的确凿证据，要杨森与潘文华联络，想出一个最好的办法来，一举消灭刘文辉。

杨森把潘文华请到重庆，传达了蒋介石的密令，并说：“中央把这样机密的大事叫咱们去做，足证委员长对咱们是十分信任的。”他提出的方案，是由杨森的川黔部队对刘文辉发起突然袭击，将刘文辉或捉或杀，到时候请潘文华掩护并声援。

潘文华回到成都，与他的总参议锺体乾、参谋长杨续云商议，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的灭刘计划得逞以后，唇亡齿寒，下一步潘、邓二人必将步刘文辉的后尘，得到同样的命运。于是潘文华就采取“拖”的办法，不积极行动。

蒋介石见潘文华迟迟不动，就急电召潘文华去重庆。潘文华干脆“托病”。杨森无奈，只好派他的参谋长范诞生到成都来游说并探听虚实。

范诞生到成都，先到二十军办事处找杜重石。范诞生是二十军的老人，当然知道杜重石去过延安，但也只知道他是代表杨森去考察的，并不知道他在延安参加了共产党，更不会想到他在四川负有特殊的使命。而杜重石随时与潘文华通气，却知道他这一次来成都的目的与任务。两人见面，谈起近来四川的政局，杜重石故意把话题往这方面引：“史迪威跟委员长这样一闹，社会上议论纷纷，多数人都说是美国人向着共产党。看起来委员长最近会有些动作。听说西昌行辕正在起劲儿查禁红色书刊，成都也有人风言风语地说：川康地方上，就有‘通敌’的人。”

没想到范挺生居然很明确地说：“美国人只想早日帮中国打败日本，支持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一天天壮大，对国民党构成了威胁。委员长怕的也是这个。过去有人说：日本人侵略中国，是亡国不会亡党（指国民党）；俄国人侵略中国，是既要亡国又要亡党。其实，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不过是几个书生开开会，发点儿议论，成不了什么气候。后来一天天壮大，到今天有了这样的局面，是国民党自己帮了它的大忙。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里说：苏维埃政权能够在白色政权中间一小块一小块地长期存在，并且总是在各省的边区，是因有白色政权区域的各军阀之间的战争和各军阀割据自雄的分裂。这是国民党的自作自受。这话说得一点儿也不错。委员长接受过去的教训，所以决心要翦除死敌除外患，消灭杂牌解内忧。刘文辉、龙云这一类地方杂牌军，总是暗地里跟国民党的死敌勾勾搭搭，这就是很危险的内忧。有一句老生常谈：‘最坚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你也听说过吧？”

范挺生的话，终于泄露了天机。所谓“外患”，指的是共产党；所谓“内忧”，指的就是国民党内同情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像刘文辉这样的地方杂牌军。至于刘文辉“通敌”的“敌”，当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了。杜重石考虑了一下，故作不懂地问：“你那么说，惠公不也是地方杂牌军吗？”

范挺生自得地笑笑说：“惠公那可又当别论。你难道忘了杨郁文与委员长嫡亲外甥竺培丰在嘉陵宾馆结婚的事儿了？”

杜重石也笑笑说：“那么说，惠公与蒋公之间有特殊的多重关系，是‘特殊的杂牌军’，应该另当别论。”

范挺生与潘文华会了面。两人的政治态度大相径庭，自然不可能推心置腹，只是表面周旋，虚应故事而已。临别的时候，潘文华说：“我有一句话，请你带给惠公：‘大敌当前，不应该再挑起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端，应以民族大义为重。’”

蒋介石对川康地方势力既不信任，又害怕压力过大，反弹力更强，会使地方势力更加靠拢共产党。所以对刘、潘、邓三人的联合力量，又不得不有所迁就。而刘文辉等人也懂得利用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变化，向蒋介石作政治讨价还价的砝码。当时蒋介石虽然出于不得已而暂时停止了铲除刘文辉的行动，但是“灭刘之心”，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仍然未死。

三、《大义周刊》的诞生

1944年9月，原参政员临时性结合的“民主政团同盟”改组，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杜桴生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意见：国共合作已经成为过去，党员身份绝对不宜暴露。为了便于今后在知识分子阶层进行民主活动和统战工作，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更为合适。宣传工作，也以出版公开发行的刊物更为有效。因此，杜重石经沈志远（著名经济学家，民盟中央委员）和范朴斋（民盟中央委员、成都市分部主任）介绍，加入了民盟，并积极筹办一个公开发行的刊物。

在当时，要办一个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杂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需要有一个创办团体的名义，还要许多知名人士作为发起人，当然还需要有足够的资金。以民盟的名义办，一是目标太明显，政治性太强，容易被特务机关所注意；二是杜重石刚刚参加民盟，要以民盟为背景创办一个杂志，资历

和声望也都还不够。因此，他决定以袍哥这个社团实际上也就是以川康军人为背景。发起人和资金问题，倒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沈志远和杜桴生建议：既然刊物以川康军人为背景，最好请深得川康军人拥戴的革命前辈张澜带头作发起人，下面的事情，就好做多了。

那时候张老住在成都南门外诸葛亮衣冠家附近黄瑾怀新建的私邸“怀远山庄”内。杜重石专程前去拜访，张澜老先生欣然接待。杜重石先向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到延安访问的经过；然后谈到接受毛泽东、陈云、朱德的接见，委派他来成都，组织袍哥团体“蜀德社”，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在川康军政人员中做统一战线工作；最后说起国内政治气候的转变，“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统战口号已经不再适用，必须转到“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新目标上去。为了进行宣传，十分迫切需要一份刊物。现在打算以袍哥社团为背景，申请创办一家《大义周刊》，特请张老领衔当发起人，等等。

张老听了，十分爽快地说：“你们要办刊物争取和平民主，我完全赞成。要我当发起人，没有问题。用袍哥社团作背景，这个主意要得。当年在‘四川保路同志会’闹革命时期，袍哥就起过很大的作用嘛！那时候尹昌衡杀了清王朝四川总督赵尔丰，推翻了满清的四川政权，做了都督，成立袍哥团体‘大汉公’，他自己就做‘大汉公’的总舵把子。可以说袍哥团体是历来就有革命性的嘛。……不过，国民党的报刊审查机关，对于新办刊物，审查控制可是相当严的。”

杜重石说：“发起人都是川康将领中的袍哥大爷；办刊物的宗旨，是宣扬袍哥的民族意识、爱国思想，激励袍哥抗日救亡。这样的刊物，想来审查机关也不好驳回，批准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张老沉思了一下说：“你在申请书上要引用蒋介石说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拯救民族危亡’那些门面话。”

杜重石按照张老的意见写了申请书，给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处长陈克诚送去，不久就得到“依法由内政部登记，四川省立图书杂志审查处查讫，中华邮政挂号认为新闻纸类”的通知书。于是袍哥刊物《大义周刊》，就这样办起来了。

《大义周刊》社的社长为杜重石，发行人为王白与。发起人除了由张澜领衔、杜重石主办之外，还有国民党政府监察院检查委员谢无量（刊名“大义”二字，就是请他写的），成都耆宿学者刘豫波，电影界名人万籛天，潘文华部的师长兼袍哥大爷彭光汉和陈兰亭，川康绥靖公署副官长黄瑾怀，刘文辉部二十四军的团长李宗煌²，属于刘湘系统的《华西日报》社社长王白与，成都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黄云章（民盟盟员），潘文华部刘树成师参谋长汪载涛，以及江、浙籍工商界人士吴梦三、凌虎声、许有根等人。

真是形形色色，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杜桴生看了这份名单，打趣地说：“《大义周刊》的发起人是一锅颜色、味道全不谐调的大杂烩，但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办好《大义周刊》。这也正是统一战线的具体表现嘛！”

除了发起人之外，还有一些不便作为发起人的学者，则聘请他们为特约专栏撰稿人：川康农工学院教授、民盟中央委员杨伯凯（笔名凯若）负责政

王白与和李宗煌二人，都是民革成员。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白公馆”。事迹见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团结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的《民革川康五魂》一书。

论；经济学家沈志远负责经济讲座；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在刘文辉处工作的张友渔（笔名章瑜，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负责撰写日本方面的军政述评；吕朝向（笔名洪钟）负责写文艺评论。其中多数人是张澜介绍推荐的。

《大义周刊》申请立案的时候，说明是“袍哥刊物”。但是袍哥的名声不好，特别是不明袍哥历史的青年和大学生们，一听“袍哥”二字，就说这是“封建余孽”。为此，在杜重石筹办蜀德社的时候，就按照杜桴生的建议，把袍哥改称“社团”了。现在办刊物，仍按照这一传统，凡是《大义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袍哥的，都一律改称“社团”。这份刊物，现在还可以从四川省图书馆查到。翻开那发黄的纸张，里面有许多标题，例如：《社团产生的因素》、《社团的别名》、《社团的基本立场》、《社团思想与墨家思想》、《一论（二论、三论）社团义气》、《当前社团应有的态度》，还有根据英国新闻处资料编译的《黎利计划的社团中心》等文章，就都是用“社团”来代替“袍哥”的。

此外，为了扩大宣传袍哥的历史功绩，引发袍哥们走革命的道路，在张澜的支持和阳翰笙的协助下，以《大义周刊》的名义在春熙路春熙大舞台上演了阳翰笙编剧、描写四川袍哥罗大爷参加辛亥革命的袍哥题材话剧《草莽英雄》，在当地造成了很好的影响。

杜重石手中有了刊物，有了公开向读者说话的地方，他的宣传工作就活了，文章也就有得做了。

1944年晚秋，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向国民党提出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国民议会，成立各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民盟发表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宣言，《大义周刊》随即发表了《拥护民主同盟的紧急呼吁》社论，以作配合。

1945年春，国民党政府在分配中国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代表的时候，民社党、青年党都有名额，唯独共产党却没有名额，为此，《大义周刊》发表社评说：“国民政府是以民主国家的资格出席旧金山会议的，而出席的代表却是国民党指派的反民主的人。这真是对民主的极大的讽刺。看来，光有争民主的理想，光有理想的善良意图，是不够的，要使理想成为事实的唯一途径，是严正地面对一党专政的现实采取行动。……”

在当时，一家袍哥刊物能够如此大胆地发表言论，应该说是很不简单的了。

后来，国民党政府在各抗日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增添董必武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去出席旧金山会议。这中间，当然也有《大义周刊》的一份力量。

1945年9月初，杜桴生到重庆开会后回到成都，对杜重石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要公布的受降将领名单，都是国民党军官，对八路军、新四军，却严令在原地待命，不许受降，还把这一决定通知了日伪军的司令官。”

杜重石问：“你这消息可靠吗？”

杜桴生说：“这是南方局在会上传达的，还会有错？”

过了两天，这一消息就在报上公布出来。张澜看了，非常气愤地对杜重石说：“这不是单纯地由谁来受降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将来由谁来保证实行政治民主的大事，是争取中国将来实现民主的政治斗争。对这样的大事，《大义周刊》应该说几句公道话。”

根据张澜这句话，杜重石受启示，及时地写出了以《说几句公道话》为题的评论文章，在《大义周刊》上刊出。文章指出：“同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抗日部队，而受降却有不同对待。一是许其受降；一是限其原地待命，不许受降。似此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不可告人的阴暗伎俩，置浴血抗战八年之军民于何地？居心何在？令人隐忧重重……”

这样的公道话，当然为当局者所不欢迎、不受用。两天之后，川康绥靖公署副官长黄瑾怀来通知杜重石：“马参谋长请你明天上午到他办公室去一趟，他有话跟你说。”

杜重石心里已经意识到是什么事，但仍故作不知地问：“什么事儿？”

黄瑾怀是《大义周刊》的发起人之一，倒不隐瞒：“听说是和《大义周刊》发表的文章有关。你准备一下。”

第二天上午9时，杜重石到了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办公室。这时候，副官长黄瑾怀、秘书处处长刘东文、稽查处处长刘崇朴和参谋长都已经到了。参谋长叫马德斋，是个回民。因为杜重石也挂有绥靖公署少将参议的衔儿，按系统属于参谋长管。不过这是个虚衔，上下级之间，一般都保持客客气气，并不真像部队系统那样严格认真。但是这一回马德斋明明看见杜重石走了进来，却拉长了脸，装作没看见的样子。杜重石只得先开口：“参座，找我有事吗？”

马德斋面有愠色，怒目而视，过了半晌，这才突然说：“你的《大义周刊》可以收场了！那篇谈‘受降’的评论、你看过没有？言论太反动了！”

杜重石见他用势力压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创办《大义周刊》，发起人是张表老，发行人是王白与。我这个社长是挂名的。我只知道讲讲袍哥的事儿。参座觉得哪篇文章太反动，请先找他们谈。”

马德斋见杜重石这个下属居然敢于顶撞他这个顶头上司，更加怒形于色地用教训的口吻说：“你一个嫩水的娃娃，这样搞下去，对你没好处的！”

马德斋当众教训杜重石，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引起了他的反感，也没好声气地继续顶撞，并有意不称“参座”而叫参谋长：“参谋长要是认为《大义周刊》太反动，以后就‘正动’好了。”

黄瑾怀素来知道杜重石的脾气犟，怕两人呛呛起来，事情会越弄越僵，就出来打圆场：“你老弟不要专讲袍哥嘛！以后《大义周刊》发表的文章，你先过一下目，不就行了吗？”

杜重石也就买他一个面子，趁此下台阶说：“是的。副官长说得对。《大义周刊》今后发表文章，我要先过目，然后再发表，免得引起外界误会。”说着，扭头就出了参谋长办公室。

杜重石出了绥靖公署，即去找张澜，把马德斋刚才的话跟张澜说了。张澜很生气地说：“讲几句公道话，就叫‘反动’，哪儿还谈得上‘民主’二字？要照他们的话说，贪污腐化、营私舞弊这些不公道的事儿，倒是‘正动’了？真是岂有此理！”

在张澜的第二次启示下，杜重石又在《大义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反动说起》的评论文章：“说几句公道话，指出有人贪污腐化、营私舞弊，不为全民着想的丑行，名曰‘反动’。根据这个奇特的逻辑，显而易见，那些以权谋私、睁眼不见浴血抗战八年取得胜利是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硕果，

张表老——张澜字表方，尊称为“表老”。

乃至排除异己，夺取人民应有的权益，危害人民利益的事，都是‘反动’了。那就只好让人民宁反勿正了。……”

正好《大义周刊》上同时刊登了张友渔用本名发表的一篇政论《日本的和平攻势与无条件投降》，于是稽查处处长刘崇朴就抓住这两篇评论大做文章。他是个军统特务，平时听报童沿街叫卖《大义周刊》的时候高喊：“请看，请看成都唯一的硬性刊物《大义周刊》！”早就已经引起他的注意。他到处宣扬：给《大义周刊》写文章的，都是思想有问题的人，有的还是共产党。川康军人被共产党利用了。等等。

张澜听说此事以后说：“我看川康军人不是被共产党利用了，而是被反动派的不民主逼上了‘梁山’。他们怎不想想刘自乾、潘仲三为什么要参加民盟，成为盟员！”

那一个时期，《大义周刊》与全国各地的进步刊物一起，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揭露、批判国民党官吏贪污腐化、践踏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等方面，无可辩驳地起到了团结知识青年的积极作用。

刘自乾——刘文辉的号。

潘仲三——潘文华的号。

第十章 牢狱黑幕

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杜重石等人在成都发起召开追悼会。为此，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并将杜重石以莫须有的“流氓袍哥包庇烟赌罪”加以逮捕。

在狱中，杜重石耳闻目睹了重重黑幕。

经民盟中央营救，杜重石获释出狱。但是《大义周刊》已经被封，成都也无法住下去了，他只好转移到另一个战斗岗位上去。

一、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

1946年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过了4天，7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又被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他们两人，都是因为反内战、争民主而被蒋介石杀害的。他们的死，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纷纷集会抗议。成都市各界也筹备举行追悼大会。发起人是张群和邓锡侯，张群还同意担任大会主席。

开会前三天，邓锡侯警卫室的副官主任余仲良得到了国民党特务要捣乱会场、破坏大会的消息。他是蜀德社的成员之一，因此特地跑来把这一消息告诉杜重石。接着，特务分子就放出谣言，说是共产党要在开会那天举行暴动，弄得市民人心惶惶，不知道应该不应该去参加追悼会。

开会前两天，张群突然借故离开了成都，声称他不能担任大会主席了。张群在成都本来就是蒋介石的“替身”，他之所以“挑头”发起开追悼会，无非借此装装他也拥护民主的门面，“临阵脱逃”，本在大家的意料之中，没什么可以奇怪的。出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邓锡侯这个“汤圆儿”也突然称病，不能出席大会了。

尽管杜重石在两天之前就把“可能要出事”这样的局面告诉了张澜，但他还是毫不畏惧地出席了大会。

对于蒋介石派特务分子暗杀民主人士这一事件，杜重石十分气愤，特地撰写了一副挽联，悬挂在追悼大会的会场上：

怪，拥护三民主义，竟遭毒手，应留者未留，
何弗思国中人群，要誓死争回民主。
妙，维持法西政权，定下阴谋，该杀的不杀，
试环顾海外局势，应狠心抛却独裁。

大会会场设在蓉光大戏院。由于预知有特务要捣乱，估计参加大会的人不会太多，结果开会的时候，参加大会的人数比预计的还是多了许多。

大会准时举行。在青年党主席李璜代表各界民主人士致悼词以后，即由张澜代表民盟及李公朴、闻一多家属致谢词。这时候台下口哨声和“打倒共产党的走狗民主同盟”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特务们纷纷敲打桌椅，制造噪音，秩序登时大乱。混乱中，有的小特务向张澜投掷秽物，有的小特务就去撕悬挂在会场上的挽联。杜重石写的挽联，也被特务分子抢走了。

混乱中，杜重石一面吩咐潘文华的警卫室副官、蜀德社袍哥秦绍成保护张澜离开会场，一直送他到家，一面注意台下，发现原来是保警大队长王介中、侦缉大队长余闻翰等一批便衣特务在指挥小特务们带头捣乱。

当天夜里，杜重石把自己在会场上亲眼见到的情况告诉杜桴生和《华西

晚报》的两名记者：共产党员唐征久、民盟盟员黄是云。他们三人立即把消息发出。第二天，军统特务办的报纸《扫荡报》报道的是“市民自发地进行捣乱”，而《华西晚报》和别的一些报纸则把带头捣乱的便衣特务名单公布了出来，特务们造的谣言，不攻自破了。

这时候，四川省会警察局长已经换了军统特务徐中齐。他打听到报上所发表的“带头捣乱会场的便衣特务名单”是杜重石提供的，恼火之极，当即下令让保警大队大队长王中介派人去逮捕杜重石。王中介对杜重石的“后台”是知道的，有些犹豫地说：“只怕好抓不好放吧？”徐中齐咬牙切齿地说：“既然决心抓他，难道还放他不成？你把他抓来，录下口供，立即转送重庆‘白公馆’。量他杜重石有多大本领，还能跳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吗？”

王中介跟杜重石认识，自己不便出面，就打发一个中队长带人于当天深夜闯进杜重石家里，逮捕了他，并把《大义周刊》也封了。

第二天，军统特务机关报《扫荡报》以《袍哥流氓杜重石包庇烟赌被警察局拘捕》为题，在显眼的版面位置上发了一条花边新闻。其目的，当然是想转移视线，以“袍哥流氓包庇烟赌”罪掩盖特务机关出于政治目的逮捕杜重石的真相。

《扫荡报》的这一做法，正好应了“欲盖弥彰”这句古话。他那里想盖，杜重石的朋友们干脆就给他来一个针锋相对——揭。第三天，由广安县旅省同乡会具名在《新新新闻》上登了一则启事：

本会监事长杜重石因思想问题被省会警察局拘捕。有的报纸所载消息与真情不符，且涉及本会监事长个人及我县旅省同乡之声誉。特此登报声明。

陈思孝主办的《新新新闻》，是成都发行量最大的民办报纸。由广安县旅省同乡会出面把事实真相公布出来，使徐中齐十分尴尬也更其恼火。原来策划好的立即将杜重石转送重庆“白公馆”特务魔窟加以谋害的诡计，一时间也不能得逞了。

二、拘留所中四十天

杜重石被押送到警察局拘留所，天色已经放明。拘留所所长姓刘，也是个袍哥。杜重石曾在省会警察局挂过事务主任的虚衔儿，所以他跟杜重石本来就认识的。今天见杜重石被送进了拘留所，很客气地说：“杜大哥来了，应该受到优待，你就在警长的卧室住好了。”当即把杜重石让到了警长室。

那时候，杜重石还是个单身汉，他被捕之后，由家里拉包车的车夫把消息通知了黄瑾怀，又把寝具及日常用品送进了警察局拘留所。所长收到之后，亲自送进警长的卧室里来，还帮着铺设好。

当天，杜重石就坐在警长的卧室里，闲来无事，看看报纸，倒也不觉得牢狱之苦。《扫荡报》上那一篇《袍哥流氓杜重石包庇烟赌被警察局拘捕》这篇“花边新闻”，他也看见了。

入夜之后，忽然来了一位不认识的警长，到办公室跟所长嘀嘀咕咕地说了些什么。那人一走，所长就走进警长室来，吞吞吐吐十分为难地说，“杜大哥，真是对不起你，今夜晚只能委屈你一些，请你到……到……拘留室去过夜。”说着，就把原来铺设在警长铺位上的被褥又卷了起来。

这当然是徐中齐怕杜重石在牢中受到优待，特地派人来关照的。刘所长官小职卑，接到了上峰这样的指令，也不敢做手脚多加照顾，只好无可奈何

地亲自抱着被褥用具，把杜重石带到监房前面，把卧具递到他手里，再次致歉说，“杜大哥，真是对不起你，委屈你了。上面的命令，我实在没办法。”

杜重石苦笑一声说：“你我都是在行的，这事情与你不相干。”

这里的拘留室，是并排的两大间。每间大约 20 个平方米，两边各有一排地铺，中间是一条两尺来宽的“过道”，每一排地铺上，都已经躺着二十来个人，一律头冲墙壁，脚冲“过道”。靠近拘留所大门的一间是男监房，里面的一间是女监房。女犯进出拘留所大门，都要在男监房的牢门前经过。男女监房的牢门都是用胳膊粗的木条做的，很像牛栏。

这时候已经入夜，监房里面电灯昏黄，暗淡无光。杜重石进了牢门，从两个地铺间的缝隙中慢慢儿往前走，想寻觅一处空档放下自己的被褥。通道窄，怀里又抱着铺盖，一不小心，碰着了一个人的脚。正要道歉，突然这只脚猛地飞起，往杜重石的大腿上一踹，接着是一声粗鲁的海骂：“瞎了你的眼了？往哪儿踩！老子在这里关了好几年了，还有十几天就要出去，要不是为了这个，老子捶扁了你！”

睡在他旁边的另一个人“呼”地坐了起来：“三天两天的我还出不去，老子不怕这个！老弟，我来帮你揍这小子！”

这人瞪着眼睛正要挥拳，忽然改了口：“哟，这不是蜀德社的杜大哥嘛！刚才兄弟说话多有冒犯！”说着，按袍哥的礼节，将右手大拇指往上一翘，握成拳头，左手手掌在右拳上一搭，再把右腿弯曲向前作弓形，全身向下蹲两下，说了声：“小兄弟向大哥赔罪！”

刚才骂人的那个人听说是“杜大哥”，急忙也滚起身来，抱拳行礼说：“不知者莫怪罪嘛！刚才的话，冒犯大哥了！”

杜重石也急忙点头还礼说：“梁山兄弟，不打不亲热嘛！把话讲明白了，就没事！你们两位兄弟，怎么认得我？”

要动手打人的那个说：“杜大哥的大名，我是慕名已久的。那年彭大爷掌舵的‘合叙同’在华瀛大舞台开山设堂，举行迎宾大会，我和五哥……”他指指刚才骂人的那位：“我和张五哥两人都去了的。杜大哥在会上的讲话，真是为我们袍哥兄弟长了志气，我们听了，心里特别舒坦。从那时候起，我们就想拜会拜会杜大哥，只是老没那机缘。因为我们俩为彭大爷掌舵的‘合叙同’开山设堂，打了方仲文，吃了官司，一直到如今，还没出去。为兄弟行的事情，要的就是‘义气’二字，关几年也没啥了不起的，有心当光棍儿，决不能拉稀！没想到，倒在这里跟杜大哥见面了。真是难得！我姓李，行六。大哥在这里有什么事情要兄弟办，尽管吩咐，兄弟一定效劳！”

说着，张、李二位就把杜重石的被褥接过去，帮他在靠木栅栏的地位铺好，这个铺位，本来是李六的，为了表示对“大哥”的敬意，特意让了出来，说是靠栅栏的铺位空气好一些。

杜重石进牢房，由于有张、李二人以袍哥义气对待，又宣扬了杜大哥在袍哥界的地位和为人，很快就得到了同监犯人们的照顾与敬重，因此并没有吃到什么大苦。

第二天深夜，牢房里的人全都呼呼入睡了，杜重石脑子里还在思前想后，久久不能成眠。12 点左右，一个值夜班的青年警察在拘留室门外来回巡

在行——这是袍哥行话，称为“拿言语”，指同是袍哥中人。

拉稀——袍哥行话，指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拉扯别人。

遑，见前后没有别的警察，蹲下身子，轻轻地敲了两下木栅栏：“杜先生，这两本书，是外面有人托我交给你的。还要我转告先生，《大义周刊》被封了，大家都平安。你有什么话，我替你转告。不要告诉别人，免得上当。”

杜重石接过书来，在暗淡的灯光底下一看，一本是文天祥的《正气歌》，扉页上写着“身如逆水舟，心比铁石坚”两句；另一本是《水浒传》，封面上写着《血溅鸳鸯楼》一回书中赞武松的诗句：“铁拳劈开生死路，钢刀杀尽横蛮人”。一看就知道是蔡梦慰的笔迹。书里还夹有一支铅笔和几张纸。他急忙抽笔写了“我因追悼李、闻的事被拘捕”几个字，托他交给范朴斋。

蔡梦慰是个记者，也是个爱国诗人。他与杜重石在成都共事多年，是《大义周刊》的主要编辑与撰稿人。他在杜重石被捕的当天，就拣出这两部书来，写上诗句，托人打点送进牢房来给杜重石，鼓励他继续与敌人斗争。不幸的是，这个爱国诗人在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白公馆’魔窟。

警察局办事，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抓捕一个人之后，除非案情特别重大或特别紧急，一般并不立刻审问，而是先关押个十天半月的，目的有三：一是杀杀犯人的火气，以免上堂哄闹；二是让犯人尝尝牢房滋味，以便利用犯人急于求出的心理而全盘招供；三是材料不全，证据不足，正在搜集或制造之中。杜重石的案子，也不例外。直到抓了他一个多星期之后，一个警察才来打开牢门，一面通知说是“司法科科长找你谈话”，一面就掏出铐子来，把他铐上押走了。

杜重石也在省会警察局挂过职，以前经常来，跟许多人都认识。司法科张科长是浙江绍兴人，上海法政学院毕业，到四川来也已经好几年了，依旧讲一口“绍兴官话”，听见别人喊“杜大哥”，他也喊，结果听起来倒像“堵大哥”，大家常常笑话他。

这一回，张科长倒是没有摆出公事公办的派头来升堂问案，而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话”。一见杜重石被押进来，依旧大模大样地坐在沙发里，也不叫“堵大哥”了，而是没有任何称谓地说了声：“请坐，请坐！”

杜重石一面在他旁边的一张沙发上坐下，一面把双手举了起来：“你就这样把我‘请’来呀？我犯了你们什么罪？要给我戴手铐？”

他急忙让警察开了铐子，挥挥手，让警察走开，一面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来点燃，著有所恩地凝神抽了一口，一面取一支递到了杜重石面前。杜重石从来不抽烟，这他是知道的。今天也许是走神了，也许是故意做作。杜重石摇摇头，刺他一句：“真是贵人多忘事，你知道我跟你不一样，我是向来不‘沾毒’的。”

张科长习惯于他的职业，脸皮锻炼有素，被犯人噎两句甚至于骂两句都不在乎，依旧神色自若地抽他的烟。过了一会儿，突然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我有个朋友，他的弟弟叫陈全忠，在华西大学读书，你认识吗？”

“不认识。”杜重石很干脆地回答。

“他倒是认识你呢！他是民盟盟员，你怎么会不认识？”他歪着头，似乎十分惊讶。

“我既不是盟员，又不在华西大学上课，我怎么会认识他？现在我是到你们司法科来受审的，凡是与‘袍哥流氓杜重石包庇烟赌’一案无关的事情，好像没必要问也没必要回答吧？”“包庇烟赌的案情，当然要搞清楚的。我跟你老熟人，见了面，先‘摆摆龙门阵’，随便聊聊嘛！”

对他这种拿人家当小孩子愚弄的“引诱审讯法”，杜重石实在无法忍受

了，就提高嗓门几大声地说：“要摆龙门阵，等我出去以后，我请你到茶馆里当着大家一起摆。今天我是被你们抓来，没得那个心情跟你冲壳子。彼此都是老熟人，也没有必要捂着盖着的。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杜重石要是当真包庇烟赌，你们倒是不会抓我的。”

“那可不见得。”他半扬起头，吐出了一口烟。

“怎么不见得？”杜重石的嗓门儿更高了。“我在拘留所里亲眼看见夜里有人用黑布遮住了烟灯抽鸦片！”

张科长一怔，脸上露出了窘态，旋即恢复镇静，轻描淡写地说：“那是下面的人偷偷摸摸地干的，上面不知道。”

“现在我告诉你了，你总知道了吧？”杜重石继续噎了他一句，又转了话题：“不用绕圈子说那么多废话了，还是痛痛快快干脆干脆说说蓉光大戏院开追悼会的事儿吧。”

话送到了这一步，张科长也不再绕圈子了，开门见山地问：“听说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是你写的。是吗？”

“不错。那挽联已经被你们抢走了。”

“不是抢，是为了收取你的罪证！”他似乎也有些沉不住气儿了，把“罪证”二字，说得很重。

“行啊，‘罪证’已经到了你们手里，杀人的大权也在你们手里。怎么样？开刀吧！”杜重石没好气地大声噎他。

他忽然又脸色一变，笑嘻嘻地说：“杜大哥，我们不会难为你的。只要你登报声明一下脱离民盟，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

“哈哈！”杜重石不由得纵声大笑起来。“我不是民盟盟员，你要我登报声明脱离民盟，开啥子玩笑喔！这样的声明登出去，别人不说我是神经病啊！”

尽管杜重石再三申明自己不是民盟盟员，但是张科长却像看见过名单似的，死死咬住了不放，还以老相识的关系，出于友好的诚意，一再说明此事关系重大，要他好好儿考虑考虑。一直纠缠了一个多钟头，杜重石不改口，他也不松口。最后，他只得让警察来把杜重石押回牢房，除当面吩咐“对杜先生要客气些，不要上手铐”，以示“优待”之外，还亲自送到办公室门口，亲切地拍着杜重石的肩膀“善意”相劝：“登报的事，你真的要好好儿考虑考虑呀！”

杜重石当然懂得他的“善意”中所包藏的用心是什么，因此也不会去“考虑考虑”，他每天在牢房里读着《正气歌》，觉得自己为完成中共中央所交待的任务，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虽九死而无悔。奇怪的是，自那以后，拘留所再也没人来提审过他。

三、拘留所重重黑幕

拘留所，说起来虽不是监狱，但性质却和监狱一样，只不过管理上比监狱松一些而已。

当时成都的“省会警察局”，杜重石在那里挂过名，是常出常进的地方。但是所接触的，都是上层人物。例如拘留所所长，尽管见面也点头说话，却从来没有进过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对于牢房里面的黑幕，也是一无所知。这一次“夤缘”能够“深入”牢房里面来一住几十天，能够亲身体会

一下囚徒生活，应该说是他这一生中极为难得的“遭际”。

“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让龙低头”。拘留所里的犯人，是按贫富和社会地位分三流九等的。只要你有钱，或者你与某个官僚或社团有些瓜葛，能给牢头狱卒们带来些许好处，你即便进了牢房，仍能得到格外的照顾。杜重石一进拘留所大门，如果不是徐中齐特地派人来“打招呼”，他已经受到了所长的特殊关照，可以舒舒服服地住在警长的小房间里，躺在干干净净的床铺上，等待着官司的结束。有道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徐中齐的一句话，所长不敢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于是杜重石只好“跻身”于众囚犯之中了。

当时四川的社会，特别是下层社会，袍哥势力很大。杜重石一进牢房，就体会到了这种势力的存在。他要不是“蜀德社”的“杜大哥”，不但得不到众囚犯的尊敬与睡栅栏门旁边的优待，只怕早已经“龙入浅滩被虾戏”，饱享老拳与羞辱了。

尽管四川政府当时明面上也是禁赌禁娼严禁鸦片的，但是街面上到处是赌场娼寮烟馆，有公开的，由武装警察保护；也有半公开的，由黑社会势力保护。甚至进了拘留所牢房，只要你肯给钱，狱卒们就会“行个方便”，替你吧烟具运进牢房里来，居然半遮半掩地在牢房里面“开灯”。杜重石在张科长面前说的话，就是他的亲眼所见，并不是信口开河随意发挥的。

前面说过，拘留所里分男女两个大牢房，男牢房靠外面，女牢房靠里面，所有女犯进出拘留所，都必须经过男牢房门口。当时关进女牢房的“女犯”，除了少数刑事罪犯之外，大都是没上“花捐”或不肯到警察局指定医院检验性病的暗娼。她们即便是进了牢房，也依旧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走起路来扭扭捏捏，说起话来嗲声嗲气，不用别人指点，一看就可以知道她们的身份。奇怪的是，这些暗娼，大都在傍晚时分放出去。开头几天，杜重石只以为她们是拘留期满放出去的，有一次拘留所放暗娼的时候，他正好站在栅栏门内，偶然与一个暗娼打了个照面。那粉头见杜重石注视她，都已经走过去好几步了，又扭回脖子来冲他嫣然一笑，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来，带钩儿的眼睛里，却有三分哀怨七分愁。尽管这个暗娼并不是什么美女，但这“回眸一笑”，这“梨颊生涡”，这“临去那秋波一转”，却给杜重石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第二天一早，只见这个暗娼脑袋上包着围巾，打着呵欠，又被押进了女牢房，杜重石心里纳闷儿：怎么放出去才一个晚上，又“犯事儿”进来了？

当天晚上，又一批暗娼被“放”了出去，杜重石为好奇心所驱使，特别注意了一下，只见昨晚“放”出今早回来的那个暗娼竟也在里面。为此他更加纳闷儿了，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文章？次日一早，等那批暗娼再度返回拘留所的时候，他特别注意了一下，只见那个“梨涡”，果然也在里面！

这样奇怪的事情，杜重石百思而不得其解，就去问张五、李六两人。他们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多“杜大哥久闯江湖，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原来，警察局与社会黑势力是一家，小偷儿、流氓、妓女等等依附于黑社会而生存的行当，也必须依靠警察局的庇护，才能开张。因此，黑社会和警察局都特别恼火那些“不归王化”的暗娼们。先是穿便衣的打上门去索取“保护费”，如果仍不满足，就由穿制服的以“妨碍风化”罪把她们抓进警察局里来。她们是靠出卖皮肉色相维持一家生计的，关进了拘留所，不等于断了她们的生路吗？于是就有先进来的同行们教给她们继续挣钱的法子：与狱卒们合作，每晚由狱卒们带出牢外“做生意”，一早仍由狱卒们带回来，

只要赶得上早晨放风点名就行。所得夜度资，一般是与狱卒对开拆账，姿色好、收入高的，也可以按四六甚至三七成分账，由暗娼得六成或七成。当然，暗娼私下里还要给具体经办的狱卒们一些钱，她们的行话叫做“小开支”，方才不会受到刁难，不然，只怕连拘留所的大门也出不去。

当暗娼的，大都好吃懒做，不是抽鸦片，就是抽白面儿。关进了牢房，当然只能吃糙米饭、喝白菜汤，也不能过烟瘾。不过这都是对那些“死脑筋”暗娼而言，只要活动活动心眼儿，就又什么都有了。她们想吃什么，只要肯拿出钱来，一样可以买到，包括烟膏、白面儿在内，而且价格并不比外面的贵，只是在质和量上有些差异罢了。

犯人不论男女，要想吃好的，都可以托“勤务警”到外面去买，但要塞给勤务警小量的“跑腿钱”。比如一碗肉丝面，市价是一块五角，请勤务警去买，就得给他三块钱，至少也得两块五。其中一块或一块五，就是他的了。再少，人家就会叫你等等，或干脆答复你“没工夫”。至于端来的面，肉丝可能比市面上的要少一半儿，而面条则可能少三分之一。充其量最多值一块钱。因为勤务警去买面的店家是固定的，他们与狱卒都有默契，价格特别优惠。这“优惠”下来的钱，当然也进了狱卒们的腰包了，不过凡是出得起钱在牢房里“叫馆子”的人，一者饭量都不太大，二者也不在乎这几个钱。实在吃不饱，还可以叫“双份儿”嘛！

有钱的犯人，不但可以在牢房里喝酒、吃肉、抽鸦片，色劲儿上来了，找个妓女来春风一度，都是做得到的。反正关进来的暗娼们也要出去做生意，只要找间空屋子把男女犯人锁在一起，不出大门，就把钱挣到手了。

犯人家属给犯人送东西，特别是送吃的，也是狱卒们敲诈的好机会。例如送进罐头食品，他可以说看不见里面装的是什么，硬是要一筒筒都打开来看过才可以收。送罐头的目的，无非为了可以长期保存，如果都打开来看过，那还能保存吗？如果送的是盒装糕点呢，尽管明明看得见，他却坚持要拿去请法医检验过以后才肯收。这时候，聪明的或懂得牢中“规矩”的犯人家属，就应该塞黑钱，请求行个方便了。

以上所说“黑幕”，还只限于被囚犯人能够看得见的下层狱卒们“做手脚”赚钱，至于上层的狱官们如何买放真凶、如何掉包、如何代替仇家下手暗害等等，则都还不在于其内。

四、“取保释放”真相

杜重石被关进了拘留所，他在外面的朋友们，当然要四处活动，以求尽早释放。

大约被关了一个月左右，拘留所所长悄悄儿对他说：“徐局长看在川军将领们的情份上，已经准许你取保释放了。”果然，没过几天，徐中齐带着王介中亲自到拘留所来宣布释放，还特地从成都著名的“长美轩”酒家叫来一桌丰盛的酒席，设在所长办公室内，说是给杜重石出狱“冲喜”。尽管逮捕杜重石是徐中齐下的令，是王介中派人具体执行的，但是他们两人都没在逮捕现场露面，于是在酒席宴上，他们居然有脸以“局外人”加“援救者”的身份出现，说一些“都是同山兄弟，凶吉自当相救”以及“削绝大义，神入共戮”等等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对杜重石来说，反正今天是你放我，是你订了酒菜来请我，不吃白不吃，何况吃了一个多月的囚粮，早已经“嘴

里淡出鸟来”，见了酒肉，也不客气，吃了个酒足饭饱，一抹嘴巴一抱拳，说了声“后会有期”，就飘然出了拘留所大门。

杜重石回家以后，民盟成都分部的三四位负责人在范朴斋家里举行一个小型茶话会，庆祝他平安出狱。通过这个茶话会，杜重石方才得知，这次释放出狱，并不如徐中齐说的那样，是因为川康将领彭光汉、陈兰亭、黄瑾怀等人递了保状，徐中齐买他们一个面子，只要他们保证杜重石出狱以后离开成都，他这里立刻放人。他所说的，都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则是民盟中央的力量。

杜重石通过那个青年值班警察的手，把一张写有“我因追悼李、闻的事被拘捕”的字条带给了范朴斋。范朴斋拿了字条去找张澜。张澜立即打电报把这件事情通知正在南京的民盟秘书长。民盟秘书长把这事儿提高到“国民党无故逮捕民盟盟员，说明国民党无视民主，因此民盟拒绝参加国大”的高度，向正在筹备召开“国大”的吴铁城、雷震提出抗议。当时民盟在各民主党派中实力和影响都比较大，吴铁城、雷震正在极力讨好民盟，拉拢民盟参加“国大”以装点国民党还政于民、实行宪政的门面，他们接到这样的抗议书以后，立即向民盟秘书长表示：除了急电徐中齐立刻放人之外，还要请国民政府对徐中齐的冒失行动进行惩处。

徐中齐得到中央立刻放人的急电，这才做了个空头人情，不但把释放杜重石的面子卖给了彭、陈、黄三位川康将领，还取得了杜重石释放以后立即离开重庆的保证。此人手段之辣，于此可见一斑。

杜重石出狱后不久，徐中齐果然被调离了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职务。这大概就算是吴铁城他们所说的“惩处”吧。不过这也只是国民党为了向民盟讨好故意装出来的一种“姿态”，等到国民党千方百计拉民盟参加“国大”不成功，“姿态”也就立即转变，把民盟的老对头徐中齐调到重庆市警察局当局长，而且凶相毕露地勒令在重庆的民盟负责人解散民盟组织，以作报复。——这是后话。

第十一章 从地下到地上

杜重石出狱以后，带领《大义周刊》的原班人马，到重庆经营现代书局，专营进步书刊。因发行《挺进报》，现代书局被封，他事先得到内部消息，匆忙出走，得到陆军大学前校长杨杰的掩护，平安到达香港。在失去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他独立作战，参加了李济深领导的民革中央，并接受任务，两次秘密潜入成都，做川康将领的反蒋工作。

1949年12月，杜重石奉周总理的命令到第一野战军，出任贺龙的政治代表，负责联络川康部队，促使二十军军长杨汉烈率部起义。

一、当起书店老板来

杜重石出狱以后，一者因为他的出狱名义上是川康军人彭光汉、陈兰亭、黄瑾怀的保释，而实际上彭、陈等人则是上了徐中齐的大当，答应了“杜重石出狱之后立即离开成都”的条件；二者也由于《大义周刊》已经被查封，所有工作人员，都应该有一个着落。于是经多方面联系，征得了杜桴生的同意，杜重石与《大义周刊》的原班人马，于1947年春一起到达重庆。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沈志远、邓初民、朱蕴山、杨伯凯、郭沫若、徐谈庐、陶行知、翦伯赞等人就曾经想发起、创办一个“新群文化图书公司”，由于缺少具体经办的人手，迟迟没有办成功。正好杜重石等一批人需要转移阵地，于是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他们。第一件工作，就是在重庆开办一个门市部。

正好王晓籁在重庆办的“四海社”宣告结束，杜重石就把他们的社址以80万元法币的价格“顶”了过来。房子是两楼一底，地点在邹容路43号，作为书店门市部，是最理想的地段了。

陆军大学原校长、国民党政府前驻苏联大使杨杰，当时住在上清寺聚星新村7号李挽澜的家里。李挽澜是杜重石侄女的未婚夫。有这样一层关系，杜重石就去拜访杨杰，要请他也来当新群文化图书公司的发起人。

杨杰看了沈志远执笔的“新群文化图书公司创办缘起”和发起人名单以后说：“我是被军统注意的人，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对‘新群’是不利的。再说，发起人中全是些著名的民主人士，也不妥当。最好是利用你的社会关系，把川康将领中的袍哥大爷拉进来作为发起人。这样，既可以冲淡特务对你们的注意，还可以通过他们多征集一些股金。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杜重石接受了杨杰的建议，果然把彭光汉、陈兰亭、黄瑾怀、范绍增、龚渭清和当时住在重庆的袍哥界著名人物石孝先等人都拉进来作“新群文化

杨杰（1888—1949），云南大理人，字耿光，是有国际声誉的军事国防战略家、爱国主义者，也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主义革命。1928年出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1931年调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历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欧洲军事考察团团长、中国特任驻苏联大使等职。晚年与蒋介石的政见逐渐分歧，已经受到蒋介石的严密控制与监视。1949年9月9日，应中共中央毛主席之邀去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途经香港，被蒋介石特务杀害于香港寓所。1950年将骨灰由港运回云南、葬于昆明西山烈士陵园。1982年由民政部追认为烈士。

石孝先——黄埔第四期毕业生，曾出任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武官，是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清阳的儿子。

图书公司”的发起人。加上原来的民主人士，又形成了一锅“大杂烩”。情况和《大义周刊》颇有些相似。

门市部的工作人员，除《大义周刊》的原班人马蔡梦慰、张真民（民盟盟员）、方白萍（共产党员）、李扬波之外，又由杜桴生介绍了三个共产党员进来。一个是吴秋帆（解放后任重庆市委统战部秘书长、副部长），具体负责门面的装修设计；一个是龚思雪，负责去上海与徐伯昕联系请新知书店代印新群文化图书公司出版、发行的《陶行知先生论文集》，并用此书与新知交换包括《资本论》四卷在内的其他进步书刊；一个是陈柏林，在门市部当店员，后被特务逮捕，解放前夕被害于魔窟“渣滓洞”。

“新群”门市部终于装修一新开始正式营业了。书店老板，就是杜重石。书店大门外面贴着海报：“《陶行知先生论文集》已经由本公司出版，日内将在本门市部出售”。前来买书的人很多，其中主要是青年学生。

开张以后三四天，有两个西装笔挺的青年，一进门就问可有《资本论》，店员陈柏林警觉地回答他“没有”。他们又问可有《工人无祖国》，陈柏林回答说：“也没有，连书名都没有听说过。”这两个“顾客”就一唱一和地起哄，一个说：“你们书店是专卖进步书籍的，《资本论》你们没有，《工人无祖国》竟连书名也没听说过，这不是挂羊头买狗肉吗？”另一个就说：“我们是从沙坪坝重庆大学特地跑到你们这里来买书的，你们却这也没有，那也没有，我们来回奔跑，你们要包赔损失！”

从那以后，又发生过几起“顾客”无理取闹的事情。很明显，这是特务分子故意捣乱来了。

杜重石跑去找重庆市警察局刑侦处处长谈云章，先说了有人捣乱的事儿。又把那些袍哥将领彭光汉、陈兰亭、黄瑾怀、范绍增、石孝先等人支付股金的收据存根给他和他下属的刑警大队长看了，这才用袍哥的行话跟他们说：“请你们俩代我向你们的兄弟伙儿拿句言语、拜个上福，大家都是同山堂的弟兄，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不要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作弄自己人。”

这一通袍哥言语，说得谈云章和他的“兄弟伙儿”都笑了起来。刑警队长说：“杜大哥不要误会，全是兄弟伙儿的误解。”谈云章再具体解说“误会”的焦点所在：“共产党在重庆的机关报刊《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前一阵子被‘群众’捣毁，停刊了。如今由‘新群文化图书公司’出版、发行《陶行知先生论文集》，不由人不怀疑是不是‘新华’和‘群众’各取一个字新组织起来的变相组织，你要是不说，我们哪儿知道这个‘新群’是两三年以前就筹备组建了？更不会想到这是陈大哥、范大哥、石大哥他们入股办的公司。话说明白了，就没事啦！”

早在杜重石去动员杨杰当发起人的时候，杨杰就曾提出过：“新群”这个名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是《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改头换面。即便这两家报刊没有被砸，也有可能被认为是这两家报刊的“外围组织”。当时杜重石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以为杨杰也未免过于小心了，完全是多余的顾虑。经此一役，才不得不佩服“姜是老的辣”，杨杰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是敏锐的、中肯的。经与董事会协商，决定把“新群文化公司”改名为“现代书局”。

果然，从此以后，存心来捣乱的“顾客”没有了。

1947年秋季，国民党在全国各地进行大逮捕，不少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

纷纷外逃躲避。由于现代书局有那么多的川军将领兼袍哥大爷入股，等于涂上了一层保护色，加上杜重石的社会关系网络分布面很广，各方面都有朋友，因此有许多逃亡者或直接投奔现代书局，或通过朋友关系辗转介绍来现代书局，把现代书局当成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所”、先后到现代书局躲避的计有：成都《工商导报》的李伯达、四川大学的周戈西、西川书局的张孝先、西川书局德阳分店的冯争先、遂宁师范学校学生潘星海等。

二、冒牌的军事专家

早在1946年，中共重庆市委办的油印地下报纸《挺进报》，在市民中的影响就已经相当大。特别是那年冬季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公布以后，舆论哗然，全国各地报纸包括川康地方报纸对这件事都进行了批评。因为中美两国国力悬殊，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力量到美国去开矿办厂，更没有商船到美国领海、内河自由航行，也很少有工业产品可以出口美国，去享受“最惠国待遇”。签订这样的条约，看起来双方权利、待遇平等，实际上很不平等；名为互利的通商条约，实际上只对美国单方面有利，其实是自欺、欺民的诡计。为此《挺进报》尖锐地指出：“中美商约的实质，是中国单方面对美国开放。名为平等，实为不平等；名为互惠，实为独惠。这不但对我国战后建设不利，且由此丧失了关税自主权。美货源源而来，扼杀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

《挺进报》的这一论点，迅速被重庆市民所接受，街谈巷议，纷纷指责国民党当局举措失当。因此特务机关对《挺进报》也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难的是尽管也发现了一些线索，但是除了抓捕几个持有人、收缴一些报纸之外，对《挺进报》的编辑、印刷机构，始终不能破获。

现代书局虽然有那么多重保护色，但是特务分子从所售书刊的进步性，嗅到了一些味道，怀疑《挺进报》的编辑、印刷与现代书局有关，于是又暗地里派特务盯梢、跟踪可疑的店员和顾客。

实际上，《挺进报》的编辑、印刷，与现代书局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书局当店员的共产党员陈柏林，确实负责一部分发行工作。他经常以送书为名，把《挺进报》分送到各工厂、学校去。不久，陈柏林在分送《挺进报》的途中遭到特务分子的跟踪盯梢而被捕。蔡梦慰觉察到自己处境危险，正准备离开现代书局，但是晚了一步，仍被特务分子发现抓走了。他们两人，在重庆解放前夕同时被害于特务机关的魔窟“渣滓洞”。

陈柏林被捕后的第三天，谈云章紧急通知杜重石：“书局将被查封，你也有被捕危险。”这时候杨杰已经从李挽澜家搬到山洞的陆军大学教育长办公处的私邸，他夫人也从昆明到重庆来与他同住。搬家的时候杨杰与杜重石有约，如果发生紧急事件，如何联系，怎样说话。杜重石急忙通知他，当夜要到他处暂住。

天黑以后，杜重石随身只带一些紧要东西，就独自一人到了山洞杨杰的家。在客厅里，杨杰给他夫人介绍说：“这位是李正平先生，是我特地请来给我整理《国防新论》的。”

没等他夫人多问什么话，杨杰就把杜重石引到客厅对面的一间房间里。

山洞——重庆的一个地名，并不是真的山洞。迁都以后，蒋介石的“官邸”也设在这里。

这里设有书橱、书桌，放着杨杰所著《国防新论》的原稿和一些军事方面的参考书，还铺有现成的床铺。杨杰压低了嗓子轻轻地说：“很少有人到这里来，你放心住下就是。我对家里人说，你是研究军事学的专家，是来替我整理《国防新论》一稿的。这样，免得‘特殊客人’来看我的时候引起麻烦。”

杨杰当时已经将近 60 岁，他的夫人是续弦，年轻而漂亮。传说在他的原配夫人故去以后，蒋介石巧妙地通过曲折的关系，把一个女特务介绍给他，专门负责在家里对他的监视。看起来，杨杰对他的夫人已经有所警觉，所以在他夫人面前，也不说出杜重石的真实姓名和来历。

从此，杜重石就以整理稿子为名，足不出户，倒认真地读起书来了。每天晚饭以后，常和杨杰一起到宅外的小丛林中散步、闲谈。杜重石虽然并不真的替他整理《国防新论》，不过他有时候也说一些自己对这一主题的看法：

“《国防新论》，着重于一个‘新’字。我们必须抛弃狭隘的、已经过时的军事观念。古战场上，单枪匹马就可以冲锋破阵：关云长凭他手上的一把青龙偃月刀，就能够过五关斩六将；赵子龙凭一支长矛，就可以在长板坡战场的千军万马中三进三出。这些史料，现在早已经送进博物馆了。共产党人小米加步枪的人海战术曾经在抗日战争中取得过不朽的战绩，但很快也要被淘汰了。在二次大战中起过很大作用的飞机、大炮、坦克，二战结束以后，也会因为科技的日新月异而需要重新设计改进。原子弹就是把最新的科技成果用于军事的实际例子。我们不能坐在空中霸王号飞机里做着小米加步枪的旧梦。沾沾自喜于过去所取得的胜利，是将来国防中最危险的思想。”用今天的眼光看来，他的“以发展眼光看问题”，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

有一次，杜重石故意说：“蒋介石对政治影响比较大的政见异己者，采取的手法是很多的。有时候还通过曲折复杂的关系，把女特务介绍给政见异己者，名为‘夫人’，其实是‘坐探’。因为蒋介石也知道，最坚固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嘛！”

他微微一笑说：“这不是什么新花样，是戴笠从希特勒的特务头子希姆莱那里学来的美人计。”

从他说话的语气，从他对夫人不说实话的警惕性，可以证明他对自己的夫人是军统特务这一传说也是有所觉察的。

这时候，蒋介石在内战中节节失利，为了稳定后方政局，对四川的人事作了一些调整。头一个，就是以一贯反共的王陵基取代邓锡侯，并调再三向他表示忠心的杨森为重庆市市长。邓锡侯的下台，有两方面原因：第一，邓锡侯曾经支持桂系的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第二，蒋介石急于要军粮用于打内战，于 1948 年初命令粮食部长俞飞鹏到成都叫邓锡侯速征军粮 10 万担。邓锡侯说：“川粮川人要吃，还有这么多的中央军驻在四川也要吃。”很明显，这是不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这期间杨森到了重庆，夏炯通过各种关系得知杜重石在杨杰家避难，就借故到山洞来看望杜重石，并带来一个消息，谈云章主办的《新华时报》上发了一条消息：《政治难民杜重石逃避山洞某公馆》。尽管报上没说明是哪个公馆，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杨公馆，要杜重石早做准备。

夏炯走了以后，杨杰对杜重石说：“夏炯认为这是谈云章有意在他办的

空中霸王号——二战后美国生产的最新型民航机，能乘坐 58 个人。这种当时的“空中霸王”，现在看来，只能算是“小型客机”了。

报上向你透个风，卖你一个交情。要是他真要对你下手，没有必要先露这个消息。我同意他这个看法。不过行辕二处的徐远举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新上任的警察局长徐中齐又是你的老对头。尽管他们都知道你和杨森的关系，可目前是‘勘乱’时期，只要他们说你是共产党，连杨森、夏炯也无能为力的，我看，三十六计走为上，先到香港再说。”

按照杜重石的想法，凡是做地下工作的，在白区暴露了身份，呆不下去了，一般都是撤回解放区。但是这一次事出突然，与杜桴生又一直联系不上，不知道上级组织的意见如何。他想回广安老家，到华蓥山地区发动民众武装，而杨杰则说：搞民众武装，非杜重石所长，再说，他已经决定派李挽澜回广安、岳池，组织华蓥山地区的武装斗争了。做地下工作的人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时候，往往需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杜重石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听从杨杰的安排。

但是当时从重庆去香港只能坐飞机，而飞机场是严密控制在军统特务手里的。走水路、陆路先到别的城市再转飞机虽然也可以，但是费时旷日，再说，水陆码头一样也有特务，只能相机行动。为防止出意外，杨杰先把杜重石秘密转移到石家花园隐蔽起来，然后打通万国银行总经理张裕良的关系，趁张裕良要到香港去的机会，托他买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再经过化装，打扮成他的随从模样，总算躲过了特务分子的眼睛，杜重石于1948年初夏平安到达香港。

三、民革中央特派员

杜重石到了香港，暂时住在铜锣湾姨妹夫姚振华家。然后按照杨杰的安排，首先去见朱蕴山和邓初民，汇报了现代书局出事的原因和杨杰如何掩护他逃离重庆的经过，同时说起自己本打算到华蓥山或老解放区工作，但是杨杰认为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非其所长，因此只好先到香港，看情况再决定行止。

朱蕴山沉思良久，这才说：“杨杰的话不错。白区的工作，实际上比解放区更其重要。根据你的社会关系和工作能力，我看最好是回到成都去筹建民革川康分会的地下组织，策反川康军人起义。”

于是他们两人把民革的组织情况向杜重石作了介绍：

早在1943年，一部分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酝酿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秋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另一部分酝酿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1946年春在广州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两会都分别制定了政治纲领和章程，选出了领导人员，组成了领导机构。两会都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1947年，民联、民促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民主分子先后到达香港。考虑到两会的宗旨完全相同，为了更加团结一致，发挥更强的战斗力，开始酝酿两会的合并。11月，以两会为基础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1948年1月1日，大会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蔡廷锴、李章达、陈其瑗、陈劭先、王葆真、朱蕴山、朱学范、郭春涛、李民欣、张文、何公敢、邓初民等人被选入中央领导机构。

民革从酝酿到成立，始终坚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赞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明确提出民革的宗旨是“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

当时的民革总部设在香港，在大陆设有若干个分会。川康分会的工作虽然十分重要，但是缺乏适当的人选，以致迟迟没有成立。这次杜重石不期而至，朱蕴山和邓初民都觉得他是最适当的人选，所以极力动员他去。

杜重石作为军政从业人员，对于民革的情况，虽说不是了如指掌，至少也是有所耳闻的，从所列的中央委员名单看，也确实都是比较激进的民主人士，何况这些人大都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可以看作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参与民革工作，仍没有离开“统战”这个圈子。只是自己刚刚从四川逃出，再次入川，危险很大。于是笑笑说：“我好不容易逃出了虎口，难道要我再入虎穴不成？那可是要冒出生入死的危险的呀！”

邓初民认真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干革命总是要冒一定危险的。再说，成都方面，除了你去之外，一时还没有更适当的人选。成都的政局现在基本上控制在川军手中，与重庆还是有所区别的。估计危险虽有，却不会太大。”

杜重石仔细想想，这话也不错。多少革命先烈，为了自由民主，抛头颅，洒热血，虽九死而无悔，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难道因为前途危险就踟蹰不前、望而却步吗？这样一想，立刻挺起胸膛，豪爽地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只要工作需要，我明天就可以去成都。”

朱蕴山和邓初民对杜重石这种不怕艰险的大无畏精神十分嘉许，当即陪同他一起去拜访了民革主席李济深。

李济深，也作李济琛，广西苍梧人，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1925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1933年，曾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事败后下野，住在香港，过着清苦的生活。李济深子女众多，家教极严，生活朴素。抗战期间，众子女都送回苍梧大坡山乡的一家店铺里寄住，过着吃糙米饭、喝野菜汤的艰苦生活。杜重石到李济深家的时候，他的子女刚从苍梧回来。后来继承他出任民革中央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的“老九”李佩瑶，这时候刚15岁，正在香港培侨中学上初中。

杜重石和朱蕴山、邓初民到了李济深家，民革中央负责军事方面的蔡廷锴正好也在座。杜重石再次说了四川方面的情况以及自己这次出逃的原因与经过；朱、邓二人介绍了杜重石的历史以及与杨森之间的从属关系和政治背景，提出让他去四川筹建民革川康分会的建议。李济深虽然对杜重石不大了解，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仓促会见，但仍对他十分信任，不但当即同意他去成都筹建民革川康分会，而且还让他筹建民革川康军委会，策动川康军队反蒋起义。他明确指出：“刘文辉和蒋介石明争暗斗了多年，在川康地方能够起到先锋作用。策反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他的身上。”

朱蕴山补充说：“刘文辉和中共中央早就有联系，一直赞同中共的政治主张，蒋介石掀起多次反共高潮，他都没有动摇过。这一回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他对于共产党是否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好像有些怀疑动摇了。我和初民过去协助他办的《唯民周刊》和《大学月刊》，现在也销声匿迹了。他好像一个‘寒暑表’，遇上了寒流，温度就会下降的。”

邓初民说：“现在情况又有变化，共产党已经从战略撤退转为全面进攻，

寒流过去，气温上升，他这个‘寒暑表’，温度也已经上升了。这时候去劝说川康军人起义反蒋，正是时候。”

事情谈妥以后，朱蕴山说：“在香港，还有几位民革的同志。你是不是都见一下？”

杜重石说，“见当然是要见的。不过有劳你们二位陪我逐一拜访，既费时，也费力。为了节省时间，不如大家在一起聚会一次，不就都见到了吗？我现在暂住铜锣湾我姨妹夫姚振华家，后天就是星期日，我在姨妹夫家设一席，请把要见的人都请到我姨妹夫家。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你们二位最好先到一步，怎么样？”

朱蕴山说：“这样也好，倒省却许多时间，也免得我们奔波了。我和初民一定先到，好给你介绍。”

当即记下了时间、地点，分头去准备。

到了星期天，朱蕴山和邓初民上午 10 点就到了，在等待来客的空闲时间中，邓初民说：“民革刚刚成立的时候，英国上下两院、美国参众两院，都发来了贺电，祝民革在国共两党之外成为第三种政治力量。有一位刚从美国来香港的人，认为英美两国的议会发来贺电，说明民革在国际上受到了重视，还真想抓住这个机会，使民革在中国成为第三种政治力量。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在中国与英美议院遥相呼应。他鼓吹：要扶植一批自由主义民主分子组织新政治团体，走第三条路线。在这样的政局下，毛泽东在庆祝‘五一’劳动节讲话的时候发出邀请，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们去参加中共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我们立即给毛泽东发了电报，表示响应和拥护。你不论在香港还是到了成都，都要当心不要受这种鼓吹的影响。到了今天，还在鼓吹走第三条政治路线，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随后，民革在港主要人员陆续到来，计有：梅龚彬、许宝驹、陈汝棠、谭平山、吴茂荪共五人。经过交换意见，他们一致同意民革中央委任杜重石为“民革西南工作区中央特派员”，并与许宝驹约好以“破格通信法”作为互相联系的密码，杜重石则仍用杨杰给他起的化名李正平作为联络代号。

四、策动川军将领反蒋

1948 年仲夏，杜重石由香港飞到上海，住大西路 42 号未婚妻家。

早在 1946 年春，杜重石经人介绍，认识了比他小五岁的仇素蓉小姐，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即宣布订婚。仇小姐是南方人，订婚之后，即返沪探望老母。原计划过一段时间即来成都完婚，但是接着杜重石因悼念闻一多、李公朴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又去重庆开书店，刚刚有些起色，又因为《挺进报》出事而到香港。两年多来，可以说一直没有一段平静的日子，因此把他们早就应该办的婚事也耽误了。

这一次杜重石从香港来沪，丈母娘考虑到女婿已经 35 岁，女儿也已经三十挂零，不能再拖了。如果再想等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不知道要等到哪年哪月。于是干脆因陋就简，在永安公司“七重天酒家”匆匆举行了婚礼。参加婚宴的，只有最亲近的几个亲友。

虽然新婚燕尔，甜蜜温馨，但是任务紧急，耽搁不得。杜重石婚后不久，即由夫人设法买到机票，经过化装，贴上假胡须，打扮成一个“驼背老者”，乘中航公司的客机飞抵成都。

下了飞机，到机场来迎接他的吴梦三都不认识他了，直到他走到吴梦三的身旁，轻轻地叫他，方才醒悟过来。两人握手大笑。当即同乘川康绥靖公署副官长黄瑾怀派来的汽车到了黄家。夜间匆匆叙述了重庆、香港两地的情况以及此次化装来蓉的任务，首先得到了黄瑾怀的支持，第二天一早仍由黄瑾怀派专车把杜重石送到雅安，与刘文辉见面。

杜重石把李济深的亲笔密信取出，交给了刘文辉。信上只有简简单单的两行字：“一切都好。详由李正平面达。请与李慰谈切商。”然后介绍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和政治背景：西北战场胡宗南部队已经大部分被歼灭；中原战场洛阳已经解放；民革在香港成立的时候，英美议院都发来了贺电；毛泽东“五一”节讲话邀请各民主党派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在港民主党派的响应等等。最后切入主题，民革中央希望刘文辉负责筹建民革川康分会和民主联军川康军委会两个地下组织。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刘文辉对于筹建两个地下组织都表示赞成，但是事关重大，不能由他一个人作出决定，更不能单独行动，必须去成都与邓锡侯、潘文华商量。

过了两天，杜重石与刘文辉先后到了成都。为确保安全和便于行动，刘文辉把杜重石安排在他的警卫大队长王瑞臣家里住宿。

这以后，通过刘文辉的安排，与邓锡侯、潘文华等人进行了秘密商谈，随后即在王瑞臣家成立了民革川康分会和民革川康军委会两个地下组织，由刘文辉化名杨宗文为主任委员，李宗煌化名华正国为副主任委员，王白为秘书长。此外，还有黄瑾怀、吴梦三、汪载涛、王蕴滋、张平江、聂丕承、徐则林等人为委员，大家分头进行活动。

杜重石还带有李济深给杨光的亲笔信一封，由于他既不能亲自去重庆面交，又不能付邮邮寄，只好打电报给接受杨杰指示去川北华蓥山开展武装斗争的李挽澜，让他到成都来把信取走再转交给杨杰。

时光过去了半个世纪，李济深的这封亲笔信虽经辗转流传，至今基本上保存完好，为杜重石的政治活动，也为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作了见证。全文如下：

耿光志兄勋鉴：

重石同志来港，俱悉吾兄领导川康各地组织，并发动民众武装工作，艰苦奋斗，极佩贤劳。本会成立以来，因交通关系，对于西南内地宣传甚感不便，实际情形亦多隔膜。兹据重石同志报告，特嘱其回川面陈一切。并经本会决议，特派重石同志等筹备分会。伏希吾兄负责指导进行。是所至禱。草此顺颂筹祺。

弟济深（章）

民革川康两分会地下组织成立，杜重石任务完成，即于1948年秋返回香港。行前刘文辉拿出五两黄金来，托他转交邓初民、龚梅彬两人。因为他俩在九龙一个什么学院教书，收入不高，生活清苦，而活动既广且多，开支入不敷出，有捉襟见肘之叹。

到了香港，先去吴茂荪家，得知姚振华夫妇已经去了美国，铜锣湾寓所的家具送给了吴茂荪，还留下一张2000港元的汇丰银行支票给杜重石作为到港后的费用。姻亲之间，照顾得可谓相当周到。

杜重石向李济深、蔡廷楷汇报川康民革分会和军委会成立的经过及领导入选后，于1949年春二次潜入成都，主要完成如下三项任务：（一）将民革

中央给川康分会主要负责人的任命书和川康地区工作纲要交给刘文辉。(二)介绍国内政局：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部解放，傅作义起义，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向蒋介石提出八项和平条件，等等。(三)根据民革中央的工作纲要，与刘文辉具体商定民革川康分会的工作重点，是在国民党的各机关法团及工商企业、厂矿、仓库的各级各层工作人员中开展策反工作，迎接解放，要他们在各自所在单位尽力设法保护各类物资和档案资料，严防特务破坏。

4月底，南京已经解放，上海市被解放军包围，即将开始上海战役。杜重石在交通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由刘文辉掩护，几经波折，于5月初第三次到达香港，中山先生的原私人医生陈汝棠，当时在香港开业行医，他开设的诊所，是民革中央在港临时联络点。杜重石从陈先生处得知，所有民革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已经去了北平。杜重石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北平，向李济深汇报了此次去成都与刘文辉商定如何配合解放大军迎接解放的工作重点。

到了北平方才得知，在北平召开的民革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上，杜重石已经当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了。

杜重石的这一段经历，长话短说，只有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可实际做起来，有多么困难，要冒多大的危险，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恐怕很难想象！

几经周折，杜重石总算又回到了党的身边。自从在杨杰的掩护下逃离重庆，他就与党失去了联系。但是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与觉悟，他在没有上级党领导的前提下，继续为党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如今既然已经回到了党的身边，怎么能不与党取得联系、把失去的关系接上呢？

他找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交际处处长金城，向他汇报了离开延安以后近10年来所做统战工作的情况。金城既是他的老朋友，也是他在延安时期的“革命领路人”，曾经以“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名言指引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如今事隔10年，两人相见，倍感亲切。

如今杜重石既是共产党员，又是民革成员，还是民盟成员。但是他的党员身份至今没有公开，金城只能以“民革中央高级领导人”的身份把他安排在六国饭店，即现在北京饭店西楼住宿。这在当时的北平，就算是最高级的宾馆了。

与杜重石同住六国饭店的，还有民革浙江分会的代表黄云山 和杨啸天。

不久，杜重石得到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通知，贺龙的第一野战军即将由陕入川解放大西南，周恩来命令杜重石尽快到成都去与刘文辉商定川康地方如何配合一野争取和平解放大西南的具体计划，最迟9月下旬必须起程。周副主席给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还相当危险。但是在这全国即将解放的关键时刻，能否策反川康地方和平解放，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得失，必须不畏艰难险阻，尽一切努力去胜利完成。

这时候民革中央正计划在11月间召开民革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杜重石计算了一下时间，从北平经香港到成都，再由成都经香港到北平，即便旅途一切顺利、也难于在40天内打一个来回。何况香港与成都间的航班越来越紧张，特务的监视也越来越严密，不一定哪个环节上出一点儿小小的问题，就会导致难于设想的结果。估计出席二次全会已经不可能，杜重石把自己的意见以《把革命进行到底》为题写了一个提案，又自己出钱印刷，然后交大会

黄云山——黄埔第四期毕业生，民革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解放后曾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秘书处分发与会代表，就匆匆出发了。

杜重石克服重重阻力，通过层层关卡，终于在1949年10月初平安到达成都，依旧住在王瑞臣家里，与刘文辉具体磋商地方部队如何配合解放军的具体细节。这一回，杜重石代表的不单单是民革中央，而是兼有传达周总理的意见在内。

这期间，北京在10月1日举行了开国大典，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进军大西南的号角也已经吹响。一野部队从陕南翻越米仓山秦岭入川，二野三兵团部队从湖北、湖南溯长江入川，二野四兵团部队由四野部队配合，从广西渡南盘江、谷拉河进入贵州、云南。军队进展顺利，解放形势一片大好。

一天深夜，刘文辉突然来到王瑞臣家对杜重石说：“昨天下午，徐远举突然到我家问我：‘杜重石到成都了，住在哪里？’我说：‘我连这个人的姓名都没听说过，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看来，行辕二处一定已经得到你来成都的情报，而且很可能知道你来成都与我有关。不然，徐远举不可能从重庆专门跑到成都来找我问这件事。”

杜重石说：“徐远举跑到你家去问你关于我的下落，正说明他还不知道你和我有联系。他当了那么多年的特务，懂得‘打草惊蛇’的道理，不会那么客气地来通知你我早做防备的。听说王白与和李宗煌在重庆被捕，就是有特务混进了民联组织，才出事儿的。要吸取这个经验教训，从肃清内部入手……”

刘文辉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不是讨论情报来源和防止泄密的时候。这些问题我们会认真探讨的。现在最主要的是你的安全问题。还是那句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反正咱们商量的事情已经差不多，现在时机紧迫，你赶快离开成都，以免夜长梦多，迟则生变。”

杜重石当即拟了一份“李病危回家休养”的电文，交刘文辉送到雅安的秘密电台，发往中共中央。

刘文辉再三叮咛王瑞臣，在杜重石离蓉之前，必须确保其人身安全，还要他严嘱家人，如果有人问起杜重石或李正平，就说不知道。

五、二十军金堂起义

杜重石第三次离开成都，是在处境十分危险下的冒死一搏。刘文辉也确实已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当时成都的军政大权虽然基本上掌握在邓锡侯和潘文华的手中，但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是个反共老手，成都也驻有蒋介石的行辕，还有无孔不入的大小特务分别把守水陆空进出口。何况特务头目“保密局西南特区主任”徐远举就专门驻在成都单抓杜重石。如果化装得不太好，一旦被特务分子认了出来，他就不用再想回北京了。

总算各方面都配合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杜重石终于顺利飞离成都到达香港，再坐海轮于1949年11月下旬平安回到北京。船在天津码头一靠岸，李克农派来迎接他的徐淡庐已经在码头上等候他多时。只是民革的二次全代会已经开过，赶不上了。

12月中旬，周总理设宴招待杜重石。这时候贵阳、重庆都已经解放，成都还在相持之中。宴会上，周总理举杯对杜重石说：“刘、邓、潘的起义通电，中央已经收到。不过现在还不能公布。胡宗南在川西的部队尽管打不过解放军，吃掉刘、邓、潘的力量还是有的。打起来，会影响和平解放大西南

的整个计划。你现在去西安，随一野部队进军成都，负责联络川康部队和协助接收，今天就算给你饯行吧！”

当夜，李克农和徐淡庐两人一起到杜重石的住处来，把周总理的话再复述了一遍，又拿出一封由总理签署的给贺龙的介绍信来，要他立即做好去西安的准备。

这时候从北京到西安的火车已经恢复全线通车。杜重石到达西安，与一野司令贺龙、政委李井泉见了面。三人商定，由杜重石作为贺龙的政治代表，负责联络川康部队。当即派第十八兵团敌工部部长刘玉衡作为杜重石的随员，同乘一辆吉普车赶到成都前线。

12月25日黄昏时分，杜重石和刘玉衡的吉普车开到了成都东北金堂县的赵家渡附近，与一野十八兵团六十三军军长刘忠联系上。刘军长说：“这里就是最前线了。对面的敌军是二十军，军长是杨汉烈。”杜重石说：“杨汉烈是杨森的儿子，我与他私交还不错，我立刻设法与他联系，希望他审时度势，率部起义。”

杜重石决定亲自去见杨汉烈。刘军长不放心，派军部侦察参谋陪同杜重石一起出发，以便随机应变。时间紧迫，必须趁天色没有断黑，目标明显，让对方哨兵看清楚，才能避免误会，平安地穿过火线。两人换了便衣，来不及吃晚饭了，怀里揣上两个馒头，就骑马匆匆出发，往二十军的驻地闯去。

两军对垒，在火线上来往，危险性当然是很大的。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这种关键时刻，个人的安危，只能置诸脑后了。

幸亏骑马目标明显，二十军的前沿哨兵没有鲁莽开枪，问明了身份，立即带他们两人到军部会见杨汉烈。

杨汉烈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点见到已经是“贺龙政治代表”身份的杜重石，真是又惊又喜。杜重石见到杨汉烈，来不及多叙离情，只将新中国建立、蒋介石大势已去的政局及川康地方部队大都已经通电起义的情况略作说明，希望他认清形势，以数万生灵和自己的前途为重，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应该及早率部起义。杨汉烈也来不及说更多的话，只说早有此意，正打算派人联络，没想到杜重石从天而降，真是天从人愿，立即表示愿意率部阵前起义。

杜重石说：既然如此，此事宜早不宜迟，建议杨汉烈当夜就到六十三军军部去与刘军长面谈。杨汉烈不再犹豫，当即打发一名参谋持杨汉烈军令与杜重石带来的侦察参谋先期快马返回六十三军军部，杜重石与杨汉烈小作安排，随后就到。

杜重石和杨汉烈到达六十三军军部的时候，已经过了夜半，正确地说，已经是12月26日的凌晨了。有参谋事先到达，刘军长还在军部坐等。但由于时间实在太晚，刘军长与杨汉烈两人只是匆匆一面，双方各表诚意，就送杨汉烈和先到的参谋一起到小客栈安歇。为欢迎杨汉烈率部起义，投入人民怀抱，祝贺他的正义行动，刘军长与杨汉烈约定：第二天早晨设宴招待后，再具体商谈起义细节。

那天正好是圣诞节，在西方国家一定热闹非常，但是杜重石经过一天又半夜的奔波劳碌，已经十分疲乏，本想再与汉烈一叙离情，可是实在太困了，也就草草入睡，只待第二天在宴会上再仔细交谈。

第二天上午，到客栈去请汉烈赴宴的通讯员回来说：“杨军长昨天夜里刚到客栈，他们部队就有人找上门来。杨军长他们也没住宿，当时就急急忙

忙地与来人一起走了。留下话说：‘有紧急事情要赶回部队，不能共进早餐了，请刘军长原谅。’”

这一突然变化，颇使大家惊讶，生怕起义事又有变化。急忙派人到二十军继续联系，方才得知杨汉烈所部一三四师师长萧传伦反对起义，企图经松潘进入西康、云南去打游击，已经把部队拖到温江，所以杨汉烈不得不连夜赶到温江去处理这件事情。好在副军长范廷生已经奉命做好了整编的准备，12月26日，二十军终于正式宣布光荣起义，暂时在原地驻扎，等待整编。

成都方面的情况：

12月25日，川康军人起义的通电公布，由王缙绪出面在成都蜀一电影院召开各界各人民团体会议，宣布成都和平解放。

12月30日，举行解放军入城式：贺龙将军率领部队进入成都市。刘文辉、邓锡侯、王缙绪、潘文华、黄隐、严啸虎等川康地方领导人都到北门外天回镇欢迎。

12月31日，杜重石陪同二十军军长杨汉烈和副军长范廷生向贺龙汇报二十军起义的经过，方才知杜重石离渝之后杨森及二十军的一些情况。

1948年11月下旬，蒋介石电调整编后暂驻鄂西的二十军到津浦线参加淮海战役作战。不料参加淮海战役的国民党部队，一个兵团一个兵团地全被解放军吃掉。这时候二十军军长名义上是由杨森的侄孙辈杨干才担任，实际上一切全都听命于杨森。杨森怕二十军也在淮海战役中被歼，向白崇禧报告部队不愿东调。白崇禧正等着蒋介石把老本儿输光，他的桂系好趁机上台，也不同意二十军东调。一直拖到1949年1月2日，二十军才在蒋介石的严命下东运南京浦口转到蚌埠。

1月7日上午，二十军由蚌埠出发前往淮海战场。一三四师师长李介立率部队刚刚走出十几里地，迎面碰见第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璉。他穿着便衣，乘一辆牛车，向蚌埠逃来，他看见李介立，忙问：“你带部队到哪里去？”李介立回答：“参加淮海战役作战。”胡璉说：“赶紧下令停止前进吧！你看我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整个战场上，咱们的部队都完蛋了！我是换了便衣才跑出来的。”

李介立一看情形不对，一面下令部队停止前进，一面派人把情况报告军长杨干才。1月9日，二十军由蚌埠调驻明光（今嘉山县）。

不久，杨森奉蒋介石的命令到明光来集合官兵讲话，给二十军将士打气。要“二十军在万不得已时决不投降，要效法杨家先人杨继业碰死李陵碑的榜样”。

由于蒋介石在淮海战役中的彻底失败，被迫宣布下野，退到老家奉化溪口进行幕后指挥，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1949年2月15日，二十军奉命调到安徽芜湖，担任芜湖、鲁港、三山街一线长江南岸的防守任务。

4月22日，解放军部队渡过长江，不断登陆，二十军被围，上游安庆、下游江阴都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二十军只得撤退。黄昏时分，二十军大部被歼，团长刘润珊中弹毕命，师长李介立、副师长朱泰安、参谋长吴文光被俘。残部分散后一部分逃回四川，一部分流窜各地。

4月23日，南京解放。

杨森得知二十军全军覆没，非常恼火，即命令由芜湖附近逃回四川的原一三三师师长景嘉谟和由副师长提升为一三四师师长的萧传伦收集残部，在

重庆南岸重新成立第二十军，以景嘉谟暂时代行军长职权。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于7月15日由台湾飞到广州，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恢复他的职权。逃到广州的国民政府也作迁渝准备。8月24日，蒋介石到达重庆。杨森立即把市政府办公楼腾出来作为“总统府”。杨森为了表示他效忠于蒋介石，还把他的一个侄女儿杨汉秀也杀了。

杨汉秀是杨森二弟杨懋修的女儿，一向思想进步。1940年在山西敌后参加八路军。后由朱德批准去延安，改名吴铭，先在八路军总部工作，后参加抗大、鲁艺学习。1946年3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公开成立四川省委，由吴玉章任书记，王维舟任副书记。王维舟提名杨汉秀到重庆做杨森家族的工作，于是，杨汉秀接受党的派遣，与周副主席一同到达重庆。

杨汉秀到达重庆以后，以大小姐的身份住在“渝舍”，并以清理财产为名，到渠县开展工作。后来被跟踪她的特务逮捕，在渠县监狱关了一个多月后转成都四川省特委会监狱。这时候，杨森的八姨太汪德芬出任天府中学校长，她以杨森的名义去找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说四川特委会逮捕杨汉秀是出于敲诈勒索，欺负杨家的孤儿寡母。王陵基也拿不出太多的证据来可以证明杨汉秀有罪，只好同意放人。杨汉秀出狱后，回农村继续发动武装斗争，再次被捕，关在重庆“白公馆”。杨森迫于情面，把她保释出来就医，一直住在“渝舍”。

1949年9月2日重庆“九二大火”以后，杨森一方面为了推卸罪责，一方面也为了表示自己忠于蒋介石，肯于“大义灭亲”，下令刑侦处长张明远等人直接到他的“渝舍”将杨汉秀逮捕，并在11月23日将她枪杀于歌乐山麓金刚坡的一个废弃碉堡中。

1949年11月，杨森被任命为重庆卫戍总司令，以刘雨卿、杨养域为副总司令。基本部队计有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队长彭斌所率的九个步兵团，宪兵二十四团，范绍增旧部罗君彤的三六一师，二十军的一三三、一三四和七十九师。又划重庆市及附近巴县、江北、涪陵、长寿、南川、武隆、丰都、合川、璧山、铜梁、永川、江津、荣昌、武胜、广安、綦江、大足、北碚等县为“卫戍区”，每县成立一个常备师，统由杨森指挥。杨森这时候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以卫戍总司令的名义大肆招兵买马，成立“反共保民军”五个军，把各县常备师划归“反共保民军”建制之内。又在“军”之上设“路”，一共五路总指挥。要以重庆为中心，以西南为根据地，完成“反共复国”的大业。

这时候，从芜湖等地搜集残部重新整编的二十军，已经由代军长景嘉谟率领，在川东涪陵集结。杨森命令他的儿子杨汉烈为师长，急速到涪陵把部队拉到重庆。

11月14日，蒋介石和蒋经国、毛人凤等人从台湾飞重庆，准备实施破坏、屠杀、潜伏、游击“四大任务”。“爆破专家”杜长城和“东南技术总队”也空运到重庆，目的是破坏兵工厂和水电厂。还打算把拘捕的“政治犯”统统斩尽杀绝。

11月17日解放军二野三、四兵团从川东和黔北进攻重庆。杨森令罗君彤的第三六一师及彭斌的内务部警察第二总队在南岸一带布防；把二十军的

杨汉秀牺牲后，因为“出身”问题，长期得不到烈士的称号。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才由政府正式承认她为烈士，并在她的故乡广安县建立了纪念馆。

一三三、一三四两个师由南岸调回江北，把二十军的七十九师调到涪陵，计划重点防守长江以北一线。几天之后，解放军攻克彭水，溯江而上，一部进逼南温泉，一部解放江津，围攻永川，截断成渝公路，包围了重庆附近最大的军用机场白市驿机场。蒋介石十分惊恐，只得准备放弃重庆，飞逃成都。

这时候，重庆的地下党组织通过杨森的秘书葛覃，了解到杨森对破坏重庆不太积极，估计有争取的可能，就提出四项条件，通过鲜英给杨森做工作，希望他翻然悔悟，戴罪立功。

鲜英打发他的第三个儿子鲜恒到“渝舍”面见杨森，转达了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四项条件：（一）杨森所属部队撤离重庆的时候，保证不破坏山城重庆市区的建筑，不破坏大溪沟电厂，不骚扰抢劫，保证山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二）尽一切努力营救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革命志士。（三）杨森不随蒋介石去台湾，率部起义，共产党解放军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四）在可能情况下活捉蒋介石，为新中国立功。

杨森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他那忽左忽右摇摆不定的特性又一次反复。沉思了好久，这才说：“第一条要求我能办到。我们部队撤离重庆，绝不破坏陪都的市政建设，不骚扰百姓。第二条难于做到。因为中美合作所所关押的政治犯，名义上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徐远举掌管，实际上是蒋介石亲自过问直接掌握的。我管辖下的稽查处根本无权过问。第三条要我率部起义，已经不可能了。要我不去台湾，也不可能。我跟特生不一样。他是民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与共产党合作有功；而我对共产党有过，共军来了饶不了我。我的部队，两个师已经交给喻孟群、杨汉烈指挥。可以遵照特生的嘱咐，在我去台湾以后起义。第四条那就更难办到了。我在重庆市区只有一个团，连我自己早就在特务监视之下，稍有不慎，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鲜恒回去向父亲转述了杨森的话，鲜英带领另一个儿子鲜继坚一同开车到“渝舍”，打算亲自动员他一下。但是这时候杨森正与他的亲信们谈后，“渝舍”内一片乱糟糟的，无法再与杨森个别交谈机密大事了。

11月29日，解放军已经攻到重庆南岸，蒋介石不得不于晚上10点撤离重庆。由于沿途汽车太多，道路堵塞，无法通行，直到午夜方才到达白市驿机场。当夜就住在他的专机“中美号”上。30日一早起飞，上午7时在成都凤凰山机场降落。这时候，解放军离白市驿机场已经只有10公里，蒋介石如果晚走一天，就逃不掉了。

11月29日，杨森电令罗君彤师、彭斌的内务部警察第二总队和向文彬的重庆保安警察总队同时向川西撤退；命令二十军一三三师、一三四师撤离江北向川西进发；又电令二十军七十九师师长杨汉烈也立即向川西撤退。命令发布完毕，他带领五个连的卫队巡视重庆一周，长叹一声：“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不能破坏！”

11月30日一早，杨森向成都撤退。下午，解放军的先遣部队进入山城重庆。

杨森原计划由东大道经永川、荣昌、隆昌、内江到达成都，但是到了璧山以后，永川的电话已经不通，只好改道北路到达遂宁。12月8日，杨森经绵阳到广汉。向文彬所率领的保安警察总队和陈亮所率领的重庆自卫队也陆续到达。杨森将这些杂牌队伍整编为二十军独立师，委向文彬为师长，陈亮

鲜英——字特生，民主同盟重要成员之一，是杨森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班同学，与杨森私交颇深。

为副师长。 12月10日，二十军代军长景嘉谟率一三三、一三四师相继到达金堂；而七十九师则还在途中。

杨森到成都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任命他为西南军政副长官兼代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并要他与逃到什邡的川鄂边区绥靖主任孙震一起在绵阳设立指挥所，阻挡解放军北上。

12月10日下午，蒋介石找了个借口，飞离成都逃到台湾。

12月13日上午，刘文辉、邓锡侯派专人送信到广汉，约请杨森、孙震一同起义。如果两人同意，请到彭县云顶场会商一切；若不能亲自参加，也可以派负责的代表前去。当时杨森和孙震都在绵阳，留守广汉的副参谋长向廷瑞接到这样的信，不敢怠慢，立刻派专人专车把信送到绵阳。下午，杨森打电话回来说：他和孙震都不能去彭县，他派喻孟群为代表，孙震派董长安为代表，明天出发去彭县，与刘文辉、邓锡侯会商。

12月15日中午，杨森和孙震忽然率领指挥所的人员从绵阳回到广汉。吃过中午饭，杨森和范廷生、鲁伯言、王联奎以及孙震一行人匆匆赶到成都，住在北新街大川银行内。不久，杨森的军需处处长邱峻送来800两黄金，交给杨森，而原西南长官公署长官顾祝同恰在此时打电话通知杨森，说是到台湾的飞机已经准备好。看样子，杨森到达成都，是应顾祝同电召，打算逃往台湾的。

12月17日中午，范廷生从成都打电话给广汉的向廷瑞，要他派人到广汉至中江的路上寻找杨汉烈，说是杨森18日要在成都北门外驷马桥看地形，要杨汉烈务必在18日上午9时以前赶到。向廷瑞立即派人去找，但是没找到。18日上午9时杨汉烈回到广汉，得知这个消息，赶紧驱车赶到驷马桥，但是杨森和孙震等人在一个小时以前已经坐飞机逃到台湾去了。

当天中午杨汉烈即与范廷生、鲁伯言等人赶回广安，并于下午6时在总部召开副师长以上高级军官会议。会议由喻孟群主持，范廷生取出杨森的“手令”交喻孟群宣读，内容有四点：（一）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由喻孟群代行，范廷生任参谋长。（二）第二十军成立军事委员会，由喻孟群、夏炯、罗君彤、郭大树、范廷生、向廷瑞、向文彬、陈亮、景嘉谟、萧传伦、熊恭岳、鲁伯言为委员，由喻孟群任委员会主席；凡是二十军的重大事情，都由军事委员会开会协商处理。（三）十军军长由杨汉烈继任。（四）总部特务营归杨汉烈指挥。

喻孟群读完，范廷生又作口头补充：“由于杨汉烈没能准时赶到，杨森在上飞机之前嘱我转告汉烈：要二十军光荣起义。这是惠公临走之前的最后安排。”

12月21日，喻孟群等人赶到金堂，才知道景嘉谟和萧传伦已经把一三三、一三四两师拉走，宣布脱离二十军。至此，杨汉烈的二十军，实际上只有七十九师、新编独立师和特务营这一点儿人马了。

12月23日，二十军从金堂开赴赵家渡的途中，遇见四十四军陈春霖部三四九师团长李鼎及通讯营营长李庚所率领的残部数百人，他们已经与军部失去联系，沿途溃逃。杨汉烈即委李鼎为三四九师师长，李庚为团长，暂归二十军指挥。

12月25日，杨汉烈正要派人与解放军联系起义的事情，恰巧杜重石赶到，于是一切都简单化、顺利化了。

杨汉烈汇报完了杨森的情况和二十军起义的经过之后，杜重石又把夏炯

的一封信给贺龙看。信是夏炯让他的经理处处长王星东带来给杜重石的。信中说：他已经知道二十军光荣起义，他现在去温江找恶霸地主报杀兄之仇，等私事了结以后，即到成都向贺龙请教。因为二十军起义的时候他不在金堂，人们都说他已经把部队拉到邛崃山区打游击去了。杜重石不相信此话，如今果然有信送来，所以必须向贺龙汇报。

贺龙说：“恶霸地主的仇，共产党会替他报的，叫他速来成都。”

杜重石说：“现在是军管时期，他既没有汽车，又没有通行证，怎么来呀！”

贺龙说：“你去叫杜桴生给他开一张军管会的通行证嘛！”

成都解放后，杜桴生出任成都市军管会秘书长。他给夏炯开了一张汽车通行证，由杜重石交王星东转去。后来夏炯果然到成都来投解放军。不过他的几千人马，都已经作鸟兽散了。

第十二章 坎坷人生

杜重石进入成都以后，通过各种渠道迅速把国民党机关、法团、工矿、企业的档案搜集上来，为成都市的接管工作做出了贡献。贺老总报请总理批准，有意留他在川西行署任民政厅厅长。但是，解放初期由于一些地方“进城干部”与“地下党员”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少数人或出于政治偏见，或出于别有用心，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最终把杜重石挤出了成都，返回北京。

杜重石从成都回到北京，才知道自己在民革二次全会上的提案遭到了攻击，几乎被开除出民革；而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因有人告状，也使他受到了点名批评。为此，朋友们避他如瘟疫，而组织上也不分配他工作。他一气之下，挂冠而去，回到上海，与人合伙开一木行。

但是接着而来的是“三反”、“五反”，木行亏空，负债累累。公私合营后，他当了一个行政 25 级的办事员，后来通过沈志远的帮助，才调到了商业系统的业余学校当语文教师。

1957 年，他被人诬陷，错划为右派，在原单位监督劳动。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和罪名，又突然把他逮捕，送到了上海市黄浦区公安分局拘留所。在这里受尽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与审判员数次针锋相对地展开辩论，

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 5 年又加刑 3 年，从此开始了他的劳改生涯。

一、矛盾从这里产生

1950 年元旦，也就是贺龙、杜重石等一野部队入城以后的第三天，杜重石就收到了国民党在成都的法团机关即航空委员会、水上警察局、报刊发行机关以及银行、工厂、仓库等单位的物资清册清单，检举潜伏特务的姓名、住址，以及追查特务破坏活动的线索等材料共 60 多卷册。以后又陆续收到了一些。这些材料大都是民革地下工作人员会同群众在解放前夕的混乱局面中组织应变委员会或应变小组冒着危险竭力保护下来的，而且都与接管及治安有关，因此杜重石把所有材料全都交给成都军管会秘书长杜桴生，由办公室主任廖家崐会同签收。

1 月 3 日，贺龙跟杜重石谈话，表扬说：“进成都才两天，你就收到了这么多的材料，很不容易呀！足见你在成都的工作很有群众基础嘛！等川西行署成立了，你可以搞民政工作。”

杜重石说：“一切听从者总安排。”

贺龙说：“你是中央派来的。你的工作，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数，还要请示周总理最后决定。”

当时贺老总的意，是要杜重石出任川西行署民政厅厅长。这事可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 1986 年 6 月给杜重石的信中得到证明：

杜老：您好！

我们在编辑《周恩来书信选集》时，看到一份大概是一九五一年一月九日周恩来同志发给贺龙同志的电报，电文中道：“支电称杜瑞石想系杜重石之误。杜的工作，同意来电意见。周恩来一月九日”

请您证实一下，这份电报是否发于一九五一年，建国后您的工作是如何安排的，以及您的简历。

请您在百忙中抽空回忆一下，并早日函复。

此致
敬礼！

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室（章）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

“支电”即“四日发出的电报”。可证贺老总在1950年1月4日也就是与杜重石谈话后的第二天即致电周总理请示，建议任命杜重石为川西行署民政厅厅长，周总理于1月9日复电表示同意的。但是不久川西行署成立，李井泉任主任，杜桴生任秘书长，民政厅厅长则是邱翥双，这里面的变化，是怎么回事呢？根本的原因，固然在于某些人的“阶级偏见”，而事情的“诱因”，则是因杜重石所收到的财产清册所引起。

解放初期，有一些地方和部门，“进城干部”与“地下党员”之间闹不团结，存在矛盾。“进城干部”，大都是野战军部队下来的；“地下党员”，有的从老区根据地派来，有的则是当地培养发展的。本来，“地上”与“地下”，是革命战场的两个方面，应该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缺一不可的。可惜的是，当年有相当多的干部特别是进城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偏见，总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贡献大，总觉得在枪林弹雨下才是真正的锻炼，在灯红酒绿的白区城市里是锻炼不了人的。更有甚者，则抓住地下党员当年因工作需要而结交的三教九流大做文章，说他们“社会关系复杂”，审查个没完没了，伤了许多同志，特别是出身不大好的同志。今天我们回头来看这些问题，也许有人会觉得可笑，可在当年，这些可都是一时难于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呢！

1950年1月5日，当时的成都市市长兼市委统战部部长李宗林来找杜重石，要他把所收材料交统战部处理。杜重石回答他说：“这些材料，主要牵涉到接管财产和深挖潜伏特务，与统战部关系不大。我和杜桴生、廖家岷同住军管会，已经在两天前就把材料都交给他们了。统战部需要了解情况，可以找他们查看嘛！”

这话完全在理，李宗林无可奈何，就转了话题。他支吾了半天，终于从衣袋里取出笔记本，一边翻看一边笑嘻嘻地如同打哈哈般说：“你对贺老总讲，红四方面军到川北，杨森叫夏炯跟红军秘密谈判，夏炯还给了红军许多医药用品和军需物资，还有手枪、子弹。老杜，你把反动派说得这样好，该不是替反动派涂脂抹粉来懵共产党吧？”

杜重石脾性耿直，生乎最讨厌的就是装腔作势说假话。李宗林说话的时候虽然是笑嘻嘻的，其实是借打哈哈说出了他的真正想法。他心里有些反感，就正色地回答他说，“与红军谈判这件事情，是我亲身参加的。红军代表是陈昌浩，二十军代表是夏炯，我是夏炯的随员，怎么能说我是替反动派涂脂抹粉来懵共产党？如果我说的的是假话，那才叫‘懵’呢！”

这话也完全在理，李宗林又一次感到无可奈何。他似乎有些恼了，一改刚才笑嘻嘻的语态，而是绷着脸，一字一顿地诘问：“你把反动派说得这样好，那么杨森为什么要挖朱总司令的祖坟呢？”

杜重石说：“1938年我在延安，就当面给朱总司令提过当时社会上谣传杨森挖了朱德祖坟这件事情，朱总司令说：‘这是国民党顽固派惯用的造谣挑拨伎俩，谁相信这些鬼话，谁就要上当。’”

李宗林见杜重石搬出朱总司令自己说的话来反驳他，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怒形于色地大声反问：“你把杨森说得这样好，为什么他不起义，要跑到台湾去给蒋介石当殉葬？”

杜重石不是个畏惧权势的人，自己认定不错的事情，依旧据理力争：“这件事情我比你清楚得多。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到达彭县以后，就专门派人送信到广汉，要杨森到彭县商量一同起义的事情。当时杨森身边有胡宗南部队，还有特务盯着，完全没有他的行动自由。他自己去不了彭县，就派他的副手喻孟群到彭县去跟刘、邓、潘三人说明自己的困难处境。直到他上飞机逃到台湾之前，还叮嘱二十军起义的事情。这些情况，你都知道吗？”

杜重石的话依旧是在理的，李宗林第三次无可奈何，张口结舌他说不出话来了。半天，这才勉强笑了笑说：“不要一只屁股坐两条板凳，要站稳立场啊，同志！”

可是杜重石仍不买他的账，接着说：“你要我站稳立场，就是说我的立场不稳，你的立场很稳。不过我并没有忘记毛主席当年在延安引用魏征的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只相信自己的武断绝对正确，认为只有自己才革命而别人的立场都不稳的人，更应该多想想毛主席的教导，大有好处。”

这一次谈话，双方落一个不欢而散。杜重石算是把李宗林给得罪了。

李宗林以前根本就不认识杜重石，因此也无所谓有“个人成见”。他对杜重石有意见，质言之，是一种“阶级偏见”：第一，杜重石出身地主阶级，又是杨森的秘书和驻沪、驻蓉的少将衔处长，因此在他看来，杜重石应该是个敌对营垒中人，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同志”。第二，他对杜重石到延安去参观学习半年多就入了党，就被派回成都来做统战工作，心中也很不服气，总觉得杜重石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不应该委以如此重任。第三，他对地下党员在白区的工作特别是统战工作看得很简单，总觉得他们拿的是高工资，所谓统战，不过是与一些国民党的上层分子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在灯红酒绿的糜烂生活中混日子，与正规部队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斗争”不能同日而语。第四，就凭杜重石的资历和工作成果，周总理派他来当贺龙的政治代表，似乎也太高抬他了。

这种看法，如果出自一个中下层干部，倒也无伤大雅，问题在于他是党的高级干部，而且恰恰是主管统战工作的高级干部，由这种错误思想所导致的后果，可就严重了。他的这种看法，很可能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至少他跟川西行署负责人也谈起过。因为第二天杜重石把他和李宗林的谈话向贺龙汇报的时候，此人在旁边插话说：“李宗林同志在政治上是好人。”

这句话；又引起了杜重石的反感，犟脾气一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也用话噎他说：“李宗林在政治上是好人，我在政治上是什么人？是坏人？”

那位负责人看了杜重石一眼说：“我没说你政治上是坏人嘛！是你自己在说。”

杜重石没和他再争辩。贺龙说：“同志间有意见，由区委开会解决吧。”

当夜7点钟，在统战部临时办公楼（原国民党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的私邸）李宗林的住处开了个党组区委会，与会者共五人：区委书记、李宗林、杜重石、杜桴生和徐淡庐（他当时由李克农派到西藏去工作，路过成都）。

区委书记是一野后勤部部长兼任的。他说了开场白：同志间有了意见，要在区委会上开诚布公地相见。接着李宗林就抢着发言：“我们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现在请老社先作自我批评，再由大家发表意见。”

他这种狂妄自大的话，等于把自己置身事外，喧宾夺主地成了区委会的

主持人了。他的这两句话，等于给区委会定了一个调子，分明是要杜重石在会上承认自己立场不稳，犯有“一只屁股坐两条板凳”的错误。他说话时那种盛气凌人的语态，也很使人反感。杜桴生撇了撇嘴，看了他两眼，却没说话。杜重石就很不客气地说：“摆事实讲道理，凭事实讲真话，是每一个同志所应该具有的党性品德。我和李宗林同志发生不同意见的事实经过，应该先由双方说清楚，再请同志们提意见批评。现在事实经过还没谈，李宗林就命令我作自我批评，”他把“命令”两字加重了语气。“他只凭主观武断，硬是把千真万确的事情说成是我随意捏造，是我替反动派涂脂抹粉来惜共产党，是为党性所不容的。”

李宗林见杜重石不作自我批评，反而据理反驳，不由得跳了起来，声势汹汹地说：“党性不容的是地主出身的剥削分子！顽固坚持错误，是成份不纯的必然反映！”

话说到这里，已经充分暴露了李宗林对杜重石抱有严重的“阶级偏见”，不是根据问题的实质判断是非，而是从阶级出身判断是非，话说到这里，这个会也就没法儿开下去了。

李宗林祭起“阶级出身”这宗法主，实际上也反映了他自己的理屈词穷，只好用大帽子压人了。在那个历史年代，形而上学严重，认识问题简单化，处理错了许多问题。明明自己错了，还自以为是“立场坚定”的具体表现。其可悲之处，也正在这里。

关于杜重石和李宗林的认识之争，一提到了“阶级出身”，问题反倒更加不好解决了。双方振振有词地分说了一通，结果区委会毫无结果，不欢而散。临散会的时候，杜重石引用毛主席的话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好为人师的狂妄态度，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李宗林无法反驳，气得白了杜重石一眼，鼻子里“哼”了两声。

尽管开了区委会，可矛盾没有解决，反而加深了。

不久，川西行署成立，宣布民革成员邱翥双为民政厅厅长。

在这种情况下，杜重石已不便留在成都，只好回到北京去。

二、激流勇退

1950年夏，杜重石在四川完成了联络川康军人及协助接管任务后回到了北京。

前面提过一笔：1949年10月杜重石奉周总理之命去四川，恰值民革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因来不及赶回来，曾写了一个以《把革命进行到底》为题的提案，自费印刷后交大会秘书处分发给各地代表。

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份提案呢？当然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也不是凭空杜撰，为写文章而无病呻吟，而是实有所指，有感而发的。

民革中央成员，来自国民党中的高级军政人员，当时大家在“反蒋”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只求目标一致，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要求各人在政治上、素质上达到某一个标准，因此成员中不免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其中有被讥为“外红内白”的“红萝卜”式的人，也有未脱旧官僚习气、凭裙带关系、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的人。对于民革中央的这些人，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存在，也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连民革中央主席也无可奈何。

偏偏杜重石自以为“有胆有识”，要来当一回“杨修”，想以提案的形

式在全国大会上来一个“发聋振聩”。当时杜重石已经三十六七岁，说他“少年气盛”，似乎不太妥当；论经历，他也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在政治上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了。但是在民革组织中，他却只能说是“少壮派”。何况他这个民革成员是共产党员“兼职”的，还有一些“共产党人要解放全人类”的责任感在驱使他。于是，一个本来不应该由他扮演的角色，却由他来粉墨登场了。

提案初稿写出，经邓初民删改，印发各代表后，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一类人同意杜重石的观点，认为他在民革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扔了一颗炸弹；一类人则自动对号入座，大发雷霆。首先对号入座的是当时出任礼宾司司长的“红萝卜”式人物，在会上大喊：“杜重石年纪轻轻的竟敢随意骂人，应该给他点儿教训！”第二个对号入座的人承认：“杜重石说有人搞小圈子，说的就是我！”可惜的是他们有胆量联系自己，却没那胆识批评自己。他们以“长者”的姿态向大会提出：开除杜重石民革党籍！进行缺席批判！

民革既然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组织，当然不可能让这些“旧样翻新”者所左右。特别是高层次的领导人如李济深、朱蕴山、朱学范、梅龚彬、邓初民、许宝驹、陈汝棠等人纷纷反对，认为在民革中央代表大会上提意见，是每个成员的权利，正体现出民主党派的民主主义精神；如果提提意见就要开除党籍，还谈什么民主党派？

开除党籍的提议没有通过，他们又建议成立专案小组，审查杜重石的提案有无政治问题。审查的结果，当然没有政治问题。但是当时的礼宾司司长凭着他的威风，左右了会场，居然把杜重石的“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免去，改为“中央委员会团结委员”了。

当时杜重石在四川，后来虽然回过一趟北京，但随即又去西安转成都，这些情况并不知道。这次回来，方才知道了详细情形。但除了扼腕叹息之外，一切都晚了。

事情还不止此。不久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李宗林虽然没有来参加，但是他把杜重石在成都的“表现”写成材料，交四川代表带交中央统战部，使他在大会上受到了点名批评。

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杜重石的工作问题被挂了起来。按照周总理的批示，他应该担任川西行署民政厅厅长，但是遭到李宗林的反对，被“轰”回北京来了。

杜重石也曾经两次去政务院找过周总理，但是都被门卫挡在大门外面，连面也见不着。他也曾想暂时做个软体无脊推动物，把自尊自爱之心抹去，厚着脸皮守候在政务院门口，等周总理出来，像封建时代的“拦轿喊冤”一般，陈情于周总理，也许能够实事求是地得到解决。可是他没有这勇气。他自尊自爱过了头，变成了软弱。又怕别人指他的脊梁，骂他是《水浒》中牛二一样的泼皮，厚颜无耻耍无赖，给李宗林及其同伙以口实：杜重石耍无赖，正是成份不纯、出身剥削阶级的必然反映。他也曾经想过去找李克农，估计请他安排一个工作是不会成问题的。但是他不想这样做。他不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不愿以“待罪之身”去乞求一份儿工作。特别是1938年在延安认识的一些老朋友，1949年见面的时候，还是那样热情，那样亲切，到了1950年，也就是杜重石被点名批评以后，许多人，包括金城在内，都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立场”有问题的人，因此见了面大都十分冷漠。就是杜重石主动

跟他们谈话，他们也尽量不搭话，避之如瘟疫，唯恐传染到他们身上。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能“讨”到一份儿工作，又怎么干呢？

想当年，正因为他社会关系多，有利于在白区开展工作，如今时过境迁，社会关系“多”变成了社会关系“复杂”，不利于在红区开展工作了。

清夜们心，反躬自问：自从1938年去延安，到1949年奉周总理之命随贺龙进成都，10年之中，中共中央所交给自己的任务，都在与敌人斗争中完成了。这就无负于党，无愧于己，可以心安理得。再往前推，到了延安，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指引下，我是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自觉自愿地跟共产党走的。我不是被“逼上梁山”，而是甘愿放弃比较优厚的生活条件，甘心到延安吃小米，甘心冒着杀头的危险到白区去做地下工作的。仅仅10年时间，究竟是自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呢，还是被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当权者所阻挡、不许再发展呢？甚至是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被落伍但却有权者所妒忌、所不容呢？

联系到“一只屁股坐在两条板凳上”，“要纯洁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成份”，说穿了，不过因为我是地主出身，属于“阶级异己分子”。我所能够起的作用，已经起过了。如果还认为自己是“特别党员”，存有非非之想，将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像我这样“成份不纯”，“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早晚是要被清洗出党的。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觉得与其他日让人家抓住小辫子被开除出党，不如学刘伯温有自知之明，自动摘去乌纱帽，脱却蟒龙袍，来一个“功成引退”，从此跳出“政治圈”，不争功名与利禄，不求闻达于诸侯，当一个自食其力、与世无争、但求温饱的小小老百姓，倒还光彩得多。

正好这时候他夫人行将分娩，来电报促他速回上海。于是他既不向任何人辞行，也不向组织报告，就一个人悄悄儿离开北京，“挂冠而去”，回到上海家中。

杜重石这一激流勇退的“壮举”，其结果是他的特别党员就这样“自动”消失了，而在档案记录上，则是“自动脱党”。

三、谋生之路

1950年7月，杜重石夫人生下一女，乳名“咪咪”。

当时杜重石与他岳母、妻、女四口之家住在上海，没有收入，难免坐吃山空。就是要当一个小小老百姓，衣食住行四个字也还是要讲的。不然，缺少柴米油盐，生活就会成问题。上海不是山村，不能学一个自耕自织，只得在求职上动动脑筋。

一天，民革浙江分会成员徐天任登门拜访。解放前他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浙江人。闲谈中，说起他有个同乡潘纯志在浙江义乌、缙云一带经营纱管木坯，生意做得还不错，与上海的几个纱管厂都有业务联系。如果杜重石愿意，不妨联合几个人办一个木行，与他们合作。

木纱管就是纱厂纺纱用的线轴。上海共有十几家纱管厂，所需坯木，都由木材加工厂在浙江、福建、江西一带的山区采伐以后加工成坯木，再运到上海来细加工。当时华东纺管局所属各厂急需坯木，鼓励私营小厂经营，因此申报手续简便，而投资又不用太多。杜重石觉得这倒是一条“谋生之道”，就决定与徐天任合作。

两人一共集资 2000 万元（当时还用旧币，相当于新币 2000 元，但币值比现在大得多），办了一个群力木行，专门经营纱管木坯。杜、徐二人分任正副经理，常驻上海，各领月薪 100 万元；另几个合伙人则以“劳力投资”，常驻浙江工地。

为了表示“从此与政治绝缘”，在工商业登记的时候，他不再用在军政两界用过的名字杜重石，而用了族谱上的名字杜先器。

从 1950 年夏季到 1952 年夏季的两年中，杜重石并没有达到他预计的“自谋生路”的目的。群力木行开张不久，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先在党内及机关团体内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接着扩大到工商界的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运动中，业务基本上停顿，但是所有人员的工资必须照发，房租、水电费必须照付。群力木行资金本来就很少，全靠坯木生产供货周转。生产一停顿，坐吃山空，作为资方的经理，只得寻亲觅友，四处借贷。那年月，上海各私营工商业的资方日子都很不好过。到了 1952 年初，群力木行的亏空已经达到 4 亿元，相当于注册资金的 20 倍。按照规定，亏损如此巨大的工商户，是可以申请歇业的；但是政府还有另一条规定：“三反”、“五反”运动期间，所有工商业一律不得歇业。杜重石也无可奈何，只得继续东拉西借，把木行维持下来。

杜重石在上海的日子不好过，李宗林这个大官僚主义分子在四川却成了反官僚主义的英雄。尽管这时候杜重石已经不在成都，但是李宗林还是不肯轻易放过他。1951 年底，杜杆生在成都成了“三反”运动中的“大老虎”，连连批斗之后，又受到了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等到杜重石得知这一消息，杜桴生已经含冤去世了。对于这件发生在遥远的川西的案件，杜重石既无办法干预，也不可能干预。那时候，他正忙于为全行职工及其家属的温饱四处借贷，没有工夫顾及那些是是非非了。

1952 年，杜重石又有了第二个女儿茜茜。在这样的日子里添人进口，是喜事更是烦事。幸亏这一年“三反”、“五反”运动基本上结束，已经奄奄一息的群力木行，被评为“基本守法户”——“五反”之后，评为“守法户”的工商业基本上就没有，所以“基本守法户”实际上就是“最高级奖赏”了——大家继续群策群力，为清偿这 4 亿元债务而奔忙。一直拖到 1956 年，上海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群力木行全体职工包括杜重石在内，统统合并到日晖港木材公司去。杜重石的工资评定力行政最低级，25 级办事员，月薪新币 43 元。

经过这五六年的风风雨雨，杜重石的家庭经济状况已经彻底崩溃，早就寅吃卯粮了。他家中上有母亲、岳母，下有两个女儿正上小学和幼儿园，六口之家，靠这 43 元，怎样养家糊口？

一向以清高自命、不愿斤斤计较块儿八毛的杜重石，也不得不在经济上打打算盘了。他必须另找工作。但是找工作就得去求人，而且必须去求一些掌握大权却面目可憎的人。这是杜重石宁可饿死也决计不肯去做的。他还是民革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委员，按说他可以找民革中央去求助一下。但是一想到 1949 年 10 月民革二次全会上那些“官僚旧样翻新”者们的嘴脸，他又一点儿胃口也没有了。这时，他忽然想起当年创办《大义周刊》时的老友、经济学家沈志远，尽管他现在任民盟上海市委主委，而自己已经不是民盟盟员了，但也不妨以《大义周刊》同仁的身份会见见他吧？

沈志远到底是个学者，见了面，依旧那样热情亲切，说话间极富于人情味儿，听说杜重石近年来处境不佳，如今连生活都成了问题，满口答应一定尽力帮忙解决。临别又嘱咐杜重石在会客室再等一会儿，他匆匆到办公室取来一个信封，递给杜重石说：“这里面是100元钱。重石兄，我知道你的脾气，你不要为这100元钱说话。我现在的情况比你好。”

杜重石还能说什么？钱，他确实很需要。但是在这风雨岁月中，他更需要的是情。而这两者，沈志远都奉献出来了。

大概是沈志远在某一级干部面前说了话，总之是在公私合营以后的三个多月，杜重石就由日晖港木材公司调到了上海市商业一局职工干部业余学校当语文教师，月薪104元。去职校报到以后，日晖港木材公司又按照每月104—43=61的工资差额给他补发了3个月共183元。这期间，杜夫人也在立信会计学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推荐到华贸毛纺公司当会计。

真是时来运转，生活立刻又“宽裕”起来。夫人和岳母特地烧了几个拿手好菜，阖家欢乐一下。咪咪和茜茜同时举起装着汽水的小玻璃杯：“妈妈，我们祝爸爸健康快乐！爸爸，干杯！”

阖家欢笑，其乐融融。杜重石不由得自己也觉得好笑：一个人的欲望，原来是这样容易得到满足的；而一个人的理想，却又是如此容易发生变化的。想当年，为了抗日救国，也曾经想过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为了追求崇高理想，也曾经自动放弃比较优裕的生活，甘愿跑到延安去吃小米；为了统一战线，更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在刀尖枪丛中开辟道路。才几年工夫，如今只要一家人能够吃饱穿暖，就万事足矣，别无他图。

“这就是我挂冠归隐的‘骨气’吗？”他苦笑了。

四、北京之旅

杜重石在上海市商业一局职工干部业余学校教了一年书，和语文教研组组长黄昌汉的关系搞得不错。他是南京国民政府社会部次长黄伯度的儿子，当时黄伯度已经去了台湾，而杜重石解放前与社会部常务次长洪兰友有些交情。根据这种关系，两人的关系也就比别人更近些，在讨论教案之余，也常常聊些闲天，有时候黄昌汉还到杜家来走走。

1957年春夏之交，中央机关首先开始整风，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对中共党政部门改进工作的意见。新中国经过八年的恢复建设，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欣欣向荣，如今又广开言路，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更显得到处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杜重石想想自己1950年在北京与朋友们不辞而别，太过于任性了一些，至少罗青、李克农、徐淡庐这些老朋友，都不是不讲情义的人，这几年来，尽管没有见面，书信还是经常往返的。如今自己安定下来了，也应该到北京去看看他们。如果有机会，趁目前政治气候宽松，让他们帮个忙，也许还能调回北京去工作。再说，他母亲为了减轻他一家的负担，已经到沈阳苏家屯他妹妹先清家去了。他妹夫孙仕浚是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的工程师，他妹妹与丈夫在同一厂当会计。如果去北京，也可以顺便去看望一下母亲，至少比直接从上海去可以省一半儿车费。

此念一起，他就给罗青等人写信。得到欢迎的表示以后，1957年夏天学校一放暑假，他就首途北上，住在罗青家里。

这时候李克农已经调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因为身体不好，到北戴河

疗养去了。他得知杜重石要来北京，临走之前托罗青转达他多年不见的想念之情以及这次失之交臂的歉意，有什么事情，一切由他的办公室主任徐淡庐代为办理。

到京的第二天，杜重石就给黄绍坟打电话：“我到北京了，咱们约个时间见面细谈吧。”

罗青在一旁听见了，劝他说：“老弟，你刚到北京，不知道这里的政治气候，还是先不要跟‘黄青天’来往的好，免得惹麻烦。”

杜重石不解地问：“什么‘黄青天’？”

罗青说：“黄绍 在全国人大对党政部门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见报以后，社会反响强烈。特别是他到上海视察监狱，有许多犯人向他递申诉状，喊他‘黄青天’。怎么，你在上海，连报纸都不看吗？”

杜重石笑笑说：“报纸当然看的，不过没注意到‘黄青天’的故事。我就是因为看见他的言论，才想找他聊聊的。历史上老百姓管包公叫‘包青天’，如今也有人管他叫‘黄青天’，可见他在人大还能代表一些民意嘛。”

罗青说：“你在地，又不在党政部门工作，有些事情你是不知道的。你看过《人民日报》6月7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没有？你仔细看看，就能够领会到中央认为大鸣大放出了格了。毛主席在党内几次讲话，都提到：既不能出格，以免在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乱子，又要让人继续鸣放下去，以便察看出左、中、右人物的面貌；还让党报暂时不要刊登正面的文章，以便引蛇出洞，让反动教授、知识分子们把毒素都吐出来。看形势，恐怕又要酝酿什么运动了。”

杜重石听从罗青的劝告，果然没有跟黄绍 见面。他去找了一趟李济深，李济深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推荐他去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信由罗青代交国务院。他在罗青家住了一个星期，就到沈阳看望母亲去了。

行前徐淡庐到罗青家来，给杜重石送来200元“路费”。他说：“李副总长去北戴河之前，对我说过：‘听罗青说老杜经济情况不好，他是个不愿在别人面前诉苦的硬汉子，临走送他一点儿路费吧。’我是奉命给你送‘程仪’来的。半个月以后，中央有重要会议，李副总长要回北京来开会。你去国务院工作的事，他会向总理进言的。你回上海以后，等接到国务院通知，就可以来北京。以后咱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听他说得这样肯定，杜重石也以为事情十拿九稳。他当时囊中羞涩，有这200元钱，沈阳之旅，可以大壮行色，也就老实不客气地照单全收了。一算时间，到沈阳探母以后再回上海，学校已经开课了。就写了封信给教研组组长黄昌汉，第一是请假一周，第二是请他帮忙代课。为表示自己对形势大好的欢欣之情，信内还附了当年春季所写的一首诗。

五、老牌右派

杜重石从沈阳回到上海，一晃又近半年，关于调职国务院的消息，却一直没有。按照他的估计，大概要等到整风运动结束，把各人的政治面貌搞清楚以后再说了。

1957年冬季，上海市教育系统才迟迟地开始整风反右学习。杜重石的工作地点在黄浦区，所以参加的是黄浦区统战部和民革黄浦区委联合主持的整风学习会，地点在福州路的一幢大楼内。

既然是“整风”，当然要从动员大家对党提意见开始。尽管会议主持者再三反复地说：“帮助党整风，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达到再团结的目的；更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即便有说错了的，也不要紧。”等等。但是这时候全国第一个反右高潮已经过去，中央机关、各大专院校的右派分子基本上都已经按六个档次处理完毕。最重的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最轻的免于行政处分，降级留用。

人们对“提意见”三个字已经心有余悸，谁也不敢出这个风头了。因此整风座谈会上，与会者除了说几句“很好很好都很好，没有什么意见”之外，一个个噤若寒蝉，基本上没人给党组织提什么意见。

但是反右派斗争是从中央布置下来的，各单位都有具体数字。哪个单位抓不出右派来，完不成任务，就说明这个单位的党组织保守、右倾，弄得不好，这个单位的头头儿就是右派了。因此，为了避免自己当右派，各单位的负责人千方百计挖空心思也要抓出几个右派来，凑够了上级所要的数字，才算完成任务。

像这样的工作方法，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笑话，可在50年代，却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干的！

当时划右派，主要根据就是在整风座谈会上的言论。现在人人都已经知道“整风座谈会”是请君入瓮的“阳谋”，还有谁会这样傻，愣充好汉来自愿当右派呢？

办法还是有的。一个人长了嘴巴，当然要说话。既然你在座谈会上不说话，那么就查你平常时候都有什么言论。当然也不能挨着个儿人人查，而是有重点地查，由组织按比例“内定”若干人为重点审查对象，然后发动群众对这几个人提意见，贴大字报。有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群众中间，还有许多善于分析批判的“理论家”呢！

于是，历史上有问题的，平时好提意见的，与领导干部闹过别扭的，特别是个性耿直、相信事实、喜欢抬杠的人，这一次大大的倒霉了。

杜重石就是个天生的“杠头”，他与李宗林之间的矛盾，既不是杀父之仇，也不是夺妻之恨，更不是阶级斗争、民族矛盾，说穿了，无非因为杜重石尊重事实，不肯顺着他的意思当应声虫罢了。更没想到李宗林的“原则性”有如此之强，1950年赶跑了杜重石，1952年整死了杜桴生，居然还不甘心，到了1957年，还把杜重石当年在成都跟他的磨擦当作“右派言论”给转到上海来了。

于是，向党提意见的整风学习会一变而为反右批判会。首当其冲受批判的就是杜重石。而发言最积极、大字报贴得最多的就是职工干部业余学校的老师黄昌汉。至于大字报的内容，除了把两人平时海阔天空的聊天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之外，连当年办的《大义周刊》是黄色刊物、在成都都是个帮会头子兼广厦饭店的老板、还是包庇烟赌的袍哥大爷等等，都揭发出来了，以此说明杜重石这个右派，不是“现在堕落成右派”，而是在多少年前早就已经是“老右派”了。

大字报上所批判的问题，有一些确实是杜重石跟他聊天的时候谈起过的，黄昌汉作为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当然也懂得其中的涵义。如今他却故意断章取义地摘录片言只语，经过歪曲，然后无限上纲，用作攻击的资本，只能说明此人用心不良。至于在成都的那些事情，是杜重石从来也没有跟他说

起过的，如今也出现在大字报上，可见问题的根子不在上海，而在成都。反右领导人不过把成都转过来的材料授意他照抄罢了。

杜重石的杠头性格，当然不可能你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好在其他人写的大字报不过是从黄昌汉那里趸来的“转手货”，只要把黄昌汉的大字报驳倒，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于是他把反右大会当作辩论会场，振振有词地为自己声辩起来。其结果，当然是他分辩得越多，反击得也越有力，最后竟剥夺了他的发言权，只许他老老实实地听批判。

在这样的情况下，杜重石只能做到一条，那就是充耳不闻，只当自己什么也没听见。在杂乱的吼叫声中，他倒冷静下来了。他在想：任何一个民主的国家，都让被告有辩护的权利。现在我成了被告，却不许我申辩。这种事情，只在封建主义统治的国家中才有。现在已经是新中国了，为什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归根结底，是中国的封建主义统治时间太长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法制不健全，人们习惯于用封建主义的形式、方法办事而不自觉，还以为自己忠于人民忠于党。可悲之处也正在这里。

为了证明自己历史清白无罪，杜重石向吴玉章、李克农、罗青等人发出求援信，希望他们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作证。但是只有吴玉章一人有信回来。而这封信，也是劝他不要背思想包袱，要相信人民相信党，只要自己确实没有问题，党和政府绝不会冤枉好人，地方上一定会实事求是作出结论的。

其他人不回信，都不奇怪。反右运动中这样的信，能不能送到他们手上都不一定。但是想想罗青与自己不论是公是私关系一直很密切，而他又是个胸怀坦荡、实事求是的人，总不应该连信也不回一封吧？

没有想到的是：1957年12月，《人民日报》上突然登出一则消息：“罗青趁党整风之际擅自召开所谓民主教授钱端升等座谈会，大发右派言论，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这一来，反右领导人可有了根据了，他向群众说：“杜重石说他过去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完全是吹牛。他说的那个罗青，也是个右派，已经被开除党籍了。他们两人是一丘之貉。这是杜重石勾结党内外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证明。”

杜重石也确实有好长一段时间想不通：罗青啊，暑假我到北京的时候，你说我不知道北京的政治气候，还再三嘱咐我要小心谨慎，你身在北京，而且在党内担任要职，能听到毛主席的讲话，也知道政治动向的，怎么你也会那么不小心，彼人家抓住了口实呢？

接下来的批判，温度升高了。人人可以喊着“杜重石”三个字并指着他的鼻子随意谩骂、把一切凡能上纲上线的反动帽子都给他扣上。统战部和民革负责反右的两个领导人找他谈话，要他检讨自己的错误。杜重石气愤之极，拍着自己的脑袋说：“过去国民党的特务分子说我思想反动，把我投入监狱；现在共产党干部也说我思想一贯反动，要我检讨。我的思想越弄越糊涂，弄不清我到底对谁反动了。”

第二天开大会的时候，两个反右领导人在会上一提杜重石的这句话，职工干部业校的黄昌汉立刻联系历史，上纲上线地批判起来：“杜重石说，国民党、共产党都说他反动，他思想上越来越糊涂，不知道自己究竟对谁反动。其实杜重石一点儿也不糊涂。这是国民党极右派戴季陶说过的‘用右手打共产党，用左手打国民党’的翻版。他有意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牵在一起，放在一处，目的就是污蔑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大家说，杜重石反动不反动？”

会场上一片口号声。等待口号声平息下去了，黄昌汉接着说：“杜重石

反动不反动，我们不能听他现在是怎样说的，而要听他过去是怎样说的。过去他说过的话，没有录音，他会不承认。但是他亲笔写的反动诗词，他想赖也赖不掉的。同志们，大家擦亮眼睛，请看杜重石的反动诗！”

说完这些话，他从整风办公室内推出一辆早就准备好的双轮车来。车上用木条搭了一个架子，上面横幅大字写的是“请看杜重石的反动诗”九个碗口大的字，“杜重石”三字是用黑笔写的，其余的字都是红笔写的。下面分四行用拳头大的字照录今年暑假杜重石从北京寄给他的那首诗：

江山喜雾漫天雪，梅柳梢回大地春；
便觉韶光无限好，王朝沉沙乾坤新。

这诗，是今年春天初雪放晴后杜重石有感于怀写的歌颂祖国春回大地的颂诗，怎么又变成“反动诗”了？学问就在于如何解释上。黄才子昌汉凭着他的法眼慧心或曰特殊的嗅觉，发现这是一首诅咒社会主义的反动诗。“漫天雪”暗示“白色恐怖”；诗的作者喜欢新中国出现这种白色恐怖，然后蒋介石才能回来，也就是“春回大地”；“韶光无限好”当然指的是复辟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无限好；“王朝”指的是新中国，“沉沙”指的是灭亡，这里的“乾坤新”，指的就是变天，恢复旧社会。——多么精辟而又令人信服的分析！

杜重石当然绝不承认。于是在“态度恶劣，死不认罪”的结论下，给他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不许再当教师了，被罚到行政科当工友，负责扫马路和厕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厚颜无耻的人，竟也有“天良”发现的时候。有一次，黄昌汉上厕所，正好碰见杜重石。他见左右没人，悄悄地对杜重石说：“老杜，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别太死心眼子了，先检讨一下，过了这一关再说嘛！我是没有办法，人家都给我准备好了材料，我不得不写呀！”

对于他的这种两面派表演，杜重石感到恶心死了，没好气地反将他一句说：“我的‘反动诗’，也是他们给你提供的吗？我不是俊杰，所以也不识时务，更学不会你的那套本领。”

他一声不响，哭丧着脸说了一句：“老杜哇，你太冤枉好人了。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哇！我可真是好心无好报，吃力不讨好！”说着，灰溜溜地走了。也不知道他说的“好人”、“好心”，都是什么品牌、什么标准的。

一天，杜重石下班回家，见8岁的大女儿咪咪在客厅里哭得很伤心，好像受了什么大委屈，6岁的小女儿茜茜在旁边劝姐姐不要哭。这可是很少有的事。杜重石最爱的就是这两个女儿，哪怕自己吃天大的苦，也不愿女儿受一分委屈。见女儿哭得这样伤心，暂时收起自己满肚子的官司，好言好语地把她劝得不哭了，这才问她，究竟为了什么哭。不料咪咪抽抽咽咽地说：“妈妈打我。”

孩子的答复使他大吃一惊，这可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在家里，不论是爸爸、妈妈、姥姥，谁也没有打过她们。孩子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大人总是跟她们讲清道理。今天咪咪犯了什么大错，竟使夫人破天荒地第一次打起孩子来了？

做爸爸的一把抱起已经老大的咪咪，逗她说：“好孩子是不哭的。走，咱们上楼跟妈妈说理去，问问她为什么要打挂红领巾的好孩子！”

三人上了楼，只见杜夫人一个人斜靠在沙发上，眼角也挂着泪

水。这更使杜重石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急忙放下孩子，轻声地问妻子：“蓉，你今天怎么打了孩子，自己也在哭？”

杜夫人名“素蓉”，夫妻之间，习惯于以“蓉”相称。但是妻子依旧低头不语。杜重石继续问：“蓉，我知道你是从来不打孩子的。是不是咪咪这一次过份淘气了？”

这一问，妻子还没回答，咪咪可不答应了。本来已经停止了哭泣，这时候又委屈地瘪上了小嘴：“爸爸，我……我没淘气。我放学回来，在家里唱歌，妈妈不许我唱。歌是老师教的，我唱不好，就不能得5分……”

一听是这么一件小事儿，杜重石倒乐了：“就为这个呀！什么歌，爸爸教你唱，保险你得5分。”

咪咪得到爸爸的支持，刚刚露出一丝儿笑意，妻子却用很不高兴的口气说：“我就是不让她唱这支歌！”

“什么歌呀？”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为什么不让唱？现在不是大人都在唱吗？”

“唉，小牛哇，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开窍！”妻子用埋怨的眼光白了丈夫一眼。“要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好》，我怎么会不让孩子唱？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歌词中原来‘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这一句，现在改成‘右派分子想翻也翻不了’。我叫小东西不要唱，爸爸听见会难过的。她偏不听，还要唱……”说到这里，她自己也不住委屈，那泪珠儿就像断线的珍珠，刷刷地往下滚。——杜重石属牛，性格也像牛，他夫人就以“小牛”称他。

听到妻子为了这件事情打了孩子，首先体会到的是妻子往后做人的困难，继而体会到的是妻子对自己刻骨铭心的爱。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今天，他的确伤了心，所以也情不自禁地搂着妻子大滴大滴地掉眼泪。

两个孩子张大了小眼睛看着爸爸妈妈互相搂着掉眼泪，又互相用手绢儿擦眼泪，咪咪反而停止了哭泣，和妹妹一起拉住了爸爸妈妈的衣角，很真诚地说：“爸爸，妈妈，不要哭了，我和妹妹都不哭了。我一定听妈妈的话，不唱那支歌了。”

六、意外入狱

杜重石被错划为右派以后，在校内当了半年多勤杂工，除清扫马路、厕所和办公室之外，校方居然还把编写黑板报的任务也分配给他去做。在他和家人们想来，右派是思想问题，不同于反革命，而且中央政策明文规定“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劳动一段时间，思想从右到左扭转，摘去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事情也就过去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1958年9月30日，他照常到学校去上班，校长秘书通知他到校长室去一趟。一进门，一伙儿警察和便衣儿向他奔去，只说了一声“你被捕了”，不由分说，就把他一副铐子铐走了。

50年代，由于国家法制不健全，法院和公安局办案，不是以法律为根据，而是按上级的命令、暗示办案，伸缩性很大。特别是单位“送”的人，因为单位代表组织，单位负责人代表党，因此法院、公安局办案就以单位的鉴定书或处理意见为准，不去甄别案犯犯罪的真假大小。于是，大量因单位负责

人出于打击报复而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在那个年代出现了。

那年代公安局抓人，如果不是突发性案件，一般集中在“五一”、“十一”、元旦、春节这几个节日之前进行。理由嘛，一者为了加强节日期间的治安，二者也为了造成一种声势，好在犯罪分子中间起到震慑作用。

杜重石不是什么突发性的刑事犯，之所以要在国庆节前夕逮捕他，其原因盖在于此。

1958年的国庆节，对右派说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按照中央分化、争取、打击的政策，经过甄别，对确实有悔改表现的，摘除帽子，以为榜样；对坚持右派立场不改的，升一级，送劳动教养；对犯有其他刑事罪的，升两级，逮捕法办。

政策是中央定的，但是具体执行的，仍是基层单位。什么叫改好了，什么叫不思悔改，全在基层单位领导的一句话。但是杜重石并没有犯其他刑事罪，即便表现不好，最多也只能升一级，送劳动教养，而他居然一升就是两级，宣布逮捕。这不能不说他的原单位确实是对他“另眼相看”的。

抓人，也有许多档次。要是案情重大，属于市局处理的，由市局出动警车直接抓；一般的案子，由分局抓；偷鸡摸狗的小案子，派出所来个民警带走就算了。

杜重石的案子，其实是没有案子，愣要把他办成是一件案子，而且是“反革命”的案子，如果原单位报到市局，市局是很有可能要驳回的。所以他的原单位也聪明得很，不往市局报，而是在节日之前以“治安需要”为由往分局报，所以一报就准，而且在国庆之前“就热汤剃头”，一锅烩了。

杜重石被捕的当天，就由家里送来了被褥、换洗衣服及生活必需品。但是一关关了三天，根本就没提审，以至于连自己为什么被捕都弄不清楚。第四天，一个看守拿来了四张纸、一支圆珠笔，递给杜重石说：“这是给你写交待材料的。纸不够可以问我要，不许糟蹋，给你几张要还我几张。”

杜重石拿着纸笔愣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旁边一个因为相信一贯道被捕的老年犯人劝他说：“这是这里的规矩，新来的人，先要自己写一份交待材料，叫作‘认罪书’。预审员看了你的交待以后，根据你认罪的程度，才决定是不是提审你呢！”

这真是奇怪的逻辑，抓了人来，不告诉人家为什么抓他，反而要自己先认罪。杜重石苦笑一声：“我正要在提审的时候问问他为什么抓我呢，他倒真聪明，要我自己给自己定罪。我什么罪也没犯，这样的交待，我不写。”

老犯人以过来人的身份开导他：“不行啊，我刚进来的时候，也和老弟你一样，认为自己没错不肯写。可是我不写，他就不提审我，我就只能永远在这里关着，既吃不饱，也不许见家属。还是老犯人劝我说：胳膊不要跟大腿较劲儿，进来了，唯一目的就是早点儿出去。想出去，唯一办法就是认罪，争取早判刑，判轻刑。只要到了劳改大队，就可以吃饱饭，也可以见家属了。我是听了人家的劝，才想通了的。反正我只是相信一贯道，也没有害过别人，承认自己错了，总不至于判我10年8年的刑。老弟，你不就是思想反动，又没犯什么罪，承认一下，以后不反动了，不就什么都了结了吗？”

老人家不懂得什么叫思想反动，以为像他一样，信神而不信共产党，就是反动。但是从他的话中，却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不写交待，提审员就不提审。这可真是公安局的新发明。讲法制的国家，嫌疑犯扣留不能超过24小时，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宣布逮捕。这倒好，公安局办案，可以没有证据

先抓人，抓人以后再取证，取不到证据就不放人，继续扣押，直到你自己承认有罪为止。难怪公安局只有错抓的人、没有错放的人呢！

说一千，道一万，不论有罪没罪，这“交待材料”还非写不可。杜重石拿着纸笔，愣神半天，忽然灵机一动：今天既然来到了法制机关，法制机关应该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中国尽管还没有完善的法律，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一国家的根本大法却是在1954年就公布了。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没有违反宪法的任何一条，何不借此机会写一份申诉书，详细申诉一下呢？

主意打定，他盘腿凝神，奋笔疾书。不久就把“交待材料”写好，交了上去。

七、法庭辩论

杜重石在监房里关了一个多星期，一天只吃一碗粥、两小碗饭，饿得人两眼冒金花，可还是没有提审的消息。他估计是自己写的“交待材料”没有被审判员所通过，所以还要继续“挫其锐气”，等到真正“蔫儿”了，再来收拾他。

到了10月中旬，大概是审判员觉得“是时候”了，终于让民警把他提到法庭上去审问。

法庭上坐着一男一女，年纪都不大。男的穿着藏青毛哔叽中山装，女的戴一副近视镜。瞧那架势，男的是审判员，女的是书记员。

还没有正式进入审问程序，审判员就把杜重石交上去的材料扔了下来，绷着脸说：“这个，不行。拿回去重写。要写你的罪行，不是要你写丑表功的自传。”

“我没有丑表功。我写的全是事实。希望法庭调查。”

“你写的都是事实？你就没有一点罪？难道是政府把你逮捕错了吗？老实告诉你，你的所作所为，你所干过的危害人民的罪恶勾当，材料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你无法狡赖的。”

“我没有狡赖的必要。我只是凭事实说话。”

“我看你并不傻。聪明人，就应该学得聪明些。”

“我不聪明。要是我真聪明的话，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不管你聪明不聪明，你都应该懂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政府是绝不会让一个坏人逍遥法外的。你首先必须端正态度，把交待材料写好、再提审你。”

说完，也不再听杜重石的分说，收起桌上的卷宗来，与女书记员一起走了。

民警把他押送回监房。他知道，进了这个门，想要很快地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了。既来之，则安之，铁下了一条心，不再写任何材料，且看他怎么审问。

第三天提审，一上堂，审判员就问：“交待写好了吗？”

“没再写。再写也和上次的一样。”

“还是和上次的一样，我怎么定案？”他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说。

这句话是他冲口而出说出来的，却正好说出了他内心的“天机”。原来，他不是来审理案件，而是来“定案”的，也就是要从犯人写的交待材料里面

找出几条他认为“相当的”、“差不多的”罪行来，足以作为他写判决书的依据，然后一宣判，案子就了结了。这种工作方法，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审判员发明出来的，总之是高明之极，又省事之极。从他上一次提审说的“难道政府把你逮捕错了吗”，就说明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审判员所应有的最低标准——是非感。他不懂得一个审判员的首要工作是甄别被告是否有罪，然后在有罪的基础上适当量刑。50年代之所以会造成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审判员不懂得甄别有无罪错，单纯相信凡是送来的、抓来的就一定都有罪，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这种简单化的审判方式，碰见杜重石这样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他除了继续关、继续饿之外，可就没有办法了。

今天，审判员因为两庭下来没有一句可用的口供，有些于心不甘，倒没有采取“饥饿审判法”，而是想凭自己本事从杜重石的嘴里掏出几句有份量的口供来，因此没有像上次那样拂袖而起，宣布退庭，而是一边翻阅着案卷一边信口而问。正因为他没有任何准备，翻了半天档案，也抓不住重点，只好看见什么就问什么，所以提问也是杂乱无章的。

“你是不是担任过伪二十军司令部秘书、二十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二十七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副处长、四川省会警察局总务组组长和调查组组长、川康绥靖公署参议这些伪职？”

“我于1938年冬离开延安，1939年春到成都，按照毛主席和陈云同志的指示，打进川康军政界从事地下工作。在成都担任过二十七集团军第二十七军驻蓉办事处处长，不是二十七集团军驻蓉办事处副处长。当时任二十七集团军驻蓉办事处处长的是肖寿眉，不是我。我在四川省会警察局当的是事务主任，是专门负责对外交际的，不是你说的总务组组长、调查组组长。可见你掌握的材料，连我的基本历史都没搞清楚，只有我在川康绥靖公署当参议这一项算是说对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这些伪职，都是我为了工作需要才取得的‘掩蔽体’，不是我的真正职务。我的真正工作和身份是地下党员。我离开延安的时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对我说：在国统区工作，就像上战场一样，要有战术上的掩蔽体和保护色，我担任国民党军政机关的职务是为了取得公开活动的身份，也就是我在川康地方军政人员中做统战工作、为实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所需要的保护色。至于我在二十军当秘书和驻沪办事处处长，那是我去延安以前的事情。”

审判员被噎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过依旧端着架子，继续审问：“就算你担任伪职是为了工作需要，可你在担任伪职期间，做了许多危害人民的事。你开广厦饭店，剥削劳动人民，你与流氓袍哥合组‘蜀德社’，包庇烟赌，私设刑庭，可有此事？”

“我开广厦饭店，是为了筹集活动经费。我从1939年离开延安一直到1949年建国以后，这上段时间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四川工作，可我没领过党的一分钱经费。所有活动，都是我自己筹集的资金。至于与黄瑾怀等人组织袍哥团体‘蜀德社’，那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旧瓶可以装新酒’，利用袍哥作为保护色，利用茶馆里摆龙门阵和出版袍哥刊物来宣传抗战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说我‘包庇烟赌’，那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报《扫荡报》对我的诬蔑，目的是为了抓我坐牢师出有名。至于说我私设刑庭，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诬陷我的话。作为新中国的司法机关，以此为证据，甚至没有任何根据，就给我插上私设刑庭的罪名，请问我私设刑庭打了谁了？给谁用刑了？”

这时候，审判员回过头去，跟女书记员嘀嘀咕咕地耳语了一阵，又在她的记录上指指点点，意思似乎是叫她不要记录某些话。杜重石没有理他，继续说：“我本来是共产党员，1950年我自动脱党了。不过我现在还是民革成员，毛主席说过，民主党派是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友党，你们逮捕我之前，至少应该通知我们民革组织……”

审判员打断了他的话，撇着嘴十分蔑视地说：“什么长期共存，民革成员都是化了装的牛鬼蛇神，只能短期共存！”

“什么话！”杜重石不由得气愤起来。“我可只知道民革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之一。要照你的说法，难道共产党领导的都是一批牛鬼蛇神吗？”

这句话厉害，审判员自知失言，急忙圆场：“我没说民革组织是牛鬼蛇神，我是说像你这样的反革命，是化了装的牛鬼蛇神。”

“我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历史反革命。解放后我没有任何反对党和政府的言行，解放前我接受党的派遣在白区工作，所有的伪职都是保护色，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

“你这是强词夺理！”审判员理屈词穷，发火儿了。

“你才强词夺理呢！要是做地下工作的人凡是担任过伪职的都要算反革命，谁还敢做地下工作？”

这一反问，噎得审判员更加语塞，脸红了半天，最后忽然态度温和起来，轻声细语地说：“杜重石，不管你过去如何为党工作，现在你总是右派分子吧？凡是右派，可以证明过去参加革命都是投革命之机。你不要再丑表功了。当前的问题是向人民低头认罪，要从你今天的立场联系你的历史。如果你坚持反动立场不改，自绝于人民，不但对你没有好处，对你妻子儿女也没好处。你难道打算就这样在拘留所里耗下去吗？你不想跟你妻子儿女见面吗？你不想早日结案，早日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与妻子儿女团聚吗？告诉你，想在这里泡，是泡不出去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认罪。只有你认罪了，我才能说你认罪态度良好，从轻发落，少判你几年刑。你死硬到底，只能换来重判，到那个时候，你可后悔都来不及了。”

这几句话，也就是俗语所说的“攻心为上”，是审判员利用犯人想念家属，想到劳改大队去吃一碗饱饭，想争取早日结案早日释放早日与家人团聚的心思而进行的“攻心战”。对于这种战术，杜重石不是不懂。可是目前的处境，不是他和审判员平等地讨论某个问题，而是审判员必须找出他有罪的根据来，才好判刑，才好结案。在那个年代，审判员办案是有偏颇的。两个老百姓打官司，可以判断原被告准是谁非，如果是单位里送来的犯人，原告就是单位，就是党组织，因此审判员必须与单位的观点一致，这才叫“站稳立场”；如果给被告辩解，证明被告无罪，那就叫“立场站到敌人方面去了”。“给敌人辩解”，这是任何一个审判员都害怕的帽子。因此，杜重石的案子，幻想审判员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帮他辩解，是绝不可能的事。他说的“唯一出路就是认罪”，在这样的前提下虽不是至理名言，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想通了这样的关系，杜重石鄙夷地瞥了审判员一眼，轻蔑他说：“好吧，为了你早日结案，也为了我早日见到老婆孩子，你叫我怎么认罪，我就怎么认罪好了。”

审判员说了几句攻心之言，就感化得这个顽固分子承认有罪，不禁喜形于色，他一面示意女书记员如何写这“罪行供状”，一面居然露出一丝从来

也没有过的笑意，略带埋怨地说：“真是的，早想通了，该有多好！”

书记员把供状递给杜重石过目，他看也不看就画了押。在这样的状况下，你爱怎么写就怎么，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呢？他们满意地退堂了。

第二天中午，第三次提审。这次倒是真快，审判员和书记员都在桌子后面站着“立等”，一见杜重石提到，先说了两句“开场白”：“你的案子，现在正式宣判。如有不服，可在收到判决书后的第二天起10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然后把判决书读了一遍。

判决书前面的罪状之类，杜重石无心去听，只注意后面的判决：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他仰天哈哈一笑：“我用5年生命，来换取与亲人一见，来换取到劳改大队吃一顿饱饭，值了，值了！”

审判员在获得他不再上诉的诺言以后，把他押回监房。他感到肝胆俱裂，似有切肤之痛，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到白区去开展工作，居然也会成为“反革命”的罪行，10年辛劳，10年奋斗，换来的竟是5年徒刑，这实在是少见多怪的千古奇冤哪！

八、写诗加刑

一天，杜重石在监房内颓然枯坐，两手抱着脑袋，往两膝上一撑，在烦恼中打发光阴，等待转到提篮桥监狱。忽然看见在板铺与地面的交接处有一个空烟盒，还有一小段比香烟更短的铅笔。这东西，可真是久违了。在监房里，纸笔居然也成了禁违品，不是写坦白交待材料，犯人是不能写字的。他把香烟盒子拆开，展平，摊放在膝头。古人云：诗言志。写首诗来抒发一下此时此刻的心头所想吧，可脑子里浮想联翩，要写的话太多太多了。写什么呢？就写牢房即景：

平地风雷起，无辜入牢监。
母妹涕关北，妻女泣江南。
牢房生死路，辗转难入眠。
晨间喝稀粥，见水少见饭。
人多无睡处，马桶挂铁栏。
桶下得睡地，聊胜立体眠。
提审逼供词，软硬兼施全。
为免饥肠苦，只求早宣判。
我得判决书，方得送“提篮”。
到了提篮桥，方许妻儿见。

……

刚写到这里，被门外巡逻的看守小头目看见了，他声势汹汹地问：“哪儿来的纸笔？”

“地上捡的。”

“地上怎么会有铅笔？”

“前几天那么多人关进来，说不定是他们掉在这里的。”小头目打开牢门，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把铅笔和没写完的顺口溜收走了。

老犯人在旁边感叹：“你呀，你呀，你还是太老实了！既没有眼力劲儿，也没机灵劲儿！没等他开门进来，你就应该把纸撕得粉碎，或者干脆塞进嘴

里吞下肚去，给他一个死无对证。为了这样一件小事，他们总还不至于把你送到医院去破胃取证吧？”第二天，那个看守小头目又来问杜重石要他的判决书。杜重石问干什么，他膨着眼睛说：“你去问审判员！”临关门，还扔下一句：“反动本性不改，关在牢房里还不老实！”老犯人又连连皱眉：“看样子你的案子还要改判。再提审你，千万别跟他们顶嘴，先争取维持原判，到了劳改队再说。”

过了几天，果然又提审了。杜重石迈出监房，一路上频频嘱咐自己：要耐心，要沉得住气，免得纠缠不休拖延时间，影响去提篮桥与妻儿相见！

一进法庭，只见审判员阴沉着脸，扬一扬手中的香烟盒：“这东西，是你写的吗？”

杜重石只说了两个字：“是的。”

审判员咬牙切齿地训斥：“你这个人，真是反动透顶！本庭念你追随共产党多年，虽然一贯与党离心离德，立场始终没有站到人民这一边来，总也算是接近过革命的，有心开脱你，只判你5年徒刑。你不但不感谢政府对你的宽大处理，反而变本加厉，视政府为可欺，居然身在牢房，还念念不忘谩骂政府，污蔑政府，是可忍，孰不可忍。根据你的现行活动，本庭现在宣布改判。”

说到这里，他和女书记员都站了起来，朗声宣读了一份判决书。

内容大致如下：

现查明被告人杜重石1934至1937年先后充任伪二十军司令部秘书、驻沪办事处主任（少将级）。1940年由军统特务谈××介绍在四川省警察局充任总务组长。1943年又充伪二十七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副处长（少将级）以及绥靖参议等伪职。任职期间，在成都梓潼桥街私设刑庭，勾结黄××组织“蜀德社”、“哥老会”贩卖毒品，聚众赌博，并与特务人员极为密切，解放后仍坚持反动立场，当共产党整风之际，被告人猖狂地向党进攻，并积极写信支持右派分子进行活动。经本院于1958年10月30日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在案。当判决后又发现被告人隐瞒了在看守所内窃取铅笔书写反动诗词恶毒地污蔑国家法律的事实。

上述事实，经查证属实，并有搜获的亲笔所写反动诗词可资证明，证据确凿，被告人亦供认不讳。

本庭认为：被告人杜重石解放前长期充当反动伪职，并有罪恶活动。解放后，仍坚持反动立场，乘我党整风之机猖狂进攻，捕后仍不低头认罪，窃取铅笔，书写反动诗，妄想蒋帮复辟，审判时隐瞒了在看守所中的反动罪行，判决后在搜获反动诗后才被迫作了供认，情节殊为严重，依法应从严加刑惩处。为此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三项及第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杜重石因犯反革命罪应加判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与前判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合并执行徒刑8年（刑期自1958年9月30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3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10天内向本院提起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1959年1月30日判决

这一次，杜重石是特别注意听他宣读的。听完了判决书，不由得火冒三丈，把提审之前反复嘱咐自己的话忘记得干干净净，失去理智似地跳了起来

大喊大叫：“我写的是牢房生活的实情。是先有这种牢房实情，然后才有我的牢房文字。是因为牢房生活的艰苦，才引起我对亲人牵肠挂肚的思念。难道这也叫‘反动诗词’？只有没心肝的人，才说得这种话来！判决书上说我在抗战时期所任的那些‘伪职’，你连名称都没有搞清楚，就说什么掌握了‘确凿的犯罪事实’。与黄××组织‘蜀德社’，有这事。他是川康绥靖公署副官长黄瑾怀。我是川康绥署参议，不是什么‘绥靖参议’。我和他组织‘蜀德社’，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旧瓶可以装新酒’，利用哥老会团体进行统战工作。‘贩卖毒品，聚众赌博’，是因我1946年秋在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的大会上挂了痛骂国民党特务的挽联，他们给我诬栽一个‘袍哥流氓杜重石包庇烟赌’的罪名，目的是借此可以公开逮捕我。你们引用了国民党特务诬栽我的罪名，岂不是和国民党特务站在一个立场上去了？‘谈××’的确是军统特务，也确实介绍我到四川省会警察局挂名任职。不过那是我利用他在军统局的关系，以便取得有利于统战工作的情报。我与他的来往情况，党组织都是知道的，不是什么秘密。判决书中，只有一句是实事求是的，那就是：‘捕后仍不低头认罪。’因为我确实没有什么罪好认。其余各条，不是捕风捉影，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审判员大发雷霆，拍着桌子喊：“杜重石，你老实点儿！你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就丑表功，到今天还不认罪！”

杜重石继续顶撞：“我没罪，叫我认什么罪？我只认命！”

“你这样闹，还想再加几年刑？”

“权在你手里，随你的便！”

审判员让杜重石给气得呼哧呼哧的说不出话来，只好示意民警强把杜重石押回牢房算完事。

杜重石判刑以后，被转到提篮桥监狱。这是上海市最大的一所监狱，11座高大的楼房，能关押上万名犯人。这还是英租界时期英国人建造的。80年代后是上海市劳改局所在的地方。犯人们在这里等待接见一次家属后，就要分配到市属劳改大队去了。至于分到什么地方，一看你有什么特长，是否为本市郊区各劳改工厂所需要，二要看你的体力，第三个才看你的命运。按照公安局的老规矩，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犯人是不知道自己去向何方的。

接见的日子终于到来。接见的地点在提篮桥监狱大铁门里面的那个大院子里。一排桌子打横接成长龙，每次放进四五十个家属来，在桌子的外侧坐好，然后关上大铁门。再到牢房里提出相应的犯人来，坐在桌子的内侧。看守和狱警则在犯人背后盯着，严防有人在接见中进行非法活动。接见的名义上是一刻钟，但是从放进人来到见上亲人，时间就过去了十来分钟，真正能够用来说话的，也不过五六分钟时间而已。

杜重石用8年刑期所换来的，就是与妻儿见面诀别的这五六分钟！

杜夫人带着8岁的长女咪咪来“探监”。才两个多月时间，她看到丈夫已经被饿得脱了人形，绝不是富有诗意的“人比黄花瘦”，悲痛得连一句离别之言也说不出，只是泣不成声。女儿拉着妈妈的手，一个劲儿哭喊：“我要爸爸，我要爸爸！”见妈妈不理她，只知道哭，她倒不哭了，挣脱妈妈的手，一低身就从桌子底下钻了过去。但被站在犯人身后监视的看守大声吆喝所吓了回来，眨巴着大眼睛凝视着面前所发生的一切，不懂得爸爸为什么要被关进监狱里。

“春宵一刻”，不过值千金而已。犯人接见的一刻，往往是万金难买的。

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见了亲人这一面以后，就在人世间消失了，再也不可能见到他了。

一声哨子响，宣布离别的时刻终于到来。杜重石紧紧地抓住了妻子女儿的手，再三重复的只是“你要保重自己”这一句话。——他明白，诸如“照顾好老人、孩子”这一类话，对这个善良、贤惠的女人来说，是无须嘱咐的。

接见后的当天深夜，杜重石和一批犯人即被驱上停在监狱大院子中心的一辆辆大卡车，每辆车上都要密密麻麻地塞进四五十名犯人，挤得连转身也困难。每辆车子的司机旁边，都坐着一名全副武装的押车士兵。然后在警车开道、武装车殿后的阵势下缓缓开出上海市区。沿途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队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迎送，如临大敌。直到车子开出市区很远很远了，天色才渐渐放明。

第十三章 虽九死终无悔

杜重石被判刑以后，第一个到达的劳改单位是安徽的陈村水库工地。一年后转到“和睦山”开矿。在这里渡过了饥饿的“三年自然灾害”，几乎死去。最后被送到普济墟农场，在这里渡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杜重石被判刑8年，却稀里糊涂地服了11年刑。等到他“释放”出来，等待他的却是变相的“无期徒刑”。1975年，他这个本就没有罪，而且已经“刑满释放”的“非战犯”，又被列入战犯的范畴，实行特赦。

特赦回沪，家已破，人还在，不团圆。可悲！

63岁的老人，竟成为新进的工人，月领工资36元。

可叹！

历史不容亵渎！颠倒了的历史，又被人民颠倒了过来。“四人帮”打倒了，刘少奇平反了，邓小平复出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了！

1980年，杜重石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如果从1950年算起，足足30年！

尽管他已经是耄耋老人，但是对共产党的忠心不变，对祖国的爱不变，对政府的信任也不变。虽九死，仍无悔！

一、劳改第一年

出于车上任何一个劳改犯的意料之外，这一次“转监”，没到上海郊区，而是出了省界，到了安徽省的陈村水库工地。

冬春之交，昼短夜长。到达陈村水库工地的时候，天色已经快要黑了。车子在一个广场上停住，大家下车，一共有200多人，由接收的队长整队点名。每点到一人，就出列到行李车前面认领自己的铺盖，另外站队。每10人一组，临时指定了组长，然后每人发给粗瓷饭碗一个，竹筷子一双。

全部点名完毕，队长讲话，说明这里是陈村水库工地，他是劳改大队的队长，姓谷。陈村水库是1958年大跃进中开工的防洪、灌溉两用水库。在工地劳动的有民工，也有劳改队。为了争取在1959年年底完工，所以增加劳动力。要大家好好儿劳动，改造思想，争取立功减刑。同时宣布纪律：不许越过警戒线，不许与民工有任何接触，不许打架斗殴，不许……

最后各人自己扛着行李，进入工棚，工棚离工地不远，是一个很大的用土墙围起来的院子，门口有警卫。里面除队部是砖房之外，一排排都是土墙芦苇顶的工棚，有的还苦着大块的黑色油布。工棚很矮，里面阴暗而潮湿，白天也要开着电灯。给这200多人住的工棚，看样子是新盖起来的，地面坑洼不平，还有积水，没有住过人的痕迹。每一间工棚，都有面对面的两个土炕，炕上铺着厚厚的干芦苇，每个炕上规定睡30个人，每人有将近1米的铺位，可见这工棚有多大。

刚刚把铺盖打开，外面就吹哨子，有人喊：“开饭！”拿着碗筷出门一看，大伙房门口已经排起了好几条长龙。拉住一个“老号儿”一问，原来这里吃饭是“自取制”，不分，也不定量，能吃多少吃多少。这可真是天大的喜讯。杜重石自从1958年9月30日被捕进入黄浦分局，一直到1959年2月底送来陈村水库工地，5个月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对于“饥饿”两个字究竟是怎样写的，比上小学刚认识这两个字的时候体会深刻多了。以至于今

天听见“不定量”三个字，简直比小孩子过年还要高兴，比大人买了彩票中头奖还兴头。他拿着饭碗排上了队，好不容易到了饭桶跟前，盛了满满的一碗，挤出人群仔细一看，这哪里是饭，原来是砸成小颗粒的豆饼和整粒的老玉米混合在一起煮成的东西。——是农民用来喂猪喂马的饲料！

“争取到劳改队好吃饱饭”的梦幻彻底破灭了。但是饥肠辘辘，为了活命，不想吃也得吃。所谓的“饭”，坚硬而难嚼，粗粝而难咽，里面还混有草茎、豆梗之类无法下咽的“杂质”，不得不一边吃一边吐。一碗“饭”，足足吃了有半个小时。吃完以后肚子胀得不行，还不知道脆弱的肠胃能不能接受得了。

第二天的早饭，依旧是这东西，昨夜一顿就吃倒了胃口，第二顿只吃半碗就饱了。

早饭后整队出工，第一天干的活儿是用小车推土、推石头。这活儿虽然累，比用肩膀挑还是省力一些。中午饭由伙房送到工地来吃，当然还是豆饼玉米饭。不过由于推了一上午车，身体需要补充热量，吃起来不但比头两顿多，而且也觉得比头两顿香。等到下午收工回工棚吃晚饭，这样的“饭”，居然也能吃上满满的两大碗了。

收工回来才发现，大伙房和工棚外面，都一摞摞地堆着许多豆饼。不但露天堆着，底下也不垫任何东西。伙房门口，有几个面有菜色的轻病号在用小铁锤把豆饼砸成一粒粒的“骰子块儿”。据说队部的队长、指导员、干事等人，吃的主食也是这种豆饼玉米饭，只不过副食比犯人强些而已。这可真是难为他们了。在劳改队当干部，不但要与犯人一起风吹日头晒，还要吃同样难以下咽的“饭”，也真不容易。

春去秋来，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个月，在水库将近完工的时候，工棚前后堆放的豆饼总算吃完了。伙房里传出来好消息：明天要吃“大馒头”了。这又是一个天大的喜讯。连听着、想着都流口水，许多人还为明天的这一顿美味佳肴折腾得夜不成寐，总盼望着早些天亮，连做梦都看见又白又软的大馒头！

第二天的早饭，杜重石也不例外地早早就到伙房门口排队。但是打回来的“馒头”，不但不白不软，而是又黑又硬。一问，才知道这种“馒头”不是用面粉做的，而是用麦子磨面以后剩下的麸皮做的。这东西没有凝聚力，拿的时候要用两只手去捧，不能用两个指头捏，不然，稍一用力，就散成粉末了。吃的时候比豆饼玉米饭似乎好下咽一些，但却更难消化。吃下去是什么样子，拉出来还是什么样子。拉的屎经风一吹就散。更难受的是由于麸皮太糙，缺乏润滑性，几乎人人大便闭结，拉不出屎来，不得不用肥皂头塞进肛门里，才能借肥皂的润滑性把大便拉出来。

陈村水库提前完工，杜重石当年即转到“和睦山”矿区去开矿。这里的饭食倒是比水库工地的要好些，至少是“正规些”，不再吃那些不是粮食的粮食了。但是口粮却有定量，是按照各人的体力主要是劳动支出分强、中上、中、中下、弱五个等级定的。杜重石年近“知命”，又是个书生，体力并不太强，只评了个中下。但是矿山上没有轻活儿，几乎人人都超负荷劳动，“中下”体力的人，所付出的劳力，却是“中上”的。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热量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可以说，他自从到达“和睦山”以后，就从来没有吃饱过一顿饭。在拘留所曾经痛恨过、诅咒过的“饿鬼”，又跟定了他，使他躲也躲不开，甩也甩不掉，只好白天黑夜伴随着他。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消

瘦，是浮肿，是四肢无力，是头晕眼花。这时候，人们倒又怀念起陈村水库工地那爱吃多少吃多少的豆饼玉米饭来了。不管怎么说，总能把肚子吃饱哇！

但是当时劳改队里几乎人人如此，这点儿“小病”，不可能不出工。于是凡有亲人的，大都纷纷写信要求寄邮包，当然是要吃的东西。按照劳改队的规定，犯人家属一般只能寄衣物，食物原则上不收，寄来也要退回去。后来放宽到每次可收1公斤。鉴于犯人吃了自己家里寄来的食物，能够增加体力，能够多干活儿，于是每次可收的食品逐渐由每次1公斤上升到2公斤、3公斤。

家里寄来的食品，除了自己解馋、疗饥之外，还有一种极大的用处，那就是用来向“狱医”行贿。

狱医也是由犯人担任的。在劳改队里，有两个行当最吃香，一个是大夫，一个是大师傅。犯人当了大夫，可以不干体力劳动，而且不问学历，哪怕是因为“无照行医”抓进来的，到了劳改队，无照行医就合法了。当大师傅的可以混个肚子圆。“劳改经”所谓“劳改进伙房，好比上天堂”。但是狱医属于轻劳动，口粮定量是最低的。在副食油水不足的情况下，狱医也觉得肚子饿，也觉得吃不饱。但是狱医手中有权，有开病假条的权。谁的病是轻是重，能不能出工劳动，全在他的一句话。于是，就有人拿食品去贿赂狱医，用来换取一天两天的休息，或证明不能继续从事强体力劳动，建议调剂一下工种。

杜重石其实早就身体顶不住了。从1959年开始，他的消瘦和浮肿越来越厉害。他是很需要休息和调剂工种的。但是“狱医房门朝南开，有病无肉莫进来”，他拿不出肉罐头来贿赂狱医，就拿不到这张巴掌大的小纸片儿！

他肚子饿了一年多，眼看着同监们从家里寄来糕点、罐头，最次的也寄来些炒米粉，适当地减缓了饥饿的威胁，何尝不想也让家人寄些来？但是一想到家里根本就没有积蓄，而妻子的每月62元工资，要付水电房租，要填饱一家四口的肚子，生活水平线已经降到了最低限度，何况从1960年开始，所谓的“自然灾害”也已经袭击了上海，猪肉、豆腐之类的平价物资都要凭本定量，而肉罐头之类的高价商品，则价钱贵得吓人。他有心想让家里寄，也张不开口哇！

开始的时候，他以为“吃不饱”的问题只存在于劳改队，社会上的公民，只要有钱，当然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后来慢慢从劳改干部那里听说，社会上也缺衣少食，而且到了饿死人的地步，就更不好张口向家里要东西了。

1959年底，杜重石到了“和睦山”矿区以后，正所谓痛定思痛，经过回顾与展望，脑子里有了两个想法：第一，冤案产生了，不能让它冤沉海底，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必须尽一切努力把冤案翻过来。因此，不但不能自杀，而且必须“保命”。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奔走翻案；只有活着，翻案才有意义。第二，妻子刚过40岁，尽管已经不是风华正茂的青春少年，至少还不老，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有一半儿路程没有走完，绝不能让她陪自己受这么多年罪，必须尽一切可能与力量动员她离婚，然后走自己的路。只有这样，两人才不会在桅断帆破的同一条危船里，在风雨飘摇中一起沉没，同归于尽。

出于这样的心态，他花费了好几个夜晚，洋洋洒洒又恳恳切切地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以“长痛不如短痛”为理由，动员她与反革命分子杜重石划清界限，提出离婚。

信交到队部 4 天以后，郑干事找他谈话了。

“犯人寄出寄进的信件，队部都要经过检查，这你知道吧？”

“知道。”

“你和家里来往的信件我都看过的。”他从衣袋里摸出杜重石劝妻子离婚的那封信。“从信上看，你们夫妻的感情很深厚的嘛。你爱人看到了这样的信，心里不难过吗？这封信退给你。你再考虑一下是不是寄。”

“不用考虑了。我是考虑了好几天以后，才决定这样写的。”

“还是考虑一下吧。你进来快两年了，在劳改队里，不大知道外面的情况。劳改队的生活当然艰苦。不过外面的生活也很困难。在这里粮食定量低、劳动强度大，这我们都知道。不过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让你们吃‘代食品’。在外面，早就吃上‘代食品’了。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我嫂子和妹妹在乡下，都因为粮食不够吃得浮肿病死了。”他说到这里，眼睛里噙着泪花儿，说话的声音也哽咽了。

“农民公社化以后，不是吃饭不要钱吗？怎么还会得浮肿病？”杜重石惊讶了。

“公社办食堂，吃饭不要钱，大家可以放开肚子吃饭，当然高兴。还把家里的铁锅、铁壶都送去炼了钢。可是公社的粮食产量有虚报的，交了公粮以后，自己仓库里的粮食并没有这么多。库存一吃完，食堂就开张不了了。各家家里都没有粮食，连锅都没了，有什么办法！天灾是一方面，更可怕的是人祸。还有苏联老大哥向我们讨债，不得不把本来就不多的农产品运到苏联去。国家有困难，大家要勒紧裤带共渡难关。”

郑干事是安徽人，合肥高中毕业后参军，在国民党起义部队吴化文师做文化工作，转业以后分配到劳改队来当干事的。他在劳改干部中比较有文化，对待犯人态度也比较好，从来不大声呵斥，在犯人中威信很高。

杜重石听从了郑干事的劝告，这封信没有发出去。

到了 1960 年，矿上开始死人。最先死的，是身体最棒的人。他们往往出工的时候还什么“病”都没有，但是走到半路上，或干着干着活儿，或在收工的时候，突然往地上一倒，就没气儿了。这是因为他们膀大腰圆，干的活儿重，所需要的热量也多，一旦失去平衡，就好像一盏灯似的，油耗尽了，灯也就灭了。大家都知道，这是饿死的。但是每个死人的死亡报告上，又都有大夫的签字，证明他们都是病死的。谁要敢提“饿死”两字，立刻关你的禁闭。这一来，别人是不是饿死姑且不论，你是注定非饿死不可了。因为禁闭室里，一天只喝两碗清汤似的稀粥！

这时候，杜重石明显地感到自己也不行了。小腿已经浮肿得和大腿一样粗，一按一个坑，亮晶晶的，好像一掐就能掐出水来。胸口的肉却一天比一天少，一根根肋骨，像搓板似的。每天收工回来，劳累加饥饿，一躺倒就像死人一样，困倦得动也动不了。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地方不酸疼，特别是腰和腿，简直不像是自己的一样。一早起来，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天黑。天黑了可以躺着睡觉，可以在梦中与妻女相会，可以解脱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他明白，如果再拖下去，他非死在这里不可。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只得厚着脸皮，写信向家里要肉罐头了。

也不知道家里人怎么勒紧了裤带，或者是变卖了什么最后的家当，因为罐头确实寄到了，而且有好几个之多。他手里捧着肉罐头，眼睛里噙着泪水，向狱医室走去。到了狱医室门口，急忙擦干了眼泪，然后装出一副乐不可支

的神态来，告诉狱医家里寄邮包来了，没得说，当然是分而享之。

这种“化学反应”是非常快的。第二次杜重石到狱医室看病，用不着他开口，狱医就以十分关切的口气说：“你的身体已经很糟糕，不能再在矿上干活儿了。我立刻向队部反映，给你调剂一下工种。”感谢肉罐头的效用，不久杜重石就被调到了工程指挥部蔬菜生产大队去了。这里伙食虽然并不比矿上好，劳动却比矿上轻得多。

蔬菜队一共有 200 多人，大都是身体比较差的弱劳力。尽管种菜的劳动比开矿要轻得多，但是经不住肚子里缺食，大家的身体都越来越虚弱了。这时候，身体最棒的第一批死人高峰已经过去，第二批死亡高峰接着到来。这一批死的，是身体最差的老病号。他们本来就是风中残烛，勉强苟延残喘而已，一遇见较大的风，烛火就灭了。到了 1961 年，原来 200 多人的蔬菜队，几乎减员一半儿，只剩下 100 多人了。

荒年中最能拖的是像杜重石这样身体不棒但也不是最弱的人。他们不要大量的热量支出，而稍许有一点儿热量就能维持生命的火花儿继续燃烧。不过这个“拖”字，也有一定的时间性。短时间的拖，也许还能拖过去；如果长久地拖，只怕也没有挣扎着活下来的本事了。

二、一线生机

1961 年夏初的一天，杜重石又遇见了开矿生产队的郑干事，他问起蔬菜队的劳动情况，杜重石告诉他：蔬菜队原来有 200 多人，后来减员一半儿，现在只剩下 40 多个人了。再这样下去，恐怕这 40 多个人也剩不下。郑干事沉吟半天，透露了一个消息：“不久你们可能要调到普济墟农场去了。听说那里的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果然，不久之后教导员召开大会作动员报告，说为了大家将来重新做人能够自食其力，领导决定调大家到普济墟农场去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又说那里粮食丰收，鱼虾满塘，生活条件比这里好得多。大家听了都很高兴，都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

1961 年仲夏，杜重石到了普济墟农场。这里以前是军垦农场，有相当大的规模，总场为团级，设场长、政委；分场是营级，设分场长和教导员；中队是连级，设队长和指导员。全场共有 5 个分场。每个中队下面又分大田、菜园、饲养、副业等生产组。杜重石被分配在二分场五中队的菜园组劳动。这里离总场比较近，住的工棚也比以前好。虽然依旧是二三十人住一间大房间，但不是睡通铺，而是每两人睡一张小土炕，炕与炕之间有一米宽的空间，可以放一些衣服包裹日用杂物。炕头还有专门放鞋子的“鞋洞”。起床之后，出工之前，要求把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被子叠得四棱四方。所有这一切，可能都是军队留下来的好传统、好习惯。就是称呼也和以前不一样，不叫“劳改人员”，而称“服刑人员”。

1962 年正在秋收中，由于台湾国民党想趁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的内外交困期间发起反攻大陆，农场奉上级命令采取“应变措施”，把犯人中原国民党科长以上的文官、营长以上的军官都集中到五分场七中队，称为“从严队”。杜重石是国民党少将，当然在其中。

有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杜重石被“从严看管”以后，反倒更加轻松了。当时忙于秋收，其他各队犯人大都天不亮就起床，直到天黑才收

工，一天要劳动 12 小时以上。“从严队”从严管教，规定上午 8 点出工，下午 4 点收工，生怕这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会趁早晚天黑逃出去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

“从严队”以学习为主，劳动为辅。学习什么呢？一曰“交心运动”，向政府“交出红心”，也就是各人把自己的罪恶翻出来再叙述一遍、认识一遍，写一份“忏悔书”。二曰“一封信运动”，在认罪的基础上，每人给家里写一封“忏悔信”，写自己的罪恶给家庭、给社会带来了多少危害、不幸和痛苦。

这两件事情，对杜重石来说，倒真是痛苦之极。他本来就没有罪恶，是冤假错案给他和他的一家带来了危害和不幸。现在硬要他倒过来说，不说还不行。如果在平常日子，按他的犟脾气，倒真可能来一个“不认罪就是不认罪”，但当时一者是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非常时期，不要顶风上，白让人家抓了“配合蒋介石”的典型，那更冤枉；二者在“从严队”里呆着挺舒服的，别“放着自在自找不自在”。因此，也只能违心地按照判决书上所定的几项罪名再“提高一下认识”，然后给家里写封信，什么“我现在是鬼，你是人，阴阳各路，要划清人鬼界限”等等。他把这样的“忏悔书”和“忏悔信”交了上去，居然也过关了。

这时候，社会上由于 1958 年虚报产量的浮夸风所引起的大饥荒有了教训，发热的脑子开始降温，不再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胡话了。但在劳改农场，这股风却还方兴未艾，依然很有市场。“从严队”就种有一丘小株密植的“示范田”，队长扬言要亩产万斤以上，放一个“大卫星”，以此来显示队长的领导有方。

丰产田亩产万斤上报以后，上级派人来检查，队长从大田组召集一帮小伙子，连夜把别处田里长得最好的稻子连根带土铲下，移栽到“示范田”里。上级来检查的时候，还特地抱了个孩子来坐在稻穗上面拍照，以显示其“真实性”。可惜的是检查组只来一天，而且只是站在田外看了看，不明真相。检查组一走，移栽过来的壮稻就全部趴下，刚刚灌浆的稻穗也无法再成熟，全浪费了。

其实，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1958 年“大跃进”年代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这里之所以“还当新闻来写”，是因为别处都已经收敛了，而劳改队里居然还正在学！

到了 1963 年的秋收季节，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烟消云散，“从严队”也奉命结束。杜重石被调到三分场六中队菜园组继续种菜。

这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基本上已经过去，粮食紧张也略有好转。像杜重石这样的劳动力，不但每月也有 30 斤口粮定量了，中队里每半个月还宰一头猪，有时候还在墟塘里捞一些野鱼来给犯人改善伙食。此外，每月还发给 2 元“假定工资”，不是现钞，而是场里自印的“代价券”，凭券可以到场内开的“百货供应站”买东西。每月还由干部带领“管大账”的犯人推着小车到附近的村镇去购买日用品。

这期间农民们还没有从“灾荒”中解脱出来。每天社重石他们收工以后，都有农民家的妻女到菜园里来捡那扔掉的老菜、坏菜。她们捡回家去，不是用来喂猪，而是做菜吃。据她们说：母鸡下几个蛋，村干部也不许她们拿到市集上去卖，认为那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只许拿到收购站按低价收购。她们中间还真有人愿意到劳改农场来干活儿的。可是劳改农场不能

收公民，她们想来还来不了！

劳改队的生活超过了农民的生活，杜重石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妻女。她们四个人靠妻子每月 62 元的工资，怎么生活呢？他妻子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大义灭亲、六亲不认、人情冷淡、世态炎凉的时代，她是决不会去求“嗟来之食”、自招白眼的。可自己是个没收入的犯人，离刑满释放还有好几年时间。想来想去，忽然想起 1948 年朱蕴山老先生还借过姨妹夫姚振华港币 600 元这笔陈年老账来，就抱着“姑妄一试”的心情，给他发了一封信。信是寄他秘书潘幸生转的。信中大意说：自从被判刑之后，妻女生活窘迫，甚干涸辙之鱼；1948 年朱老在香港借姚振华港币 600 元，早已代还；如有回信，请寄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杜先清处等。

朱蕴山到底是聪明人，收到了这封信，立刻懂得了“弦外之音”。两个月之后，杜重石收到胞妹来信说：收到朱蕴山先生汇款 300 元，汇上海 200 元，余 100 元按月寄农场补助生活。

在那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朱蕴山老先生敢于不避界限不清的非议，重视政治道义，雪里送炭，古道热肠之心，也十分不容易了。

三、“文革”中女儿探监

转眼间到了 1966 年。天灾人祸带给中国百姓的苦难刚刚结束，人们刚刚吃了几年饱饭，人民生活刚刚开始安定些，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鼓又擂响了。

十年动乱，从此开始。

“文革”中的事情，可写的实在太多了。诸如各种批斗会、背诵红宝书、大跳“忠字舞”、破四旧立四新、推行早请示晚汇报的宗教仪式等等尽人皆知的雷同故事，这里就都不去说它了。

到了 1968 年暑假，咪咪和茜茜姊妹俩到劳改农场看望父亲。这时候姐姐 18 岁，妹妹 16 岁，都已经长成大人或“准大人”了。她们在学校里读书，因为是反革命子女，被划为“黑五类”，不但不许参加“红卫兵”，平时也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批斗甚至殴打，日子当然很不好过。通过女儿的叙述，杜重石才知道妻子工作单位的造反派曾经带领红卫兵到家里来抄家两次，第一次是翻箱倒柜，把看得上眼的东西和整套红木家具都搬走了，理由是“反革命分子剥削人民所得的东西应该归还人民”。第二次强迫他妻子穿上解放前留下的旗袍和高跟鞋，脖子上挂着“反革命分子杜重石家属”的牌子，被头戴柳条帽、手拿“哭丧棒”的造反派推推搡搡地押着她在住区附近游街，还要她手提铜锣，自敲自喊：“我是反革命家属。”造反派则口出秽言，恣意辱骂。他妻子本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受到这样的侮辱，痛不欲生，曾经两次自杀：一次跳楼，一次去摸电门，都被家人救下，自杀未遂。现在卧病在床，由母亲照顾着，可又担心丈夫在农场受到更大的冲击，所以特地打发两个孩子来看看。

听了姊妹俩一字一泪的叙述，父女三人抱成一团，哭成了一堆，悲痛之声，溢出于接见室之外。正好管教队孙队长从这里路过，进来一看，见父女三人如此伤心哭泣，解劝说：“你们父女多年不见了，今天相会，应该高兴些才是。”又带他们到犯人理发员住的一间小房间，说：“我叫他们把房间腾出来，暂时给你们三个人住。劳改队里的刑事犯，什么人都有，什么事情

都做得出来。夜里你和她们一起住在这里，比较安全些。你到小伙房买点儿饭票，让她们在小伙房吃饭。”

当晚孩子们到小伙房买饭菜，她们特别老实，自己能吃多少就买多少。炊事员悄悄儿对她们说：“以后你们可以多买一些，自己吃不了，可以留给爸爸吃嘛。大伙房半个月才吃一次荤菜，小伙房天天有荤菜，还有鸡、鸭。”

从那以后，姊妹俩买饭菜就尽量多买一些荤菜，拿回来给爸爸吃。

第二天，孙队长特别来通知：让杜重石休息一天，不出工，在房间里陪女儿多聊聊家常。以后晚上小组内的学习时间，也可以不参加，和女儿们一起多谈谈。

那时候，社重石因为肚子里油水不足，对红烧肉特别感兴趣，更爱吃大肥肉。有一次，姊妹俩到小伙房买了两大盘荤菜，鸡、鸭、红烧肉都有，还买了六张葱油饼。正好孙队长也到食堂来买饭，看见姊妹俩买了这么多的饭菜，笑着说：“你们姊妹俩，胃口不错嘛！”

姊妹俩当然不知道劳改农场的“规矩”，也不懂得说谎，天真地回答说：“我们吃不了这么多，是带给爸爸吃的。”

不料孙队长却笑笑说：“小孩子对父亲应该有孝心。”

孩子回来跟爸爸一说，杜重石大有感触。在劳改队里，虽然大多数干部都是面孔铁板，甚至言语粗鲁，态度蛮横，但也有一些干部，像这里的孙队长，以前在“和睦山”的郑干事等，是很通情达理的，是很有人情味儿的。他们首先拿劳改犯看作“人”，做的是“感化人”的工作。从效果上来看，他们的成效更其好。可惜，像这样的干部，在劳改单位不但数量很少，地位大都很低。

四、新生之后，劳燕分飞

社重石被判有期徒刑8年，刑期从1958年9月30日算起，按说到了1966年9月30日，刑期就满了。怎么到了1968年暑假他的两个女儿来看他，他还是“服刑人员”没被“释放”呢？

原因就在于他还有3年“剥权”。从法律上说，“剥权”是剥夺公民权，诸如选举权、被选举权、著作出版权等等。剥权也是一种处分，但却应该算在刑期之外。按正规办，应该先释放，然后以管制分子的名义存在于社会上。也许是“文革”期间的新发明新措施，也许是当时的劳改单位对于“法制”观念十分淡薄，特别是远离城市的外地劳改队，为了省事，往往把“剥权”期也算在刑期里面，“合并执行”。于是杜重石就在这些“省事者”的“照拂”下凭空多服了3年刑。

苦挣，苦熬，苦等，苦盼，苦苦熬煎了11个年头，终于到了1969年的国庆节前夕。不论是正式的刑期，还是附加的3年“剥权”，总算都熬满了。杜重石正喜滋滋地做好了回上海与家人团聚的打算，到了大队干事代表国家来宣布“刑满释放”的时候，忽然平地一声雷，“执行通知书”上写的是“刑满释放，留场就业”8个大字！

什么叫“留场就业”？没有到过劳改农场的人，一定很难理解，必须作一番解释。

“就业”，指的是没有工作或失去工作的人走上工作岗位。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在劳改农场，这却是一件谈虎色变、闻之丧胆的大坏事。

“文革”以前，凡是劳改犯，经过判刑劳改以后，除了服刑期间重新犯有重大罪行依法加刑者外，一般是到期必定放人。执行得很严格，连半天也不差。上午抓的上午放，下午抓的下午放，半夜里抓的，稍稍提前，黄昏以前一定放。宣布释放以后，把铺盖行李搬到招待所去，然后办理各种手续，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离开之前，劳改单位还会派一辆马车把你就近拉到汽车站或火车站。到了自己的原籍，凭释放证就可以恢复户口，然后由街道或民政部门安排适当的工作。

“文革”开始以后，各大城市“清理阶级队伍”，凡是属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的，大都押解回原籍监督劳动。哪怕是三代以前的祖籍，从来没有去过，村里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也会从档案中把根儿“倒”出来，然后押了去。

因此，劳改释放的人，哪怕没有戴任何帽子，也为城市所不容。至少是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人，中央公安系统有内部文件，规定“释而不放”，一律强迫在原场或原厂“就业”，称为“就业人员”。

劳改释放，留场（厂）就业，并不是“文革”期间的发明。早在50年代，国家的劳改政策中就有“就业”的规定。但有几个前提：第一是自愿；第二是无家可归的人；第三是有较高的劳动技术，生产上一时离不开的。这三条中，又一切服从第一条，哪怕他根本就没有家，劳改释放以后他愿意走，也只能让他走，不能拦他。因为一旦释放，他就是公民。公民拥有人身自由。至于生产上离不开，那也只能协商，“请”人家暂时留下来“帮忙”，一旦有人接替，还是得让人家走。这种经过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新人”，就业以后，通称“职工”。国家政策规定：这些职工各种待遇都与没有劳改过的外聘职工完全一样，工资按国家劳动局定的级别发，有工会组织，被评上先进生产者的，一样可以得到各种奖励，包括到疗养院疗养等等。

但是“文革”期间的“就业人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统统划入了“牛鬼蛇神”系列，而且依旧是专政对象，政策规定一律由原劳改管教部门管理，与“劳改人员”、“劳教人员”合称“三类人员”。

“文革”开始后的就业人员，待遇比劳改、劳教人员略为好一些。例如有通信自由，但来往信件依旧有被“抽查”的时候，还不是暗地里查，而是光明正大地剪开信封，看过以后，能给的印上一个“信件检查”的条戳发给各人，认为有问题的，特别是国外寄来的信件，不声不响地就没收了。例如有人身自由，但星期假日外出仍需请假，而且只限于到本场几个分场去看看以前一起劳改的“朋友”，最多能到附近几个村子去买点儿东西。再例如有选举权，但只规定你选场长或政委做人民代表，选别人是不行的，当然也不会有被选举的可能。

既然是“就业”，当然应该有工资。但是这工资的数目极低，基本上只够买饭票的，要做件衣服穿，就得从牙缝里省。“就业”政策是全国性的，但工资标准却各地不一样。拿农田工来说，北京地区的劳改农场，1969年最高的三级工工资是43元，二级工是36.50元，一级工是32元，等外一级是27元，等外二级是25元。四级工直到八级工名义上也有，但谁也拿不到。个别人或体力特别强，或技术特别高，或特别善于迎合队长的喜恶，一个中队里也许有一个两个四级工，工资则是48元。

杜重石在安徽劳动，但又属于上海市劳改局管，不知道他们执行的是上海的标准呢，还是安徽的标准，总之，发给他的月工资居然只有12元！

政治待遇差、工资低，这都还可以忍受。无法忍受的是，判刑有期，就业无期。从理论上说，就业是安排工作，不是处分，当然没有期限，但是又带有强制性质，释放以后，你不愿就业也不行。如果你不辞而别，除了新疆之外，户口哪儿也报不上，一旦抓回来，罪名则是“逃跑”。轻则批斗一两场，重则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变相的刑罚，整得你不敢再逃才算完。

这样的“就业”，难怪劳改释放的人闻之丧胆了！

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去”，杜重石没有三头六臂，只能乖乖儿地在这里廉价地出卖劳动力。可他这一年已经 57 岁，再过几年，力气卖不动了，奈何？

11 年时间，盼来的是“变相的无期徒刑”，杜重石心情的恶劣，可以想见。原指望出来以后，法制也许健全一些了，再依法申诉，以免冤沉海底。可是看看“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哪一件是讲法律的？看起来，自己这一生，是只能“冤死”在这里不可在这种心情下，加上他与妻子重聚的希望已经没有，于是他“获得新生”以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写信给妻子，告诉她这里的实情，宣布与她离婚。

但是这封信发出之后，没有接到家里的回答。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妻子在上海的遭遇：

造反派第三次来抄家，妻子拿出丈夫写的信：“我和杜重石已经离婚，划清了界限，我现在不是反革命家属了。”

他们恶狠狠地反问：“既然离了婚，为什么还不嫁人？不嫁人就是还有联系，就是界限没划清楚！”

这些自以为“革命”的造反派呀，他们手中居然会有这样大的权力！“我虽未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为免妻子受这无端的牵连、无尽的痛苦，还是那句话：长痛不如短痛，情迫之下，只好含悲忍泪，从此劳燕分飞，别无选择！

五、特赦公民，家破人在

1974 年冬天，凡是在农场劳动的原国民党军政系统县团级以上人员，不论是劳改还是就业，统统集中起来，调到白湖农场。

为什么要集中调走？谁也没说。公安局办事，一向如此。因此，在途中大家都纷纷猜测。

有人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蒋介石想趁机反攻大陆，政府把我们集中起来过一次，怕我们出去乱说乱动，配合蒋介石。这一回，是不是国内外又有什么风吹草动了？”

有人说：“别想那好事了！这次集中，我看是凶多吉少。现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共产党内部打了个不亦乐乎，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批斗，今天这个下去了，明天那个又上来了，走马灯似地团团转，比三年自然灾害更乱，台湾国民党还不想趁此机会反攻大陆？为了防止咱们这些人配合，集中起来，便于管理，必要的时候，处决起来不也方便一些吗？”

杜重石哈哈一笑，“别瞎猜了！干嘛自己吓唬自己呀！‘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三年自然灾害、死了那么多人，咱们几个，都是阎王爷不收的人。为什么不收？因为咱们都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人嘛。这次集中，也许每人都有一个大大的福在等着呢！”

一席话，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批人到了白湖农场以后，被编在一大队十中队菜园组劳动，似乎一切照常。直到 1975 年初冬，政府公布了特赦令，对被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和军警宪特县团级以上人员实行特赦，其中也包括杜重石在内，但不知道算是哪一类的。

特赦对杜重石来说，其实是一宗笑话。从“法”的角度说，杜重石早就已经刑满释放，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还要政府来特赦什么？从“理”的角度说，杜重石是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根本就不是国民党那个系统的人，也没有犯任何罪，特赦什么？把他拉出来特赦，简直像把死人拉出来再枪毙一样笑话！

但是笑话归笑话，现实生活中却非按照这种笑话去办不可。不然，杜重石就只能一辈子在劳改农场“就业”了。

简单地说吧，杜重石被宣布特赦后，又集中学习了半年，于 1976 年回到了上海。由上海市的公安部门通知他女儿到火车站接他。父女相见，悲喜交集。

杜重石虽然回到了上海，实际上上海已经没有他的家了。这时候大女儿咪咪已经 26 岁，成家之后，住愚园路 1407 弄 28 号。如今家破人在，只好暂时住在女儿家，等待政府的安置。

当时中央对特赦人员的工作安置、住房分配等问题都有严格的规定，上海市公安局也不能不执行。但是国家并没有为这批人拨专款。安置的措施，只能把这些人安插到国营企业中去，让他们“老有所养”。尽管那一年杜重石已经 63 岁，早就超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为了给他找一个管他今后余生的单位，还不能不勉为其难。结果，总算把他安排在江苏街地段医院当挂号员，按新进工人待遇，月薪 36 元。

杜重石年纪虽然大，但他对工作的认真，却非小伙子可比。他建立了病历卡索引箱，减少了寻找病历的时间，加快了挂号的速度，年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六、时来运转，政策落实

打这以后，神州大地上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同志复出，“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反右运动被认定是“扩大化”等等。

不久，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的讲话发表了。讲话中提到：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就凭这几句话，人们有理由说，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人民造福的实事求是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这期间，历次运动中人为地造成的各种冤假错案逐渐得到平反。杜重石想起自己的冤假错案定得毫无根据，在这样的政治空气下，得到平反应该说是毫无问题的。于是他认真地写了一份申诉书，于 1979 年初上交黄浦区人民法院，并将副本送呈黄浦区统战部。

但是当时要清理的案件太多，法院里案卷堆积如山，几个审判员白天黑夜地加班，也看不过来。一直拖到年底，依旧没有消息。其间他也曾多次到法院催问，并托统战部代向法院催询，答复都是“安心等待通知”。也就是说，他的案子，还没排上队。

1980年初，民革中央负责人朱学范到上海，杜重石找他谈了申诉至今没有下文的情况。朱学范答应他向上海市委统战部介绍他与民革的历史渊源，以便统战部与法院及早处理这一案件。

朱学范的一句话，胜过本人催问上百次。他的案卷，立刻被挪到了前面来尽快处理。没过多久，到了1980年2月，终于得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宣告杜重石无罪。

但在判决书中却有这样一段属于“尾巴”性质的文字：“至于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行及在看守所内所写词句，虽有错误，但未构成犯罪。”这分明是办案人员思想没有彻底解放，唯恐将来政策有变，预先给自己留下的退路。

这时候杜重石已经被聘为长宁区政协委员。他找政协长宁区委协助落实政策的负责人邢女士说：“我在看守所写的是牢房生活实情，其中没有半点夸大与失实诬蔑之辞。是先有了牢房中这样的生活，才有根据实际生活记录下来的文字。共产党是最讲究‘认真’的，这样认真地说实话，怎么能说是错误呢？”

邢女士据此与黄浦区法院交涉，总算把这条最后的尾巴也割掉了。不久，黄浦区人民法院再次送来了判决书，内容如下：

现经查明：杜重石在解放前曾任国民党二十军杨森秘书、驻沪办事处（少将级）处长、川康绥靖公署参议等伪职属实，但早与我方接触并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撤销本院（58）黄刑字第2793号判决和（80）黄法复字第18号判决，宣告杜重石无罪。

严格地说，川康绥靖公署参议是他做地下工作的“外衣”，根本就不应该算是“伪职”。不过事情争取到了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些许出入，不计较它也罢。

历史是公正的。那个出于阶级偏见死盯住杜重石不放的李宗林，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顽固地追随“四人帮”，疯狂地迫害群众，多次挑起武斗，终于在一次武斗中身负重伤，死于非命。在错误的道路上，划上了休止符。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善恶到头总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杜重石平反以后，其工资关系转到了他的原工作系统，上海市第一商业局中百公司，按行政17级待遇。至于这30年冤案所造成的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损失，并没有任何赔偿。说实话，一个人的30年生命，这样巨大的损失，也不是几万块钱所能弥补得了的。退一步想，总算活着出来了，没有瘐死狱中，比起那些虽然落实了政策，但却已经“无福消受”的人，不是还强得多吗？

这时候他除了政协委员之外，还担任了民革长宁区委委员、副主委。

1980年10月，杜重石以感激之情，给朱学范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在恢复政治名誉的关键时刻，出于政治道义，使他的平反得以早日落实。真所谓“疾风知草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不久，朱学范即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亲笔信：

重石同志：

顷接来信，非常高兴。现“四害”正在审判，这是正义的审判，全国人

民大快人心。同志之冤案，早已平反，恢复政治名誉，闻之不胜欣慰。同志的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理应恢复，没有问题。我当注意及之。草草即复，并颂康健！

朱学范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七、热爱祖国，上书市长

杜重石的冤案彻底平反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通过关系寻找夏炯的下落。几经周折，终于得知他已经在1950年作古，当然并不是“寿终正寝”，而是强迫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因为他一生既打过共产党，也帮过共产党，解放战争的后期虽然也投向了解放军，但是不久即以莫须有的所谓“叛乱”罪被镇压了。在那个年代，夏炯的女儿夏文湘也被下放新疆，在石河子红山嘴电厂工作。杜重石与她取得联系后，得知她因为父亲的历史关系，受到牵连，至今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当即写信告诉她：夏炯在历史上虽然打过共产党，也帮过共产党，何况最后还是光荣起义的。关于她父亲代表二十军与红四方面军密谈、支援红四方面军的事情，如今只剩下当年的红四方面军司令员徐向前可以证明，要她大胆给徐向前同志写信询问。不久，中央军委办公厅以信函的形式代替徐向前同志给夏文湘所在单位党委复了信，肯定了夏炯确实曾经支援过红四方面军一批物资，也肯定了他在那一历史时期的功绩。复信全文如下：

石河子红山嘴电厂党委：

你厂夏文湘同志来信，请徐向前同志谈其父夏炯的情况。经徐向前同志回忆，夏炯与当时红四方面军秘密谈判确有此事。同时夏炯还为我红军解决许多医药、军需物资，对红军帮助很大。

此事当时是张国焘、陈昌浩具体商量决定的，徐向前同志当时在前方打仗，虽知此事，但详细情况不清楚。

请将此情况转告夏文湘同志。其父夏炯在四川与红军接触的这一段，肯定是办了好事的，对中国革命也是有一定贡献的。

现将夏文湘同志的来信转去，请阅处。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印）

一九八二年三月九日

徐向前同志的证明，不但给夏炯的历史作了证明，同时也证明了杜重石对贺龙所说的话不是如李宗林所想象的是“杜撰”、是“为阶级敌人涂脂抹粉”、是“懵共产党”的。

问题已经澄清，可是付出的代价却太大太大了！

杜重石为这不平事，曾写过一篇史料，在1984年6月出版的《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发表。标题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与川军的一次谈判》。文章很长，这里就不转引了。

俱往矣。痛定思痛，我们并不埋怨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许多人挨了一棍子之后，噤若寒蝉，什么话也不敢说了。这种人，不说他爱党爱国之心是假的，至少是不够。

杜重石老先生，身经几十年的冤枉，平反以后，“家破人已嫁”，如今只落得晚景凄凉，如果斤斤计较于自己的得失，他就只能在怨天尤人中打发光阴，就只能在牢骚满腹中过日子。但他不是这样，而是通过自身的实例，总结出历史经验，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意见反馈给党和政府。

如 1989 年 3 月 8 日他在写给原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的信中提到的十大问题，大致内容如下：

（一）健全法制建设，依法办事。（二）教育为立国之本，应加大教育投入，适当提高教师待遇。（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权威。（四）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知错改错，树立良好的党风、政风，取信于民。（五）政法部门要依法查处大案要案，敢于碰硬。（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何人犯罪一律以法论处。（七）党政官员要廉政高效，对失职、渎职者应引咎辞职。（八）与政协提案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对提案应持慎重负责的态度，以防敷衍塞责。（九）人大和政协应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十）关心群众生活，稳定市场物价，并予监督检查，持之以恒。

再如 1993 年 11 月 10 日，杜重石再次致函朱镕基副总理，重申“在一定岗位上的领导干部如有不可推卸的渎职行为应引咎辞职”的观点等。这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有些已被采纳。

杜重石先生的一生，为党和人民做过许多好事，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过不朽的功勋。尽管经历坎坷，但他对党对祖国的热爱，虽九死而无悔。如果仔细地写起来，100 万字也打不住。如今只用二十几万字浮光掠影地写完了他的主要事迹，难免挂一漏万。只希望能把他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赤子之心、拳拳之意表达出来，传播给大家，让大家都来学他这种表里如一、不计个人得失，把自己放在国家进步、民族团结、文化提高、经济发展的共产主义事业中的坦荡胸襟，于愿已足。

最后，不揣冒昧，还要对杜老先生的一生总评一句：在人生的道路上，他所走过来的路，是一条正路，尽管这条路布满了荆棘，而且如此坎坷，他都一如既往，毫不动摇地走下去。

